#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劳工和政治的跨学科视角



大卫·钱德勒和克里斯蒂安·福斯主编

# 《数字对象——数字主体: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劳工和政治的跨学科视角》

大卫·钱德勒和克里斯蒂安·富克斯主编

威斯敏斯特大学出版社www.uwestminsterpress.co.uk

出版单位:
威斯敏斯特大学出版社
101 Cavendish Street
伦敦W1W 6UW
www.uwestminsterpress.co.uk
Text©编辑和几位贡献者2019
2019年首次发布
封面:Diana Jarvis
在英国印刷的闪电源有限公司。由Siliconchips Services有限公司排版的印刷及数码版本。
ISBN(精装版):978-1-912656-08-0
ISBN (PDF): 978-1-912656-09-7 ISBN (EPUB): 978-1-912656-10-3 ISBN (Kindle): 978-1-912656-11-0 ISBN(平装版):978-1-912656-20-2 DOI: https://doi.org/10.16997/book29
本作品遵循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非衍生品4.0国际许可协议。要查看本许可协议的副本，请访问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或致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卡斯特罗街444号900套房知识共享地址94041。
本许可证允许复制和分发作品，前提是作者归属清楚地说明，您不将该材料用于商业用途
并且修改后的版本不会被分发。
本书全文经过同行评议，确保高学术水准。完整的评审政策请见:http://www.uwestminsterpress.co.uk/site/publish。利益冲突:编辑和投稿人声明
他们在出版本书时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建议引用:
钱德勒,D.和富克斯,C.(编)2019。*数字对象、数字主体: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劳工和政治的跨学科视角*。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出版社。DOI: https://doi。org/10.16997/book29。许可:CC-BY-NC-ND 4.0
要在线阅读本书的免费开放获取版本，请访问http: https://www.uwestminsterpress。co.uk/site/books/10.16997/book29或用移动设备扫描此二维码:

# 内容


1. 导论:大数据资本主义-
政治、行动主义和理论 1
*克里斯蒂安·富克斯和大卫·钱德勒*

**第一部分:数字资本主义和大数据资本主义 21**

2. 人类世的数字治理:the Rise of the
相关机器(Correlational Machine) 23
*大卫·钱德勒*

3. 超越大数据资本主义，走向辩证数字化
现代性:对大卫·钱德勒章节的反思 43
*克里斯蒂安·富克斯*

4. 大数据资本主义时代的卡尔·马克思 53
*Christian Fuchs*

5. 大数据批判的利害关系是什么?反思
克里斯蒂安·富克斯的章节 73
*大卫·钱德勒*

6. 像半机械人一样看东西?《后人类的纯真》
知识 81
*Paul Rekret*

7. 作为光谱的后人文主义:对保罗·雷克瑞特的反思
第1章 95
*罗伯特·考利*

**第二部分:数字劳动 101**

8. 透过生殖镜头:劳动与斗争在
文化与经济的交集 103
*Kylie Jarrett*

9. 推特社交工厂中的矛盾:反思
Kylie Jarrett’s Chapter 117
*Joanna Boehnert*

10. E(a)有效不稳定性、控制和阻力
-数字化工作场所 125
*Phoebe V. Moore*

11. 超越压抑:对菲比·摩尔章节的反思 145
*Elisabetta Brighi*

12. 再见，我的奴隶:通过制作替代主题
数字对象 151
*邱林川杰克*

13. 工资工人，不是奴隶:对邱林川一章的反思 165
*彼得古德温*

**第三部分:数字政治 169**

14. 批判还是集体?传播资本主义与
政治主体 171
*乔迪·迪恩*

15. 批判的主题、语境与模式:反思
Jodi Dean’s Chapter 183
*Paulina Tambakaki*

16. 《纲领党:政治的转型》
-大数据时代的组织 187
*Paolo Gerbaudo*

17. 运动党-赢得选举和
数字化时代的民主转型:对
保罗·格博多的章节 199
*安娜斯塔西娅·卡瓦达*

18. 固定资本的挪用:一个隐喻? 205
*安东尼奥·内格里*

19. 数字机器的挪用与挪用
固定资本作为社会存在的现实占有:
对托尼·内格里《章》的反思 215
*克里斯蒂安·富克斯*

编辑和撰稿人 223

索引 227

# 第一章

# 引言
## 克里斯蒂安·富克斯和大卫·钱德勒

### 1. 简介

2017年5月，《*经济学人*》封面刊登了一篇关于大数据的专题文章，题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资源”。这篇专题文章认为，数据是世界的新石油。数据将推动21世纪的发展，就像石油在20世纪初改变了世界经济和社会一样。这些流行的话语声称，大数据提供了产生知识的新方法，将带来创新和创造的可能性。

在*经济学人*发表大数据专题的同一个月，我们在威斯敏斯特大学组织了跨学科研讨会“数字对象，数字主体:大数据资本主义时代的行动主义，研究与批判”(2017年5月20日至21日)[1]。研讨会由威斯敏斯特高等研究所和政治与国际关系系主办。国际知名专家就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数字研究做了十场演讲。这个编辑过的合集是会议的产物，并提供了对所作演讲的进一步思考。

我们特别感谢威斯敏斯特高等研究所的丹尼斯·罗斯·汉森，她出色地组织了这次会议，并支持我们将这本书出版。我们还要感谢威斯敏斯特大学出版社的安德鲁·洛克特对出版这本书的兴趣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Fuchs, C. and Chandler, D. 2019. Introduction Big Data Capitalism - Politics, Activism, and Theory.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1–20.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I: https://doi.org/10.16997/book29.a. License: CC‑BY‑NC‑ND 4.0

书和他的编辑帮助。我们还要感谢来自传播与媒体研究所和民主研究中心的同事们，他们担任了主席和受访者，也感谢演讲者、撰稿人、志愿者、口译员、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他们的工作帮助会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关于“数字转向”的出现，人们提出了许多主张，据说通过破坏传统的现代主义主体/客体、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公共/私人、消费/生产、时间/空间、精神/身体、劳动/休闲、文化/自然的二元二元，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的可能性。人类/后人类(posthuman)。这一转变经历了几个阶段，包括控制论、自动化技术、大型计算机、数据库、人工智能、个人电脑、万维网、智能手机、地理信息系统、社交媒体、有针对性的数字广告、自我量化、大数据分析、云计算和物联网。

这本文集介绍了数字化对社会影响的跨学科评估。这些贡献质疑了数字乐观主义和数字悲观主义的主张。数字乐观主义者断言，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带来了新的社区形式、认知和感知的替代方式、创造性创新、参与式文化、网络化行动主义和分布式民主。数字悲观主义者认为，数字技术并没有带来积极的变化，而是通过新的控制形式加深和扩大了统治。悲观主义者谈到了网络威权主义、数字去人性化、-异化2.0、网络剥削和监控社会的兴起。

这些章节涉及与行动主义、研究和批判相关的数字问题。它们涉及数字行动主义的可能性、潜力、陷阱、限制和意识形态。他们思考计算社会科学、数字人文学科和无处不在的数据化是否会催生新的研究方法，还是会导致威胁批判性研究独立性的数字实证主义，并可能导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死亡。本书探讨了数字主体和数字客体时代批判的未来、场所和可能性。

本书提出的主要问题是:数字化对主体、客体和社会的关键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通过三个镜头来审视:数字资本主义/大数据资本主义、数字劳动力和数字政治。这三个视角构成了本书的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由六章组成:三个陈述，每个陈述后面都有一个评论或回应。第一部分关注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整体社会。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受到计算机技术的塑造，数字资本主义就存在。近年来，大数据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导致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新维度出现。大卫·钱德勒、克里斯蒂安·富克斯和保罗·雷克瑞特的三篇文章，以及三篇评论(克里斯蒂安·富克斯对大卫·钱德勒的评论，钱德勒对富克斯的评论，罗伯特·考利对保罗·雷克瑞特的评论)，主要关注数字资本主义

以及大数据的各个方面。钱德勒讨论了大数据资本主义如何带来一种以相关性为重点的新形式的数字治理。富克斯认为，卡尔·马克思帮助我们批判性地理解数字资本主义和大数据资本主义。Paul Rekret在数字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批判了Donna Haraway和Bruno Latour的后人类主义方法。

当我们批判地分析资本主义时，正如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的副标题所表明的那样，我们是在处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有经济的一面和政治的维度，两者是相互作用的。第二节和第三节探讨数字政治经济学。第二节关注数字劳动，第三节关注数字政治。

第二部分的三章——由凯莉贾勒特、菲比摩尔和杰克L.邱撰写——聚焦于一系列关于数字时代劳工和阶级的问题:数字家政工人(贾勒特)、数字工人的量化自我(摩尔)和数字时代的奴隶制(邱)。乔安娜·博纳特评论凯莉-贾勒特，伊丽莎白·布里吉评论菲比摩尔，彼得·古德温评论杰克L.邱。

第三部分的三章——由乔迪·迪恩、保罗·格博多和托尼·内格里撰写——讨论了数字政治的各个方面，即传播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社会运动(迪恩)、数字时代的政党(格博多)，以及社会斗争如何推进数字替代方案的问题(内格里)。Paulina Tambakaki评论乔迪·迪恩, Anastasia Kavada评论保罗·格博多, Christian 富克斯评论托尼·内格里。

这三个部分加在一起，连同他们的九场演讲和随附的评论表明，在当代数字资本主义中，我们面临着主体和客体的矛盾，统治和剥削的结构威胁着社会凝聚力和民主。数字统治和对数字劳动力的剥削是塑造数字资本主义的霸权结构力量。但这种情况并非毫无希望，因为存在着可以建立替代方案的斗争潜力。例如，在数字资本主义内部，建立数字公地社会的潜力正在显现。因此，托尼·内格里(Toni Negri)在他的文章中问道，我们如何才能在政治上恰当地利用数字机器。推进数字公地和建立公地社会的兴趣是一种政治视角，它将本书的许多贡献结合在一起。

在对收集的卷的介绍的其余部分，我们将讨论数字主体和数字对象的关系(第2节)和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概念(第3节)，这构成了本书中九个演讲和回应的背景和背景。

## 2. 数字主体/数字对象(Digital Subjects/Digital Objects

本卷涉及数字社会中客体和主体正在经历的变化。它询问大数据和数字化对主体、客体和社会的关键影响是什么。

计算和数字化并不仅仅是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现象。数字逻辑的历史要长得多。早在1703年，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就建议将数学建立在二进制逻辑的基础上，而不是十进制的基础上:“但多年来，我一直使用最简单的数列，即以2为进的数列，因为我发现它对数字科学的完善很有用。”因此，除了0和1之外，我不使用其他字符，当到达2时，我重新开始”(莱布尼茨1703,np)。在计算机的历史上，开创性的工作是由查尔斯巴贝奇和艾达洛夫莱斯在19世纪完成的。巴贝奇和洛夫莱斯之所以领先于他们的时代，是因为19世纪的技术标准集中在马克思(1867/1976)所说的大规模工业上，而不是建造一台计算机。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计算设备可以追溯到艾伦·图灵在1936年发明的图灵机的概念。0和1的数字逻辑是图灵机运行方式的一个关键特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图灵为英国军方制造了计算机，以破译纳粹的编码信息。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力量的战争，也是第一次计算和数字战争。图灵机的例子表明，计算和数字总是站在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如今，数字计算无处不在，塑造着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资本主义、治理、日常生活、文化、教育、福利和科学。

技术一直在影响着人类的能力。因此，我们不能轻易地将技术客体与人类主体分开。计算机，这个数字机器，从一开始就改变了主体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和互动方式。在战争史上，我们已经从肉搏战发展到远距离杀伤，通过计算机化的技术，智能炸弹、杀手机器人、无人机暗杀和先发制人的战争成为可能。这些技术不仅使战争在空间和时间上变得更加遥远，而且也使战争在道德上变得遥远。数字战争的例子告诉我们，数字机器改变了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和构成的方式。

这本经过编辑的文集聚焦于数字生活的最新阶段和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我们称这一最新阶段为“大数据资本主义”。生成大数据的算法如今已成为政治和伦理问题的核心，但对于算法知识的独特性，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共识。

联合国认为，大数据分析对于解决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至关重要，从粮食短缺到冲突和环境危机。例如，联合国全球脉动项目(UN Global Pulse)通过收集和分析印尼雅加达4万多条有关食品价格的推文，开发了一个实时食品价格变化模型。不那么无私的是，大数据对脸书及其用户也至关重要，这些用户分享了超过50亿条帖子

每天上传超过3亿张图片。每分钟发表评论超过50万条。脸书 2016年102亿美元的广告利润是通过分析用户活动和内容产生的大数据来定位用户而产生的。

像伦敦和巴塞罗那这样的“智慧城市”部署了大数据分析，以更有效地管理这些城市综合体。为了管理交通流量和创新交通方式，伦敦交通局(TfL)每天收集并分析2000万张牡蛎交通卡。在巴塞罗那，超过2万个智能电表安装在垃圾箱、路灯和其他基础设施上，收集社会环境大数据。在每年营业额近500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公司沃尔玛，一个分析团队实时分析数百个数据流，包括客户数据、销售数据、气象数据、社交媒体数据以及事件和位置数据，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对新兴趋势做出快速反应，从而提高销售额，满足客户的感知需求。在灾害风险(联合国全球脉动)、媒体和通信(Facebook)、智慧城市(伦敦交通局)和商业(沃尔玛)等领域，这些例子展示了数据收集和分析的数量、种类和速度。大数据改变了我们在不同领域的认知方式，算法知识正在影响着日常实践和流程。本书旨在阐明，当知识、主体、客体和社会变得数字化和算法化时，什么是利害攸关的。跨时间和空间相关性的算法检测使大数据方法能够在“实时”场景中运行，例如雅加达的食品价格，伦敦交通局的交通数据管理，Facebook的广告实践以及沃尔玛的零售策略。

虽然对大数据的含义没有一致的定义，但它往往被理解为与数量、种类和速度有关(Kitchin 2014, 68)。大数据的*量*是指大到人类无法处理和分析，只能由机器驱动的算法处理和分析的数据集。大数据有*各种*各样的来源和类型。大数据具有高*速度*:它是实时产生、流通和行动的，而且速度非常快。

互联数字设备，如闭路电视、无人机摄像头、物联网传感器、Twitter、b谷歌、Facebook、智能手机、联合国全球脉动技术、智慧城市技术、新闻推送、天气预报站、人口和人口数据收集器、价格和经济数据工具，或沃尔玛的数据收集方法，创造源源不断的数据流。算法知识使大数据分析能够通过关联这些数据流来识别和分析事件模式，从而实现对世界的新理解和新方式。

在哲学上，理性主义传统认为知识存在于固定的因果关系中，存在于独立于经验且先于经验的实体的固定属性或本质中，而经验主义则认为知识是经验性的、情境性的，是通过人类感官获得的。伊曼努尔·康德提出了一种认识论，强调了它的重要性

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的区别。"就知识服从感性法则的程度而言它是感性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服从智力法则，它是理智的或理性的”(康德1770,50)。算法知识破坏了这种区别。

算法是在数学和计算中发现的一个概念，长期以来一直与追求理性形式的知识联系在一起。算法是解决问题的可靠的、可定义的程序。算法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数学的起源”(Henderson 2009, 7)。今天，算法不仅计算现有数据，而且通过寻找相关性来开发新形式的“感官”或“经验”知识。算法知识寻求发现模式和关系，使人们能够以新的方式观察、感知、响应和适应复杂出现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康德对通过大脑的反射能力获得的理性知识和通过感觉器官获得的经验知识的区分就失效了。数字机器通过传感器产生大数据，从而模拟和自动化人类体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伦理理性存在于机器中，这导致了自动化决策。认知和感知似乎成为跨越人类/机器鸿沟的统一算法程序。本卷更深入地探讨了数字转换，并询问它们对我们理解主体和客体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在社会中运作的影响。

大数据研究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参见Mayer-Schönberger和Cukier 2013, Kitchin 2014, Mosco 2014)，涉及大数据和算法知识如何改变经济，政治，文化和环境。与不断增长的研究数量相匹配的是有关大数据的出版物。2017年夏天，Web of Science列出了2014年、2015年、2016年发表的约5800篇标题中含有“大数据”的文章。大数据研究产生影响的重要领域包括灾害研究、媒体/传播研究、智慧城市以及管理和组织研究。

在灾害研究中，大数据越来越多地用于预测和预防灾害，并尽量减少灾害对人类和自然的影响。大数据也用于灾害响应，其中无人驾驶飞行器(也称为无人机)收集有关灾害现场的数据，而机器学习算法则识别与灾害相关的数据中的模式。灾前灾后越来越多地部署数字人道主义。数字人道主义“研究了技术和大量数字数据的新用途如何改变社会准备、响应、应对和最终理解人道主义灾难的方式”(Meier 2015, xi)。当涉及到处理广泛的国际问题时，大数据分析和新信息技术越来越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发展(Coyle 和 Meier 2009)， 冲 突 (Karlsrud 2014, USIP 2013, Himelfarb 2014)和自然灾害(Meier 2015)。大数据分析

是实施UN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的关键:“更多样化、更综合、更及时和更可信的信息可以带来更好的决策和实时的公民反馈。这反过来又使个人、公共和私营机构以及公司能够做出对他们自己和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有利的选择(UN，2014年)。”联合国呼吁开展“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数据革命”，认为“改善数据本身就是一项发展议程”。通过提供更多的数据，可以更有效地适应社会各阶层出现的问题，从而缓解贫富差距(UN，2014年)。事实上，“数据差距”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不平等加剧的原因(Stuart et al. 2015)。

在媒体与传播学研究中，大数据被用于通过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交流，产生对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的新理解。大数据改变了人类交流的参与者、结构、系统、内容、效果、背景和权力结构。boyd和Crawford(2012)认为，大数据给传播研究、知识、研究伦理和权力结构带来了挑战和机遇。例如，关于大数据的传播研究侧重于在线议程设置和在线关注(Neuman et al. 2014)，有针对性的在线广告中的大数据分析(Couldry & Turow 2014)，大数据在传播力量方面的作用(Andrejevic 2014)，数据新闻(Fink & Anderson 2015)，自动文本提取和分类作为衡量文化的工具(Bail 2014)，竞选期间政治传播的分析(Larsson & Moe 2012)，以及对用户态度和行为的预测(例如他们的政治派别，参见Colleoni et al. 2014)。2014年，《*大数据与社会*》期刊创刊。从2014年到2016年，它发表了130多篇文章，表明大数据传播研究是媒体/传播研究的一个蓬勃发展的子领域。

智慧城市和市民传感器的研究分析了大数据如何改变城市生活(Greenfield 2013, Kitchin 2014, Krivy 2016, Thrift 2014, Townsend 2013)。大数据的发展和应用正在推动人们对城市治理和规划认识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在无处不在的传感技术(通常被称为物联网)的帮助下进行的，通过物联网，连接到道路、垃圾箱和路灯等日常物品的数字设备，可以实现新的城市管理形式。许多关于大数据应用的研究认为，新的数字技术可以使公民和政府以更有意义的方式联系起来，赋予社区权力，传播知识，更好地控制公共产品和服务。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已经居住在城市，到2050年，预计全球75%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世界各地的许多城市都在寻求通过使用网络、数字技术和城市大数据来解决一系列问题，如改善治理和服务提供，创建更具弹性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展当地经济，

提高可持续性，改善流动性，为集体活动提供更大的透明度和问责制，提高生活质量，增加安全和保障。简而言之，我们的愿望是利用数字技术改善公民的生活，推进城市管理，促进经济发展。

在管理和组织研究领域，利用大数据来了解消费者和用户的个人偏好、品味、生活方式、行为选择、态度、兴趣等。将大数据应用于个人，可以实现差异化定价和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广告。大数据还改变了生产过程的方方面面，包括对员工的监控以及对产品、运输和物流的监控和数据化。大数据也被用于理解和预测金融市场的发展。George等人(2014)认为，大数据使组织能够同一性新的市场和产品，收集新的管理知识，并跟踪工作组成员。其他研究侧重于如何使用大数据来管理产品的生命周期(Li et al. 2015)以及管理供应链(Hazen et al. 2014)。b谷歌的首席经济学家Hal R. Varian(2014)认为，大数据分析应该被用作经济学的标准研究方法(另见Einav & Levin 2014)。另一项研究被称为消费者分析(Erevelles et al. 2016)。这侧重于分析消费者的兴趣和满意度，以及确定品牌战略(Tirunillai & Tellis 2014)。即使如此简短的总结也表明，大数据研究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研究领域。然而，与此同时，它又是高度碎片化的。大数据研究人员经常忙于复杂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他们很少有时间或机会去反思理论、方法、知识和社会在算法知识时代所经历的广泛变化。本作品集试图通过数字资本主义、劳工和政治的视角来审视大数据的应用和新形式的算法治理，从而弥补这一差距。

《连线》*(Wired)*杂志前编辑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曾有一句名言:大数据和算法知识的发展终结了对理论、因果模型和假设的需求:“有了足够的数据，数字就会为自己说话……[当]面对海量数据时，这种[传统的]科学方法——假设、模型、测试——已经过时了”(安德森，2008)。大数据预示着一场认识论革命。有人声称，大数据将使现有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过时，并将意味着理论的死亡。无论如何，大数据正越来越多地打破学科界限，因为它关注背景，揭示看不见的关系。

Savage和Burrows(2007)讨论了研究方法、理论和认识论在大数据时代是如何变化的。他们认为，研究方法的“套路”“需要重新思考”，以便有“更多的反思”

[…]由他人收集的社会数据的激增[…][和]方法的激进混合加上新的批判性反思”(Savage和Burrows 2007,895 - 896)。Evgeny Morozov (2014)指出，大数据也对道德和政治监管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当一个人有传感器和反馈机制时，为什么要依赖法律?如果政策干预要做到——用当今的流行语来说——“以证据为基础”和“以结果为导向”，那么技术就可以提供帮助。Savage和Burrows强调大数据方法的重要性，而Morozov(2014)则提醒我们算法知识的政治和伦理含义。

构成数字转型和大数据资本主义的各种过程在认识论、本体论和伦理意义方面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本卷试图通过九篇演讲和回应来解决这一缺陷，这些演讲和回应共同使用和发展了批判政治经济学、治理学研究、政治理论和传播理论领域的概念工具。政治经济学是“理解经济如何运作以及它们如何与周围更大的社会相互作用的独特方式”(Wolff和Resnick 2012, 1)。治理学研究是分析“任何政府方法”的研究领域(Foucault 2008, 13)。“真正的政府实践的发展”及其在“主权行使”中的合理化(22)。

本书概述了数字和大数据资本主义对政治、行动主义和理论的影响。它涉及数字主体和客体的转换所产生的关键认识论、本体论和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以下内容:

· 数字化如何影响治理和权力的逻辑?
· 数字化如何改变知识的本质和对因果关系的理解?
· 数字化如何处理不确定性、风险、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的新问题?
· 数字如何影响批判、行动主义和政治组织?
· 数字如何与资本主义和劳动力内部的变化相互作用?
· 批判理论如何解释数字在社会中的作用?
· 数字如何影响再生产和性别关系?
· 数字化如何改变文化与自然、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数字技术如何塑造人类世?

## 3. 大数据资本主义[2]

虽然大多数社会观察家都会同意资本主义关注的是资本的积累，但对于如何定义资本、谁生产资本，并没有普遍的共识。马克思(1867)和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认为资本就是货币

这是通过剥削劳动力和销售商品而增加的。布迪厄(Bourdieu, 1986)的追随者认为资本更具普遍性，延伸到政治和文化领域。布迪厄区分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资本，并使用了符号资本的概念，他声称符号资本与所有其他形式的资本相互作用。

无论人们如何定义资本和资本主义，许多学者和观察家都同意，资本主义是一种基于金钱和权力积累逻辑的社会形态。为了这个目的，它试图将一切都工具化，因此产生了一个基于霍克海默(2004)所说的工具理性的高度工具化的社会。

如果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那么数字资本主义可能是其发展的一个阶段和阶段，或者是生活和社会生产的一个维度和模式。反过来，大数据资本主义是在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统治和剥削等更广泛的背景下表示数字最新发展的一种方式。

关于数字化的基本社会学问题是，我们应该将数字化转型置于资本主义和社会的哪个层面。我们可以说有四个主要立场。第一种观点认为，数字化构成了社会的彻底变革，这样我们就不再生活在资本主义或现代社会中，而是生活在一种全新的社会类型中。例如，Nico Stehr(1994)认为，知识社会意味着“劳动和属性的时代已经结束”(ix)，而“知识社会的出现首先标志着*经济结构*的彻底转变”(10)，因此，“经济活动的新结构和新组织的出现”(122)。对于曼纽尔·卡斯特来说，在世纪之交写作时，“网络社会”的兴起意味着一个“新世界正在形成”(卡斯特2000,367)。卡斯特还认为，“信息技术革命催生了信息主义的出现，作为新社会的物质基础”(卡斯特2000,367)。

第二种更为批判的立场认为，信息社会话语是一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它将信息技术呈现为构成一个彻底的新社会，一个促进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决定论的社会。例如，Garnham(1998/2004, 165)认为，信息社会理论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掌权者所青睐的合法化意识形态”。沃尔特·朗西曼(1993,65)认为，“不能声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任何新的子类型已经出现[…]”术语，如“管理”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或“社团”资本主义都产生了更多的混乱，而不是启发”(朗西曼1993,54;也可参见Freedman 2002)。

这种持怀疑态度的思想虽然承认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对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社会的假设提出了质疑。然而，这种方法也有其多样性。所以，第三，我们找到了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导维度或类型的立场。第四，有一些观点认为

认为数字社会/资本主义是一种被纳入其他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形式或发展。

第三种观点认为，数字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导维度或类型。这种假设可以在谈论认知资本主义的方法中找到。认知资本主义理论在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方法中得到了特别的推进。Yann Moulier-Boutang(2011)认为，认知资本主义“建立在非物质资本的积累、知识的传播和知识经济的驱动作用之上”(50)。“我们可以区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三种主要形态:第一，商业资本主义，它建立在商人和金融积累机制的霸权基础上，并在16世纪初至17世纪末之间发展起来。接下来是工业资本主义，它的基础是物质资本的积累，以及大规模生产标准化商品的大型曼彻斯特式工厂的驱动作用。然后是“认知资本主义”(50)，被称为“第三种资本主义”(56)。

Jean-Marie Monnier和Carlo Vercellone(2010)认为，认知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历史积累体系”，其中“劳动的认知和智力维度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取代了以前固定资本和物质劳动的中心地位”(76)。“工业资本主义继承了商业资本主义，然后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积累体系，称为认知资本主义”(76)。“认知资本主义是一个重组过程的结果，通过这个过程，资本试图控制知识生产的集体条件，并倾向于吸收和重新定向其能量，以实现资本积累的新逻辑”(83)。

托尼·内格里(2008)谈到了“*认知资本主义时代*”，它紧随“制造业阶段和随后的重工业阶段”。在这个认知时代，价值的生产越来越依赖创造性的智力活动”(64)。“非物质劳动力(涉及沟通、合作、情感的生产和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无产阶级构成中都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哈特和内格里2000年，53页)。非物质劳动构成了“第三种也是当前的范式，在这种范式中，提供服务和操纵信息是经济生产的核心”(哈特和内格里, 2000,280)。“当代属性的主导人物——包括代码、图像、文化产品、专利、知识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物质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是无限可复制的”(哈特和内格里, 2017,187)。托尼内格里将非物质生产的数字方面描述为数字组合(参见他对本书的贡献)。

对于Franco ' Bifo ' Berardi来说，向数字资本主义的转变“标志着从连接连接的认知模式向连接连接模式的转变”(2015,11)，他的意思是对具身经验的否定。因此，“有了数字化，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个过程的终点。

不断增加的抽象性，以及理解与同理心日益分离的顶点”(17)。这对于通过将世界简化为代码和符号数字化来理解算法治理至关重要。对于Beradi来说，资本主义的当代阶段是“半资本主义”，语言和经济结合在一起。这是因为任何一种生产(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是一个“信息(算法、数字、数字差异)的组合与重组”的过程(113)。因此，在这个新阶段，“数字抽象为资本主义抽象增加了第二层”(161)。在这个抽象的过程中(跟随鲍德里亚)，符号增殖并相互作用，失去了与其原始所指物或意义的任何联系。

Berardi提出了重要的一点，即大数据资本主义对治理有影响，因为“技术功能的抽象连接取代了有意识的阐述、社会谈判和民主决策”(Berardi 2015, 217)。换句话说，“a-signifying片段的自动连接取代了秩序的对话阐述，适应取代了共识”(Berardi 2015, 217)。算法治理通过模式识别来响应或适应扰动和变化，而不是通过创造知识或解释行为。

这种与创造力和判断的具身过程的分离或异化也在Maurizio 拉扎拉托(2014)的*《符号和机器》中得到了体现*。拉扎拉托认为，大数据资本主义可以被理解为通过机械奴役产生的主体性，这是他从德勒兹和瓜塔里那里得到的概念:一种“不再区分人与非人、主体与客体、词与物”的组合(拉扎拉托2014,13)。拉扎拉托所说的“奴役”是指自动治理、控制和监管的控制论概念，“确保功能整体的凝聚力和平衡”(25)。在这个过程中，人既不独立于机器，也不凌驾于机器之上，而是与机器相连，并在机器过程内部，作为又一个分子组成部分，与其他组成部分进行组合和重组。

对拉扎拉托来说，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意味着“一个人总是在一个集合、一个集体中行动，在这个集体中，机器、物体和符号同时是‘代理人’”(30)。因此，资本主义是一个“符号学操作员”，管理着直接作用于物质流动的指定符号(没有主体作为指涉物)的流动:“货币、经济、科学、技术、艺术等等的符号机器并行或独立地发挥作用，因为它们产生或传达意义，并以此方式绕过语言、意义和表征”(60)。拉扎拉托还指出了产生存在并超越人类世的变革性影响。在此背景下，他借鉴了布鲁诺·拉图尔的研究成果:

> 通过指定符号学，机器“说话”，“表达自己”，并与人、其他机器和“真实”现象“交流”。

> 通过“权力符号”，它们与物质的原子和化学层次，生物的生物层次的表达和内容相互作用[…]机器和指示符号学能够“看到”这些层次，“听到”它们，“闻到”它们，记录它们，排序它们，并转录它们。这是人类的感官和语言所无法做到的。(87-88)

在由数字资本主义实例化的新的存在和思想形式中，主体不再被插入为*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理性的反思主体。对于拉扎拉托来说，“我们已经超越了”“认知资本主义”(100)及其对数字客体和数字主体的二元语言和表征结构的特权。相反，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从“工作”到“过程”、从“从属”到“奴役”的转变(119)。

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数字化转型应该处于什么水平，大卫·哈维是第四种观点的代表。他将当代资本主义描述为一种灵活积累的制度(哈维1989年)，一种新帝国主义(哈维2003年)和一种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哈维2005年)，这些都是基于剥夺和金融化的积累过程。这些构成了潜在的实际危机，因为真正的积累与虚拟资本的积累是不同的。在哈维看来，在资本主义的整体转型中，数字技术起着中介作用。它们是压缩时空的工具。“我使用‘压缩’这个词，因为一个强有力的例子可以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一直以生活节奏的加快为特征，同时克服了空间障碍，以至于世界有时似乎向我们内部崩溃”(哈维1989,240)。对哈维来说，资本主义的这些变化条件要求并呼唤数字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化和电子通信已经强调了金融流动的即时国际协调的重要性”(哈维1989,161)。“空间的生产考察了土地使用、运输和通信、领土组织等新系统(实际的或想象的)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新的表现模式(如信息技术、计算机化制图或设计)是如何产生的”(哈维1989,222)。

哈维在其最新著作《*马克思资本与经济理性的疯狂*》(2017)中阐述了数字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的作用。“最初被设想为协作生产开放获取公地的解放制度，已经转变为资本自由喂养的超剥削制度。大资本(如亚马逊和b谷歌)肆无忌惮地掠夺由自我熟练的劳动力生产的免费商品，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这延续到所谓的文化产业”(哈维2017,96)。“有趣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具活力的发展领域，如b谷歌、Facebook和其他数字劳动力领域，都在增长。

在自由劳动力的支持下非常快”(哈维2017,102)。“工厂劳动力在世界某些地区(如东亚)仍占主导地位，但在北美和欧洲，它已大大减少，并被各种其他劳动力系统(数字劳动力等)所取代”(哈维 2017, 57)。

哈维承认当今数字劳动力和数字资本的相关性，但同时警告不要假设它们构成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强调，在数字产业内部，以及在整个资本主义内部，体力劳动和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旧不平等仍然具有相关性。“例如，在数字劳动力的情况下，已经出现的劳动实践与18世纪末英国早期纺织品制造业的推出系统惊人地相似”(哈维 2017, 104)。这就构成了对资本的重新定义:

> 是流动的货币，而不是流动的价值。这样的重新定义有助于将注意力集中在动荡的投机市场上，即文化、知识和创业努力的属性，以及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独特形式的资产市场上广泛存在的投机行为。因此有人声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知识至上的资本主义新阶段，一个基于知识及其所有节省劳动力的创新(如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辉煌的技术乌托邦即将到来，或者正如保罗·梅森(Paul Mason)等人所坚持的那样，已经到来了。从硅谷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重新定义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孟加拉国濒临倒闭的工厂，以及工业深圳和印度农村地区自杀率居高不下的就业区，这种重新定义就面目全非了。在这些地区，小额信贷已经撒开大网，助长了所有次贷危机的根源。(哈维, 2017, 105)。

哈维还强调，大数据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崇拜:“例如，有人认为，通过挖掘海量数据集来管理智慧城市的建设，可以解决所有城市弊病，从而使贫困、不平等、阶级和种族歧视以及通过驱逐和其他形式的剥夺积累来榨取财富的现象全部消失，这种想法显然是荒谬的。这即使不是反革命，也会适得其反。它在政治激进主义和城市现实、日常生活的快乐和痛苦之间制造了一种恋物迷雾——一种巨大的分心”(哈维2017,126)。

因此，这些是作者在大数据资本主义对社会的影响方面所持的主要立场。然而，有充分的证据对前两种立场提出质疑(Fuchs2008,2014)。第一种观点低估了权力和资本的连续性。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的新型社会中，那么导致失业、不稳定、民族主义和国际冲突的资本主义危机就必然需要这样做

已经被废除了。但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持续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伴随着国家危机和政治危机，这些危机共同构成了欧盟等政治形态的合法性危机。第二种立场高估了连续性，最终形成了一种静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模式。马克思的主要见解之一是，资本主义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进化的系统，它通过对劳动力的剥削、社会斗争和危机而生存和发展。资本主义通过改变自身而保持不变。它发展生产力，区分经济和社会生产关系，以再生产马克思所说的“整个旧狗屎”[3](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1846a/1959, 35)的异化和剥削。

数字技术的出现和分化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发展生产力需要知识(一般智力)和教育在社会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从而使数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新的品质(Fuchs 2016b, 2014, 2008)。第三和第四种观点不同意这种转变发生在资本主义组织的哪个层面，但他们确实同意资本主义是一个动态系统，数字机器的出现，数字资本和数字劳动是资本主义分化的一种表现，这种分化在今天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

计算机是一种通用机器，因为它可以将世界的许多方面变成数字模式。这一特性解释了计算机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原因。你智能手机上的应用程序几乎会告诉你你可能遇到的每一种情况，从告诉你在街上迷路时该怎么做，到在地铁上玩游戏作为消遣。但电脑的普适性还不够普遍。它把生活简化为可计算的:0、1和数量。计算机算法无法理解爱、伦理、道德、团结、关怀、情感和其他独特的人类品质。因此，将人类简化为计算和工具理性也带来了一定的危险，例如将数字机器用于剥削和统治。与此同时，人类对计算的使用也推动了合作、社区、团结、抵抗和社会性的新潜力，即使从资本主义内部来看，这些潜力也指向资本主义之外。因此，资本主义内部的计算机是对抗性的数字机器。数字和大数据资本主义是一种对立的社会形态，它加深了异化和剥削，同时推进了解放的潜力(Fuchs 2017)。

当代资本主义是多种资本主义相互作用和相互侵蚀的复杂统一体，包括金融资本主义、新自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数字/通信资本主义、超工业资本主义、流动资本主义、威权资本主义和大数据资本主义。(Fuchs 2014, Chapter 5)。这些维度之间的关系是可变的。具体资本主义现象在特定制度下的实证研究

时空显示了哪个维度对这种特殊现象起主导作用。例如，2014年，全球最大的2000家公司的利润中有33.5%位于FIRE行业(金融、保险和房地产)，19.0%位于移动行业，18.6%位于装配和制造业，17.3%位于通信和信息行业(见Fuchs 2016a)。表1)数据表明，跨国公司的结构在不同程度上具有金融资本主义、流动资本主义、超工业资本主义和信息/通信/数字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且这些维度相互渗透:硅谷和其他地方的数字媒体公司都是基于大量风险资本(一种特定类型的金融资本)的注入。他们的目标是在股票市场上进行首次公开募股。他们容易制造金融泡沫。数字通信既是流动性的因果，也是时空压缩的因果(Harvey 1989)。因此，人员和商品的运输一直在增长和加速。数字商品和数字公地并不是没有重量的商品。它们不仅需要信息劳动力，还需要资本对非洲和中国矿工和装配工的体力劳动的剥削，这些人处于国际数字劳动分工中(Fuchs 2014)。

金融资本主义、流动资本主义、超工业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和进一步的资本主义构成了一个辩证的资本主义统一体，它由相互关联的、矛盾的时刻组成。资本主义是动态地、历史地发展着的许多资本主义的统一。使这幅图景更加复杂的一个维度是威权资本主义。威权资本主义是一种资本主义形式，最近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背景下，它得到了加强，这就提出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威权资本主义如何相关的问题(Fuchs2018)。

## 附注

[1] See: https://icts-and-society. net/events/digital-objects-digital-subjects-a-symposium-on-activism-research-critique-in-the-age-of-big-data-capitalism-the-6th-icts-society-conference/

[2] This section was authored solely by Christian Fuchs.

[3] Translation from German to English [C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is passage from *The German Ideology* in the Marx and Engels-*Collected Works* is, as in many other cases, imprecise, as it translates ‘die ganze alte Scheiße’ (Marx and Engels 1845/1846a/1957, 35) as ‘old filthy - business’ (Marx and Engels 1845/1846b/1976, 49).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filth, including dust, mould, rubble, rust, cigarette butts, food particles and shit. So shit is just one type of filth, although certainly a particularly unpleasant one that you do not want to find mixed into your food, which

当然，这发生在不卫生的工业条件下，以牺牲人类健康为代价，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就是为什么理查德·林克莱特的电影《*快餐国度*》问，学校孩子和其他人吃的汉堡里是怎么来的便便。有迹象表明，各大连锁店出售的快餐确实是便便快餐(MacDougall 2017)。因此，仅仅说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污秽是一种低估。马克思最初的提法通过强调资本主义和大便的联系而说对了。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屎，它让我们被当作屎对待，生产屎，消费屎，吃屎。

## 参考文献


Anderson, Chris. 2008. ‘The End of Theory: The Data Deluge Mak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Obsolete.’ *Wired Magazine* 16 (7), 23 June. Available at: https:// www.wired.com/2008/06/pb-theory/ (accessed 14 May 2018)

Andrejevic, Mark. 2014. ‘The Big Data Divi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 munication* 8: 1673–89.

Bail, Christopher. 2014.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Measuring Culture with Big Data.’ *Theory and Society* 43 (3–4): 465–82.

Berardi, Franco ‘Bifo’. 2015. *And: Phenomenology of the End*. South Pasadena, CA: Semiotext(e).

Bourdieu, Pierre. 1986.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London: Routledge.

boyd, danah and Kate Crawford. 2012. ‘Critical Questions for Big Data.’ *Infor- 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 (5): 662–79.

Castells. Manuel. 2000a. *End of Millennium.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ume 3*. Malden, MA: Blackwell. Second Edition.

Colleoni, Elanor, Alessandro Rozza and Adam Arvidsson. 2014. ‘Echo Cham-ber or Public Sphere? Predicting Political Orientation and Measuring -Political Homophily in Twitter Using Big Dat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4 (2): 317–32.

Couldry, Nick and Joseph Turow. 2014. ‘Advertising, Big Data, and the Clear-ance of the Public Realm: Marketers’ New Approaches to the Content -Subsi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1710–26.

Coyle, Diane and Patrick Meier. 2009. *New Technologies in Emergencies and Conflicts: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Washington, DC: United Nations Foundation and Vodafone Foundation.

Einav, Liran and Jonathan Levin. 2014. ‘Econom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Sci- ence* 346: 715–21.

Erevelles, Sunil et al. 2016. ‘Big Data Consumer Analytic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keting.’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9 (2): 897–904.

Fink, Katherine and C. W. Anderson. 2015. ‘Data Jour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Beyond the “Usual Suspects”’. *Journalism Studies* 16 (4): 467–81.

Foucault, Michel. 2008.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Friedman, Jonathan. 2002. 'Modernity and Other Traditions.' In *Critically -Modern*, ed. Bruce M. Knauft, 287–313.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Fuchs, Christian. 2018. *Digital Demagogue: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rump and Twitter*. London: Pluto.

Fuchs, Christian. 2017. *Social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Second edition.

Fuchs, Christian. 2016a. Digital Labor and Imperialism. *Monthly Review* 67 (8): 14–24.

Fuchs, Christian. 2016b. *Reading Marx in the Information Age. A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Perspective on 'Capital Volume I'*. New York: Routledge.

Fuchs, Christian. 2014.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Fuchs, Christian. 2008. *Internet and Society: Social Theo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New York: Routledge.

Garnham, Nicholas. 1998/2004. 'Information Society Theory as Ideolog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Reader*, ed. Frank Webster, 165–83. New York: Routledge.

George, Gerard, Martine R. Haas, and Alex Pentland. 2014. Big Data and -Manage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7 (2): 321–26. Greenfield, Adam. 2013. *Against the Smart City.* New York: Do Projects.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17. *Assemb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avid. 2017. *Marx, Capital and the Madness of Economic Reason*. London: Profile Books.

Harvey, Davi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avid. 2003.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avi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Hazen, Benjamin et al. 2014. 'Data Quality for Data Science, Predictive Analyt-ics, and Big Data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154: 72–80.

Henderson, Harry. 2009. *Encyclopedia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Facts on File.

Himelfarb, Sheldon. 2014. 'Can Big Data Stop Wars Before They Happen?' *For- eign Policy*, 25 April.

Horkheimer, Max. 2004. *Eclipse of Reason*. London: Continuum.

Kant, Immanuel. 1770. *Kant's Inaugural Dissertation of 1770*.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William J. Eckoff. New York: Columbia College.

Karlsrud, John. 2014. 'Peacekeeping 4.0: Harnessing the Potential of Big Data, Social Media, and Cyber Technologies.' In *Cyberspa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eds. Jan-Frederik Kremer and Benedikt Mu□ller. 141–60. London: Springer.

Kitchin, Rob. 2014. *The Data Revolution: Big Data, Open Data, Data Infrastruc- tur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London: Sage.

Krivy, Maros. 2016. 'Towards a Critique of Cybernetic Urbanism: The Smart City and the Society of Control.' *Planning Theory*, Online First, DOI: https:// doi.org/10.1177/1473095216645631.

Larsson, Anders and Hallvard Moe. 2012. 'Studying Political Microblogging: Twitter Users in the 2010 Swedish Election Campaign.' *New Media & -Society* 14 (5): 729–47.

Lazzarato, Maurizio. 2014. *Signs and Machines: Capit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South Pasadena, CA: Semiotext(e).

Leibniz. 1703. 'Explanation of Binary Arithmetic'. Available at: http:// www.- leibniz-translations.com/binary.htm

Li, Jingran et al. 2015. 'Big Data in Product Lifecycle Management.' *Inter- 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81 (1–4): 667–84.

MacDougall, Lauren. 2017. 'A BBC Watchdog Test Found Levels of 'Poo Bacteria' in Drinks at KFC, McDonald's and Burger King.' *KentLive*, 28 June 2017.

Marx, Karl. 1867/1976. *Capital Volume I*.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1845/1846a/1959. 'Die deutsche Ideologie.' In *Marx-Engels-Werke (MEW), Band 3*, 5–530. Berlin: Dietz.

Marx, Karl. 1845/1846b/1976 'The German Ideology.'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olume 5*, 19–539.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Mayer-Schönberger, Viktor and Kenneth Cukier. 2013. *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 London: Murray.

Meier, Patrick. 2015. *Digital Humanitarians: How Big Data Is Changing the Face of Humanitarian Response*. Boca Raton, FL: CRC Press.

Monnier, Jean-Marie and Carlo Vercellone. 2010. 'Labour and Welfare State in the Transition to Cognitive Capitalism.' In *Cognitive Capitalism and its Reflections in South-Eastern Europe*, ed. Vladimir Cvijanovi□, Andrea -Fumagalli and Carlo Vercellone, 71–85.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Morozov, Evgeny. 2014. 'The Rise of Data and the Death of Politics'. *The Observer Online*, 20 July.

Mosco, Vincent. 2014. *To the Cloud: Big Data in a Turbulent World*. Boulder, CO: Paradigm.

Moulier-Boutang, Yann. 2011. *Cognitiv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Negri, Antonio. 2008. *Reflections on Empire*. Cambridge: Polity.

Neuman, W. Russell et al. 2014. "The Dynamics of Public Attention: Agenda-Setting Theory Meets Big Dat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4 (2): 193-214.

Runciman, Walter G. 1993. Has British Capitalism Changed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1): 53-67.

Savage, Mike and Roger Burrows. 2007. "The Coming Crisis of Empirical Sociology. Sociology 41 (5): 885-99.

Stehr, Nico. 1994. Knowledge Societies. London: Sage.

Stuart, Elizabeth et al. 2015. The Data Revolution: Finding the Missing Millions.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Thrift, Nigel. 2014. "The 'Sentient' City and What it May Portend' Big Data e Society 1 (1): 1-21.

Tirunillai, Seshadri and Gerard J Tellis. 2014. "Mining Marketing Meaning From Online Chatter: Strategic Brand Analysis of Big Data Using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51 (4): 463-79.

Townsend, Anthony M. 2013. Smart Cities: Big Data, Civic Hackers,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Utopia. New York: W.W. Norton & Co.

United Nations (2014) A World That Counts: Mobilising the Data Revolu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Prepared at the Request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 Geneva: UN.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for Peace (USIP). 2013. Sensing and Shaping Emerging Conflict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Varian, Hal R. 2014. 'Big Data: New Tricks for Econometric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8 (2): 3-27.

Wolf, Richard D. and Stephen A. Resnick. 2012. Contending Economic Theor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分段

# 数字资本主义和大数据资本主义

第2章

# 人类世的数字治理:相关机器的兴起

大卫·钱德勒

## 1. 简介

数字治理是一种新的治理模式，高度依赖于数据分析新技术的应用。从量化自我的技术到数据分析在学校和企业中的应用，再到通过国际合作倡议开发新的感知能力，这些新技术在当代社会得到了发展。后者包括联合国秘书长为研究和协调大数据在发展中的应用而设立的联合国“全球脉动”、世界银行开放数据促进复原力倡议(OpenDRI)、旨在实时观察自然灾害的出现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PopTech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关于大数据和社区复原力的倡议正如本章将要介绍的，大数据方法可以在通过“相关机器”进行治理的基础上得到有效的理解。数字治理越来越多地通过非现代本体论发展，这些本体论通过过程构建世界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Chandler, D. 2019. Digital Governance in the Anthropocene: The Rise of the Correlational Machine.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i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23-42.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 https://di.org/10.69971book29.b. License: CC-BY-NC-ND 4.0

新的后认识论方法的出现和突出发展，将相关性视为比因果分析的外推和预测更可靠和更客观的“经验”方法。

本章认为，数字治理在表面上起作用，在“现实主义”的概念上，“只有现实才是真实的”(哈曼2010,180;另见哈曼2009,127)。正如批判现实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罗伊·巴斯卡尔(Roy Bhaskar)所主张的那样，“现实主义”可以被看作是有问题的，因为结构和组合的等级制度消失了，在事物表象下对“本质”的科学探索失去了价值(巴斯卡尔1998,7 - 8)。然而，正是出于实用主义的原因，一种通过“数字”进行治理的新模式似乎正在出现。数字治理承认，在预防问题(理解为紧急或互动效应)或从问题中吸取教训方面几乎无能为力，而且对转型的渴望更有可能加剧这些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数字治理不是试图“解决”一个问题，或调整社会、实体或生态系统，希望它们能够更好地应对问题和冲击，而是试图通过感知和响应出现的过程，确定关系理解如何在当前提供帮助。

本章又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节介绍了数字治理作为对效果而非因果关系的治理，重点介绍了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确立偶然互动问题(而非因果深度)方面的工作，这些问题是紧急效应的关键，可能是意外的和灾难性的。第二部分更深入地考虑了数字治理如何更强调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不是存在的本体论，并将这种方法论方法与否定因果关系结构的行动者网络假设紧密联系起来。最后两节分析了相关性如何揭示新的机构和出现过程，以及新技术如何在这一领域得到部署，并提供了一些例子，说明从因果关系到感知效应的转变如何开始改变政府方法。

## 2. The Digital Governance of Effects

数字治理从问题的影响而不是因果关系来理解问题。今天，分析人士更有可能强调，全球相互作用和过程的复杂性不利于雄心勃勃的干预方案，这些方案旨在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或通过雄心勃勃的社会和政治工程项目从头开始制定解决方案(例如，参见:Ramalingam et al. 2008;Ramalingam 2013)。在一个更复杂的世界中，线性或因果本体论可能显得过于简化，并且很容易因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任何形式的治理干预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而受到质疑。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点在于尽量减少这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转向了“数字治理”，其重点是对效果的响应性治理，而不是试图解决表面上的根本原因。例如，国际政策干预不是寻求解决冲突或结束冲突(这可能会导致可能出现问题的意外后果)，而是越来越多地被表述为“管理”冲突，制定社会战略以更好地应对冲突，从而限制其影响(国际发展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和国防部2011年)。这种注重管理效果而不是参与因果链的做法，使得政策干预的形式和做法与直接解决问题的根源大不相同。

治理的概念讨论和知识的认识论问题之间的联系，通过发展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框架，从因果关系转向结果，他将其理解为一种非政治化的举动，得到了有用的强调(阿甘本，2014)。关于解决因果关系的辩论涉及社会政治分析和政策选择，将决策和主权权力和政治问责制问题置于最前沿。因果关系假设权力在等级制度中运作，政策结果被理解为有意识的选择、权力和能力的产物。但阿甘本认为，虽然治理的原因是政治的本质，治理的结果颠倒了政治过程:

> 我们不应忽视这种逆转的哲学含义。它意味着政府观念本身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颠覆了传统的因果等级关系。既然治理因既困难又昂贵，那么尝试治理果则更安全、更有用。(阿甘本，2014)

因此，效果治理可以被看作是对现代主义或因果治理假设的撤退。然而，从因果关系到效果的转变涉及到治理本身概念化的相应转变。数字治理——通过试图增强系统和社区对效果的响应性来进行治理——将重点从正式的公共、法律和政治领域转移到系统或社会对其环境背景变化的响应能力和能力。对效果的管理涉及代理的再分配，被理解为响应能力，从而回避了对问题的责任或问责问题，或在政府作为一种政治决策形式的基础上进行干预的必要性(进一步见，Chandler 2014b;2014c)。

政策干预已转向数字化治理模式，因为治理机构试图应对复杂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固有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影响，而不是用解决方案主义和进步的现代主义理念来理解问题。出现的问题是复杂反馈循环和系统相互作用的本体论产物，往往无法预测或预见。令人惊讶的和

因此，灾难性影响需要新的思维和治理方式，这种方式超越了现代主义的线性因果假设，并有可能应对意想不到的冲击和看不见的威胁。

随着“结果”变得比“原因”更重要，“解决方案思维”变得不那么有用。它甚至有可能成为响应性的障碍，因为“解决问题”倾向于肯定当前的实践和方法，而不是强调对紧急效果保持警惕的必要性。[4]“解决方案”的承诺似乎否认了我们纠缠在一起的责任和承诺，而对效果的更大敏感性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它们。最初，将“解决问题”方法问题化的主要理论家可能是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他认为，在他所谓的“第二次现代性”(贝克，1992)中，意外影响的风险不能再被划分、划分或排除在外。贝克认为，政策制定的意外反馈效应是全球化和互联互通的必然结果，这表明自由主义现代性的界限——国家与社会之间、文化与自然之间——正日益模糊。意外和冲击事件不能再被视为常态之外的例外，不能再被量化和投保。[5]

贝克所阐述的对互联性和反馈效应的激进意识最初被认为是纯粹消极的，作为一个需要解决的因素，并可能通过“预防原则”进行管理来最小化。[6]因此，对可能导致无意影响的纠缠的认识开始将偶然性的关注整合到治理的实践中。贝克的预防原则仍然有现代主义的遗产，它假设一个潜在的知道和控制的主体能够管理意想不到的影响，但随着现代性的假设开始消退，全球化的话语演变成人类世的话语，这个主体越来越不得不更加谦虚和谨慎地行动，测试和实验，而不是假设因果模式。[7]不幸的是，贝克专注于通过预测或想象人类行为的后果的方式来调节效果，这在逻辑上似乎是不可能预见的。例如，即使科学家在应用新程序或新举措之前就其安全性达成共识，实验室中的科学实验也无法再现与真实的、分化的和复杂的生命相同的条件。这种脆弱性导致布鲁诺·拉图(Bruno Latour)等批评者令人信服地认为，一旦纳入，影响无法通过预防措施来预防或最小化，而是必须“全程”跟进(拉图 2011,27;下面将更详细地讨论拉图尔的论文)。

在他生命的最后，贝克顺应时代改变了他的方法，指出对效果的欣赏能够促进治理，而不仅仅是限制治理(贝克 2015,79)。文化与自然的纠缠也产生了积极的反馈效应，这表明需要充分理解全球气候变化等风险的新人为制造。由此，对灾难性影响的认识

对气候变化和其他风险的担忧可以被视为潜在的积极因素(贝克 2015, 76)。对贝克来说,

> 人类学冲击提供了一种新的存在于世界、看世界和从事政治的方式。卡特里娜飓风的人类学冲击就是一个有用的例子[…]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前，洪水并没有被定位为环境正义的问题，尽管有大量的研究记录了不平等和洪水的脆弱性。公众和学术界都在反思卡特里娜飓风带来的毁灭性但高度不均衡的“种族洪水”，从而将奴隶制、制度化的种族主义这一强大的“人类世”与脆弱性和洪水联系起来。这种将不相关的事物连接起来的方式，是坏事的世界性副作用真实存在的方式，例如，副作用的不可见性被变得可见。(贝克2015,80)

新奥尔良的洪水说明了紧急影响的破坏性，但它也有一个后果，即使管理当局能够认识到被认为是自然或外部的风险与被认为纯粹是社会的种族、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这就需要在自然和社会相互交织的基础上，将治理专业知识结合起来，种族政治并没有与生态政治脱节以同样的方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需要结合在一起，重新思考如何超越这种假定的文化/自然鸿沟与世界接触(另见贝克 2016)。对贝克来说，这种“变形”不是社会变革。(它)是改变变化模式的一种模式。它标志着副作用的时代。它挑战着人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思考这个世界、想象和从事政治的方式。(贝克2015,78)因此，一种新的治理形式从对影响的包容中出现:对危机和灾难的理解不再将其视为纯粹的自然或纯粹的社会，而是将其视为超出治理控制的偶然和紧急过程:

> 《变形记》与无意识的观念有着深刻的联系，它嵌入了一个深刻而持久的悖论。一方面，它强调了知识的固有局限性[…]。[N]纳米技术、生物工程和其他类型的新兴技术不仅包含可知的风险，也包含我们还无法知道的风险，这为社会感知和治理风险的能力提供了一个基本限制的窗口。(贝克2016,104)

贝克对人类世的理解是“副作用的时代”(贝克2015,78)很好地概括了人类的偶然和不可预见的出现

影响已被捕获并纳入数字化话语下的治理。贝克除了“对威胁未来的想象”将注意力集中在偶然过程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之外，并没有提供更多的东西。

布鲁诺·拉图尔试图超越贝克在这一领域工作的局限，他试图在实时反馈回路中追踪人类行为的影响，这种方法需要的想象力更少，需要的数字科学和技术更多。长期以来，拉图尔对现代主义的二元理解，特别是文化与自然分离的二元理解，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对理解问题的激进话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拉图来说，就像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与自然纠缠在一起一样，生态学家试图强调分离的必要性，以保护“自然”，而现代科学渴望将“自然”世界作为某种分离和固定的现实来认识(例如，参见拉图1993a;2004)。因此，与贝克后来的作品类似，拉图尔认为，全球变暖与其说是现代性失败的标志，不如说是人类世新形式的数字治理的推动者。对气候变化等突发性影响的认识揭示了人类与环境的纠缠，是一个关键的刺激因素，可以在更具包容性的理解的基础上，从根本上重新组织地球的治理，即“自然”不能被孤立，而必须“得到更多的管理、吸收、照顾、管家”，简而言之，将其整合并内化到政策的结构中”(拉图尔2011,25)。

数字治理对于拉图尔将行星相互作用的意外影响纳入人类世日常治理的项目至关重要。相互作用的影响被理解为具体和偶然的，因此依赖于通过观察影响来追踪互动关系表面的能力，以“一路”跟踪人类行为的意外和不可预见的后果。拉图尔热情地说，

> 预防原则，如果得到正确的理解，正是*时代精神*所需要的变化:不是一种弃权原则——正如许多人所看到的那样——而是一种*考虑任何行动*的方式的变化，一种现代主义在科学与政治之间建立的联系的深刻的潮汐变化。从现在开始，由于这一原则，意想不到的后果*依附于*它们的发起者，必须全程遵循。(拉图尔2011,27)

拉图尔的主体是行动的发起者，因此对这一发起者的互动后果负责对拉图尔来说，人类行为的后果可以通过观察或对其影响形成的网络敏感来追踪因此，数字治理试图在表面上追踪这些联系。对影响作出反应的需要也推动了寻求确定人类世的纠缠网络的辩论，呼吁对带来这些关系和相互作用的日常反馈更加敏感

揭露真相。[11]对于一些作者来说，极端天气事件或新病毒的爆发，例如，表明了跨越全球的网络相互作用，揭示了偶然的联系、相互联系和反馈循环(例如，参见Haraway 2015;Tsing 2015, 37-43;Gillings 2015)。

看到或感知关系互动的实际效果的能力变得更加有利，在更远的距离和更多样化的互动生活形式中可以建立或想象更多的联系。这些复杂而错综复杂的反馈循环也要求更大的技术能力。因此，根据拉图尔的说法，这些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 [B]通过使用尽可能多的仪器交叉它们的[回路]潜在路径，以便有机会发现它们以何种方式连接在一起[…]铺设设备网络，使所有执行行动的各种机构都能看到行动的后果[…]。“[S]敏感性”是一个术语，适用于所有能够进一步扩展其循环的机构，并能够感受到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后果会回来困扰他们[…]，但前提是[人类]完全配备了足够的传感器来感受反馈。(拉图尔2013,96)

拉图尔的框架认为，感知影响的能力对于揭示人类世中看不见的和未知的相互联系至关重要，它涉及到必要的技术和监管机制，以“强有力的禁令”“追踪并不断地重新追踪所有这些循环所形成的线路”。保持循环的可追踪性和公开可见性”，这样“无论你的行为有什么反应，一个又一个的循环[…]都将成为你需要考虑的力量”(拉图尔 2013, 135)。

随着一套新的政治能力和责任的建立，数字治理的新感官形式被赋予了物质政治形式:“这种*反应*的积累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机构，而你自己也必须反过来对这个机构*负责*。”(拉图尔2013,96)与早期的治理模式不同，数字治理并不寻求做出因果断言;12可以追踪影响的出现，以揭示新的互动关系和需要考虑的新机构或行动者。但是，没有假设可以通过先验的政策目标来理解、操纵或治理效果通过数字传感的实时响应式管理形式越来越关注世界的“是什么”(拉图尔2013, 126)。

在现代主义的存在本体论和因果关系中，世界的“是什么”(what is-ness)不是一个关注的问题，这一事实在将数字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的考虑中经常被忽视，因此将在这里进行考虑，并在下一节中进行更详细的讨论。拉图尔在“面对盖亚”讲座中认为，自然必须以“后认识论”的方式来理解(拉图尔2013,26)。通过这一点，他的意思是现代主义形式的再现、还原、抽象

而排斥则无法认识一个多元、活泼、互动的世界。这是后认识论，因为知识再也不能从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互动的具体语境中提取出来。在这个框架下，知识要“客观”——要真实——就必须是多元的、流动的和具体的(拉图尔2013,49)。这与唐娜哈拉威对“情境认识论”的理解非常相似，它拒绝现代主义提取知识的动力，即通过放大，概括和普遍化的方法，将知识从真实的紧急过程中转化为抽象，并将知识与复数分开，意义语境的变化和重叠(哈拉威1988)。在这种重新思考知识的方式中，现代主义者在主观与客观、定性与定量之间的分歧被消解了(见文图里尼和拉图，2010)。

拉图尔的本体是扁平的，其中速度、大小和规模是相互作用的瞬间和偶然的产物，无法构建和塑造路径依赖。正如拉图重复的那样，在一个不可知的偶然事件的世界里，“*是什么*固执地要求*它应得的*”(拉图2013,126)。这种对因果理解的“经验”置换也可以从贝克后来的作品中得到暗示。贝克设想，实时经验主义的发展既可以避免批判性内在方法的危险——这种方法倾向于再现后现代主义的知识怀疑主义——也可以避免先验因果框架的傲慢知识主张。因此，世界可以通过关注效果作为治理的起点，在其复杂的出现中得到治理:

> 从这个角度看，气候变化风险远不止是二氧化碳测量和污染产生的问题。它甚至不仅仅是人类自我认知危机的信号。更重要的是，全球气候风险创造了在世界上存在、观察、倾听和行动的新方式——高度冲突和矛盾，开放式，没有任何可预见的结果。因此，21世纪的指南针出现了。这个指南针不同于后现代的“一切皆有可能”，也不同于虚假的普遍主义。这是批判理论的一种新变体，它本身不设定规范视界，而是从经验分析中获取规范视界。因此，它是对自我批判的世界风险社会的规范视界的经验分析。(贝克2015,83)

在感知的数字治理模式中，注重实证分析以促进实时响应，使应急效应能够在没有外部主体“设定规范视界”的情况下，话语化地框架治理。这个新的“规范视界”现在将由世界本身设定，并通过开发对世界的出现敏感和响应的新机制和技术来访问。数字治理框架的后认识论含义似乎是人们对大数据方法着迷的基础，因为它是一种产生越来越敏感的方法

对突发效应的实时响应(例如，参见Mayer-Schönberger和Cukier 2013; Kitchin 2014)。

## 3. 大数据，对象和关系

正如在前一节对拉图尔的研究中已经暗示的那样，数字治理可以作为一种治理模式有效地参与进来，它必然共享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拓扑政治假设，并且可以通过考虑布鲁诺拉图尔(ANT的主要支持者)和格雷厄姆哈曼(主要投机现实主义)之间长期的接触来了解这种方法的概念化(参见拉图尔等人，2011)。哈曼将拉图尔的任务精确地定位为ANT方法核心的“现实主义”，他指出，对拉图尔来说，瞬间关系比实体(或“行动者”)的实体更重要:

> 对拉图尔来说，行动者总是一个事件，而事件总是完全具体的:“每件事只发生一次，在一个地方。”“一个行为人[…]总是完全部署在这个世界上，在任何给定的时刻，完全牵连到它的交易总和中。与实体不同，施动物与其品质并无不同，因为对拉图尔来说，这意味着在其有形属性之下存在着一个站不住脚的、没有特征的肿块……与实体不同，施动物与其关系并无不同。事实上，拉图尔的中心论点是，一个行动者就是它的关系。一个对象的所有特征都属于它;一切都只发生一次，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哈曼，2009,17)

这种对当前和实际关系的关注，而不是对实体、生态系统或组合中可能潜藏或虚拟的可能性的关注，对于与因果本体论的区别至关重要:

> 由于拉图尔致力于一种模式，即行动者完全部署在联盟中，没有任何保留，他不能承认任何沉睡的潜力存在于目前尚未表达的事物中。从潜力的角度来看待一件事，就是赋予它某种超越其当前状态的东西，即一个完全具体的事件。(哈曼，2009,28)

正如哈曼所说，“拉图尔是关系的终极哲学家”，在这一点上，他的哲学颠覆了德兰达的组合理论(哈曼2010,176)，该理论认为组合从未完全实现，从而使因果相互作用有可能提出出现的替代途径。对于哈曼和面向对象的本体论家来说，ANT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无法区分对象及其关系。哈曼认为，ANT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把一切都过于扁平化”，

因此，一切都只是在其表现的层面上。”因此，这种方法“无法解释事物的变化”，也无法解释替代结果的潜在可能性(拉图尔等人，2011,95)。对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来说，现实新方面的出现不是因果深度的问题，而是看到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是被委托到背景中。正如拉图尔所说，

> 我称这种背景为等*离子体*，即尚未格式化、尚未测量、尚未社会化、尚未参与计量链、尚未覆盖、调查、动员或主体化的东西。它的规模有多大?拿一张伦敦地图，想象一下，到目前为止，你所访问的社交世界所占的空间并不比地铁大。等离子体将是伦敦的其余部分，所有的建筑、居民、气候、植物、猫、宫殿、骑兵卫队……。[社会学家]寻找“隐藏在背后的东西”是正确的，但它既不是隐藏在背后，也不是特别隐藏。它*介于两者之间*，不是由社会物质构成的。它不是隐藏的，只是未知的。它就像一个广阔的腹地，为每一个行动的实现提供资源，很像城市居民的乡村，很像宇宙学家试图平衡宇宙重量的缺失的质量。(拉图尔2005,244，-强调原文)。

对于ANT来说，作为一门关系的替代科学，在对政府的理解方面缺少的不是关系的深度，而是表面上的关系，即在当前时刻赋予实体和系统连贯性或重量的实际关系的存在。因此，对于ANT来说，现代主义对世界的理解，无论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都过于相信实体，好像这些实体有固定的本质(允许因果关系)，而不是将关系转移到其他行为者:

> 世界不是由几个不确定的湖泊点缀着的坚实的事实大陆，而是由几个经过校准和稳定的形式岛屿点缀着的浩瀚的不确定海洋……我们真的知道那么一点点吗?我们知道的更少。矛盾的是，这种“天文数字”的无知解释了很多事情。为什么凶猛的军队会在一周内消失?为什么像苏联这样的整个帝国会在几个月内消失?为什么覆盖全球的公司，季报一出就破产了?(拉图尔2005,245)

2008年2月，拉图尔和哈曼参加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次公开研讨会，在研讨会上，数字治理背后的启发式政治假设之间的差异浮出水面。在研讨会上，Noortje 马雷斯就ANT对于发现基于“效果”的实用主义基础上看待世界代理的新方法的重要性，而不是对紧急情况的关注，提出了一些有用的干预

因果关系:“因为实用主义者不是沉思的形而上学家，因为他们说‘我们不会提前决定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采用这种效果的微弱信号。因为这是获得一个新对象的唯一途径，一个尚未遇到或定义的对象”(拉图尔等人，2011,62)。马雷斯认为，为了研究变化，把“正在发生的事情作为我们的起点”是一种“暂停”或“取消”本体论的方式(拉图等人，2011,89)。这方面对于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的数字传感至关重要，因为它使人们能够关注变化的表面现象，而这在因果关系的本体论中并不被认为是那么重要:

> 这是在说，我们有一个世界，不断有新的实体被添加到现有实体的范围内，一切都在不断变化，但在这个现代技术世界里，一切都保持不变。我们有稳定的政权[…]。但是，如果我们从事于研究特定的物体，我们就找不到这个被很好地组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物体的单一的东西。我们没有在基础上发现它，但我们发现它是一种紧急效应(拉图尔等人，2011,90-91)。

事物的表象就像它们的关系一样不断变化，不是通过一个深度的本体论，而是通过表面上的网络和相互作用，就像拉图尔所说的那样，关于ANT的“等离子体”或“缺失的质量”:“这里的困难不是没有格式。而是介于格式化之间的东西。也许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但一旦背景和前景被颠倒，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同的景观。(拉图尔等人，2011,84)

我在这里的论点是，数字治理的本体论假设可以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角度有效地把握，因为它的重点不是系统或实体的本质，而是通过将出现过程视为关系来检测变化的方式。没有深度概念的关系过程是相互关系的，而不是因果关系的，因为关系的过程可能是偶然的和独立的结合。所有形式的存在都是相互关联的，这一事实意味着出现了新的机会，可以用这些关系和相互依赖来看待和看穿它们:无论是松树和松菇的相互关系(Anna Tsing 2015, 176)，还是阳光明媚的天气和购买烧烤设备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者谷歌搜索词和流感爆发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德里情歌2014)。这些都是“效应”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当一些实体或过程对其他实体或过程产生影响时，它们可以被视为“网络化”或“组装”，但它们没有内在或线性因果关系，可以被映射、复制或干预。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共同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方面将其与组合理论或具有因果深度本体论的新制度或生态系统方法区分开来。因此，行动者网络方法缺乏集合的时间和空间有限性

嵌套的自适应系统，并且没有假设迭代交互会产生更高层次的复杂排序的状态变化。[14]他们对“本体论”或事物的本质只字不提，仅仅关注特定时刻效应的传递;因此，他们可以把行动者和被行动者的“连珠炮”——等离子体，或“缺失的质量”——聚集在一起，这对于描述或理解系统或状态中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至关重要。暂停或“撤销”本体论，打开了ANT在现实世界中相互作用的方法，或者将对虚拟的开放式过程理解带入了现实。新的行动者或代理是那些为了解释“效应”而产生或产生关系的人，并通过“相互关系”来看待出现的过程。在这方面，推动算法机器学习、大数据能力和物联网的新技术进步，似乎是使数字化成为一种治理模式的完美时机。

## 4. The Rise of The Correlational Machine

人类与非人类的传感器组合使新的响应形式成为可能，但这种进步与因果知识无关，而是通过“相关机器”的发展来看穿过程的分解的能力。我使用“相关机器”一词是为了将数字治理模式区分为一种非常独特的范式，与深度和内在的因果本体论形成鲜明对比。相关机器的发展对人类世来说并不新鲜，而是通过使用人工假体来感知环境，从而扩展人类能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梅洛-庞蒂关于感知现象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经典的例子，那就是手杖，它使盲人能够通过对触摸和声音的抵抗来感知周围的障碍物(梅洛-庞蒂1989)。另一个例子是在矿井中部署金丝雀作为一氧化碳传感器。

因此，人类、非人类和技术援助在通过相互关系或相关性的力量扩大人类对影响的反应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重要的是要说明为什么这是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因为这是数字治理模式的关键。数字治理依赖于因果规律或规律，但关键的方面是它们是次于相关性而非首要的。正如拉图尔所说，关键的关注点不是本体论的，而是关系的:因果关系成为关系前景的背景。以矿井里的金丝雀为例。金丝雀发出一氧化碳存在信号的先决条件是，在矿工意识到有毒气体的存在并容易受到其影响之前，有毒气体杀死金丝雀的因果规律。然而，一氧化碳的问题并不是在因果关系的层面上解决的(预测它或防止它出现，或随后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开发一种方法来表明有毒气体的存在和增加的人类

通过相互关系的力量来提高人类的感知能力。金丝雀是一种非人类的关联机器，用来发出一氧化碳存在的信号。金丝雀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到:它把存在于矿井中的“缺失的质量”带入感知。将金丝雀加入到情境环境中，揭示了其他行为者的存在，即有毒气体，它们本来就在那里，但以前却不被发现。

有两个日常的例子更清楚地说明了数字治理中人工假肢的“机械”性质，那就是温度计和指南针的发展。温度计和指南针都能扩展人类的敏感性和能动性。它们提供的义肢支持是相关的，尽管是基于因果规律或规律。指南针最初基于天然矿物磁铁矿或磁石的磁性，可以使磁针指向与地磁北极相关的航线。因此，水手们可以通过作为“相关机器”的指南针的力量看到或感觉到他们的方向，使新的“行动者”(磁场吸引力)通过它们的相关效应被纳入导航(Dill 2003)。

温度计的情况也类似:它依赖于温度升高与固体或液体(如水、酒精和汞)的热膨胀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膨胀的热特性在古希腊人就已经知道了，并在18世纪随着华氏温标的发展而被应用或“机械化”(Radford 2003)。温度计是一种人工构造的相关机器，可以看到或感知大气变化，否则就看不见。在各种新技术的推动下，新的“相关机器”一直在被开发出来。例如，更精确的量子温度计现在可以测量量子水平上的热变化。这个例子展示了如何将新的行动者——在这种情况下，是内在的量子运动——加入到创建新的机械假体中，以便在更精确的水平上看到温度的变化(NIST 2016)。

相关机器在数字治理下激增，使新的高科技组合涉及广泛使用新的传感技术，通常被称为“物联网”，传感器可以连接到互联网，并提供实时检测空气和水质、地震或停车容量的变化，等等。传感技术的潜在用途是广泛的。例如，在麻省理工学院的Senseable City实验室，研究人员告诉我，他们正在进行一项工作，利用下水道中的机器人传感器来跟踪微量的生化材料。有可能，地方当局可以收到有关当地健康状况和非法药物使用的实时信息。[15]如果下水道可以变成生物传感和药物和健康分析的关键信息生成器，很明显，新的数字管理模式可以为监测和监管警务提供一系列新的途径。[16]因此，新的组合正在被人为地构建，使新的行为体能够参与治理，包括非人类和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变化可以被看到或感觉到，并因此做出反应，经常揭示新的威胁或危险，或扩大人类对现有威胁或危险的敏感性。虽然这些“超越人类”的机械组合是建立在因果法则和规律的基础上的，但它们的目的是相互关联的:看到现在、现实中存在的、但未知或看不见的东西。举一个当代数字治理新形式的例子，伊丽莎白·约翰逊(Elizabeth Johnson)在分析商业生物传感工作和利用有机生命监测淡水和海洋水源的污染时，对超越人类的治理形式做了有见地的工作(约翰逊2017)。在这里，对包括小鱼、蠕虫、软体动物、甲壳类动物和微生物在内的一系列动物物种进行了密集监测，以发现它们的功能规范，并开发出测量这些指标变化的方法。然后，它们就可以作为“相关机器”使用:

> 当这些生物暴露在不同的系统中时，(该公司)会监测一套“行为指纹”。运动活动、繁殖率和胚胎发育被一起测量，以表明有害人为化学物质以及生物产生的毒素(如蓝藻)的严重程度。该公司宣称，通过这种方式，它可以使“污染”变得“可测量”。(约翰逊2017,284)

正如约翰逊所指出的，数字治理模式与其说是因果关系，不如说是看到看不见的东西:“让难以察觉的伤害变得容易察觉”(约翰逊 2017)。这种方法通过相关性来观察，从而能够发现新的问题和可能性。例如，动物器官身体指标的变化可以提醒人类代理人注意潜在的问题，即使这些问题的来源是未知的。因此，相关公司认为，可以“在污染在环境中不可逆转地扩散甚至危害人类健康之前”及时发现问题(约翰逊 2017)。在煤矿下金丝雀的非人类假体的技术扩展中，“生物传感使非人类生命的观察方式成为可能”(约翰逊 2017, 286)。

正如温度计作为生物传感技术的相关机器需要了解汞的性质一样，绿色荧光蛋白(GFP)已经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工具，使有机生命能够被修改为相关机器，潜在地表明酸度和碱度的广泛变化，以及病原体、毒素和致癌物质的存在(约翰逊 2017,285)。数字治理在发展新形式的相关视野的基础上，实现了从基于“解决问题”和分析“根本原因”的治理向基于效果的治理的根本性转变。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历史上依赖于因果关系有机概念的科学学科与个体实体之间的区别趋于消失。相比之下，为数字治理提供信息的本体政治(ontoppolitics)与实体无关

或因果关系，使“超越人类”的责任组合成为新的政府规范。[17]

## 5. 结论

数字治理不太关注适应性变化(在问题发生之前预防问题或在问题发生之后解决问题)，而是关注对被理解为紧急效应的问题的响应。在弹性话语中，响应性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实时的必要性:与问题和威胁共存并对其敏感被认为是改善其影响的最佳方式(Evans和Reid 2014)。因此，感知作为一种治理模式似乎与德勒兹的“控制社会”概念化有很多共同之处，在控制社会中，时间是恒定的:不是之前(预防)或之后(反应)，而是响应的持续调节，问题的“无尽延迟”(德勒兹1995,179)。实体的本质，无论是系统、社会还是个人，都变得远不如表面“效应”的浮现重要，而表面“效应”是需要调节和回应的。

斯蒂芬妮·韦克菲尔德和布鲁斯·布劳恩关于“绿色基础设施”部署的工作有效地强调了这一点，绿色基础设施依赖于非人类行动者的代理，例如牡蛎作为海堤基础设施的部署，使传感能够基于响应性而不是适应性的本地政治(韦克菲尔德和布劳恩, 2018)。因此，管理非人类生命是确保人类生命安全的一种方式。“牡蛎结构”方法非常适合这里提出的数字治理的实体政治，因为它寻求应对而不是适应气候变化。这种响应性方法在应对海平面上升方面是相关的，而不是因果关系。最重要的是，韦克菲尔德和布劳恩强调了这种治理模式的独特性，这种模式不是在面向未来的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寻求适应和学习，而是对未来有一种非常不同的暂时性或方法，因为它试图“*抵御它*”，试图通过“抵消或吸收事件”来保持一切原样(原文强调)(韦克菲尔德和布劳恩，2018)。数字治理不是寻求改革或适应现有的基础设施模式，而是寻求维持现有的基础设施形式，但增加其他形式的感知和响应。虽然现代主义或因果理解假设了集中报告和适应的层次结构，但数字治理无论是在社会、社区层面还是在量化的自我层面，都有一个更扁平的自我生成响应本体。

因此，有了数字化的治理模式，不再有因果关系的“线”，而是关系的“面”——这种转变在治理方面是根本性的，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治理不再需要假设世界现实之外的规范视界或规范目标。正如阿甘本所强调的那样，由此可以看出，对效果的治理是彻底的

去政治化，因为治理的任务是话语性地从世界中“经验地”推导出来的，而不是从作为主体的人类行动者那里推导出来的。

## 注释

[1]联合国全球脉动倡议网站可访问:http://www.unglobalpulse.org/。

[2]世界银行的OpenDRI网页可访问:https://www。gfdrr.org/opendri。

[3]有关Data-Pop联盟的信息请参见:http://www.datapopalliance.org/;洛克菲勒基金会:http://www.rockefellerfoundation.org/our-work/current-work/resilience。

[4]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 1981)奠定了基础，他以区分从狭隘的现状角度看待问题的方法与试图批判性地重新思考大局的方法而闻名。

[5]关于保险正常化效应的重要性，参见Ewald(1991)、Defert(1991)、Dillon(2008)等。

他认为:“如果我们预测的灾难的破坏性潜在威胁到每个人，那么基于经验和理性的风险计算就会崩溃。”现在必须考虑到所有可能发生的，或多或少不可能发生的情况;除了从经验和科学中获得的知识之外，我们还必须加上想象、怀疑、虚构和恐惧。(Beck, 2009, 53)

[7]对于在国际政策文件中以多种方式采用的原则的批评者来说，问题在于“可能性”思维的瘫痪方面(例如，参见Sunstein 2002)。

[8]也见Protevi(2009, 163-83)中对卡特里娜飓风的分析。

[9]以弗兰肯斯坦未能照顾好自己的创造物为例，后者随后变成了一个悲剧怪物。《拉图尔》(2011)。

[10]例如，参见Clark 2010;或Klein 2014, 1-3，以人为反馈循环的讽刺开篇，例如，2012年夏天，由于肆意燃烧化石燃料而导致的极端炎热天气融化了华盛顿特区的停机坪和停飞的飞机。

[11]拉图尔(2013,94-95);另见康诺利(2013)，班尼特(2010)。拉图尔(2013,112)呼应了康诺利和班尼特对敏感性培养的看法:“要变得敏感，就是要感到有责任，因此，为了让循环对我们自己的*行为*进行反馈，我们需要通过一系列完全人为的操作，把自己置于时间的尽头。”(原文强调)

[12]正如Gilles Deleuze和f<s:1> lix Guattari(2014, 11-22)所指出的，追踪因果链只能是一种“选择性的”、“人为的”和“限制性的”过程，“过度编码”并以一种超越的方式再现其起始假设。

德勒兹(1988,128)很好地抓住了先验方法和内在方法之间的区别，他提出了先验方法

引入“对给定的维度进行补充的维度”;即目标、方向和因果关系的观念，将人的主体与治理的客体分开。然而，在内在的层面上:“不再有一个主体，而只有一种匿名力量的个性化情感状态。在这里，[治理]只关注运动和休息，关注动态的情感状态。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它将通过它使我们能够感知到的东西来感知。”

[14]哈曼称之为“偶然性”，并认为Latour(2009,228)提供了已知的第一个“世俗偶然性”的例子，其中没有固定的方式来解释因果关系或事件的连续性。在ANT中，任何事物都不能从其他事物中推导出来:“任何事物本身要么可约化，要么不可约化为其他任何事物”(Latour 1993b, 169)。构成关系的工作“每天早上”都会重新开始(Latour等人，2011,76)。关于复杂性理论，参见Chandler (2014a)。

[15]正如Charlotte Heath-Kelly(2016)所指出的，复杂性的大数据本体导致了通用的而不是有针对性的监控参数。

[16]个人访谈，研究员，Senseable City Lab，麻省理工学院，2017年3月30日。

[17]这种通过调节效果的治理形式可以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机械奴役”概念中得到有用的理解，该概念源自控制论，其中响应是在保持平衡的基础上自动管理或治理的。在这个过程中，使用机器和成为机械过程的信息输入的一部分之间没有区别:过程本身比实体或个人之间的区别更重要。参见德勒兹和瓜塔里(2014,531-36);拉扎拉托(2014, 23 - 34)。

## 参考文献

Agamben, Giorgio. 2014. ‘For a Theory of Destituent Power.’ *Chronos* 10, -February.

Beck, Ulrich.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Beck, Ulrich. 2009. *World at Ris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eck, Ulrich. 2015. ‘Emancipatory Catastrophism: What Does It Mean to - Climate Change and Risk Society?’ *Current Sociology* 63 (1): 75–88.

Beck, Ulrich. 2016. *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Worl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haskar, Roy. 1998.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ism: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the Contemporary Human Sciences*, 3rd ed. Abingdon; Routledge.

Chandler, David. 2014a. *Resilience: The Governance of Complexity*. Abingdon: Routledge.

Chandler, David. 2014b. ‘Beyond Good and Evil: Ethics in a World of Complexit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1 (4): 441–57.

Chandler, David. 2014c. 'Beyond Neoliberalism: Resilience, the New Art of Governing Complexity.' *Resilience: International Policies, Practices and Dis- courses* 2 (1): 47–63.

Clark, Nigel. 2010. *Inhuman Nature: Sociable Life on a Dynamic Planet*. Sage Publications, Kindle Edition.

Connolly, William E. 2013. *The Fragility of Things: Self-Organizing Processes, Neoliberal Fantasies, and Democratic Activism*.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Cox, Robert W. 1981.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0 (2): 126–155.

Defert, Daniel. 1991. ' "Popular Life" and Insurance Technology.' In *The Fou- 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eds. Burchell, Graham,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211–3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eleuze, Gilles. 1988. *Spinoza: Practical Philosophy*.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Deleuze, Gilles. 1995. 'Postscript on Control Societies.' In *Negotiations: 1972–1990*, 177–82.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2014. *A Thousand Plateau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and Ministry of Defence. 2011. *Building Stability Overseas Strategy*. London: DfID, FCO, MoD.

Dill, J. Gregory. 2003. 'Lodestone and Needle: The Rise of the Magnetic Compass.' *Ocean Navigator*, 1 January. Available at: http://www. oceannavigator. com/January-February-2003/Lodestone-and-needle-the-rise-of-the-magnetic-compass/. (accessed 14 May 2018)

Dillon, Michael. 2008. 'Underwriting Security.' *Security Dialogue* 39 (2–3): 309–32.

Evans, Brad and Julian Reid. 2014. *Resilient Life: The Art of Living Dangerousl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Ewald, Francois. 1991. 'Insurance and Risk'. In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eds. Burchell, Graham,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197–21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illings, Michael. 2015. Comment: How Modern Life Has Damaged Our Inter-nal Ecosystems. *SBS News*, 12 October. Available at: http://www. sbs. com. au/news/article/2015/10/09/comment-how-modern-life-has-damaged-our-internal-ecosystems. (accessed 14 May 2018)

Haraway, Donna. 1988.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14 (3): 575–99.

Haraway, Donna. 2015. 'Anthropocene, Capitalocene, Plantationocene, Chthu-lucene: Making Kin.'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6: 159–65.

Harman, Graham. 2009. *Prince of Networks: Bruno Latour and Metaphysics*. Melbourne: re.press.

Harman, Graham G. 2010. *Towards Speculative Realism: Essays and Lectures*. Winchester: Zero Books.

Heath-Kelly, Charlotte. 2016. 'Algorithmic Auto-Immunity in the NHS: Radi-calisation and the Clinic.' *Security Dialogue* 48 (1): 29–45.

Johnson, Elizabeth R. 2017. 'At the Limits of Species Being: Sensing the Anthro-pocen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16 (2): 275–292.

Kitchin, Rob. 2014. *The Data Revolution: Big Data, Open Data, Data Infrastruc- tures & their Consequences.* Sage: London.

Klein, Naomi. 2014.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Latour, Bruno. 1993a.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tour, Bruno. 1993b. *The Pasteurisation of Fr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tour, Bruno. 2004. *Politics of Nature: How to Bring the Sciences into Democ- 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tour, Bruno.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tour, Bruno. 2011. 'Love Your Monsters.' *Breakthrough Journal* 2: 21–8.

Latour, Bruno. 2013. *Facing Gaia, Six Lectures on 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Nature: Being the Gifford Lectures on Natural Religion, Edinburgh, 18th–28th of February 2013* (draft version 1 March 2013).

Latour, Bruno, Graham Harman and Péter Erdélyi. 2011. *The Prince and the Wolf: Latour and Harman at the LSE*. Winchester: Zero Books.

Lazzarato, Maurizio. 2014. *Signs and Machines: Capit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Subjectivity*. South Pasadena, CA: Semiotext(e).

Madrigal, Alexis C. 2014. 'In Defense of Google Flu Trends.' *The -Atlantic*, 27 March. Available at: https://www. theatlantic. com/technology/archive/2014/03/in-defense-of-google-flu-trends/359688/ (accessed 14 May 2018)

Mayer-Schönberger, Viktor and Kenneth Cukier. 2013. *Big Data: A Revolution That Will Transform How We Live, Work and Think.* John Murray: London.

Merleau-Ponty, Maurice. 1989.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Routledge.

NIST. 2016. 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IST Creates Fundamentally Accurate Quantum Thermometer', *NIST*, 15 March. -Available at: 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16/03/nist-creates-fundamentally-accurate-quantum-thermometer (accessed 14 May 2018)

Protevi, John. 2009. *Political Affect: Connecting the Social and the Somatic*.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adford, Tim. 2003. 'A Brief History of Thermometers.' *The Guardian*, 6 August.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ience/2003/aug/06/weather. environment (accessed 14 May 2018)

Ramalingam, Ben. 2013. *Aid on the Edge of Chaos: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 Complex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amalingam, Ben. et al. 2008. 'Exploring the Science of Complexity: Ideas and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and Humanitarian Efforts.' *ODI Working Paper*, 285. London: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Sunstein, Cass R. 2002. 'The Paralyzing Principle.' *Regulation* (Winter): 32–37. Availableat:http://object.cato.org/sites/cato.org/files/serials/files/regulation/2002/12/v25n4-9.pdf.

Tsing, Anna Lowenhaupt. 2015.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enturini, Tommaso and Bruno Latour. 2010. 'The Social Fabric: Digital Traces and Quali-quantitative Methods.' In *Proceedings of Future En Seine 2009: The Digital Future of the City*, ed. Ewen Chardronnet, 87–101. Paris: Cap Digital.

Wakefield, Stephanie and Bruce Braun. 2018. 'Oystertecture: Infrastructure, Profanation and the Sacred Figure of the Human.' In *Infrastructure, Envi- ronment, and Life in the Anthropocene*, ed. Kregg Hetheringt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第三章

# 超越大数据资本主义，走向辩证的数字现代性:对大卫·钱德勒章节的反思

Christian Fuchs

## 1. 简介

大卫·钱德勒的章节研究了数字化和大数据时代本体认识论和治理的变化。他认为，二元论、还原论、线性因果关系和机械决定论的逻辑具有社会的先进性问题，无法对世界的复杂性作出适当的回应。言下之意是，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本体-认识论，超越二元论，使治理社会和数字的新形式成为可能。大卫·钱德勒在本卷中认为，“数字治理的本体论假设可以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有效地把握”，在这种背景下，他对布鲁诺·拉图尔的作品和一般的新唯物主义理论特别感兴趣，包括唐娜·哈拉威等人的作品。大卫·钱德勒说，这些方法使我们能够超越二元论，并将世界和数字视为存在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Fuchs, C. 2019. Beyond Big Data Capitalism, Towards Dialectical Digital Modernity: Reflections on David Chandler’ s Chapter.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Digi- 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43–51.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I: https://doi.org/10.16997/book29.c. License: CC‐BY‐NC‐ND 4.0

相互关系，而不是二元的，基于线性因果关系。大数据将成为感知和观察世界的新型相关机器的一部分，这些机器导致了以相互关系和相关性为重点的新形式的数字治理。

大卫·钱德勒的一般方法是寻找和分析超越或声称超越二元论的本体认识论。在这种背景下，他对复杂性理论和弹性研究特别感兴趣。“[E]合并或一般复杂性[…]似乎是世界的另一种本体论观点的主要竞争者”(钱德勒2014,51)。“[R]弹性思维声称可以在不假设笛卡尔确定性或牛顿必然性的情况下解决治理的明显难题”(钱德勒2014, 63)。

## 2. (Post-)现代性和(Post-)现代主义

我当然同意，主体/客体、文化/自然、人类/技术、心灵/身体、社会/经济、沟通/工作、再生产/生产等二元论逻辑，是工具理性的一个关键方面，它产生了反作用，造成了社会不容易治理的全球性问题。但我不相信，将工具理性和二元论称为“现代主义二元理解”、“现代主义对世界的理解”或“现代主义的分裂”，并将其定性为“非现代本体论”和后认识论，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这样一种术语的含义是，现代性的替代品要么是前现代性，要么是后现代性。前现代的本体认识论，如马丁·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往往以拒绝任何形式的先进技术使用的技术悲观主义告终。例如，海德格尔认为报纸、电子通讯和公共交通是不真实的现代主义形式，应该被废除(见Fuchs 2015)。另一种选择，例如后认识论一词所表明的，是以一种后现代性的形式来看待替代。

质疑二元和决定论无疑是后现代思想家如拉图尔、哈拉威、利奥塔、鲍德里亚、德里达、德勒兹和瓜塔里的作品的一个特点。在后现代思想中，强调偶然性而不是设计，强调解构而不是整体性，强调缺席而不是在场，强调网络而不是等级，强调不确定性而不是决定性，强调内在性而不是超越性等等。(见表1.1。in Harvey 1989年，43)。“突破二元论似乎是新唯物主义和后现代思想的关键”(Dolphin and van der Tuin 2012，， 97)。这些方法推进了“一元论视角”(Dolphin and van der Tuin 2012, 85)，它不仅涉及钱德勒等人倡导的扁平本体论，而且还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新的坍缩论，将人类/非人类坍缩，

社会/技术、人/机器、阶级/非阶级二元体合二为一。后人类主义将人类和非人类、类人机器人坍缩为后人类半机械人。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将技术和社会瓦解为作为社会的行动者。深层生态学和动物解放理论将自然和社会瓦解为一个无差别的整体。后现代主义将阶级/非阶级瓦解为同一性，将文化/经济瓦解为文化。其结果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后现代主义不仅试图取代和清除学术界的马克思人文主义，而且还成为资本主义灵活积累制度的意识形态(Harvey 1989年)。“这种后现代主义的爆发与罗纳德·里根的形象塑造之间存在联系，试图解构工人阶级权力的传统机构(工会和左翼政党)，掩盖特权经济政治的社会影响，这应该是足够明显的”(Harvey 1989年，336)。后现代方法的危险在于，宣称“告别现代性”可能会推进“披着后启蒙外衣的反启蒙”(Habermas 1999,5)。

## 3. 辩证现代性

我同意大卫·钱德勒的观点，我们需要超越二元论逻辑，把世界作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的整体来分析。但后现代思想缺乏必要的差异性力量。现代性与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和自由主义是不一样的。假设这些现象的同一性忽略了现代性本身是矛盾的，并且包含了后资本主义的种子和潜力。

现代性是一项旨在利用知识“追求人类解放和丰富日常生活”的工程(Harvey 1989年，12)。以二元论、还原论、机械论因果关系、实证主义、工具理性、可计算性和决定论为基础的现代性类型，作为启蒙运动的一种消极辩证法(霍克海默和阿多诺1944/2002)产生了反作用，并创造了一部现代灾难史。

但现代性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统治，它还通过霸权表现为自下而上的统治和反抗。这种对工具理性的抵抗并不站在现代性之外，而是构成了另一种现代性。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可以建立在现代性的对抗性特征之上。哈贝马斯(1990)和詹姆逊(1991)都认为现代性是不完整的。对于詹姆逊(1991,309-10)来说，这意味着后现代性比现代性更现代，而哈贝马斯则主张一种不同的、可选择的现代项目。批判的、辩证的现代性是对资本主义的、工具的现代性的一种替代。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因为它缺乏确定性和有限性，永远存在

开放性和发展性。现代性总是未完成的，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矛盾的、动态的社会形态。

我发现黑格尔主义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比后现代主义更可行。后现代主义者经常试图将人本主义和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作为二元论传统的一部分来呈现。但实际上，这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推进了辩证现代性的本体论-认识论，其中的范畴和现象同时具有同一性和非同一性，提出了一种矛盾的逻辑，从这种逻辑中产生了动态性、复杂性和开放性发展。黑格尔将复杂性和新属性的出现描述为发生在矛盾(否定)被否定的事件中的扬弃。黑格尔将辩证过程描述为一个封闭三角形结构的开放系统，因此，矛盾被扬弃为一种新的出现的属性，它本身是矛盾关系的一部分，构成了一个新的三角形的基础，这个新三角形通过进一步扬弃而产生，等等。“某物成为别物，但别物本身是某物，所以它也成为别物，如此类推，直至无限”(黑格尔1830年，第93段)。因此，辩证现代性的逻辑在本质上是复杂的、开放的和分形的(见http://www.hegel.net/en/e-poster.htm;富克斯2003;2004;2008;富克斯和施莱姆2005)。辩证现代性由不同的组织层次组成，这些组织层次是由动态发展的封装的辩证三角形构成的。每个三角形都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一个人越放大这个分形辩证法，这个系统就越动态。在它的内在层面上，存在着不断的变化。一个人放大得越大，你就会发现越有连续性。这种封装的三角形结构是基于连续性和内在变化/不连续性的辩证法。人类的实践和实践是产生社会辩证法以及这种辩证法在不同组织层次上的变化的活动(马尔库塞，1941a)。这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偏见，经常被贴上反对黑格尔主义和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认为他们提倡封闭和决定论。复杂性理论的概念，如涌现和分岔点，可以被看作是黑格尔辩证逻辑及其原则的一种表现，如扬弃、否定的否定、从量到新质的转变(富克斯 2003;2008)。

克服二元论逻辑有不同的方法。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方式，黑格尔主义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另一种方式。两者作为辩证对话的两极。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相互扬弃，并富有成效地融合成一个新的涌现的整体——就像你手里拿着的书或在屏幕上阅读的书一样。

工具理性的二元论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它在一种消极的辩证法中一次又一次地反对自己，从而破坏了资本主义的承诺，产生了危机和社会问题。工具理性是使社会非辩证法和单向度化的企图。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重大危机，但我们可以

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社会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这样的危机迟早会出现(富克斯200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与复杂性理论相结合，认为:

> 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世界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世界体系，目前正处于这样的危机之中，而且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这场危机可能还会持续25年到50年。由于这样一个过渡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我们所知道的作为现有世界体系固有组成部分的所有那些结构和进程都面临着剧烈的波动，因此我们发现，我们的短期预期必然是相当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性会导致相当大的焦虑，因此，当人们试图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保持获得的特权和等级时，就会产生暴力。一般来说，这个过程会导致社会冲突，采取相当不愉快的形式(沃勒斯坦2004,77)。

沃尔夫冈施特雷克(2016)认为，沃勒斯坦所描述的复杂的世界危机的长期阶段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危机。他说，资本主义的矛盾正在爆发，制度不能再通过购买时间将危机推迟到未来。施特雷克(12)证实了沃勒斯坦的分析，即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深度*不确定*的时期——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的时期”。施特雷克继续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他称之为“间歇期”的长期混乱阶段——“没有新的世界体系平衡àla沃勒斯坦，而是一个长期的社会熵，或无序的时期”(13)，在这个时期，社会结构和制度解散，让社会的“成员独自一人”(36)。以及优胜劣汰法则的逻辑。施特雷克的立场与沃勒斯坦的失败主义形成鲜明对比。他认为，不确定性的逻辑导致了社会的厄运和阴郁，没有出路。Michael Hardt和Toni Negri(2017,202)指出，对于施特雷克来说，“所有能够挑战资本主义统治的敌对主体现在都消失了”。

与施特雷克相反，沃勒斯坦将不确定性视为一种新的希望原则，它应该激励政治运动在追求建立新制度的过程中尝试不可能的事情。这种乐观主义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实践的结果在分岔点上是不确定的，并且可以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加剧。沃勒斯坦含蓄地提出了一种新的实践观，这种实践观建立在相对偶然性、辩证逻辑和辩证不确定性的基础上。“从一种体系向另一种体系过渡的时期，是一个充满巨大斗争、巨大不确定性和对知识结构提出巨大质疑的时期。[…]我们必须最终弄清楚我们如何在现在行动，使它有可能朝着我们喜欢的方向发展”(沃勒斯坦2004,89-90)。实践面临着不确定性，但它也是在分岔点增加某些优选选项的可能性的尝试。

## 4. 大数据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

计算被嵌入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产生的危机之中。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使危机和灾难的发生更有可能。比如，算法交易就加剧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再加上支撑金融衍生品的虚拟资本的一般逻辑，使得金融市场更加不可预测。用户生成的假新闻和虚假的网络关注，是一种使用社交媒体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半自动网络政治的形式。在大数据的世界里，分辨哪些行为是由人类发起的，哪些是由机器人和算法发起的，变得越来越困难。算法政治与右翼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结合，增加了政治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没有多少人认为唐纳德·特朗普会成为美国总统，但民意调查的预测模型失败了:正是这种结合让特朗普赢得了选举(富克斯，2018)。

大数据并没有将我们推向辩证的现代性，而是倾向于深化机械决定论、还原论和二元论的逻辑，以及阿尔弗雷德·索恩-雷塞尔(1978)认为的阶级社会特征，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大数据已经嵌入了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 2013)所说的技术解决方案主义。数字解决主义基于“*拯救一切”的逻辑，点击这里*。它假设数字技术使社会完全可控、可操纵和可治理，因此为全球问题、经济和政治危机、恐怖主义、犯罪等提供了解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主义的逻辑并不新鲜。这是一种被霍克海默(2004)称为工具理性、马尔库塞(1941b)称为技术理性的资本主义逻辑。“9·11”恐怖袭击后，数字解决方案主义愈演愈烈、加速发展。由于无法应对政治复杂性，各国政府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主义意识形态，即大规模数据和在线监控可以预测、预防和控制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决定论的逻辑因此得到进一步延伸和强化。监视社会结合了监视意识形态、监视国家和监视资本主义(Trottier and 富克斯, 2015)。大数据的兴起为数字解决方案主义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推进了大数据解决方案主义，即大数据集可以控制、解决和克服经济和政治危机。大数据资本主义并没有克服，反而加深了二元论、决定论和线性的逻辑。它是工具理性的强化，创造了统治和剥削的新品质。例如，“大数据的技术和意识形态再次出现，承诺对过去犯罪的数据进行更大、更深入的分析，结合复杂的算法，可以预测和预防未来的犯罪。”这是一种被称为“预测性警务”的做法，尽管它只有几年的历史，但很多人都在吹捧它

这是警察工作方式的一场革命。这是解决主义的缩影”(莫罗佐夫 2013, 182)。

大卫钱德勒暗示了对大数据解决方案主义的批评，他在本章的最后引用了乔治·阿甘本的观点，认为数字和大数据治理“可以被看作是彻底去政治化的，因为治理的任务是从世界上“经验主义地”推导出来的，而不是从作为主体的人类行动者身上推导出来的”。故事的结尾与故事的主线背道而驰，这是大卫作品中典型的话语逻辑，创造了整个故事本身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

## 5. 走向辩证数字现代性(toward Dialectical Digital Modernity)

资本主义工具理性所固有的对抗的升级，加剧了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经济、政治和合法性危机的这一阶段恰逢大数据资本主义的兴起。大数据技术有望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世界中创造确定性，但通过其数字解决方案主义的逻辑，它们加剧了危机。但指出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废除数字技术，回归到前现代技术。试图创造全新的、与我们现有的技术完全决裂的后现代技术，也是没有前进的道路。我们所拥有的数字技术在内部是对立的。它们推动了解决主义和统治，但同时也蕴含着合作和解放的新潜力。关键在于，资本主义、阶级、权力结构、统治和剥削从来没有让社会和技术成为完全辩证的。

现代性一次又一次地反对自己，破坏自己的潜力，引发灾难和危机。关键是要以不同的、辩证的方式塑造技术和社会，使数字客体和数字主体不再分离，而是基于辩证现代性的逻辑，在多样性中形成一个分化的、复杂的统一体。我们的社会和数字未来是不确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可以决定或计算未来。社会是复杂的、动态的、开放的、非线性的、不可预测的和辩证的，这是作为政治希望的实践的动力，它旨在通过使系统永续化来改变整体，并试图增加我们的社会和数字未来的某些潜在发展路径的可能性。这样的未来不是前现代性或后现代，而是一种另类的、辩证的(数字的)现代性，它实现了自身的潜力。它是对资本主义总体的反抗，尤其是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超越和扬弃。这样的社会也将改造和扬弃今天的数字技术，这意味着它将废除破坏性的技术和技术品质，保留合作的技术，重构现有的技术，创造超越工具理性逻辑的新的辩证技术。

# 参考文献

Chandler, David. 2014. 'Beyond Neoliberalism: Resilience, the New Art of Governing Complexity.' *Resilience* 2 (1): 47–63.

Dolphijn, Rick and Iris van der Tuin. 2012. *New Materialism: Interviews & - Cartographies.* Ann Arbor, MI: Open Humanities Press.

Fuchs, Christian. 2018. *Digital Demagogue.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rump and Twitter*. London: Pluto.

Fuchs, Christian. 2015. 'Martin Heidegger's Anti-Semitism: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the Media in the Light of the Black Notebooks.'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13 (1): 55–78.

Fuchs, Christian. 2008. *Internet and Society: Social Theo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New York, NY: Routledge.

Fuchs, Christian. 2004. 'The Antagonistic Self-Organization of Modern Soci-ety.'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73: 183–209.

Fuchs, Christian. 2003. 'The Self-Organization of Matter.' *Nature, Society, and Thought* 16 (3) 281–313.

Fuchs, Christian and Annette Schlemm. 2005. 'The Self-Organisation of - Society. Human Strategies in Complexit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Research Paper No. 16. Available at: http://ssrn.com/abstract= 385284(accessed 14 May 2018)

Habermas, Jürgen. 1990.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17. *Assemb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rvey, Davi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 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830. *The Encyclopaedia Logic (With the Zusätze)*, translated by Theodore F. Geraets, Wallis A. Suchting and Henry S. Harris. Indianapolis, IN: Hackett.

Horkheimer, Max. 2004. *Eclipse of Reason*. London: Continuum.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W. Adorno. 2002.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Jameson, Frederic.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 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Marcuse, Herbert. 1941a.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Marcuse, Herbert. 1941b. 'Som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Modern Technology.' In *Technology, War and Fascism: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ume 1*, ed. Douglas Kellner, 39–65. London: Routledge.

Morozov, Evgeny. 2013. *To Save Everything, Click Here*. New York, NY: Publi-cAffairs.

Sohn-Rethel, Alfred. 1978.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A Critique of Epi- stemology*. London: Macmillan.

Streeck, Wolfgang. 2016.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Essays on a Failing System*. London: Verso.

Trottier, Daniel and Christian Fuchs (eds.). 2015. *Social Media, Politics, and the State: Protests, Revolutions, Riots, Crime and Policing in the Age of Facebook, Twitter and YouTube.* New York, NY: Routledge.

Wallerstein, Immanuel. 2004. *World-Systems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第四章

# 大数据资本主义时代的卡尔·马克思

克里斯蒂安·富克斯

## 1. 简介

计算机以数字数据为基础运行。它们将信息转换成比特流(0和1)，以便存储、处理和传输信息。资本主义和官僚行政的逻辑推动了计算的发展。由于政治经济利益和需求以及技术发展，数据的数量，速度和种类(Kitchin 2014, 68)已经增加到一定程度，数量变成了一种新的质量。总之，我们已经看到了大数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算法和数字机器正在生成、收集、存储、处理和评估大数据，并做出在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中排挤人类的决策。这种发展导致了数字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特征的出现:大数据资本主义。大数据资本主义要求我们评估思想体系、知识形式、政治经济、政府、物质性、基础设施、实践、组织、制度、主观性、空间(Kitchin 2014, 25)、时间性、话语和意识形态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Fuchs, C. 2019. Karl Marx in the Age of Big Data Capitalism.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53-71.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I: https://doi.org/10.1699/book29.d. License: CC-BY-NC-ND 4.0

变化。本章的任务是展示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对于理解和批评大数据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重要性。

本章首先讨论了为什么马克思在今天很重要(第2节)，然后介绍了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概念(第3节)，分析了数字劳动力的矛盾(第4节)，数字资本主义的危机(第5节)，今天的意识形态(第6节)，并以对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的一些思考(第7节)结束。

## 2. 为什么马克思在今天很重要

我们今天之所以需要马克思，至少有14个理由。只要资本主义和阶级存在，他的分析对于理解、批判和改变社会仍然绝对至关重要。正如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作为历史来分析，是基于一种连续性和变化的辩证法，所以他自己的研究方法也受制于这种辩证法。

我们今天需要的马克思著作的第一个方面是对商品形式和资本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巨大的商品集合”(马克思1867/1976,125)。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导致了几乎所有东西的商品化，包括通讯。在数字商品的世界里，我们发现了数字劳动力、数字内容、数字技术和在线受众的商品化。信息在消费中是非竞争性的(作为一种资源，信息在消费时不会耗尽)。很难将他人排除在获取之外。信息很容易被复制。因此，它是一种对抗性的商品类型，可以转化为商品，但也可以相对容易地抵制商品化，并被转化为共同利益。数字资本主义面临着数字资本与数字公地之间的矛盾。

第二，马克思可以告诉我们今天对劳动剥削的理解。“无产者只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资本家也是把剩余价值转化为剩余资本的机器”(马克思1867/1976,742)。今天的无产阶级采取了新的形式，包括不稳定的劳动——比如实习生和影子工人的无薪劳动，他们的劳动可能不像更熟悉的劳动形式，但仍然产生价值——以及国际数字劳动分工中的工人(D) (富克斯 2014;2015)。

第三，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资本“必须到处筑巢，到处定居，到处建立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2010,486-487)。20世纪后期以来，资本主义相对于其福特主义的发展阶段，已经变得更加全球化，并进入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第四，马克思对今天理解资本主义危机很重要。他强调了资本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再次和

又产生危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充满矛盾，这一事实在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性循环的变化中给实际的资产者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这种循环的顶点是总危机”(马克思1867/1976,103)。

第五，马克思对技术与社会辩证关系的强调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技术。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15章(机器和大工业)和《政治批判纲要》关于机器的片段(Fuchs 2016c，第15章和附录2)中提出了这一分析。马克思对技术的分析是基于黑格的本质和存在的辩证法。在《资本论卷》第一卷关于机器的一章中，他认为，“机器本身缩短了劳动时间，但当它被资本使用时，它延长了劳动时间;[……]它本身减轻了劳动，但当它被资本使用时，它就提高了劳动的强度;它本身是人对自然力量的胜利，但在资本手中，它使人成为自然力量的奴隶;[……]它本身增加了生产者的财富，但在资本的手中，它使他们成为穷人(马克思1867/1976,568-569)。图1可视化了资本主义中技术的一些辩证法。

第六，马克思对一般智力的分析在今天很重要。一般智力的概念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成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马克思1857/1858/1973,706)。普遍劳动产生了一般智力。“普遍劳动就是一切科学工作，一切发现和发明”(马克思1894/ 1981,199)。知识、交流和技术因此成为共同的商品。

马克思预言了信息经济的出现。资本主义利润的迫切性产生了提高生产率的需要。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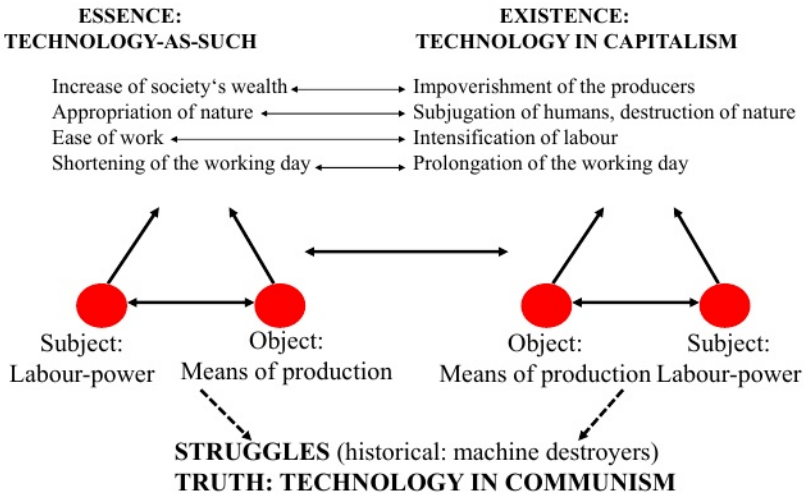



图1: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中技术辩证法的分析。

进步逐步提高了科学、技术和知识在生产中的相关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数量变成了信息资本主义的新品质。

第七，马克思对于理解数字资本主义很重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他从概念上预测了互联网的出现，认为制度的出现使每个人都可以获得有关所有其他人活动的信息，并试图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活动[…]通过邮件、电报等[建立]相互联系[…](马克思1857/1858/1973, 161)。这一提法预见到互联网是一个全球性的信息、通信和社交网络系统。

马克思著作的第八个维度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对立，这对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关重要。“由资本发展而成的一般社会权力和单个资本家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地发展着，而这种发展也包含着对这种情况的解决，因为它同时把生产条件提高为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这种转变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和形式造成的”(马克思1894/1981,373)。

在数字资本主义中，网络化的数字生产力与阶级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对抗。网络化的数字技术创造了新的商品化和剥削形式，也创造了积累的新问题。然而，作为商品的数字信息也具有抵制商品化的特征。数字资本主义的基础是数字公地与数字商品之间的对抗。数字化塑造了“无产阶级的社会合作与资本的(经济和政治)指挥之间的对抗”(Negri 2017,25)。

马克思今天之所以重要的第九个原因是，他的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的各种方法，使我们能够建立起一种关于交流和语言的批判理论(富克斯 2016a, 2016c)。例如，他说，“彼得只是通过他与另一个人保罗的关系才与作为人的自己发生关系，他在保罗身上认识到自己的相似之处”(马克思1867/1976,144)。沟通是人类为了解释社会世界、理解彼此、构建共同意义和改造社会现实而象征性地相互联系的方式。Lukács*《社会存在本体论》*、雷蒙德·威廉姆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允许构建传播的辩证批判理论，这些理论为哈贝马斯的二元论传播理论和卢曼的传播工具系统理论提供了替代方案(富克斯2016a)。

第十，马克思让我们思考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这就提出了如何反思资本主义中沟通的作用的问题。马克思提醒我们，思考经济如何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社会、工作/交流、资本/权力、劳动/意识形态、身体/心灵、体力/脑力劳动、生产/再生产都是相互关联的。社会和资本主义的二元性同时具有同一性和非同一性。它们形成了辩证法。雷蒙德·威廉姆斯以唯物主义和辩证的方式“解决”了基础/上层建筑问题。威廉姆斯(1977)认为，所有社会系统和社会子系统都有一个相同的经济时刻:人类通过交流过程产生社会性。交往是社会性和社会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同时，每一个社会子系统和社会系统也具有一个非同一性的时刻:这些都是突现的、非经济的性质。

意识形态和拜物教构成了马克思今天的关联性的第十一个维度。在商品拜物教中，“人与人之间确定的社会关系”采用了“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幻想形式”(马克思1867/1976,165)。在政治拜物教中，国家是一种恋物:民族主义是构建虚构种族的意识形态(Balibar和Wallerstein 1991,49, 96-100)。在媒体领域，广告崇拜商品形式，意识形态小报新闻崇拜统治和剥削。我们经历了针对移民工人和难民的新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的兴起。民族主义把资本和劳动描绘成不矛盾的、团结在“一个国家”中的，从而转移了对阶级矛盾的注意力。马克思在他对威权主义的分析中，创造了“波拿巴主义”的概念，它包含了“通过复兴所有民族荣耀的幻想来团结所有阶级”的意识形态项目(马克思1871/2010,330)。

第十二，马克思是批判性新闻和批判性公共知识分子的榜样。第十三，马克思强调为建设美好社会而进行社会斗争的重要性。他的人文主义是实践性的。他谈到了“推翻一切关系的绝对必要性，在这些关系中，人是一个被贬低的、被奴役的、被遗弃的、可鄙的存在”(马克思1844/2010,182)。今天，有关于数字技术作为社会斗争工具的作用的讨论。实践人文主义与第14个维度有关:马克思强调了替代方案的必要性，即超越利润的必要性和关注人类合作的社会制度。

## 3. 大数据资本主义

大数据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在经济方面，我们经历了(几乎)所有东西的新自由主义商品化和私有化，包括数据和通信。在政治体系中，出现了一个监视-工业综合体。伴随着这种政治-经济复合体的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促进了监控技术将预防和侦查犯罪和恐怖主义的观念。监控意识形态帮助创造了一种文化

控制、制造恐惧、找替罪羊、猜疑、竞争和个性化。

大数据的收集、存储、控制和分析是在政治经济利益的背景下进行的，目的是对个人进行经济和政治控制和定位。他们被定位为消费者和潜在的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披露了全球通信监控系统的存在，秘密机构利用该系统实时监控和分析通信流。涉及这一监控系统的公司包括美国在线、苹果、Facebook、bb0 /YouTube、微软、Paltalk、Skype/微软和雅虎。

c·赖特·米尔斯在1956年提出，“经济、军事和政治结构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米尔斯1956年，8)。在这种背景下，他谈到了权力精英的存在。今天，权力精英利用监视-工业复合体来施加控制。在监控-工业复合体中，用户将数据在互联网上公开或半公开。企业将这些数据和用户的活动商品化，以积累资本。秘密机构和警方的目标是获得大数据流的访问权限，以实现数据和社会的安全。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将监控部分外包给了私人安全服务机构，而对后者来说，监控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NSA将监控工作转包给2000多家私人安保公司。在监视-工业复合体中，监视资本和监视国家被融合在一起。大数据意味着老大哥的权力和资本主义的大生意。

马克思将监督劳动描述为“指导、监督和调整的工作如何成为资本的功能之一”(1867/1976,448)。福柯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景主义统治的社会”(福柯1994,58)，他继续认为，“全景机制基本上包括把某人放在中心——一只眼睛，一个凝视，一种监督的原则——谁将能够使它的主权作用于这个权力机器内的所有个人”(福柯2007,93 - 94)。监视-工业复合体表明，围绕“权力的概念[…]，马克思和福柯是一致的”(Negri 2017, 184)，“资本和权力[…]变得统一[…]，并构成了两种矛盾行为之间的鸿沟，这两种行为被迫结合在一起，但却是不可及的”(Negri 2017, 12)。

监控研究领域的一些学者声称，监控已经变成了后全景，而数字监控并没有导致数字全景。他们强调监视已经变得分散，并认为福柯的全景论应该在理论上被粉碎。这样的方法忽视了监视技术的去中心化中心化的出现。分散的监控技术在许多地方收集大数据。这些数据是联网的，并由两个中央泛光集体行动者控制:资本和国家。

大数据资本主义和算法力量可能导致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

在这个购物中心里，人类几乎成为广告的目标

到处都是，在商业逻辑统治社会的地方。在大数据的世界里，使用工具逻辑来计算人类需求的算法可以使人类活动和决策自动化，以满足这些需求。问题是，算法和机器没有伦理和道德。数据商品化意味着新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出现，也加剧了互联网的剥削倾向。大数据在数据所有权和数据控制方面需要“大数据鸿沟”(Andrejevic 2014)。大数据还具有新型的理性歧视和累积劣势(Gandy 2009)。大数据的数字实证主义逻辑忽视了技术不是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办法。大数据监控的绝对怀疑逻辑废除了无罪推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有罪推定，其依据是“在被证明无罪之前，你就是罪犯和恐怖分子”的原则——尽管大多数恐怖分子不会在网上公布他们的计划。g <s:1> nther Anders(1980, 221)强调了监视的极权主义特征:“随着监视设备的常规使用，极权主义的主要前提已经被创造出来，极权主义本身也随之产生”。监视和监视意识形态往往被嵌入到法律和秩序政治中，导致法西斯主义的潜力被推进。大数据意味着大量数据存储在服务器上并通过互联网传输，在当前的能源体制下，这意味着环境问题的加剧。电子垃圾正被倾倒到发展中国家。

2012年，数据中心使用的电力相当于30座核电站的发电量(Glanz 2012)。运行互联网的电力约占全球总发电量的10% (De Decker 2015)。外包数据和软件使用，以及将劳动力众包到云端，可能会增加失业率和不稳定劳动力。

大数据在研究领域的兴起催生了计算社会科学和数字人文等新方法。这些都是大数据实证主义的形式。这样的研究获得了大量的资金，并且痴迷于量化。大数据分析带来了一种危险，即“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融合本身就是一个将人物化的社会的产物”(波洛克和阿多诺2011,20)。大数据实证主义是“(互联网)科学对哲学的免疫”(Habermas 1971, 67)。计算机科学殖民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危险在于，计算社会科学带来了理论的死亡，并将批判性的定性的、以理论为导向的研究根除。Georg Lukács(1971, 88)在这种背景下警告说，数学和实证主义将质量简化为“可以计算”的数量，并将人类活动具体化。组织大数据的数字机器创造了一种新的物化形式，摧毁了质量、辩证法、批判和非工具性行动。我们需要大数据分析的替代方案;我们需要批判性的数字媒体研究，而不是计算社会科学。

## 4. 数字劳动的矛盾

2016年，b谷歌实现利润195亿美元，是全球第27大跨国公司。同年，Facebook的利润为102亿美元，是全球第188大跨国公司[1]。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交媒体公司都如此盈利。推特2016年亏损4.569亿美元(2)。在美国经济中，利润在GDP中的份额为24.8%，工资总额的份额为53.1% (Fuchs 2015, Chapter 5)。Facebook的工资份额(即其收入中支付的工资份额)为11.0%。为什么facebook的工资与美国经济总量相比如此之低，而其利润却如此之高?社交媒体经济是建立在对用户无偿数字劳动的剥削之上的。马克思(1885/1978)用M -C -C的形式描述了资本积累周期。P ..C ' -m '。在社交媒体经济中，这个循环变成了M -C ..P1 (v1, c) ..P2 (v2=0) ..C ' -m '。平台是产品(P1)，不是商品，而是一顿“免费午餐”。个人数据(P2)是由用户的数字劳动产生的商品，被出售给广告客户，这些客户可以在用户的个人资料上呈现有针对性的广告。

内格里(Toni Negri)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将劳动价值作为共同潜能的新理论”(内格里2017,29)。马克思强调，技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集体工人的出现:“随着劳动过程的合作性的不断强调，生产劳动的概念以及这种劳动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必然会不断扩大。为了进行生产劳动，个人不再需要亲自动手去摸对象;他只要成为集体劳动者的一个器官，履行集体劳动者的任何一种从属职能就够了”(马克思1867,643-644)。马克思也把集体工人称为“集合工人”:“越来越多的劳动类型被包括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中，从事生产劳动的人被归类为生产工人，即直接受资本剥削并服从其生产和扩张过程的工人”(马克思1867年，1039年)。

马克思认为，劳动的合作性要求对生产劳动的概念进行延伸。不仅与雇佣劳动相联系的无薪劳动时间被剥削和生产，而且无薪劳动也有助于商品生产和资本积累。在自主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受众劳动理论等领域中，对这种洞察力的表达是相互独立的。

在自主主义理论中，社会工作者的概念是“一个新的工人阶级”，“现在扩展到整个生产和再生产的范围”(内格里1988,209)，创造了“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之间的联系”(内格里1988,209)。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强调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假设，即“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不具有生产力”(Dalla Costa和James 1973,31)。这一假设否认了

“女性潜在的社会力量”(6)。家务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不仅生产使用价值，而且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至关重要”(31)。它生产了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商品:活生生的人——“劳动者自己”(6)。达拉斯Smythe的受众劳动理论认为，广告资助媒体的受众是无偿的受众工人，他们进行劳动，创造了一种受众商品。垄断资本主义下的物质现实是，大多数人的所有非睡眠时间都是工作时间。在非工作时间中，最大的一块是观众的时间，这些时间被卖给了广告商(Smythe 1977,3)。

商业社交媒体上的数字劳动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商业广播媒体上的观众劳动。社交媒体使用基于大数据商品的定向广告。受众从内容中获取意义。社交媒体用户也创造社会关系、内容和数据。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数字劳动是基于产消(生产性消费)、对个人数据的持续监控、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广告、预测算法和算法拍卖。Facebook和b谷歌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公司，利用这些劳动力和受众信息的大数据商品。

数字劳动是在数字劳动的国际分工中组织起来的异化的数字劳动，其中包括开采构成数字工具物理基础的矿物的矿工的奴隶劳动、泰勒式组装劳动、电子废物劳动、软件工程、各种形式的在线劳动、用户劳动等等。(Fuchs 2014, 2015, 2017b)。

在美国，2015年每人每周平均生殖劳动时间为44.53小时(有关以下计算的详细数据，请参见Fuchs 2017a)。工资劳动的年平均工时为1778小时。总共完成了2320亿小时的雇佣劳动，其中1130亿小时是剩余劳动时间，1190亿小时是必要劳动时间。传统的剩余价值率计算为雇佣劳动的剩余劳动时间(s)与其必要劳动时间(v)的关系，在货币方面计算为年总利润(p)与总工资(v)的关系，以美国经济为例，2015年传统的剩余价值率为0.942。但经典公式并未将无酬劳动考虑在内。据统计，2015年USA的无偿生殖劳动时间为5790亿小时。劳动的有机组成(修正后的剩余价值率)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Fuchs 2017a):

$$\text{劳动的有机构成} = \frac{\textit{雇佣劳动的无酬劳动时间} + \textit{无雇佣劳动的无酬劳动时间}}{\text{资本的这样一种效应，不仅仅是增加了雇佣劳动的无酬劳动时间，同时也增加了无酬劳动的无酬劳动时间。生殖性}}$$

劳动是生产性的，因为它是一种无偿的剩余劳动时间。资本剥削雇佣劳动和再生产劳动。2015年USA劳动力的有机构成为(579 + 113)/119 = 5.8 (Fuchs 2017a)。每劳动一小时，有5.8小时的无偿生殖劳动。-生殖劳动占全部无酬劳动时间的83.7%，占劳动剩余劳动时间的16.3%。

2015年同一年，USA人均每周生育劳动时间为44.5小时。平均4.9小时用于观看广告，12.4小时用于使用商业社交媒体(Fuchs 2017a)。观众劳动和用户的数字劳动构成了生殖劳动时间的很大一部分。此外，生殖劳动是性别化的。在美国，女性平均承担60%的生殖劳动(Fuchs 2017a)。-Facebook的算法使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逻辑，使用粗糙的区分、概括和假设来分割市场数据。较贫穷国家的用户以及一般较贫穷的用户被视为价值较低的消费者，即在点击广告时不太可能购买广告商品(Fuchs 2017a)。

数字资本主义在深化剥削的同时，也为超越资本主义逻辑的自治领域创造了新的基础。它为在资本主义内部萌芽的新生产关系创造了基础。随着数字化的发展，“商品变得越来越透明”(Negri 2017, 25)，“开始出现对社会合作的自主性越来越敏感的部门，对无产阶级主体的自我价值增值越来越敏感”(Negri 2017, 25)。数字资本主义建立在数字劳动创造的数字商品与数字公地之间的对抗之上。

开放获取出版就是数字对抗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开放获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学术出版公司的高利润率，以及这个行业的垄断倾向的一种反应。2016年，里德爱思唯尔实现税前净利润19.34亿英镑，营收68.95亿英镑。因此其利润率为1.934/(6.895-1.934)= 39.0%。同年，施普林格实现利润2.964亿欧元，营收8.331亿欧元。其利润率为296.4/(833.1-296.4)= 55.2%[3]。这样的利润率是极高的。它们是通过向图书馆出售昂贵的捆绑文章订阅、数据库和期刊，以及向个人出售内容访问来实现的。

大学和学术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使用公共资金。学术知识是一种公地，“部分是由现在活着的人的合作带来的，但部分也是通过建立在早期工作的基础上”(马克思1894,199)。垄断资本将学术公地私有化并商品化。开放获取是对垄断出版资本的反制。

“开放获取(OA)文献是数字化的、在线的、免费的，并且不受大多数版权和许可限制”(Suber 2012, 4)。大多数开放获取项目是非营利性的，由学术机构或学术协会运营。少数开放获取项目以营利为目的。他们通过文章来实现盈利

帐簿处理费(装甲运兵车、bpc)。作者为出版自己的作品支付高昂的出版费用(有时高达数千欧元/英镑/美元)。装甲运兵车和bpc就像去一家餐厅，你付钱就可以自己做饭和吃饭。在Diamond开放获取模式中，非营利、非商业组织、协会或网络发布的材料以数字格式在线提供，对读者和作者免费，不允许商业和营利再利用(Fuchs和-Sandoval 2013)。

2017年3月20日，开放获取期刊目录列出了9423种开放存取期刊。其中1866种使用CC-BY-NC- nd许可，1328种使用CC-BY-NC许可，522种使用CC-BY-NC- sa许可。共有3716个(39.4%)不允许商业再利用。5134例(54.5%)未使用装甲运兵车[4]。这些数据表明，存在独立于资本的数字学术公地。

在开放获取上有各种各样的政治立场(Fuchs和Sandoval 2013)。政策和行业视角认为，“开放获取是一种伟大的新商业模式”。工会的观点认为，“开放获取是由自愿的非资源项目构成的，这些项目破坏了出版工人的工作”。激进的开放获取观点认为，“非营利性开放获取需要与动员资源的资本主义出版进行斗争”。

激进开放获取只有通过获得基金会和公众的资金、志愿者的帮助、充当开放获取出版社的大学、以及大学和研究委员会制定有利于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的政策等形式的物质支持，才能正常工作。

Lawrence & Wishart (L&W)是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出版社。马克思主义网络档案馆(MIA, https://www.marxists.org)是一个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图书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2014年，L&W和MIA之间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否应该以开放获取的形式在网上提供了一场冲突。

L&W辩称，“侵犯这项版权的后果是剥夺了一家小型激进出版商维持生存所需的资金。[…][MIA]复制的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的规范和期望，而是一种消费文化，期望文化内容免费提供给消费者，而让出版商、编辑和作家等文化工作者得不到报酬。MIA不同意这一观点，称互联网“是*一种新的信息媒体*”。具体来说，工人运动的历史实际上应该是“自由的”。“[…]任何共产主义出版社的重点，MIA所遵循的，是确保这些作品得到最广泛的传播，而不是再一次限制它们。这是共产主义出版的对立面。”

这场冲突是数字公共左派和版权左派之间的冲突。它表达了网络数字生产力与资本主义内部替代项目运作之间的对抗。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放到网上，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出于政治原因，这些著作应该在网上免费获取。广泛的可访问性是使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良好基础

而互联网是完成这项任务的绝佳媒介。由于“史翠珊效应”，版权执法在互联网上是适得其反的。左翼项目之间的竞争是弄巧成拙的。左派应该专注于挑战营利性企业出版的合作。合作还可能需要争取和发展其他形式的资助(公共资助、捐赠模式、商业再利用收费、一旦达到特定的捐赠水平，就可以开放获取作品，等等)。

## 5. 数字资本主义的危机

Paul Mason(2015)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定理、熊彼特的长波理论和数字媒体分析联系起来。其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崩溃理论，这是亨利克·格罗斯曼的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崩溃理论的新版本。格罗斯曼(1992,119)认为，“由于利润的相对下降，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崩溃”(格罗斯曼1992,119)。梅森写道，信息技术导致信息的边际成本为零。因此，利润率将下降，直到资本主义崩溃和后资本主义出现(见富克斯2016b)。

这样的分析忽视了阶级斗争对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利润率是这样计算的:

$$Rate\ of\ profit = \frac{s}{c+v}$$

S…剩余价值，利润

c…不变资本v…可变资本

将分数的枚举数和分母除以可变资本，我们得到如下变换:

$$Rate\ of\ profit = \frac{\frac{s}{v}}{\frac{c}{v}+1}$$

s/v…剩余价值率c/v…资本的有机构成

剩余价值率衡量劳动剥削的强度，资本的有机构成衡量生产的技术和资源强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算机化对利润率产生了矛盾、矛盾的影响。它既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又提高了剩余价值率。这两个比率具有矛盾性

对利润率的影响是相互矛盾的。有机成分的提高降低利润率，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提高利润率。资本家反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降低了工资份额(工资在GDP中所占的份额)。总的影响是，在许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总利润率是波动的。这种波动鼓励了金融化，而金融化又增加了经济的波动性。工资的相对下降导致了家庭债务的增加和购买力的削弱。2008年的危机是新自由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积累矛盾的表现。此后，世界许多地区的经济危机也变成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催生了威权主义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威权资本主义。

## 6. 今日意识形态(Ideology Today)

商品生产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交换价值是指一定数量的商品以x商品A = y商品B的形式进行的交换(例如1根香蕉= 0.15英镑)。在生产和购买的商品中看不到社会生产关系，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商品是“一种社会象形文字”(马克思1867/1976,167)。“意识形态的出现和扩散似乎是阶级社会的一般特征”(Lukács 1986, 405，德文翻译)。

民族主义是一种将民族视为政治恋物对象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掩盖了阶级关系。它把资本和劳动呈现为一种(虚构的)国家利益的联合。“民族和国家地位是法西斯政治话语的核心组成部分”(伍德利2010年，185页)。“[F]禁欲主义*本身*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政治商品:[…]对隐藏商品真实本质的社区身份的拜物教”(伍德利2010年，17-18)。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它通过统一和同一性的神话，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化的群体之间投射出一种‘共同的本能命运’(统一的社会地位)，在分化的阶级社会中忽略了社会区别的现实”(伍德利2010年，17)。资本主义危机可以产生法西斯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排除新民族主义将转变为新法西斯主义和新的世界大战的原因。

图2显示了一种右翼威权主义模式(详见富克斯2018年)。该模型利用威权主义领导、民族主义、友敌方案、父权制和军国主义来分散人们对阶级结构的注意力。

唐纳德·特朗普就是右翼威权主义的典型代表。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和资本家，还是一个利用推特和真人秀传播意识形态和塑造自己品牌的媒体人。社交媒体是一个领域

# 右翼威权主义(RWA)个人⊠团体⊠机构⊠社会

RWA的社会角色:将注意力从阶级结构、资本主义和统治转移




**图2:**右翼威权主义的典范。

象征的、沟通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在信息时代，网络传播领域是阶级斗争的重要领域。特朗普在推特上有3000多万粉丝，在脸书上有2000多万粉丝，在Instagram上有700多万粉丝，他利用社交媒体作为传播右翼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

2016年9月5日，美国人庆祝劳动节。特朗普在推特和脸书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在视频中他向美国工人发表了讲话

http://twitter.com/realDonaldTrump/statuses/772798809508372480, https://t.co/RNl7cfzkmN)。在视频中，他说:

> 美国工人为我们今天所热爱和拥有的国家奠定了基础。但是，美国工人正在被压垮。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样糟糕的贸易协定，对雇佣了这么多优秀人才的小企业征收如此高且不可原谅的税费。在这个劳动节，让我们向美国的工人致敬，向那些自豪地保持美国工作的男男女女致敬。他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绝对最好的。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们。我已经准备好让美国再次运转起来，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这就是我们在11月8日要做的事情。

这篇文章包含了几个意识形态的元素。它把美国人描绘成一个神话般的集体。它构建了资本和劳动的统一的国家利益。他把美国描绘成受到外敌攻击的国家。社会冲突被描绘成国家之间的冲突，这转移了人们对阶级冲突的注意力。特朗普对推特的使用清楚地表明，民族主义是如何成为政治拜物教的。罗莎·卢森堡认为，在这种背景下，民族主义是一种“模糊的面纱”，“在任何情况下都隐藏着明确的历史内容”(卢森堡1976,135)。“[B]血缘、社区、民间，都是隐藏真正的权力星座的工具”(Neumann 1994/2009, 464)。

## 7. alternative

21世纪正在到达一个以动荡和政治两极分化加剧为特征的历史分岔点。未来是不确定的。我们可能走向超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威权主义的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在一场核世界大战中彻底毁灭地球和毁灭人类，或者是一个另类的公地社会。

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2000年、2004年、2009年、2017年)在他们的《*帝国*、*众*、*联邦*、*议会*》四学中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全球资本(帝国)面临着一个新的工人阶级(众)。新的共同潜力出现，可能成为公地社会(英联邦)的基础。然而，联邦只是21世纪社会发展的一个可能结果。也可能出现新法西斯主义或人类终结等负面发展。哪种选择占上风取决于社会斗争将如何发展。罗莎·卢森堡在1918年所写的真理在今天再次变得非常迫切:“在这个时刻，社会主义是人类唯一的拯救”(卢森堡1971,367)。

右翼威权主义运动推进了关于自然、社会和交流的特殊政治。在自然方面，他们崇拜国家同一性、家庭和保守传统，并将移民和全球同一性视为破坏国家的环境问题。右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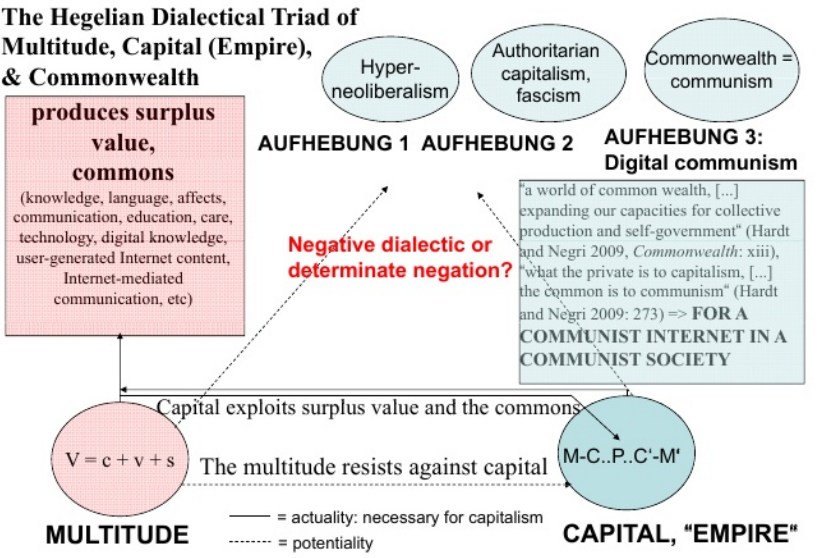



**图3:**资本主义帝国与大众的对立导致的社会矛盾发展选择。

威权主义的社会政策是宣扬适者生存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为本土民族人口保留福利的民族“社会主义”修辞的结合。在传播方面，右翼威权主义将保守的技术悲观主义(认为传统价值观在互联网上受到威胁，并主张对互联网进行法律和秩序控制)与新自由主义的技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颂扬企业媒体和企业互联网)相结合。今天的进步力量往往是分裂的、碎片化的。公地包括社会公地、自然公地和交流公地。所有这些公地都变得越来越商品化和私有化。左翼政党和运动主要为捍卫社会公地而斗争，绿色运动为捍卫自然公地而斗争，技术运动为捍卫交流公地而斗争。为了挑战右翼威权主义，进步力量应该从20世纪20年代左翼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当时各派别，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人，相互反对，没有团结起来对抗法西斯威胁。我们需要一个反对右翼威权主义的统一政治战线，在这个战线上，对社会、自然和交流公地的捍卫成为一个与一个进步党和一个联合运动相关联的运动。社会民主主义需要以社会民主主义2.0的形式进行更新;争取社会主义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运动。对于资本与右翼威权主义的趋同，唯一可行的答案是左翼趋同为国际主义进步运动(见图4)。




**图4:**公地运动的政治趋同。

在传播方面，以公共为基础的社会的视角代表了数字公共、平台合作社和公共服务互联网的进步。民主交流塑造并被塑造为“自由人的联合，使用共同的生产资料工作，并在充分的自我意识中作为一个单一的社会劳动力消耗他们的许多不同形式的劳动力”(马克思1867,171)。
弗朗兹·l·诺伊曼(1957,294-295)强调，在危机的情况下，学者作为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发挥作用是很重要的:“因此，作为大学和国家的公民，我们仍然需要对焦虑和自由进行双重进攻:教育和政治的进攻。政治，再一次，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件双重的事情:我们的学术学科的主题与政治问题的渗透[…]以及对政治问题采取立场。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政治的人性化;如果我们希望防止煽动家利用焦虑和冷漠，那么我们——作为教师和学生——就不能保持沉默。[…]我们必须说出来，写出来。”

## 笔记

[1]数据来源:2016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表格10-K (Alphabet, Facebook);福布斯2000全球最大上市公司榜单。
[2]数据来源:Twitter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2016年10-K表格。
[3]数据来源:Reed Elsevier Investor Relations, Annual Reports, https:// www.relx.com/investors/annual-reports
[4]对于相当大的份额，没有可用的数据，这意味着不使用apc的期刊的实际比率实际上更高。

# 参考文献

Andrejevic, Mark. 2014. 'The Big Data Divi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 munication* 8: 1673–1689.

Anders, Günther. 1980. *Die Antiquiertheit des Menschen 2. Über die Zer- stö rung des Lebens im Zeitalter der dritten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Munich: C. H. Beck.

Balibar, Étienne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1991. *Race, Nation, Class*. London: Verso.

Dalla Costa, Maria and Selma James. 1973.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2nd ed. Bristol: Falling Wall Press.

De Decker, Kris. 2015. 'Why We Need a Speed Limit for the Internet.' *Low-Tech Magazine*, 19 October 2015.

Foucault, Michel. 2007.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Foucault, Michel. 1994. *Power*. New York, NY: New Press.

Fuchs, Christian. 2018. *Digital Demagogue: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rump and Twitter*. London: Pluto.

Fuchs, Christian. 2017a. 'Capitalism, Patriarchy, Slavery, and Racism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 and Digital Labour.' *Critical Sociology* 43, DOI: https://doi.org/10.1177/0896920517691108.

Fuchs, Christian. 2017b. *Social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2nd edition.

Fuchs, Christian. 2016a. *Cri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Fuchs, Christian. 2016b. 'Henryk Grossmann 2. 0: A Critique of Paul Mason' s Book '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Our Future'.'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14 (1): 232–243.

Fuchs, Christian. 2016c. *Reading Marx in the Information Age. A Media and Com- munication Studies Perspective on 'Capital Volume I'*. New York: Routledge.

Fuchs, Christian. 2015. *Culture and Econom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New York: Routledge.

Fuchs, Christian. 2014.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Fuchs, Christian and Marisol Sandoval. 2013. 'The Diamond Model of Open Access Publishing: Why Policy Makers, Scholars, Universities, Libraries, Labour Unions and the Publishing World Need to Take Non-Commercial, Non-Profit Open Access Serious.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11 (2): 428–443.

Gandy, Oscar H. 2009. *Coming to Terms with Chance: Engaging Rational - Discrimination and Cumulative Disadvantage*. Farnham, UK: Ashgate.

Glanz, James. 2012. 'Power, Pollution and the Internet.' *New York Times Online*, 22 September 2012.

Grossmann, Henryk. 1992. *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Being also a Theory of Crises*. London: Pluto.

Habermas, Jürgen.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 Boston, MA: Beacon Press.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4.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London: Penguin.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9. *Commonwealth*.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17. *Assemb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itchin, Rob. 2014. *The Data Revolution*. London: Sage.

Lukács, Georg. 1971.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Lukács, Georg. 1986. *Zur Ontologie des gesellschaftlichen Seins.* Zweiter Halb-band. Georg Lukács Werke, Band 14. Darmstadt: Luchterhand.

Luxemburg, Rosa. 1971.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of Rosa Luxemburg*. New York,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Marx, Karl. 1894/1981. *Capital Volume III*.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1885/1978. *Capital Volume II*.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1871/2010.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In *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MECW), Volume 22*, 30–59.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rx, Karl. 1867/ 1976. *Capital Volume I*.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1857/1858/1973. *The Grundrisse*.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1844/2010.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Introduction. In *MECW, Volume 3*, 175–206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848/2010.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MECW, Volume 6*, 477–519.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Mason, Paul. 2015. *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Our Future*. London: Allen Lane. Mills, Charles Wright. 1956. *The Power Eli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gri, Antonio. 2017. *Marx and Foucault*. Cambridge: Polity.

Negri, Antonio. 1988. *Revolution Retrieved: Selected Writings on Marx, Keynes, Capitalist Crisis and New Social Subjects 1967–83*. London: Red Notes.

Neumann, Franz. 1957/2017. 'Anxiety and Politics'.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15 (2): 612-636

Neumann, Franz. 1944/2009. *Behemoth: The Structure and Practice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33–1944*. Chicago, IL: Ivan R. Dee.

Pollock, Friedrich and Theodor W. Adorno. 2011. *Group Experiment and Other Writing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mythe, Dallas W. 1977.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1 (3): 1–27.

Suber, Peter. 2012. *Open Acces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Williams, Raymond.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odley, Daniel. 2010. *Fasc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Fascist Ideology*. Abingdon: Routledge.

第五章

# 大数据批判的关键是什么？对Christian Fuchs章节的反思

大卫·钱德勒

## 1. 简介

在他的章节中，Christian对批判性理论方法的相关性进行了强有力的全面分析，以理解和参与大数据资本主义的背景和替代方案。在这里，大数据在监控社会中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这可能构成一种新形式的极权主义控制意识形态:“组织大数据的数字机器创造了一种新的物化形式，破坏了品质、辩证法、批判和非工具行为。针对这种非人性化的意识形态控制，克里斯蒂安认为，我们需要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人文主义，将人类重新置于世界的中心。我不打算在马克思主义论证的正式层面上讨论这一章，有大量时间来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人文主义;我与克里斯蒂安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想法在我们当代的相关性，以及它们作为一种参与和批评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方式的有用性。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Chandler, D. 2019. What is at Stake in the Critique of Big Data? Reflections on Christian Fuch's Chapter.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 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73-79.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I: https://doi. org/10.16997/book29. License: CC-BY-NC-ND 4.0

## 2. 批判马克思主义

首先，我想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人文主义置于语境中。也许，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中数字化问题的经典批判著作是为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奠定声誉的著作: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1947)。对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来说，现代主义思想是去人性化的:启蒙运动在使世界和人类非自然化，以及减少、普遍化和平等化世界经验方面存在问题。对于批判理论来说，启蒙运动是有问题的，是压迫的，而不是解放的。启蒙运动的理性观本身就包含着毁灭的种子。启蒙运动被视为通过理性的力量将人类与自然分离的历史——基于对差异的包容，以对等原则为基础。这将启蒙运动塑造成一个没有内在限制的极权主义项目(阿多诺和霍克海默，1997:6)，非常符合克里斯蒂安那一章的描述。因此，对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来说:“资产阶级社会是由平等统治的。它通过将不同之物简化为抽象的量而使之具有可比性”(1997,7)。

> 不同之处被平均化了。这就是批判性地决定可能经验的界限的判断。一切事物与其他一切事物的同一性得到了补偿，因为任何事物都不能同时与自己同一。启蒙……切除不可通约的…在抽象的平等统治下。(1997,12 -13)

对于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方法来说，启蒙运动与其说是一个进步和理性的过程，不如说是对世界和人类个体的一种机械的、麻木的、还原。对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来说，这是一个没有外部可能性的世界，因为一切都通过概念抽象被纳入对等(1997,16)。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任何新事物都不可能发生，因为过程总是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即使是未知的数值，也仍然可以代入方程，将整个世界溶入数学。因此，所有新事物都是预先确定的，产生了一个“没有希望的知识”的世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1997,27 -28)。同样，正如克里斯蒂安所言，大数据资本主义将一切都纳入市场等价法则或算法监控之下。

因此，对于这条批判线来说，大数据资本主义的(前)历史是很长的，最早的尝试是通过对等的扩展来控制外部，莫斯的礼物经济和前现代的魔法和牺牲是早期版本的非等价物交换(莫斯2002)。非等价物的表演性交换随后通过比例，即概念对等的比例，导致了思想上的对等的反映——概念的包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过程通过金钱在实践和思想上进一步形式化

作为交换的普遍等价物，通过民主和普遍权利的抽象，以及科学和数字的发展(Sohn-Rethel 1978)。因此，现代主义项目是理性主义和官僚控制想象的延伸之一，随着这种发展，主体/客体和人/自然二元对立的加剧。

克里斯蒂安的这一章真正继承了这一批判项目，将大数据资本主义描绘为现代性中所有非人化和问题的顶点——从资本主义的巅峰，到法西斯主义的巅峰，再到非人化的巅峰。因此，启蒙运动显然在大数据资本主义中达到了顶峰，通过市场和数字算法监管，一切都是对等的。批判理论及其继承者试图通过挑战这种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来回应;质疑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或现代主义理性形式的切割和区别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等级制度，以及它们在人与自然之间日益增长的区别;并试图挑战进步的目的，以及建立差异的等价物和包容的合理化依据。对基督教徒来说，

> 大数据资本主义和算法力量可能导致世界变成一个巨大的购物中心，在这个购物中心里，人类几乎无处不在地成为广告的目标，商业逻辑在这里殖民社会。在大数据的世界里，使用工具逻辑来计算决策和人类需求的算法可以使人类活动和决策自动化。问题是，算法和机器没有伦理和道德。

对于这种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它是反对启蒙运动或现代主义思想的政治斗争-缺乏灵魂，其机械极权主义没有“伦理和道德”-这是大数据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和危机的解放方面。批判的方法试图通过将人带回世界，拒绝现代性的同质化、商品化和算计性的凝视来解决问题。

## 3. 大数据与现代性

然而，将对大数据的批判挤进批判理论对现代性的谴责的困难在于，批判理论方法被迫回避大数据的非现代认识论主张及其所唤起的治理模式(将大数据作为政治和治理的超现代主义框架)。克里斯蒂安对大数据的左翼批判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正是他将其与现代主义驱动和理解的悠久历史联系起来的方式，以保持一种批判性的方法和观点

卡尔·马克思的相关性尽管克里斯蒂安对现代主义追求均等化、商品化和控制的动机持批评态度，但他几乎没有区分大数据是一种方法论方法，还是大数据只是另一种说法。问题在于，它将大数据简化为数据。我想说的是，虽然现代实证主义对数据的假设有其危险和问题(参见Hacking, 1990)，但大数据声称的是不同的东西(因此是不同的危险和不同的问题)。这种差异反映了政治和治理在上个世纪的变化方式，突出了对现代主义和启蒙主义方法的信心崩溃。

大数据声称提供对“实际”的洞察，而不是在基于表象或抽象的现代主义知识层面上工作。大数据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治理模式，依赖于“现实主义”或表象的表面观点，而不是关注因果关系，在因果关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连续性对于建立线性和非线性因果关系的轨迹至关重要。因此，大数据声称要改变我们的日常现实以及我们与周围事物的直接关系。它声称，通过“数据化”，让看不见但存在的过程和效果变得可见，从而实现这一点。大数据通过数据化“看到”的过程在理论上是直截了当的，尽管完善所需的相关性的工作要复杂得多。例如，如果输入谷歌的搜索词与世界上的过程相关，例如购物意图、流感爆发或冲突紧张局势的加剧，那么世界上的这些过程就可以“数据化”，即可以通过谷歌对这些术语的算法检测和分析间接看到它们。这就像煤矿里的金丝雀感知有毒气体一样，作为一个实时的指标，可以做出反应。

正是这种日常生活的“数据化”导致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化”形式，而这一过程正是我们称之为“大数据资本主义”的关系互动的核心:这是一种通过将互动和关系带到表面并使其可见、可读从而可控的方式来访问现实，而不是寻求理解因果关系的隐藏规律(Anderson 2008;Cukier and Mayer-Schöenberger 2013)。因此，大数据作为一种治理模式，依赖于通过关联的力量来扩大视野。这种通过数据化更好地“看到”的能力被认为是允许对过程进行调节或调节，从而永久地“抵御”、“消除”或“吸收”危机或故障(Wakefield and Braun 2018)。在这种想象中，就好像时间变慢了，使冲击或危机可以控制。举一个当代的例子，正如我所写的，看看如何将其应用于减缓和感知赛马的“色彩模糊”(Wood 2017)。

希望这种在慢动作中“看到”当下的类比能让我们理解数据化不是通过简化和抽象来解决问题，而是关于特定的和模拟的，感知环境中的变化，否则这些变化是看不见的。所以，虽然数据可以被理解为

就二进制代码而言，数字世界本身变得更加模拟，或者在物体的独特属性或本质方面变得更少分化。大数据关注的是“实际”的表面，而不是存在的本体论本质，也不是复杂因果相互作用中出现的过程。因此，产生的“知识”不是固定的东西，也不是可以存储和再利用的东西，而是通过相关机制“看到”变化的通量或流动。因此，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治理模式是通过一种不同类型的“知识”来实现的，这种“知识”更类似于对符号的翻译或解释，而不是理解因果链(Esposito 2013)。

在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中，数据收集可能性的增加和计算能力的发展使分析人员能够谈论知识生产的“第四范式”(超越理论、实验和模拟)(Pietsch 2013;因此，大数据似乎缺乏现代主义知识“生产过程”的某些属性，并且似乎较少受到以主题为中心的概念装置的中介。正如Rob Kitchin所强调的，大数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构建往往不是知识生产的有意识过程的一部分:数据通常已经存在，在社交媒体或其他电子数据捕获过程中，发现相关性是关键的创新(Kitchin 2014, 2)。因此，有人认为:“大数据分析为理解世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论方法;新的数据分析不是通过分析相关数据来检验理论，而是寻求“从数据中产生”的相关见解(Kitchin 2014, 2)。

## 4. 结论

对于大数据的兴起，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看来，要采取“左翼”的批评方法，大数据必须被视为一个现代主义问题，它唤起并强化了自上而下的“命令与控制”治理模式。但也有可能采取一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批判性地对待大数据话语的方法，不是因为这些话语代表了现代主义抽象的“巅峰”，而是基于对现代主义因果过程主张的认识论拒绝，以及对人类知识方向和控制的潜力。看到存在的东西并对其做出反应，是理解和能够运用知识来改变存在的东西的一个可怜的替代品。大数据话语接受世界本来的样子，并促进对世界的适应，将人减少到任何其他因素来调节和调节。大数据方法试图完全绕过这些关键区别，而不是遵循人为夸大人与非人或主体与客体之间鸿沟的现代主义方法。

在这方面，大数据的认识论主张及其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支撑反映了现代主义者的当代疲惫

和启蒙思想。事实上，对于许多缺乏克里斯蒂安批判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批判理论家来说，大数据的问题恰恰在于它没有实现其将人类从认识论主张中移除的主张(boyd和Crawford 2012)。与其批判现代性的“无灵魂”和人与世界的分离，当代批判更希望在这一点上走得更远。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在今天受到批判，不是因为它异化和去人性化，而是站在相反的立场上，认为它过于人道主义或以人为中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克里斯蒂安的章节反对大数据批判的潮流，因为它要求人类回到一个被现代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所否认的有意义的世界。

## 参考文献

Adorno, Theodor and Max Horkheimer. 1947/1977.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London: Verso.

Anderson Chris. 2008. ‘The End of Theory: The Data Deluge Mak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Obsolete.’ *Wired Magazine* 16 (7): 23 June. Available at: http://archive.wired.com/science/discoveries/magazine/16-07/pb_theory(accessed 14 May 2018).

boyd, danah and Kate Crawford. 2012. ‘Critical Questions for Big Data: Provo-cations for a Cultural, Technological, and Scholarly Phenomenon.’ *Informa- 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5 (5): 662–679.

Cukier, Kenneth and Viktor Mayer-Schöenberger. 2013. ‘The Rise of Big Data: How It is Changing the Way We Think About the World.’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Available at: http://m. foreignaffairs. com/articles/139104/kenneth-neil-cukier-and-viktor-mayer-schoenberger/the-rise-of-big-data (accessed 14 May 2018).

Esposito, Elena. 2013. ‘Digital Prophecies and Web Intelligence.’ In *Privacy, Due Process and the Computational Turn: The Philosophy of Law meets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edited by Mireille Hildebrandt and Katja de Vries. Abingdon: Routledge.

Hacking, Ian. 1990. *The Taming of Ch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itchin, Rob. 2014. ‘Big Data, New Epistemologies and Paradigm Shifts.’ *Big Data and Society* 1 (1): 1–12.

Mauss, Marcel. 2002. *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London: Routledge.

Pietsch, Wolfgang. 2013. ‘Big Data: The New Science of Complexity.’ 6th Munich-Sydney-Tilburg Conference on Models and Decisions, Munich, 10–12 April 2013, Philsci Archiv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Available at: http://philsci-archive.pitt.edu/9944/ (accessed 14 May 2018).

Sohn-Rethel, Alfred. 1978.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Wakefield, Stephanie and Bruce Braun. 2018. 'Oystertecture: Infrastructure, Profanation and the Sacred Figure of the Human.' In *Infrastructure, Envi- ronment, and Life in the Anthropocene*, edited by Kregg Hetheringt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Wood, Greg. 2017. 'Bookmakers to Embrace "Big Data" to Shift Racing' s Betting Landscape.' *The Guardian*, 6 October.

第六章

# 像半机械人一样看东西?后人类知识的纯真

Paul Rekret

## 1. 简介

提出哲学和传记之间的联系是一项充满困境的工作，尤其是在生活和思想之间冒险的决定论联系记住这一附带条件，如果我们仍然可以假设本体论陈述在某种程度上与作者的主体立场有关，那么就有必要坚持认为，对理论范式的评估不应放弃对作者动机的分析。对理论的评价不应该回避对理论所表达的欲望、它旨在满足的认知或分析需求，以及它可能追求某些研究方向而不是其他研究方向的原因的考察。当理论试图形成对其自身现状的判断时，这些问题尤其具有启发性，因为政治利害关系更为直接。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塔亚想要研究在当前时代的更突出的描述中，那些主要将当代技术发展视为表达基本观点的基础的“后人类”的描述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Rekret, P. 2019. Seeing Like a Cyborg? The Innocence of Posthuman Knowledge.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81-94.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I: https://doi.org/10.16997/book29.fLicense: CC-BY-NC-ND 4.0

生存经验的转变。?我之所以选择关注的焦点，是因为我信仰，这些理论往往忽视了在获得回报方面根深蒂固的全球分歧，以及近期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平等历史结构的连续性。在此背景下，我建议回顾一下我们的数字体验概念形成的特殊条件，即当代私有属性制度。这不仅可以证明对我们的社会理论的历史视界的反思是有价值的，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推动它们的冲动。

## 2. 侵蚀边界

继续讨论历史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争论的理论集合围绕着一个周期性的运动。这是对主观经验的当代转变的诊断，根据被视为现代和后现代哲学标志的有限人类中心主义的过时而制定。根据这一观点，生态危机被认为是强化了人类存在与复杂基础设施纠缠在一起的感觉，在分子水平上操纵生物过程的能力日益增强，被认为是对自然和人工之间区别的挑战，而数字知识生产的进步使越来越广泛的认知过程自动化成为可能。这些过程合在一起，就成了反驳“思维是人类的一种离散属性”这一观点的证据。虽然生态、生物和数字层面的转变似乎是完全不同的，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连贯性，因为它们围绕着一个杂糅的形象融合在一起，表明人类物种的技术突变侵蚀了构成现代思想的象征性二元结构。随着自然与文化、心灵与身体、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分歧越来越难以维持，社会理论倾向于运用的人类中心主义术语也越来越难以维持。这种观点认为，混合的新状态破坏了抽象的、理性的主体的现代理想，这种主体独立于世界之上，又与世界相对立。

暂时把混合性的形象放在一边，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层面上，后人文主义围绕着它所看到的筋疲力尽和无力回应新混合状态的东西进行巩固，这是与马丁·海德格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以及最近的语言转向有关的，雅克·德里达和米歇尔·福柯等人。不用说，后结构主义对主体的批判在后人类的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它对语言或话语的强调仍然被认为不足以反思思维日益受到制约的数字中介。在这方面，后人类主义者的推理路线相对更直接。后结构主义对现代哲学的批判可以以其对认识论的批判为特征

一个被赋予理性思考能力的主体对世界施加的暴力排斥了所有他认为没有自主推理能力的‘他人’:女人，疯子，次等人，动物等等。”这是一种伦理立场，或多或少，后人类主义理论家也倾向于采用这种立场。然而，他们也试图夸张地扩展它，以便这些立场之间的差异变得相当明显。后结构主义的姿态集中于破坏主体的权威和自我确定性，方法是将主体分散到他的知识的不稳定媒介中——无论是被认为是话语、差异，还是权力/知识——这些媒介先于他，他永远无法掌握。然而，后人类主义论点的关键是，即使这种分散仍然是过于以人类为中心的一组主张，因为它以社会结构条件和中介主体性的方式为中心。即使后结构主义者认为思想是有限的，并试图破坏思想对世界的控制，他们仍然认为人类的中心地位和本体论的自主性是思想的媒介。这进一步要求给人类行动者以方法论和政治上的优先权，这一结果显示了现代思想的人类中心主义等级制度的持久性。

## 3. 杂合性的主张

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的《半机械人宣言》(A Cyborg Manifesto)(1991)对合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和控制论的技术发展进行了展望，将“半机械人”作为一种日益普遍的机器和有机体的混合体的反映。哈拉威的观点是，随着人体与控制论或生物技术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人类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因此，随着现代二元论的侵蚀，混杂性取得了胜利。或者，正如她所写的，人类永远是事物的集合体。我们不是自我同一性的(Haraay 1991,181)。毫不夸张地说，《半机械人宣言》中的论点已经形成了一种范式。事实上，只有法国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两年后出版的一本书，才能与它们的影响相提并论。拉图尔(1993,2)在《我们从未是现代的》一书中提出了平行的(如果有时是不同的)探究思路，但他仍然呼应了哈拉威的核心论点，他宣称后冷战时代是由“混合的扩散”定义的。在进一步的共鸣中，拉图尔对这种水合性的开篇说明，人类胚胎的释放，也来自生物技术。对于这两位思想家来说，冷冻保存的有机体可以代表一个更广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杂交破坏了现代批判性的预测，即什么是人类，什么不是人类的清晰而独特的本体论区域。

尽管哈拉威和拉图尔从这些基本见解中发展出了不可否认的异质和复杂的研究项目，但我们在这里的关注

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混杂的时代。认为主体在当前时代已经被侵蚀的观点是一种本体论的争论，它越来越多地塑造了一种扩张性的理论范式，而且往往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奇怪的主张——至少在它暗示本体论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方面——因为它暗示，一般来说，虽然存在本身是由混杂性定义的，但这只有在技术变革使其表现不可否认的时代才变得不言自明。扭曲一个众所周知的短语，历史在这里成为本体论的助产士，从生物和增强技术中出现的混合实体承担着实现本体论断言的重量，即人类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完整的、自主的存在，对自己或周围环境进行控制。然而，这样的主张往往意味着一种寻求拯救技术进步的举动——技术进步往往是破坏性资本主义强迫的产物，如果不是明确的军国主义冲动——为了进步的理论目的。因此，为了解放的目的，它落在理论家的本体论思辨上，拯救和重新想象技术，这一任务只有在这些过程所包含的关于存在的更深层次的真理能够被辨别出来的地方才能完成。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后人类主义者可以说将本体论思辨瓦解为伦理-政治论证，因为正是对混杂性的肯定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和谐批判，在这种背景下充当了伦理和政治思想的起点(Rekret 2016)。除了在历史和本体论之间产生一种特殊的振荡之外，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有时会产生一种理论上的自恋，这种自恋将理论家置于末世论的终点，在末世论中，存在的真实本质只能从他们发现自己的历史瞬间中辨别出来。

## 4.《头与手》

说到这里，有必要退一步来考察一下这个混杂人物的参数。抛开本体论的评估不谈，重要的是，虽然后人文主义理论对当下的诊断是建立在对最近的社会和技术变革的细致考虑之上的，但这往往是以牺牲对更长的连续性的评估为代价的。这就是说，许多被视为后人文主义理论的东西往往首先放弃了对现代性符号二元论(自然/文化、精神/物质、精神/身体、人/技术)出现的物质条件的彻底考虑这一缺憾促使我们对那些试图提供这样一种解释的尝试进行调查。从关注资本主义的出现如何调解我们的认知范畴的批判理论传统中获得线索，使我们能够将问题中的二元论定位为与剥夺和圈地的过程不可分割的。

这种主张的一个更有力的版本源于阿尔弗雷德·施密特(1971)的建议，即通过真实相互作用的历史棱镜来看待人与自然的二元论概念。施密特在这里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学术领域，即将雇佣劳动的早期概括视为将“自然”作为有意识和有计划的人类干预对象的感知。一旦劳动与其手段分离，其与生产的关系由工资作为中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任何抽象统一都被切断了。这意味着，资本最终会颠覆人与自然之间的等级关系，使后者不再被视为凌驾于主体之上的客体。

施密特对“思想”的历史条件的深刻洞察，如果我们把它更直接地应用于哲学史，可以进一步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信息。在这种背景下，在她关于原始积累过程的性别化和种族化本质的历史中，西尔维娅·费代里奇(2004)，138-40)将笛卡尔关于纯粹精神领域和纯粹物理领域之间本体论划分的制度解读为与适合于持续压制前资本主义形式的共同体的身体的机械观点不可分割。正如费代里奇(Federici, 2004)所言，理性将身体作为一个“可理解的”对象，使其服从于统一的、可预测的行动形式，即服从于资本对劳动的纪律。此外，这种精神和感官的分离与女性与再生产知识的分离以及她们作为劳动的自然再生产者的相应构成(费代里奇 2004;密斯 1998;Merchant 1983)。

这种对笛卡尔思想与资本主义起源的暴力历史的关系的解读，与米歇尔·福柯(2013,45-73)《疯癫史》(history of Madness)中的一条思路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众所周知，在那本书中，福柯将笛卡儿的*先验*将疯癫从理性思考的过程中排除，与17世纪将无家可归者和失业者关进收容所作为调节失业的一种手段联系起来。至少，与费代里奇一样，福柯通过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视角，理解思想正在变得自主，从而理解现代主体的基础。

在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瑟尔(1978)对现代认识论的批判中，一种相似的直觉也很明显。撇开他围绕认知抽象的物质来源的主要论点，在索恩-雷瑟尔对笛卡儿的解读中，后者将自在世界作为*延伸物*的假设直接与资本主义对手工生产的控制的局限性和摩擦联系在一起。[6]在这里，将思想作为独立于世界的基础的现代哲学工程，与资产阶级对独立于物质劳动的精神劳动的需要有关。也就是说，头和手的分离被认为是资本通过自动化最终控制手工业的关键，因为后者是建立在一种知识形式的基础上，其来源不是感性的(索恩-雷瑟尔 1978, 113, 122, 141)。

这些关于经验的精神和感官维度的历史的叙述如何能告诉我们对当代混杂概念的理解?至少，它们表明，拉图尔所谓的“现代构成”的条件与与资本积累相关的过程是分不开的。这进一步暗示，任何主张暂停两者之间边界的论证都必须面对资本中介思想的方式。在这种平衡中，有一个问题，即思想是否寻求承认对它的客观限制，以及它是否承认制约它的历史经验的维度。诚然，这一说法最初可能看起来是可疑的，因为这里感兴趣的各种后人类主义学术显然是一种政治上进步的事业，其核心是对父权制、种族等级制度、资本主义，尤其是对利润和战争的追求，而技术创新往往指向这些。[7]但是，放弃对资本在调解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的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评估，不仅使关于混合状态的当代历史本体论评估受到质疑，而且还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因为，如果资本的中介显然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集和广泛，那么它就需要质疑资本迫使存在的分裂和分离是否实际上没有充分反映在杂糅性的概念中。

## 5. 本体论外科学

不可否认的是，技术发展，无论是冷冻胚胎、DNA编码，还是在分子片段水平上对生物过程的操纵，都会侵蚀或破坏自然与人工之间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人类主义者的历史叙事抓住了当代经验中一个日益普遍的方面。但它是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这样做的，可能无法提供一幅忠实于当代经验全部广度的画面。按照玛丽莲·斯特拉森(2005)提出的论点，在另一个实践层面进行检验时，也就是说，主导当代知识属性制度的认识论——构成了我们对世界的大部分知识的基础——这里所讨论的边界或二元论不仅没有被打破，而且它们之间的边界越来越宽。斯特拉森的观点是，只要当代生物技术和技术发展受到知识封闭的扩张过程的支配，它是以一种与世界的概念关系为前提的，这种关系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现象的集合，与一种为了产生“发明”而修改它的自主意志分开。[8]

与后人文主义理论家，尤其是Haraway(1991)所概述的主张不同，斯特拉森诊断出一个“自然”世界，它越来越被理解为信息或代码，并与之相关。但是，后人文主义者

将此作为自然和技术边界侵蚀的证据，从斯特拉森的角度来看，它带来了相反的结果。因为信息的“自然”来源不仅被转化为受知识属性法律管辖的产品，而且这些产品反过来又使“发现”进一步的潜在信息来源成为可能，相应地，促进等待人类脑力劳动转化和商品化的自然过程的更新概念。因此，被认为是“自然”的东西不仅在范围上增长，而且增长得越多，它就越被知识属性制度所消耗，这使得科学见解成为私有化的对象(斯特拉森2005,102)。即使在诸如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之类的协议中，通过承认知识可以嵌入实践，寻求保护土著实践不受专利保护，情况也是如此。斯特拉森在其他地方写道，这种善意的保障措施并不代表对当代资本积累过程的挑战，而仅仅是将知识属性的包容或“混合拥抱”作为前现代(或另类现代)实践的进一步形式(斯特拉森1999,184)。[9]事实证明，在当前的范式中，即使是感性的知识形式也可以抽象为对象。或者，直白地说，一切都是商品或其他可商品化的东西，这是一种基于将自然视为被自主主体操纵和转化的抽象对象的观点的立场。

值得重申的是，后人文主义理论家对私有属性在知识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天真，他们也不是对资本在他们所观察到的当代杂交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视而不见。[10]资本主义经常被明确地认为是与对生命或人性的新理解密不可分的。然而，回到斯特拉森的论点，这掩盖了通过本体论投机的镜头与资本主义相关的过程的观点。也就是说，据说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差异”领域，新的“复杂性”，或者是非人类的或去个体化的抽象生命概念(Haraway 1997,57;Braidotti 2013, 60)。[11]这些类型的表述，即资本被视为反映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混合本体论状态，忽略了法律理论家Sheila Jasanoff(2012)所称的，与斯特拉森相呼应的，知识属性在世界上运作的“本体论手术”，而且，这是有条件的边界侵蚀问题。这种遗漏反映了我们之前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主张，因为后人文主义对自然和技巧之间先验认识区别的忽视反映在这些理论对主体与当代世界关系的有限观点中。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其他长期存在的批评的回应，这些批评认为“电子人”、杂交或后人类的估值否定了全球劳动分工。这里的论点是，与装配线、农具或扫帚挂钩的身体长期以来一直充当机器的角色，以换取工资，作为契约劳工或动产奴隶(Wilkie 2011; Fernandez & Malik 2002)。指出这一点不仅使后人文主义者受到质疑

混合时代的分期化，以及它所引发的伦理问题。首先，它意味着人类与机器的关系有着比最近试图评价或批评技术变革所允许的更为复杂的历史。另一方面，它表明，后人文主义提供了一种政治，它讲述的是数字和生物技术进步的消费者的经历，但不一定是生产者的经历。消费主体的意义和代理界限可能受到技术变革的困扰，这指的是一种自主性形式，这种形式从一开始就不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属性。正如杰索普(Jessop, 2007)所示，当我们考虑到世界上97%的专利和80%的研发资金位于经合组织国家时，后一种说法就一目了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技术科学相当于重组了对一个被认为是独立和自然的世界行使权威的自主思维的分离。这样的分工意味着现代思想与世界二元论的普遍存在，尽管当代技术科学在全球新殖民规模上进行了重组。

## 6. The Innocence of Knowledge

从施密特、费代里奇、索恩-雷塞尔等人那里获得的洞见暗示，当我们纯粹从本体论的角度理解精神与物质或社会与自然的划分时，我们就忽略了我们自己的范畴所经受的社会斗争的砖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本体论思辨而言，这种对其范畴的物质起源漠不关心的倾向再现了它声称已经被侵蚀的笛卡尔二元理论。这不仅是因为现代二元论被视为在实践中持续存在，在正在进行的思想和发明的封闭过程中，而且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声称的那样，它进一步暗示了一种认为心灵与这些实践没有任何联系的观点(Rekret 2016)。

考虑到这一点，我想回到我开始的问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知识的清白的后人类经济有什么功能。面对一种膨胀的混杂状态，现在广为流传的对现代二元论过时的本体论主张，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愿望?因为值得指出的是，声称无罪本身从来都不是无辜的，而是总是被部署在特定的语境和特定的目的中。那么，通过混合本体论的功能，智力上推迟对思想物质条件的拷问是为了什么目的呢?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之一是回顾约翰·洛克知识论中关于知识无罪的最初现代表述。对洛克认识论的反思将使我们得以一瞥认识论的清白总是被嵌入到政治背景中的方式，并开始为进一步评价后人类主义的论点设置参数。

当洛克(2000)把心灵作为*一张白板*时，他这样做是作为一种从经验中建立理性的假设过程的基础。[12]根据洛克的提法，认知的清白，他将儿童作为一个特权的容器，提供了直接接触现实世界中物体的途径，从而回避了积累知识和语言的最具问题(Rose 1984)。乔安娜·福克纳(2011a)在对洛克观点的深刻评价中指出，洛克将人类知识视为本质上是无辜的，这有力地反驳了中世纪的道德，尤其是原罪学说。将心灵塑造成一张白纸，满足了早期现代中产阶级从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中获得自由的需要。因此，根据福克纳的解读，洛克的怀疑主义和作为其基础的知识纯洁性的概念相当于一种资产阶级的想象，它拒绝将传统作为权威和等级的来源。在福克纳(2011a)的评价中，她继续展示了洛克如何将孩子的思想作为主张思想不是天生的，而是与世界交往的结果的特权实例，并在任何主张思想纯真的主张中展示了一种根本的张力。一方面，儿童是批判知识的来源，是否定迷信和偏见的来源。另一方面，洛克明确指出，正是因为孩子是无辜的，因此容易腐败，所以他们需要成年人的控制和管教。因此，儿童提供了一种对人类本质纯真的断言，同时又允许纯真所暗示的控制和无知的丧失被投射和否定。在其他作品中，福克纳(2011b, 69-70)将这种不稳定的纯真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联系起来，并将其与社会契约的早期体现所暗示的自然的同时价值化和压制联系起来。她解释说，洛克允许“自然”在*城邦*中持续存在，既是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也是对原始享受的幻想。但是，自然的“人类童年”，具身在农民或殖民地主体或儿童本身，也对成熟的现代契约秩序构成风险，因为它意味着无法封闭和“改善”土地，也无法承担公民社会公民所要求的勤劳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说，洛克的无罪构想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想象，通过叙述说明其权力的合法性，以及一种否认失去对无罪风险质量的控制的手段。

洛克代表一个上升的商人阶级动员纯真，这对后人文主义自身的冲动有什么启示吗?毕竟，正如我们已经肯定的那样，后人文主义的论点通常是建立在对邪恶的技术发展可能在多大程度上被重新用于解放目的的猜测之上的。尽管有这些承诺，这里的问题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后人类主义的混杂理论是否反映或减少了存在经验的历史维度。在这一点上，根据斯特拉森等人的观点，上面整理的证据表明，在思想取代认识论反身性以进行本体论思辨的地方，反身性就会发生退缩。那么，我们仍然要问为什么

近年来，杂交论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如此盛行。

## 7. 后人类焦虑(Posthuman anxiety)

至关重要的是，特别是对于女权主义学术来说，后人文主义解决了一种迫在眉睫的焦虑，即后结构主义对主体的批判，鉴于其对性别的社会建构的强调，没有触及和毫发无损地留下潜在的本质主义生物学的性别概念在这种背景下，混合的概念可以被动员起来挑战文化*和*生物惯例的公认概念。这可以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批判性干预，其中后结构主义对性别话语建构的评估绕过了生物学本身更困难的问题。继续讨论社会理论家与生物科学的关系问题，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杂交”的叙述，以及它所暗示的对科学和技术变革的关注，建议人文学者重新接触自然科学，因为他们从索卡尔的“骗局”中蹒跚而行，以及这一丑闻所代表的欧陆哲学的更广泛的合法性丧失，以及对传统文科追求的更广泛的文化和制度攻击

虽然这一切都是肯定的，但似乎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潜在逻辑后人类主义范式的流行，一个最终涉及到这些理论所暗示的认识论清白的姿态。回想一下，对于洛克来说，知识的纯洁性破坏了封建知识和贵族权力的合法性，同时又将这种纯洁性暗示的控制力的丧失投射到早期现代社会的卑贱主体上。同样，在我们所看到的后人类主义者通过私有属性规避思想对世界的调解问题的情况下，混合的修辞允许对资本主义和商品化的批评的清晰表达，尽管如此，它仍然可以庆祝资本的成就。然而，它只是忽略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资本可能引导或包含这些技术发展到它们的核心。这里不可能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的说明，但足以说明，从新技术发展中提取解放内容的可能性是一个比混合性的数字所允许的更令人烦恼的问题更令人不安的是，后人文主义否认了这样一种焦虑，即我们的概念本身也可能与与当代资本主义相关的过程密不可分。在我们这个时代，对资本主义操纵认知表现的担忧是普遍存在的，对我们的思维和感受的操纵的担忧和不安是普遍存在的，无论是通过组织网络平台的算法，还是旨在提高和延长认知表现或防止精神崩溃的药物疗法。在这种背景下，似乎要避免询问思想是如何被制约和

受其社会背景的限制，以关注现代“人”统治的等级制度侵蚀的名义，为当代资本主义产品的理论家和消费者提供了一种治疗方法。这是一种允许表达对当代技术发展的批判观点的疗法，同时*包含*这种批判，以便它不需要回顾自己的，可能妥协的，主体立场，或者实际上，它自己的消费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混杂”本体论的风险在于，它们再现了批判性思维的退出或委托，而批判性思维是一个日益受自动化和算法组织过程统治的世界的特征。

## 注释

我要感谢尼古拉斯·博雷和西蒙·Choat对本文草稿的批评意见。

我所说的后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批判理论。重要的是要将其与“后人类”理论区分开来，这些理论建立在对技术的非人性化影响的规范性批评的基础上，如福山(2002)和哈贝马斯(2003)。关于“批判的”后人类主义的概述，请参见Badmington(2003)和Herbrechter(2013)。

[3]关于这一点，见cool&frost (2010);Braun & Whatmore (2010);Bryant, Harman & Srnicek(2011)。

关于这一点，见Rekret (2018a)。

[5]拉图尔(1991)在本体论或后人类转向的思想家中是例外的，因为他关注他所谓的“现代宪法”的历史起源。借鉴Shapin和Schaffer (198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拉图尔呈现了一个关于17世纪自然和社会分离的大多是话语的故事，它夸大了科学和政治术语对自然和社会更广泛术语的争议。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过度夸大了历史人物的相对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波义耳和霍布斯。有关拉图尔现代性历史的令人信服的批评，请参阅Pels (1995)， Jacob(1995)和Choat(2017)。

有关Sohn-Rethel观点的更广泛解释，请参见Rekret和Choat(2016)。

本节的论点在Rekret (2016;2018c)。

应该指出的是，拉图尔是一个例外，因为他自己的政治可以被描述为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实用主义。从他的作品中获得灵感的许多本体论推测更明确地与解放政治有关。关于拉图尔在这方面的批判性评估，请参阅Noys(2011)。

伊恩·哈金(1998)对哈拉威的批评与斯特拉森的相似。哈金认为，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我们越来越

将身体视为可替换部件的组合，因此我们加强而不是超越笛卡尔的存在框架。

[9]关于这一点，参见Parry (2004);海姆赖希(2009);Brand & Görg (2008)。

值得坚持的是，哈拉威的工作不仅对形成一个进步的科学技术研究范式至关重要，而且她明确地将她的工作置于社会主义传统之中。哈拉威的政治承诺和她的研究作为一个整体在这里都不是问题。相反，本文感兴趣的是杂交本体论，整个社会理论范式都建立在这种本体论之上，并从她的工作中产生出来。

[在]一系列作品中也发现了类似的主张。例如参见Latour (1988), Connolly (2013), Barad(2007)。

在本节中，我将引用雷克瑞特 (2018a)中首先概述的论点。

[13]关于这一点，见Parisi(2008)。

[14]关于“文化战争”背景下索卡尔骗局的概述，见Guillory(2002)。

[15]例如，参见阿尔贝托·托斯卡诺(2011;2014)和Jasper Bernes(2013)围绕物流展开的交流。

## 参考文献

Badmington, Neil. 2003. ‘Theorising Posthumanism.’ *Cultural Critique* (53), Winter: 10–27.

Bensaid, Daniel. 2002. ‘A New Appreciation of Time.’ In *Marx for Our Times: 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of a Critique*, translated by George Eliot, 69–94. London: Verso.

Bernes, Jasper. 2013. ‘Logistics, Counterlogistics and the Communist Project.’ *Endnotes* (3) September: 172–201.

Braidotti, Rosi. 2013.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Brand, Urich and Christoph Görg. 2008. ‘Post-Fordist Governance of Nature: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the State and the Case of Genetic Resourc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5(4): 567–89.

Braun, Bruce and Sarah J. Whatmore. 2010. *Political Matter: Technoscience, Democracy, and Public Lif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ryant, Levi, Graham Harman and Nick Srnicek (eds. ). 2011. *The Speculative Turn.* Melbourne: Re-Press.

Choat, Simon. 2017. ‘Science, Agency and Ontology: A Historical-Materialist Response to New Materialism.’ *Political Studies.*

Connolly, William. 2013. *The Fragility of Things: Self-Organizing Processes, Neoliberal Fantasies, and Democratic Activ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Coole, Diana and Samantha Frost. 2010. *New Materialisms: Ontology, Agency, and Politic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Faulkner, Joanne. 2011a. 'Innocents and Oracles: The Child as Figure of Knowl-edge and Critique in the Middle Class Philosophical Imagination.' *Critical Horizons* 2(3), 20: 323–46.

Faulkner, Joanne. 2011b.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Innocent: Why We Worry About Childr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ederici, Silvia. 2004. *Caliban and the Witch: The Body and Primitive Accumula- tion.* New York: Autonomedia.

Fernandez, Maria and Suhail Malik. 2002.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Cyborg Manifesto?' *Mute*, 10 July. Available at: http://www.metamute.org/editorial/articles/whatever-happened-to-cyborg-manifesto (accessed 14 May 2018). Foucault, Michel. 2013. *History of Madness*. London: Routledge.

Fukuyama, Francis. 2002.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 nology Revolution*. London: Profile Books.

Guillory, John. 2002. 'The Sokal Affair and the History of Criticism.' *Critical Inquiry* 28(2), Winter: 470–508.

Habermas, Jürgen. 2003.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acking, Ian. 1998. 'Canguilhem Amid the Cyborgs.' *Economy and Society* 27: 202–16.

Haraway, Donna.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Routledge.

Haraway, Donna. 1997. *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ium*: *FemaleMan_ Meets_OncoMouse: 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Helmreich, Stefan. 2009. *Alien Ocean: Anthropological Voyages in Microbial Sea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erbrechter, Stephan. 2013. *Posthumanism: A Critical Analysis*. London: Bloomsbury.

Jacob, Margaret C. 1998. 'Reflections on Bruno Latour's Vers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A House Built on Sand: Exposing Postmodern Myths About Science*, edited by Noretta Koert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essop, Bob. 2007. 'Knowledge as a Fictitious Commodity: Insights and Limits of a Polanyian Perspective.' *Reading Karl Polanyi for the 21st Century: Mar- ket Economy as Political Project*, edited by Ay□e Bu□ ra and Kaan A□arta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Jasanoff, Sheila. 2012. 'Taking Life: Private Rights in Public Nature.' In *Lively Capital*: *Biotechnologies, Ethics, and Governance in Global Markets*, ed. Kaushik Sunder Rajan, 155–83.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Latour, Bruno. 1988.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tour, Bruno. 1991.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cke, John. 2000.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London: Routledge.

Malatino, Hilary. 2017. 'Biohacking Gender.' *Angelaki* 22 (2): 179–90.

Merchant, Carolyn. 1983.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 tific Revolution*. London: Harper and Row.

Mies, Maria. 1998.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Wome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Noys, B. 2012. *The Persistence of the Negative: A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Con- tinental Theo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arisi, Luciana. 2008. 'The Nanoengineering of Desire.' In *Queering the Non/ Human*, eds. Noreen Giffney and Myra J Hird. Aldershot: Ashgate.

Parry, Bronwyn. 2004. *Trading the Genome*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els, Dick. 1995. 'Have We Never Been Modern? Towards a Demontage of Latour's Modern Constitution.'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8 (3): 129–41.

Rekret, Paul. 2018a. 'The Posthumanist *Tabula Rasa*'. *Research in Educatio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101(1):25-29.

Rekret, Paul. 2018b. 'The Head, The Hand, and Matter: New Materi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Rekret, Paul. 2018c. *Derrida and Foucault: Philosophy, Politics, Polem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Rekret, Paul. 2016. 'A Critique of New Materialism: Ethics and Ontology.' *Sub- jectivity* 9(3): 225–245.

Rekret, Paul and Simon Choat. 2016. 'From Political Topographies to Political Logics: Post-Marxism and Historicity.' *Constell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 Theory* 23(2): 281–291.

Rose, Jacqueline. 1984. *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Schmidt, Alfred. 1971. *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Translated by Ben Fowkes. London: New Left Books.

Shapin, Steven and Simon Schaffer. 1985.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ohn-Rethel, Alfred. 1978.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r: A Critique of Episte- molog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Strathern, Marylin. 2005. *Kinship, Law and the Unexpected: Relatives are Always A Surpri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rathern, Marylin. 1999. *Property, Substance and Effect: Anthropological Essays on Persons and Things*.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Toscano, Alberto. 2011. 'Logistics and Opposition.' *Mute*, 9 August. Available at: http://www. metamute. org/editorial/articles/logistics-and-opposition (accessed 14 May 2018).

Toscano, Alberto. 2014. 'Lineaments of the Logistical State.' *Viewpoint*, 28 September. Available at: https://www.viewpointmag.com/2014/09/28/lineaments-of-the-logistical-state/ (accessed 14 May 2018).

Wilkie, Robert. 2011. *The Digital Condition: Class and Culture in the Informa- tion Network*.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第七章

# 作为光谱的后人文主义:对保罗·雷克瑞特章节的反思

罗伯特·考利

## 1. 简介

保罗·雷克瑞特明确地打算“退后一步，检查后人类思维的参数”。他挑战了一种假设，即后人类理论化产生的知识以某种方式直接或“天真”地反映了当代世界。相反，他将后人类主义视为在特定环境中产生并通过特定环境再现的特定“故事”。他提出，后人道主义可能不会将我们从它所解决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也不会使它们的生产条件正常化。

因此，为了与后人文主义建立临界距离，雷克瑞特强调了它的偶然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设，他的分析将与那些已经对“混合思维”的广泛趋势感到不安的人产生共鸣。然而，我们可以假设，雷克瑞特将不太可能挑起与后人类主义思想家的对话，对他们来说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Cowley, R. 2019. Posthumanism as a Spectrum: Reflections on Paul Rekret’s Chapter.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95–100.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I: https://doi.org/10.16997/book29.g. License: CC‐BY‐NC‐ND 4.0

“临界距离”与其说是一种有用的诊断策略，不如说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问题，而偶然性则是一种明确颂扬的美德。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认为不需要用如此直白的术语来解释这个不相容的问题。为了得出这个结论，我首先要进一步反思后人文主义的吸引力的原因，但也要质疑其吸引力的程度。与此相关的是，我接着提出，将后人文主义视为一种光谱，而不是一种离散的思维模式，可能更有用。

## 2. 后人文主义的诉求定位

唐娜·哈拉威(1985年)的著名的半机械人形象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获得共鸣，这已经成为陈词滥调。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数字技术的广泛传播，哈拉威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模糊人类边缘趋势的预见，让我们觉得如此有先见之明。数字化不再仅仅是遥远的企业技术人员直接关心的问题;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也不再显得可有可无。相反，它似乎毫无争议——甚至是老生常谈——表明我们已经本能地意识到，从我们醒来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行为就受到了数字媒介的影响。这种变化是几个共同塑造“后人类”感性的当代条件之一，Rekret在他的章节中对此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

在Rekret的定义中，这种感性的主要特征是“杂交”的一种本体论特权。而且，对于那些追随当代人文或社会科学理论化的人来说，很难忽视各种形式的混合思维的传播。去中心化人类能动性的愿望似乎很普遍。一些随机的例子可能包括:最近在城市理论中对集合理论的接受;将物品置于历史研究中心的热情日益高涨;人类学家甚至开始推测植物、真菌和微生物的社会代理(Kirksey and Helmreich 2010)。人类理性地“思考”世界和“对”世界采取行动的能力的首要地位，已经被认知过程的纠缠概念和对各种分散代理的期望所侵蚀。正如蒂莫西莫顿所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类“不再处于宇宙的中心，但我们也不在边缘之外的VIP包厢里”(莫顿2013,13)。因此，潜在地，后人文主义不仅描述了某一组学术作家的书面输出，而且还描述了整个学术界，甚至可能超出学术界的某种本体论取向的更广泛的吸引力。

为了理解这种吸引力，将后人文主义想象成扮演着三个相互关联的角色可能会有所帮助:

(1)它借鉴并回响着一个现存的、与现代性终结有关的令人沮丧的故事;

(2)它以乐观的方式重新构建了这个故事;

(3)因此，它提供了一条充满希望的前进道路。

现代性的终结在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普遍预期中得到了最显著的戏剧化表现，它嘲弄了人类可以或可以控制世界的观点。“人类世”向我们展示了“奇怪的情况，我们已经变得足够强大，可以改变地球的进程，但似乎无法调节自己”(Hamilton 2017, vii-viii)，以及令人不安的前景，“在本世纪，人类将充分了解我们在做什么，不可挽回地降低了我们地球家园的生活条件”(同上，37)。然而，这种令人沮丧的困境是从关于世界的后现代理论中继承下来的——这是一种后人文主义声称要与之保持距离的思维模式。例如，Rosi Braidotti特别反对使用理论“作为理解和代表现实的工具”(Braidotti 2013, 5)。当“自然和文化类别之间的界限已经被取代并在很大程度上模糊”时，认知距离的理想就会贬值(Braidotti 2013, 3)。因此，虽然后人文主义与现有的失落叙事相呼应，但为了表达一种广泛的困惑感，它并没有表现为一组超然的观察:它的故事被呈现为从世界中浮现出来。

因此，在后人文主义的诊断模式中，其目的并不是把一个分析框架强加给世界，而是把世界似乎在告诉我们的东西联系起来。然而，与此同时，这种对我们理解的重构采用了一种庆祝的方式(Chandler 2018)，这激发了Rekret所说的积极的“伦理-政治”论点。因此，哈拉威的半机械人以一种俏皮的“宣言”呈现出来。对于Braidotti来说，“后人类困境”是“一个赋予追求思想、知识和自我表现的替代方案权力的机会”(Braidotti 2013,12)。简·班尼特这本极具影响力的书以“一段冗长的祷文，一种为未来重要的唯物主义者准备的尼西亚信条”结尾(班尼特2010,122)。科恩的“生命人类学”的目标很好地抓住了这里更广泛的庆祝项目:“既不废除人类，也不重新定义它，而是打开它”(科恩 2013, 6)。简而言之，后人类混合思维将现有的对人类例外主义的批评重新改造为一种乐观的扩展能动性，然后专注于这种敏感性的生成伦理和政治含义。

## 3. 质疑后人类主义的号召力

Rekret的回应是，实际上将后人文主义视为一种偶然话语——尽管他回避了这个术语。在运用“后人类”这一话语范畴时，他可能会被指责将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混为一谈，而这些理论体系实际上既在争论中进行，也在协调中进行。然而，他的定义并不是基于对这一领域*边界*的划定:他的意图并不是要具体说明哪些思想家属于这一范畴，哪些思想家不属于这一范畴。相反，他的定义与当前广泛的思想家中存在的某些倾向有关——无论他们是否自认为是后人文主义者。这

这是一种毫无争议的定义模式:相关作者之间的相互债务已经在其他地方被描绘出来了——既有持怀疑态度的评论员(例如:van Ingen, 2016),也有明确的文本本身。

更有问题的是,一种涉及定义和标记话语趋势的策略可能不是赢得朋友的最佳方式。它意味着一定的距离感;它表演性地将标注者置于所讨论的话语主体之外。对于那些生活在特定话语中的人来说,这一举动似乎是一种威胁,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以一种中立的方式叙述自己的处境。那些曾经是不公正、疾病或气候变化受害者的人,可能会对将由此产生的痛苦视为社会建构的“故事”的评论感到困惑,或明显受到冒犯(Hacking 2000)。事实上,从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看,Rekret的“撤退”到话语中似乎是不负责任的相对主义,并表明了后结构主义的倾向,正如Rekret所指出的那样,这正是后人文主义试图超越的。例如,Braidotti明确断言,“后人类主体不是……后结构主义,因为它在语言转向或其他形式的解构中不起作用”(Braidotti 2013, 188)。与此同时,Braidotti似乎是为了防止人们指责后人文主义的生产潜力受到其出现条件的特殊性的限制,他只坚持认为后人文主义与当代世界的相关性。后人文主义通过将偶然性转化为一种积极属性,拒绝普遍主义的愿望,从而为自己接种疫苗。因此,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Rekret的批评几乎不可能对后人文主义者自己说话,因为它依赖于这样一种疏远的方法。

与此同时,后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范围不应被夸大。虽然它回应了一个当代的困境,但这种困境的敏感性不可避免地参差不齐。这种反思始于预演这样一种观点,即在我们这个后现代的、以数字媒介为媒介的人类时代,我们越来越“像一个半机械人一样看”。但这个“我们”是谁呢?当然,对于那些更有可能跟随媒体技术发展的受过教育和富裕的人来说,似乎很难不知道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基因工程和其他领域同时出现的一系列更广泛的进步,它们共同颠覆了人们对“人类”边界的公认观念,进而颠覆了之前关于人类能动性的假设。然而,那些处于“数字鸿沟”繁荣一方的人可能忘记了他们自身条件的特殊性。“我们”可能会感到惊讶,即使在英国这样的富裕国家,也有13%的成年人从未使用过互联网(英国国家统计局2014年)。此外,如果允许用话语的术语来看待后人文主义,认为它倾向于以某种方式构建和代表现实,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它的故事总是以同样的方式被“解码”(Hall, 1992)。正如我上面所提出的,思考后人文主义的三重吸引力,已经在一系列可能的反应中开辟了几个立场。即使我们排除了那些“激进的虚无主义者”(康诺利2017年),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为了个人利益,愤世嫉俗地驳斥了后人文主义所解决的困境的重要性。

首先，在这个范围的一端，坐着一系列没有被现代失落感所折磨的演员。这一群体中的一些人“仍然”是前现代的;对另一些人来说，现代性的二元论舒服地存在着。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天真:例如，工程师和技术创新者通常似乎乐于承认解决方案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但他们仍然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有可能吸取教训，改进技术。政策制定者似乎充分意识到，计划很少能以线性方式实施(van Assche和Verschraegen 2008)，但他们仍然认为，有一个近似的社会导向过程总比没有好。对“进步”的信仰仍然普遍存在，并且可能更典型地被理解为增量，迭代的术语，而不是自大狂的野心。对于这一群体来说，并没有强烈的幻灭感让后人类思维产生回响。为人类例外论的消亡而烦恼的“我们”可能是一个比其居民想象的更小的选区。

一个更加模糊的中间立场可能会被想象出来。在这里，后人文主义的诊断作用被积极接受，但一个务实的选择是不顾一切地以传统方式进行。对于那些在特定学科领域活动的人来说，在日常实践的层面上，参与后人文主义可能没有什么意义。自然科学家可能充分意识到——甚至热情地好奇——从根本上质疑现代主义假设的新发现，即使他们日常工作的“文化表演”依赖于“人类代理和自然由非代理的理解对象组成的强烈观点”(康诺利2017年)。100)。因此，用雷克雷特的话说，在不接受其“伦理政治计划”的情况下，接受后人文主义的“思测本体论”似乎是非常可行的。

然而，这是第三个位置，似乎是雷克雷特的主要火力。这描述了对这个项目更积极的拥抱:在这里，对世界混杂性的认识成为乐观主义的源泉，并以某种方式转化为日常思维的行动或新框架。

## 4. 结语

那么，那些最积极地接受他所批评的逻辑的人，是否有可能对雷克雷特的论点充耳不闻呢?当他继续强调产生后人类思维的条件的偶然性时，后人类主义者自己也承认并庆祝偶然性。此外，从认识论上讲，从主题中“退一步”的可能性被排除在后人类主义的理论化之外，因为后者拒绝从认知距离来看世界。如果这意味着要站队，那么随着后人类“杂交”的吸引力的传播，雷克雷特的论点的力量可能会减弱。

这种不相容引发了一系列更广泛的问题，围绕着批判与不同类型的“非代表性”思维的相关性。然而，我已经这样做了

这里不仅暗示了后人类情感的流行是不平衡的(和有限的)，而且我们应该期待它的接受程度——即使是在同情的观众中——也会有很大的差异。也许“第三种立场”的后人类主义者的读者多少有些空想:后人类作家本身并没有傲慢到把他们自己的伦理政治建议定位为决定性的;他们在现实世界的追随者无疑也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反身性。指出这种多样性和不均匀性并不是要破坏Rekret的“方法”:他并没有将后人文主义定义为一个独立的思想体，而是为了启发式的目的而调动了它的一些共同倾向。相反，它开启了一种可能性——Rekret并没有明确否认这一点——未来可能会发展出更令人满意的反射形式的“混合思维”。

## 参考文献


Bennett, Jane. 2010.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raidotti, Rosi. 2013. *The Posthuman*. Malden, MA: Polity Press.

Chandler, David. 2018. *Ontopolitics in the Anthropocene: An Introduction to Mapping, Sensing and Hacking*. Abingdon: Routledge.

Connolly, William E. 2017. *Facing the Planetary: Entangled Huma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Swarmi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Hacking, Ian. 2000.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ll, Stuart. 1992. ‘Encoding/decoding.’ In *Culture, Media, Language*, (eds.) Stuart Hall et al. 128–38. London: Routledge.

Hamilton, Clive. 2017. *Defiant Earth: The Fate of Humans in the Anthropocen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araway, Donna. 1985.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Socialist Review* 80: 65–107.

Kirksey, S. Eben and Stefan Helmreich. 2010. ‘The Emergence of Multispecies Ethnography.’ *Cultural Anthropology* 25 (4): 545–76.

Kohn, Eduardo. 2013. *How Forests Think: Toward an Anthropology Beyond the Huma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orton, Timothy. 2013. *Hyperobjects: Philosophy and Ecology After the End of the Wor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14. Internet Access Quarterly Update: Q1 2014. Statistical bulletin. https://www. ons. gov. uk (accessed 16 November, 2017).

van Assche, Kristof and Gert Verschraegen. 2008. ‘The Limits of Planning: Nik-las Luhmann’s Systems Theory and the Analysis of Planning and Planning Ambitions’. *Planning Theory* 7 (3): 263–283.

van Ingen, Michiel. 2016. ‘Beyond The Nature/Culture Divide? The Contradic-tions of Rosi Braidotti’s *The Posthuman*’. *Journal of Critical Realism* 15 (5): 530–542

# 第二节

# 数字劳动力

第8章

# 透过生殖镜头:文化与经济交叉点上的劳动与斗争

Kylie Jarrett

## 1. 简介

数字与我们的工作和休闲的交集，以及这两个类别的模糊，已经成为大数据资本主义中越来越重要的研究领域。探索这种联系的数字劳动研究正在迅速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包括对平台中介的零工经济中的工人、社交媒体用户、社交媒体影响者以及各种工作实践被数字技术重新塑造的方式的分析。这一领域的重要性在于，它所追踪的动态——例如非物质/情感劳动的中心地位、不稳定和被剥削的工作条件以及社会工厂——如何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更广泛趋势的象征。

2016年初，我出版了《*女权主义、劳动和数字媒体:数字家庭主妇*》，通过论证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案例，为这场辩论做出了贡献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Jarrett, K. 2019. Through the Reproductive Lens: Labour and Struggl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Culture and Economy.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103–116.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I: https://doi.org/10.16997/book29.h. License: CC‐BY‐NC‐ND 4.0

家务劳动的女性主义理论解释数字媒体中消费者劳动的经济和文化逻辑。我所说的“消费者劳动”，指的是我们的文化产品在我们上传到平台时被征用和异化的无数种方式，也指我们的数据如何成为数字媒体公司剩余价值产生的基石。这本书试图解决我认为毫无结果的争论，即这样的工作是被异化和被剥削，还是有社会意义和自我实现的场所。在*《数字家庭主妇》一书中*，我认为，由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概念化的家务劳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工作模式，它既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繁殖能力的组成部分，也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繁殖能力的组成部分，但总是潜在地超出了这些动力。家务劳动是跨越文化和经济的劳动，因此，我认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数字劳动形式的机制，这些劳动形式表现出与体操相同的壮举。

我的书非常狭隘地针对一个特定的理论问题——以及个人的烦恼——并在阐述其观点时只关注有限范围的数字劳动实践。尽管如此，在更广泛地研究数字劳动和资本主义方面，其论点所依据的核心原则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本章中，我想离开我书中的具体论点，转而关注这一更广泛的背景。我将参与关于其论点所进入的行动主义、斗争和批判的更广泛的对话，并试图确定在哪些背景下，对替代劳动历史和社会再生产政治的强调使我的书充满活力，带来了重要的批判性见解。在此过程中，我将描述*数字家庭主妇的一些元素*，但主要是作为一种说明将生殖工作纳入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斗争场所的理解的手段。为此，我将重点关注三个关键领域:历史、价值和主题。

## 2. 历史

在我的书中，有一个指向女权主义的概念是，社会工厂的历史比数字资本主义研究中通常赋予它的历史要长。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论点:我们生活的时代标志着整个存在都被资本的支配所特殊地饱和——生活的真正包容构成了马里奥·特隆蒂(1973)的社会工厂。这通常归因于后福特主义的条件和大数据资本主义的信息密集型产业。通常会有一种隐含的假设，即社会工厂的环境是新的。

然而，对于任何一个不是白人、顺式、混血儿的人来说，很难确切地看出，在把全部生活纳入资本的条件中，有什么是新颖的。私人的家庭空间和人际关系，包括性活动，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之外的，提供了可以发生自主的自我创造的场所，也是马克思的物种存在的场所

可以实现。在白人异性恋父权语境中，这长期被等同于核心家庭的私人家庭空间(Berlant and Warner 1998;England 1993;Osucha 2009)。然而，女性、有色人种和LGBTQ+从来没有经历过自主性或代理的地方，而是作为(en)强迫和无偿工作的场所，以及统治和监视的情况。此外，正如Dalla Costa和James(1975)、Federici(2004)、Mies等人(1988)和Davis(1983)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性别、种族和性别存在与劳动组织密切相关，将人类主体性置于资本主义积累的核心。考虑到这些观点，对整个生活的吸收——社会工厂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叙事的一个基本部分，如果不是基础部分的话。我所探索的这个更长的社会工厂历史的一个例子(Jarrett 2017)是1922年至1937年间爱尔兰抹大拉洗衣店的有效奴隶劳动制度。这些洗衣店是拘留机构，女性认为通过父权婚姻之外的性活动对中产阶级的“干家庭制度”(Inglis 1997, 13)构成危险，因贫困而被视为“无生产力”(Buckley 2016)。或者被当时的行为规范认为是不守规矩的，被送去忏悔，并接受家庭劳动纪律的再教育。妇女们在这些修女经营的商业性但非营利性的洗衣店里，在恶劣的条件下做奴隶，没有报酬，通常要干好几年。

然而，抹大拉洗衣店不仅仅是爱尔兰天主教的一种失常，而且必须被解读为整个社会的社会、文化、法律和政治机制的一部分，这些机制支持国家经济议程，让男性——尤其是男性——在经济非常疲弱的情况下重返工作岗位(Daly 1995)。这是通过积极地恢复性别劳动分工来实现的，在物质上——以控制妇女劳动和政治权利的规定的形式——在文化上，通过布道、文化产品和洗衣店等机构的惩戒作用。这些网站通过约束和监管女性的身体、性和“灵魂”来强制女性的家庭生活，严格的忏悔以确保与她们受约束的经济角色保持一致。基于“罪的主题”(Inglis 1997)和羞耻的制度，激活这些机构并赋予其经济影响合法性的文化逻辑并没有在洗衣门结束。他们也在爱尔兰社会的所有情感中表达出来，正如声称抹大拉制度的主要倡导者是女性所证明的那样(Crowley和Kitchen 2008)。洗衣店及其在爱尔兰日常社会中的嵌入，体现了社会工厂的理念——一个由经济议程形成的社会、文化结构和个人具身的主体性。

这些在非市场背景下表现出来的资本主义逻辑的悠久历史的例子表明，如果我们要理解大数据资本主义中的劳动，恢复和纳入工业化劳动中不属于白人男性的劳动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另见Fuchs 2017)。正如Alan Sears(2016, 139)所总结的那样，工人阶级的不同成员面临着不同的问题

自主性和强制的形式基于他们在主导的劳动分工中的位置，围绕着不同的剥夺过程组织起来。因此，为了全面理解资本主义，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妇女、有色人种、跨性别者或LGBTQ+人群以及残疾人的历史(和当前经验)，他们在资本中的经历以不稳定和压迫的饱和政权为特征。这些次等的劳动条件与社会工厂的沉浸式政治之间的公开关系表明，它们有效地描绘了大数据资本主义不稳定的社会工厂中的压迫经历。

我们需要更有效和更广泛地参与的一套劳动经验是有偿和无偿性工作，摩根默特伊(2017)认为，这为大数据资本主义下的当代劳动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她以camming(基于网络摄像头的性工作)为例，描述了性工作的动态与Uber或Taskrabbit等平台之间的关系。默特伊认为，平台的功能类似于皮条客，因为它们在工人和客户之间进行交易，从任何利润中提成，并为如何执行劳动提供某些规则。默特伊认为，为理解平台经济中的劳动力提供最佳模型的，不是我提出的数字家庭主妇，而是数字妓女。

但这种类比比平台和皮条客之间的简单比较要深入得多。如果我们审视性工作的悠久历史，尤其是女性和有色人种的性工作，我们会看到亲密与经济、有偿与无偿工作、代理与控制之间非常模糊的区别。当你的核心业务是“好好结婚”时，那么即使是与生活伴侣的无偿性行为也有经济逻辑。正是在人际关系、法律、政治和经济背景下对这些边界进行的普遍和持续的谈判，可能会揭示出数字经济中劳动政治的许多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我们所认为的合法商品化之间的区别同样是不固定和可变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塑造了异性婚姻，并使无偿性劳动(与平台上的许多劳动一样)成为非市场社会和经济胁迫的结果。在揭示大数据资本主义的剥削动态时，考虑这种不平等关系可能也很有用。

认识到社会工厂的这一更广泛背景，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大数据资本主义下，劳动力到底有什么新东西。如果不是它独特地要求和/或产生资本主义原则下的生活饱和，那么它的特殊性是什么?这是资本主义剥削和异化倾向的强度或广度增加的问题吗?这仅仅是随着新的量化机制(如菲比·摩尔(Phoebe Moore)(2017)探索的工作场所跟踪技术)将现有的捕获实践具体化，可见性增强的问题吗?或者，在大数据资本主义中，劳动力的表现方式是否存在其他实质性差异?如果是的话，我们必须更多地了解当代工作的特殊品质

正确地批评这种劳动，更重要的是，确定我们可能干预的地点。然而，我重申，在追踪这种差异时，我们不能在从事工业化劳动的白人顺式、异型、男性的工作中找到我们的区别，而是也要关注性别、种族、性别和性化的劳动实践。正是在这些“所有”劳动历史中，我们不仅发现了差异，而且发现了与今天工作构造方式的连续性，因此它们可能为批评提供了富有成效的途径，也为斗争提供了模式。正如伊莎贝尔·洛雷(Isabell Lorey)所建议的，我们不仅需要将不稳定性解释为确保统治的机制，还需要将“不稳定性的主观经验[作为]政治斗争的起点”(2015,6)。了解女性、有色人种、全球南方的人、跨性别者、酷儿或残疾人是如何努力的，但也被抵制，压迫的条件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在生存中——雷马·哈马米称之为“次等坚持的政治”(2016,172)——我们可能会找到我们今天需要的行动形式。

## 3. Value

研究更长的社会工厂历史，以及以其明显的非市场和文化维度为标志的工作历史，也将焦点转移到资本主义中有价值的东西上。这是我在数字劳动研究中所说的“再生产转向”的一部分，其重点不仅在于商品化的过程，还在于价值或对资本主义有*价值*的东西是如何通过资本主义交换的非商品化维度产生的。正如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 2014,61)所主张的那样，这是一个探索“资本主义生产可能性不可或缺的背景条件”的方向。

我所提倡的理解消费者劳动的关键模型是利奥波迪纳·福尔图纳蒂(1995)在《*繁殖的奥秘*》一书中所描述的。福尔图纳蒂坚持认为，家务劳动是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附属品——再生产工人是生产周期的必要组成部分。然而，她认为，无偿的家务劳动并没有被直接剥削，而是涉及到一个多阶段的合并过程，涉及到不可分割商品的生产。福尔图纳蒂描述了无薪家庭主妇的劳动如何生产出非商品化或不可替代的产品，如食品和医疗保健，供有薪工人消费。在这一点上，这些产品被转化为劳动力，只有这样它们才能转化为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劳动时间)。在这个模型中，家庭劳动从商品生产中退了一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未商品化阶段在资本主义之外;它仍然是资本主义漫长价值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福尔图纳蒂的论证让我们看到，即使没有对劳动进行抽象，价值也可以从劳动中提取出来

还有商品化。当应用于大数据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时，这一模型需要考虑更大范围的活动，这些活动产生可商品化的产出，但也允许整个价值链中生产的商品性质的多样性和矛盾性。

越来越多的关于数字劳动的研究，特别是那些涉及性别或种族化活动的研究，也同时关注数字劳动的经济和非经济维度，强调主体形成的维度与数字平台的经济框架。然而，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假设这些劳动和/或商品交换的社会关系和非商品化维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资本主义之外的。相反，他们强调它们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特别是注意到这些网站的非商品化交换的纪律功能-例如，用户之间的情感互动如何在提供支撑贡献这种劳动的愿望的规范性压力方面对资本主义是有价值的。

这种对更长的价值链及其矛盾和多样性的可能性的关注在Julia Velkova(2016)的作品中很普遍，她在开源动画社区Blender中探索了礼物和商品关系的政治。她的作品(Velkova和Jakobsson 2015;另见Jarrett 2015)借鉴了物品的传记(Appadurai 1986;Kopytoff 1986)，并建议跟踪与文化商品相关的经济关系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以及它在不同社会关系中的循环。Velkova以Blender为例指出了这种多样性，描述了公司和开源社区之间的劳动力和软件交换有时被视为礼物，有时被视为商品交换。然而，Velkova也注意到，在任何时候，不管他们的形式如何，这些交换都巩固了维持和支持资本主义企业的等级结构，这是Blender的核心。实际上，她有用地描述了来自生产者和开源用户社区的赠送行为如何展示了资本主义内部非市场交换的多样性，以及保守性、再生性。

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Jarrett2015b)，我所说的“生殖转向”可以说根本不是一种转向，而实际上是对指导早期文化研究的框架的*回归*，特别是当它出现在伯明翰学派时，在那里，经济和文化或同一性总是被认为是相互告知的。正如Velkova的研究所强调的那样，对数字劳动和当代资本主义进行全面批判，掌握这种相互关系，拒绝文化/社会/同一性与经济之间的错误二元对立，并从广义上探索价值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

在我的互联网研究领域之外，当我们试图理解美国另类右翼(以及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的“受侵害的权利”(Kimmel 2013)等当代政治时，更新这一视角至关重要。正如我们无法理解美国历史上的种族关系一样

如果不适当考虑美国的经济基础及其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我们就无法掌握网络厌女症、欧洲法西斯主义或伊斯兰恐惧症的当代政治，如果不探索不稳定性经济学与男性和白人的历史特权的交集。特朗普当选后不久，我在社交媒体上的基调就是谴责其他人强调同一性政治是“自由主义者”，或者把一切都归结为阶级问题，这当然没有帮助。这两者不能如此简单地区分开来，过于简单化和无效的二元对立无法将我们的批评推向积极的变化。当我们整合我们的经济和同一性批评，检查社会的这些维度如何在政治化，价值化和利用差异中交叉时，争取平等和正义的斗争就会得到更好的服务(Alcoff 2006;Fraser 2014)。在当代，除非我们着眼于资本主义更长的非物质价值链，在那里，某些行动者的权利被生产和再生产，而这一承诺被背叛并变得不稳定，否则我们无法应对特朗普，法西斯和种族主义政党构成的日益严重的威胁，甚至是英国脱欧。

如果我们要确定与大数据资本主义的不稳定状况最相关的斗争点，那么关注社会再生产的经济逻辑和经济逻辑的再生产也很重要。Silvia Federici(2012)说，我们产生和再生产意识的方式——同一性政治和再生产领域的意识形态批判——成为政治行动主义的零点。因为社会再生产既是对人类理想品质的生产，也是对市场的适应，这意味着再生产工作总是处于紧张状态，涉及“潜在的分离，它暗示了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冲突、抵抗和矛盾的世界”(2012,99)。正是在打破这些矛盾、在这些矛盾之间移动和对抗的过程中——拒绝再现倒退的具身解释视界(Alcoff 2006)——抵抗性的政治意识可能会发展起来。

尼克·斯尼切克(Nick Srnicek)和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2016)认为，一个老式的葛兰西式反霸权项目对于挑战平台资本主义的政治至关重要。他们说，对意识形态的干预是通过改变中介化的政治话语和这些思想的物质实例(文化和经济)来实现的。住房和城市设计等物质基础设施，以及教育系统或家庭等生殖机构，都需要重新思考和重塑，以挑战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的认同。从根本上说，这个项目需要改变我们的自我创造工具套件，包括，特别是，我们如何阐明工作和生活的概念和实践。这表明，与其反对资本主义和经济批判的同一性政治，我们的任务是动员这些政治来阐明新的批判主题，利用生殖工作固有的情感和经济过剩来阐明压迫意识和存在、思考和行动的替代模式。

通过深入挖掘和改造生殖活动，我们可以打造一个反霸权的项目。

## 4. 主题

这直接引出了将生殖镜头应用于大数据资本主义下的劳动所产生的最后一点，即这种应用如何改变我们对劳动主体的概念，并由此改变我们的政治模式。如果我们假设社会工厂有着悠久的历史——正如女权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它早于资本主义的起源——那么，当我们识别出真正的生活包容时，我们的批判就不会结束。我们必须假设，这是资本主义生活的全部特征，尽管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表达方式不同。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受资本主义影响的活动并不一定会再现资本主义。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将我们对大数据资本主义中的劳动的批判从物种存在的异化中移开——这是马克思(1961/2013)在《*经济与哲学手稿*》中描述的四种异化形式之一——这几乎已经成为数字劳动研究的默认批判，至少在媒体研究中(Jarrett 2016b)。

这种对数字媒体对自我制造的影响的强调不仅再现了虚假意识的框架，而且还以一个性别化、种族化和性别化的主题为前提。异化于物种存在的概念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可以说，它依赖于一个人文主义主体——一个自我控制的、独特的个体，对他来说，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异化是一场形成性的悲剧(爱森斯坦1979;Braidotti 2013)。但对于女性，以及所有其他构成“他者”的人来说，这种自主性和独特性的状态，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内部还是外部，都从未被归因于或实现过。在历史上，基于阶级以外维度的权力关系和统治体系的巩固，限制了某些行动者表达“物种存在”的能力。对许多主体来说，异化是存在的条件——例如混合的、酷儿的、跨性别的主体性——因此，一种仅仅寻求回归或将其政治主体性置于一个连贯的、堕落前的物种存在中的政治就变得排他性和潜在的种族灭绝。

这种批判有两层含义。正如James Reveley(2013)所言，在我们对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异化的物质维度——产品、其他工人、自然。这引起了人们对数字劳动实践如何对其他工人或公民产生负面影响的关注，再现了浪费和过时的循环，或使资本主义制度典型的其他不平等或社会和环境破坏永续下去。摆脱对基于自我占有的数字劳动的批判，转而关注物质剥夺和退化的维度，将表现出对数字劳动更有用、更细致的批评。

其次，这种批判允许大数据资本主义的主体在其相关性和多样性方面动员起来，而不是他们的自主性。这反过来又促成了交叉和流动的政治。我不断地被切拉·桑多瓦尔(Chela Sandoval)对美国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战术、限制和差异主体性的描述所吸引，“鉴于要移动的权力形式，具有去中心化和重新中心化的能力”(2000,58)。这就是“被压迫者的方法论”，其可能性的轨迹不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与这些差异一起工作，并通过这些差异，在战术上适应权力。这也是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 2004)所描述的酷儿不适——不合时宜——的动态政治，长期以来一直是下层社会的激进主义领域。拒绝人文主义主体的首要地位，而不是通过回归神话般的统一代理形式或反对阶级压迫的单一经验来寻求补救，而是允许通过差异和共同点(包括阶级位置)来进行这种参与。

避开政治和经济主体的单一一致性，使我们能够产生针对我们所有人都变得脆弱的方式的联合行动(Butler 2004;Butler et al. 2016; Fotopolou 2016)，通过大数据资本主义，建立跨种族，性别，阶级，能力，性别和性取向的临时工会来抵制这些政治。这种对联盟如何通过共同的不稳定感而建立的关注，不仅解释了大众政治行动的产生(Hardt and Negri 2005)，而且提供了激活这些政治的机制。

我们也可以利用大数据资本主义的过度效应来实现这种激活。在准备导致本章的初步论文时，我使用社交媒体的一个时刻说明了行动主义和不稳定性是如何携手并进的。在我的Facebook动态的三分钟内，我收到了三条关于共同斗争和在反霸权项目中使用社交媒体的能力的更新。第一条是一位法国朋友分享的，讲述了法蒂玛·哈吉吉(Fatima Hajiji)的故事，她是一名16岁的巴勒斯坦女孩，在耶路撒冷被以色列军队开枪打死。紧接着出现的是爱尔兰媒体的报道，都柏林和斯莱戈市议会投票决定在其办公室上空悬挂巴勒斯坦国旗，以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几分钟后，一位意大利朋友分享了“当我看到他们时，我看到我们”视频的链接，该视频将美国黑人的生命也重要运动与被占领巴勒斯坦人民的运动联系起来。巴勒斯坦人、爱尔兰人和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和现在的经历有着根本的不同，但他们却因各自面对殖民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死灵政治的脆弱性而相交。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联盟的建立，不是来自于奇点，而是基于共同不稳定的团结。我们还看到，在大数据资本主义提供的可见性和网络的帮助下，关键政治主题(潜在)被激活。尽管Facebook注册的捕获机制是广泛而详尽的，但在界面的再生逻辑中仍然存在漏洞，可以利用这些漏洞来反击权力。

然而，声称通过商业平台分享思想等同于真正的政治变革——例如，我的点赞不会影响加沙地带的生活状况——或者声称社交媒体创造了这些联盟，都是荒谬的。这些都不是我的观点。然而，这个例子所表达的是记录、传播和放大反政治存在的能力，其方式让人想起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提高意识活动或早期废奴主义会议。我们可以在邱杰克(2016，本卷)对中国Appconn工人使用社交媒体来表达话语变化，然后在工人之间组织材料、对立实践和团结的描述中看到类似的生殖模式中断。这些都是拒绝轻易复制阶级和同一性地位的干预，部分是关于建立新的主体性。

在我自己的政治领域，类似的社交媒体应用也出现在“爱尔兰废除运动”(Irish Repeal movement)中。这是一个由100多个团体组成的广泛联盟，旨在举行公投，废除爱尔兰宪法第八修正案，该修正案剥夺了孕妇的身体自主性。在许多物质行动中，这场运动在各种媒体上的政治表达也试图产生新的关键主题，通过使堕胎成为爱尔兰的一种生活经历，打破在岛上与堕胎相关的沉默和羞耻的再现，并通过共同承认宪法和爱尔兰法律使某些群体——女性、跨性别者、种族、LGBTQ+、寻求庇护者群体——比其他群体更脆弱的方式，将政治立场迥异的群体团结起来。尽管每个团体或个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各不相同，但这场运动在“废除者”的徽章下走到了一起，2016年9月流行的令人感动的草根标签运动“了解你的废除者”就是明证。如果正如斯尔尼切克和威廉姆斯所主张的那样，霸权的非物质维度和物质维度都需要系统性地受到挑战，才能带来有效的政治变革，那么“废除”运动就展示了数字媒体的再生产能力——它(in)形成批判性主体和塑造行动的能力——是如何被纳入表述的，建立和动员联盟来实现社会变革。

## 5. 结论

这一章有很多线索，它们似乎把我们带离了我的小书很远。《数字*家庭主妇*》只不过是一个理解数字用户劳动的理论框架，它似乎脱离了本章提出的广泛的政治关切。然而，正如数字劳动力具有更大的分析重要性，因为它体现了与大数据资本主义相关的趋势，我的书所借鉴的思想和框架也具有更大的分析重要性。我(和其他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反思得越多，就越能在本书中找到共鸣

再生产领域的文化经济。这种观点表明，在大数据资本主义中，劳动和生活以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但以一种有利于思考和抵制的方式阐明了这种复杂性。它允许工作，无论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同时具有文化和经济性质——既非鱼也非鸟——并在这种混杂中看到更好地理解它的手段——这是将其分解用于其他目的的关键初步步骤。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社会再生产的舞台和资本主义剥夺的分层进行适当的关注。只有避免生产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之间错误的二元对立，我们才能全面了解大数据资本主义是如何将我们作为经济单位和个体主体性组织起来的;这是我们能够充分设想辩证法的机制(Ferguson 2016;Fraser 2014)。这反过来又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基础，从中产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不仅仅是再现不平等和排斥。通过理解劳动分配的差异以及如何在所有社会制度中再生产，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对资本主义有价值的劳动过程，以及这些过程如何不仅仅存在于正式的劳动环境中。干预资本主义的不同地点和模式——比如将生育权利政治表述为一种同一性标记——随后可能会开放。

我在这里阐述的政治、概念和框架并不新鲜。事实上，这篇论文的大部分内容——以及《*数字家庭主妇*》这本书本身的观点——仅仅是在强调长期存在的酷儿、女权主义者、非殖民化和文化研究对经济决定论的批评。关注社会再生产的呼吁是其核心，这仅仅是对女权主义者、酷儿和种族活动家在扩大阶级构成本质方面至关重要的工作的呼应。然而，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大数据资本主义可能是新的，但资本主义和不平等却不是。女权主义者、种族和酷儿理论家或活动人士对文化饱和的经济体系的复杂性提出了宝贵的批评，并要求我们在应对大数据资本主义时发挥核心作用。在借鉴这些经验——这些不同的劳动历史和生殖镜头的洞察力——我们也可能为今天的斗争找到有价值的工具。

## 参考文献

Ahmed, Sara. 2004.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New York: Routledge.

Alcoff, Linda Martín. 2006. *Visible Identities: Race, Gender, and the Sel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ppadurai, Arjun. 1986. ‘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ed. Arjun Appadurai, 3–6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rlant, Lauren and Michael Warner. 1998. 'Sex in Public.' *Critical Inquiry* 24 (2): 547–66.

Braidotti, Rosi. 2013.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Buckley, Sarah-Anne. 2016. 'The Catholic Cure for Poverty.' *Jacobin*, May 27,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6/05/catholic-church-ireland-magdalene-laundries-mother-baby-homes/

Butler, Judith. 2004.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London: Verso.

Butler, Judith, Zeynep Gambetti, and Leticia Sabsay eds. 2016. *Vulnerability in Resistan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Crowley, Una and Rob Kitchin. 2008. 'Producing 'Decent Girls:' Governmen-tality and the Moral Geographies of Sexual Conduct in Ireland (1922–37).'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15 (4): 355–72.

Dalla Costa, Mariarosa and Selma James. 1975.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3rd edition. London: Falling Wall Press.

Daly, Mary E. 1995. 'Women in the Irish Free State 1922–39: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s and Ideology.'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6/7 (4/1): 99–116. Davis, Angela Y. 1983. *Women, Race and Clas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Eisenstein, Zillah R. 1979. 'Developing a Theory of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 nism*, ed. Zillah R. Eisenstein, 5–40.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England, Paula. 1993. 'The Separative Self: Androcentric Bias in Neoclassical Assumptions.' In *Beyond Economic Man: Feminist Theory and Economics*, ed. Marianne A. Ferber and Julie A. Nelson, 37–5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ederici, Silvia. 2004. *Caliban and the Witch: Women, the Body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New York: Autonomedia.

Federici, Silvia. 2012. *Revolution at Point Zero: Housework,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 Oakland, California: PM Press.

Ferguson, Susan. 2016. 'Intersectionality and Social-Reproduction Feminisms: Toward an Integrative Ontolog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4 (2): 38–60.

Fortunati, Leopoldina. 1995. *The Arcane of Reproduction: Housework, Prostitu- tion, Labour and Capital*. Translated by Hilary Creek. New York: Autono-media.

Fotopolou, Aristea. 2016. *Feminist Activism and Digital Networks: Between Empowerment and Vulnerabili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Fraser, Nancy. 2014. 'Behind Marx's Hidden Abode: For an Expanded Concep-tion of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86: 55–72.

Fuchs, Christian. 2017. 'Capitalism, Patriarchy, Slavery, and Racism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 and Digital Labour'. *Critical Sociology*, Online First. DOI: https://doi.org/10.1177/0896920517691108.

Hammami, Rema. 2016. 'Precarious Politics: The Activism of "Bodies That Count" (Aligning with Those That Don't) in Palestine's Colonial Frontier.'

In *Vulnerability in Resistance*, eds. Judith Butler, Zeynep Gambetti, and Leticia Sabsay, 167–90.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5. *Multitude*. London: Penguin.

Inglis, Tom. 1997. 'Foucault, Bourdieu and the Fields of Irish Sexuality.' *Ir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7: 5–28.

Jarrett, Kylie. 2017. 'Le Travail Immatériel dans l'Usine Sociale: Une Critique Féministe.' *Poli: Politique de l'Image* 13: 12–25.

Jarrett, Kylie. 2016a. *Feminism, Labour and Digital Media: The Digital House- wife*. New York: Routledge.

Jarrett, Kylie. 2016b. 'Queering Alienation in Digital Media.' *First Monday* 21 (10). DOI: http://dx.doi.org/10.5210/fm.v21i10.6942

Jarrett, Kylie. 2015a. ' 'Let's Express our Friendship by Sending Each Other Funny Links Instead of Actually Talking": Gifts, Commodities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 Facebook.' In *Networked Affect*, eds. Ken Hillis, Susanna Paasonen and Michael Petit, 203–219. Cambridge: MIT Press.

Jarrett, Kylie. 2015b. 'Devaluing Binaries: Marxist Feminism and the Value of Consumer Labour.' In *Reconsidering Value and Labour in the Digital Age*, eds. Eran Fisher and Christian Fuchs, 207–223.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Kimmel, Michael. 2013. *Angry White Men: American Masculinity at the End of an Era*. New York: Nation Books.

Kopytoff, Igor. 1986.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ed. Arjun Appadurai, 64–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rey, Isabell. 2015. *State of Insecurity: Government of the Precarious*. Trans. Aileen Derieg. London: Verso.

Marx, Karl. 1961/2013.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In *Marx's Concepts of Man: Including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Erich Fromm and Karl Marx, 73–215. Translated by T. B. Bottomore. London: Bloomsbury.

Merteuil, Morgane. 2017. 'The Digital Whore: Cyber Sexual Labour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Unpublished conference pape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w York, 21–23 April.

Mies, Maria, Veronika Bennholdt-Thomsen and Claudia von Werlhof. 1988. *Women: The Last Colony*. London: Zed Books.

Moore, Phoebe. 2017. *The Quantified Self in Precarity: Work, Technology and What Counts*. Abingdon: Routledge.

Osucha, Eden. 2009. 'The Whiteness of Privacy: Race, Media, Law.' *Camera Obscura* 24 (1): 67–107.

Qiu, Jack Linchuan. 2016. *Goodbye iSlave: A Mani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 Urba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Reveley, James. 2013.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Use as Alienation: A Review and Critique.' *e-Learning and Digital Media* 10 (1): 83–94.

Sandoval, Chela. 2000. *Methodology of the Oppress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ears, Alan. 2016. 'Situating Sexuality in Social Reproduction.' *Historical Mate- rialism* 24 (2): 138–163.

Srnicek, Nick and Alex Williams. 2016. *Inventing the Future: 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 Revised edition. London: Verso.

Tronti, Mario. 1973. 'Social Capital.' *Telos* 17: 98–121.

Velkova. Julia. 2016. 'Open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Online Gift Economy: The Case of Blender.' *First Monday* 21 (10). DOI: http://dx.doi.org/10.5210/fm.v21i10.6944

Velkova, Julia and Peter Jakobsson. 2015. 'At the Intersection of Commons and Market: Negotiations of Values in Open-Sourced Cultural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 (1): 14–30.

第九章

# 推特社会工厂的矛盾:对凯莉·贾勒特章节的反思

Joanna Boehnert

2017年11月2日，纽约市两家本地数字新闻网站The Gothamist和DNAinfom被所有者乔·里基茨关闭。自2009年以来产生的所有文章和信息都从网站上消失了，以不易访问的格式存档到其他地方。115人失去了工作。里基茨煽动了对新闻公司和当地历史文献的摧毁，作为对一周前发生的事件的一种毫不微妙的回应:DNAinfo和Gothamist的记者投票决定成立工会。推特爆炸了，因为另一个地方新闻来源消失了，工会组织受到了象征性的打击。

2017年11月3日，跨学科艺术家玛丽·布·安德森在推特上发布了一个新版本的“大脑扩张”模因(见https://twitter.com/whoismaryboo/status/926469404199653376)，图1和图2)。连续的四张图片和文字将她作为推特用户的经历与内容创作者工会化后数字平台的崩溃联系起来。文中还提到了安德森自己喜欢为推特制作内容的感受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Boehnert, J. 2019. Contradictions in the Twitter Social -Factory: Reflections on Kylie - Jarrett’ s Chapter.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 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117–123.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I: https://doi. org/10.16997/book29.i. License: CC‐BY‐NC‐ND 4.0







**图1和2:**玛丽·布·安德森@whoismaryboo推特帖子，2017年11月3日。

同时又觉得自己被推特利用，从她的劳动中获利，甚至从她对这种剥削的批评中获利。在最后一帧中，她推测将内容创作者联合起来，并让推特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关闭“这个垃圾网站”。

安德森的作品有力地捕捉到了凯莉·贾勒特(Kylie Jarrett)所描述的数字媒体社会工厂中数字劳动的矛盾。在《*女权主义、劳动和数字媒体:数字家庭主妇*》(2016)一书中，贾勒特认为，通过对社会再生产的女权主义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数字媒体用户在数字经济中的作用。贾勒特在这本书中的文章“通过生殖镜头:文化与经济交叉点的劳动与斗争”，扩展了她在《*数字家庭主妇*》中提出的观点，以反映社会再生产政治的更广泛背景，推测替代数字媒体实践。在这篇简短的评论中，我用安德森的作品来反思贾勒特的想法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推特上最近的戏剧性变化。

在描述思想，甚至身份和主体性是如何由社会中的交流劳动(即“社会工厂”)产生的过程中，贾勒特说明了资本主义中的无偿劳动是如何被紧张所困扰的，以压迫和解放的方式同时工作。我感兴趣的是这些矛盾如何在推特上表现出来，以及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应对、打破甚至可能改变最令人不安的紧张关系。我在这里关注的是推特的具体运作方式，它实现目标的策略，以及这些优先事项的社会后果。社会工厂概念是这一分析的基础，这是一个自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它描述了资本主义不仅如何指导我们的经济生活，而且如何将其异化、剥夺和商品化的逻辑扩展到社会领域。

在2017年期间，不断扩展的大脑模因(即具身大脑的四个连续图像，以及各种主题的文本内容)被用来暗示个人智力能力的进化。它暗示了从爬行动物大脑到具有扩展认知能力甚至宇宙精神洞察力的状态的进展。通常情况下，这个梗是用讽刺或半讽刺的方式来使用的。安德森扩展的大脑模因被用来强调她既喜欢推特又感觉被这个平台剥削的矛盾情绪，她关于破坏这种剥削的想法，以及她被杰克·多尔西废除推特而“解放”的愿景。

推特在数字媒体生态系统中占有战略地位。它已经获得了庞大的用户群(大约3.3亿活跃用户)，这是因为该平台通过将边缘的好想法带到突出位置的方式，促进了用户互动。这种设计放大了好的想法(安德森的推文在头几天就获得了7000多个赞和转发)，并破坏了沟通渠道和传统新闻媒体的权力等级。然而，不幸的是，推特上的情况似乎正在发生变化，这可能会对它在促进边缘化观点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产生深远的影响。

就在安德森进行艺术干预的同一天，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称，推特发布了新的规则。推特用户蒂姆·彼得森指出了一个具体的变化:“推特从规则中删除了‘对权力说真话’的信仰”(@petersontee, 2017年11月3日)。帕特森发布了新旧推特规则的截图。推特删除了“我们相信言论自由和对权力说真话”，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相信言论自由和公开对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优先事项转移的影响将变得明显，但这一变化不可避免地标志着优先事项和忠诚的调整。许多用户已经注意到，最近推特运营方式的变化削弱了它的传统价值。2017年11月，推特将推文长度从140个字符更改为280个字符，并极大地改变了平台的外观和感觉。推特的一个核心特点就是要求用户清晰简洁地表达自己。字符长度的变化不仅改变了单个tweet，还改变了推特提要的体验，这些提要不再容易滚动。现在用户要花更长的时间来浏览多条推文。这一变化是在其他修改的基础上进行的。最近，“点赞”功能被改成了类似于“转发”的功能。这减少了推特用户为不同目的使用“喜欢”和“转发”的选择。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担心我所依赖的获取新闻和分析的平台不再以最初让它如此吸引人的方式运作的用户。

Mary Boo安德森不断扩展的大脑模因将推特用户/内容生产者与最近被删除的两个新数字网站(DNAinfo和the Gothamist)的记者联系起来。里基茨在2017年9月写了一篇博客，题为“为什么我反对我创建的企业中的工会”，他在博客中说:“我相信工会促进了一种有害的‘我们反对他们’的动态，破坏了企业成功所需的团队精神。”里基茨在描述他的公司的价值如何来自于他自己的创业技能和他个人在华尔街积累的资本时，表达了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与这种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贾勒特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分析描述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是如何使资本主义利润发生的。

资本主义依赖于许多不同类型的劳动，包括大量的无偿劳动和再生产劳动。贾勒特的数字家庭主妇隐喻将女性生殖工作的女权主义理论与数字工作联系起来。推特用户和失去工作的记者都可以被理解为数字工作者，他们分享信息，贡献不稳定或无偿的认知和交流劳动，为数字平台增加价值。估值边界问题是资本主义和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分歧的症结所在。自从马克思描述集体劳动者或*Gesamtarbeiter*以来，情况就是如此(富克斯2017,4)。克里斯蒂安富克斯解释说，“在软件公司中，不仅生产软件商品的软件工程师是生产工人，而且秘书、清洁工、看门人、会计、营销人员等也是生产工人。”生产劳动生产

里基茨认为价值是由股票经纪人和企业家狭隘地创造的，而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则描述了维持人们社区但在资本主义结构中被剥削的所有其他劳动。

在她的新文章中，贾勒特考虑了Morgane Merteuil(2017)的观点，即数字妓女的隐喻更准确地描述了受资本主义逻辑支配的平台经济中主观领域的捕获程度。如果社会是从人类活动的结果中出现的，而人类活动主要是由资本主义构建的关系的结果，那么资本主义下的主体性都处于深刻冲突的空间中。支配我们生活的结构鼓励特定的认同和意识形态的从属关系。妓女的比喻抓住了资本主义如何包围了如此多的人——尤其是最受压迫的选民——的私密空间。

Jarrett认为，虽然一些媒体理论家认为数字媒体中对劳动力的剥削是数字经济的一个新特征，“对于任何一个不是白人、顺式、男性的人来说，很难准确地看出所有生活都被纳入资本的条件有什么新颖之处”(2018,104)。由于受迫害群体中的人们不得不最艰难地与各种类型的压迫作斗争，他们的优势可以更清楚地揭示资本主义和数字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斗争凸显了数字媒体中的紧张关系，因为用户体验到了能动性和愉悦感——可以接触到更具批判性的新闻来源;与志同道合的人组成全球社区;让边缘化的声音被放大;在分享的幽默(哈哈大笑)等等——以及剥削和焦虑——来自各种类型劳动日益不稳定的本质;来自假新闻;来自社交媒体上的“另类右翼”和其他反动运动;来自网络骚扰，等等。正如无偿的家务劳动从资本主义诞生之初就促成了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一样，无偿的数字劳动也促成了数字资本主义。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不仅是这种动态中固有的不公正，还有我们赖以获得可靠新闻的结构的坚固性，而可靠新闻是民主进程的基础。

像许多数字新闻平台一样，DNAinfo和Gothamist在财务上也遇到了困难。数字媒体平台是由用户数据和广告的价值驱动的。推特从来没有像Facebook那样成功地利用这些优势。平台资本主义创造了基于数据的社会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积累和属性关系的格局”(Cole 2017)。Matthew Cole引用了Nick Srnicek(2017)对平台核心属性之一的定义，即“调解交互可能性的专有架构”(2017)，并声称“平台最重要的资产是其知识属性-公司软件，算法和用户数据”(2017)。正是这种知识属性使平台能够调解用户之间的交换。问题在于，这些平台及其建立的社会关系能否做到这一点并不明显

支持可靠的新闻和必要的基本信息，以不倾向于专制和反动政治立场的方式实现民主决策。Jarrett将资本主义积累模式内的数字平台描述为与社会领域具有对抗关系(2016,3,33)。通过关注这些对抗以及数字劳动的异化和实现倾向之间的辩证关系来困扰数字资本主义，为更深层次的干预创造了空间。

跨越这些紧张关系，推特可以被理解为两极分化立场加速的体现。我对推特的个人体验往往具有教育意义和解放意义。其他推特用户扩展了我对种族、性别、阶级、经济和其他问题的理解，这些问题影响了我的IRL活动、研究和友谊。推特提供了一种解释和回应政治事件的手段，并在全球范围内参与辩论和对话。然而，这些经历，以及任何与之相关的脆弱的能动性感觉，都是不稳定的。推特为获取新闻、分析、评论和幽默提供了便利，而这些在前数字时代是不容易获得的。然而，尽管推特用户使这些功能成为可能，并为平台增加了价值，但有关推特功能的重要决定并不是由用户和内容创作者做出的。用户贡献和依赖的平台不是我们的。一个由用户集体拥有的平台，才是真正的解放技术。更直接的目标是阻止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摧毁推特。

## 参考资料

Cole, Matthew. 2017. ‘Platform Capitalism and the Value Form.’ *Salvage*. Available at: http://salvage. zone/online-exclusive/platform-capitalism-and-value-form (accessed 14 May 2018)

Fuchs, Christian. 2017. ‘Capitalism, Patriarchy, Slavery, and Racism in 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 and Digital Labour.’ *Critical Sociology*. Sage. Published online, 9 February.

Jarrett, Kylie. 2016. *Feminism, Labour and Digital Media: The Digital Housewife*. New York: Routledge.

Jarrett, Kylie. 2018. ‘Through the Reproductive Lens: Labour and Struggl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Culture and Economy.’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Big Data Capitalism*.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Merteuil, Morgane. 2017. , ‘The Digital Whore: Cyber Sexual Labour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Unpublished conference paper,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w York, 21–23 April.

Peterson, Tim. (@petersontee). 2017. Twitter removed its belief ‘in speaking truth to power’ from its rules. Twitter post, 3 November. Accessed:

14 November 2017. Available at: https://twitter. com/petersontee/ status/ 926557756131180544 (accessed 14 May 2018)

Ricketts, Joe. 2017. 'Why I' m Against Unions at Businesses I Create.' *Joe Ricketts Blog*. Available at: http://blog.joericketts.com/?p=557 (accessed 14 May 2018)

Srnicek, Nick. 2017. *Platform Capitalism*. London: Polity Press.

第十章

# E(a)数字化工作场所的有效不稳定性、控制和阻力

菲比·v·摩尔

## 1. 简介

“你的动力是什么?”——克
劳德·香农(1961

计算工作中活动和表达范围不断扩大的数字化方法证明，管理旨在控制所谓的情感(Hardt 1999, Dowling 2007)和情感(Hochschild 2012 [1983];Brook 2009, 2013)劳动。当然，情感劳动和情感劳动既不新鲜，也不局限于数字化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女权主义学者已经观察到和批评了长期以来被低估的劳动。新的趋势是，通过新数字化的工作场所，利用技术来控制看不见的劳动领域，使用位置和感官设备，有可能捕捉和控制我们的每一个动作、情绪和思想，从而模糊了工作和生活本身之间的类别。在粒度上的危险在定性上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Moore, P. V. 2019. (a)ffectve Precarity Control an eitane in te Dgialied Work-place.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125-144.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l: https/do.org/10.69971 book29.j. License: CC-BY-NC-ND 4.0

合格工人的工作被量化是野蛮主义的兴起，那里没有资本主义庸俗的外在，那里没有文化，也没有文明或尊严，只有残酷的，企业驱动的劳动商品化和抽象。启蒙运动承诺让所有人都过上合理的生活，但现代社会已经证明，这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阿多诺警告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1983,34)。阿多诺不是在警告人们不要写诗，而是在强调人类原始的野蛮状态;他后来强调，在这种悲惨的暴行之后，最重要的项目必须是“恢复一种非野蛮的状态”(2005,50)，“在奥斯维辛之后，唯一适当的做法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摆脱野蛮的道路上”(2005,268)。

目前编辑的合集强调了我们现在生活的“艰难时期”。虽然我没有像阿多诺指出的那样，明确地将这些“艰难时期”与大屠杀相提并论，但我认为，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工作场所的监视是一种野蛮的形式，至少是非常不合理的时代。本章着眼于工人试图破坏在数字化和可能野蛮的工作场所中正在创造的新形式的雇佣关系，在这些工作场所，在类似于gig的条件下，受到监控和监视的工作使人们的生活几乎无法忍受(Akhtar和摩尔，2016)。

在Backman和Vn al“通过远程技术看到情感和情感的资本化或经济化”(2010年)的基础上，本章着眼于员工对被要求在工作中使用自我跟踪和无形管理技术以通过情感劳动改善健康和生产力的反应。注意到对这种侵入性控制的日常抵制形式。涉及对情感和情绪劳动进行电子跟踪的新形式的工作量化是资本在不稳定的敏捷性条件下获取剩余价值的最新方法，但这里概述的实证研究结果中工人抵抗的例子揭示了这些方法的弱点。

## 2. 不稳定与零工

后现代的、对价值规律的激进研究假设存在一种无法量化的资本外部，从而创造了解放的可能性(内格里1999年，86)。费代里奇认为，原始积累今天仍在继续，当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霸权下(2004年)，我们的最新技术有助于其追求时，不再存在生产关系的可想象的“外部”。然而，新的工人监测技术量化了定性，揭示了劳动过程中以前无法测量的方面，如情绪、疲劳、心理健康和压力。这使得管理人员永久地看到工人，并使管理人员能够穿透工人对工人沟通所促进的日常抵抗场所，这意味着越来越难以识别资本以外的任何东西(摩尔和罗宾逊2016)。新的程序和

追求超越了科学管理对物理运动的研究，因为随着识别和计算以前看不见的劳动的新方法变得明显，具体的劳动越来越受到抽象的影响，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更容易商品化。这种雇主处方通过强调幸福感来消除任何消极的可能性(Davies 2016;Cederström和Spicer 2015)。有了这样的认识，和

> [E]即使对这种新的生产性现实的测量是不可能的，因为情感是不可测量的，然而在这种非常具有生产性的背景下，在这种富有生产性主观性的背景下，情感必须得到控制。(内格里1999年，第87页)

正如Jarrett (2015a)所指出的那样，量化承认看不见的劳动是生产性的，而不是作为一种值得持续或有用回报的交换，而是为资本定位利润。

不稳定性是最纯粹的异化形式，工人失去了与她所从事的劳动的所有个人联系。在她的劳动生活中，她被剥夺了所有权，失去了位置，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她的所有价值都被榨取了。由于不稳定的数字化工作者不断地追逐下一份工作，生活中的空间和时间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遥不可及的。随着福特主义让位于金融化积累、个体经营和自动化的兴起(Frey and Osborne 2013)、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以及全球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工资在增加值中所占比例下降，不稳定性就是这种现象的征兆。在英国，2016年和2017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增长依赖于自营职业，就像零工经济工作中看到的那样。2017年，有超过90万人签订零时工合同，比2016年增长了20%

在零工经济中，也被称为需求经济(AFL-CIO, 2016)，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在线平台，人们使用数字化接口买卖劳动力。共享经济，或在“人类云”中工作，包括Upwork、ODesk、Guru、Amazon Mechanical Turks、Uber、Deliveroo和Handy等平台，这些平台在数字单一市场欧盟委员会的术语中被称为“在线平台”。Huws (2015)和Cherry(2011)将这种类型的交换和工作称为“众包”，Huws将其定义为“通过在线劳动力交换组织的有偿工作”(Huws 2015, 1)。众包促进了公司的劳动力外包，并为自由职业者和自雇工作者引入了新的平台，这种趋势在国际上正在上升。平台经济依赖于自雇合同，因此其工人无法获得常规的就业福利，如医疗保健或产假。工人几乎没有法律保护，平台的设计是为了减少雇主的责任。综上所述，零工的这些特点会给工人的身心带来极大的压力，导致情绪焦虑和恐慌。零工必须为生活的不断变化和中断做好准备，他们必须同意将其个人化

变化，总是在移动，总是可追踪的。因此，在数字化的不稳定条件下，工作、同一性和生活变得模糊。员工往往处于无法注销或关机的境地。零工工人争取独处，而不是融入社会，这种拒绝在他们的福特主义前辈看来很奇怪(Fleming 2015,83)。

在零工工作中，主体性被要求对不稳定有弹性，被试者被期望对个人健康承担全部责任，而不是将压力和疾病与恶劣的工作条件联系起来。总之，在加速资本主义竞争主体性再生产的背景下，gig工作是作为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的(Dalla Costa and James 1972, Jarrett 2015a, 2015b, Haider and Mohandesi 2015, Kofman and Raghuram 2015, Weeks 2011)。情感性工作到达肉体的下面、后面和上面。测量看不见的劳动是一种通过“情感调节”的控制形式，通过记录和试图控制身体能力来实现——在我们的研究中，通过提供自我跟踪设备，从而“改变身体的抵抗力”(Bogard 2010)。

在数字化和零工工作中，机械发展的必然性优先，甚至超过了客户。除了肉体上的、情感上的零工劳动者，他们不会利用自己的情感能力从事创造性的生产。他们从事的是一种情感压抑，通过这种压抑，所要求的从属表演侵蚀了他们自己的身心和身体健康。试图调节和调节情感，并将其成本外部化，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根据定义，情感劳动是无数的，产出可能只被视为“无实体的“消耗””(Smith 2016)。尽管如此，在零工工作中，我们劳动的每一刻都以越来越高的强度被捕捉，不是为了获得报酬，而是因为工人崩溃可能导致抵抗并降低“底线”。

Lorusso(2017)将不稳定性称为Derridean的“幽灵学”和Fisher的“*我生命*中的*幽灵*”(2014)的一种形式，因为不稳定性不是“现在的完全一部分”，而是依赖于“塑造当前行为的预期”，以及当前活动将导致更好的东西的梦想，一个以目标为导向的真空，不断焦虑地努力，因为现在没有成为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从自主主义的观点来看，不稳定性是对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希望运动的系统捕捉，当时的抵抗通常采取“拒绝工作”的形式，由“懒汉”或“辍学者”(Shukaitis 2006)，拒绝服从福特主义的工作常规(Brophy和de Peuter 2007, 180-181)。资本主义追求这种逃离到工作之外的生活领域，并通过将劳动力扩展到这些空间来捕获逃离的流动(Mitropoulos -2006, Neilson and Rossiter 2005, Federici 2008, Frassanito Network 2005)。 它还采纳了激进的想法，引入了一波灵活性，并将其作为解放出售(贝拉尔迪2009年)，在这个过程中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实际上，资本主义跟随逃离的工人进入了定性的自治空间，并重构了这些空间

沿着定量的路线，把工人带回资本主义。持续的挪用体现了资本主义在面对阻力时继续自我改造的能力(贝拉尔迪2009年, 77)。

## 3. 情感控制与抵抗

贝勒预测，如果没有调节情感的技术的发展，资本的发展是不可能进行的(贝勒1998,91)。情感使我们的行动能力(通过身体)得以实现或丧失，它的力量在于它的独特性和普遍性(Negri 1999,85)。这些观念预示并启发了德勒兹对情感或力量的主动形式和被动形式的区分。情感劳动是在情感表达之前发生的内部工作。它与工作的生物学方面有关，即:

> 劳动直接作用于情感;它生产主体性，它生产社会，它生产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情感劳动是本体论的——它揭示了构成一种生命形式的活劳动(Hardt 1999,99)。

企业对隐性劳动力的殖民化在后福特主义管理和后官僚主义技术中十分普遍，正是因为情感团结将导致最难阻止的抵抗形式，因为情感已经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哈特和内格里(2000)从后福特主义的角度描述了情感和非物质劳动，为抵抗、集体主体性和社区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在管理策略中强调对情感的控制，可以看作是与劳动控制和资本主义主体性的社会再生产以及蒙面胁迫的关系联系在一起的(Hartmann 1979)。当工人意识到情感或他们的行动能力时，他们也会意识到他们相互影响和挑战工作中的虐待行为的能力(Moore 2015)。在医护人员培训中可以看到一种明确设计用于调节和调节情感的控制方法(Ducey 2007)。Gregg(2010)概述了由电子邮件和伪办公室亲密关系引起的任何情感交流的障碍，这些亲密关系是由秘密圣诞老人和其他阻止情感关系的游戏等活动引起的。认知行为疗法和相关心理学强调了情绪和情感调节在工作压力管理中的作用，一个小组提供了名为“情感调节”的工具(psychology tools 2017)。

Firth将情感定义为“社会和生态组合的必要组成部分，它通过无意识领域”(Firth 2016,131)。内格里(1999)扩展了情感的“看不见的”方面，并假设这种劳动的使用价值不能在当代条件下量化，就像在以前的时代工作被控制的方式一样，因为这种劳动存在于一个特定的环境中

“非场所”，即非物质的。但情感性劳动已经成为企业权力强加的“道德”义务。

情感劳动不是直接的“内部”资本，但也不是直接的“劳动者的无工资再生产，增加了劳动的使用价值”(Clough 2007, 25)。相反，在真实的、情感的包容中，工作是不断发生的，既无处不在，又无处不在。工作变成了生活的全部。的确，“资本从生命的内脏内部生产自己的外部，在前个体身体能力的水平上积累，并将前个体身体能力投入工作”(同上)。零工中管理和个人责任的缺失，是一种通过将情感投入工作和减少劳动力来控制情感抵抗的方法，从而减少了意识到劳动被剥削的可能性。

## 4. 情感抵抗和日常抵抗

从日常形式到工会组织，许多抵制数字化情感劳动最坏影响的迹象正在出现。积极的抵抗包括工人黑客攻击或盗用应用程序;苏斯监视(Sousveillance)，即人们使用自己的方法，通过执行信息和共享干扰，获得他们通常不拥有的信息，从而“监视观察者”;在工作中使用个人设备;情境杠杆，例如，人们可能会“窃取”休息时间，并将其伪装成工作;或者干脆拖拖拉拉。也出现了员工利用自我跟踪进行抵抗和自我保护的案例。在一个案例中，一名没有固定合同的项目工人利用自我跟踪来保护自己免受无薪加班的影响。他跟踪了花在项目上的时间，以证明他的工资过低，并确保他的雇主遵守了《欧洲工作时间指令》。罗斯谈到了在剥削数字劳动力的背景下，其他形式的直接行动，如“普遍的破坏、长期缺勤和野猫罢工”(罗斯2008,7)。

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来看，技术*本身*并没有造成不稳定的条件。相反，对技术数据的使用，以及权力关系的隐形化，加剧了科学管理和相关工人控制的古老做法。但是，工人的组织和抵抗已经开始揭示劳动力中复活的代理，这是对李嘉图机器问题最新化身的回应。为了在数字化工人中充分出现团结，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意识是必要的。然而，一些人声称，阶级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相对于劳动的概念。Virno(2004)怀疑大众是否过于离心而无法拥有“自己的”阶级意识。Standing(2011)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识别不稳定性的“多阶级”配置是否必要，因为它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识别。工作赋予我们的物种价值(Sayer 2005)，人们在劳动中找到尊严和自我价值。科技

社交媒体一直是社会起义和抵抗的媒介(Gerbaudo 2012)，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数字激进主义的“煽动浪潮”一直在升级(Karatzogianni 2015)。菲什威克认为，劳动过程中的关键主观联系对抵抗至关重要，其中

> [C]生产过程内部和周围的争论对于作为政治主体的工人阶级的形成至关重要。它不仅创造了共享经验的客观条件，还允许对这些经验进行集体的主观解释，这种解释延伸到工作场所之外，并允许作为一个阶级表达连贯和突出的政治利益(2015,215)。

罗斯指出，对不稳定无产阶级的期望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温暖版本”(2008,36)。很容易看出这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因为社会绩效的价值*完全*被*简化*为管理指标。

伦敦的《*资本*的*自愿奴隶*》借鉴了斯宾诺莎和马克思的著作，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鉴于资本的弊端，为什么人们继续为资本服务，而没有克服它?情感及其行动的力量可以由积极*和*消极两种因素触发(这一点在关于情感的文献中经常被忽视)。一根“最后的稻草”可以触发群众，当制度权力，在斯宾诺赞意义上的“pouvoir”，不能再包含人们的“悲伤”，我们的相互情感和入伍的conatus将驱使我们反抗。伦敦赞同斯宾诺莎的“愤慨”观点，即政治影响在这里发挥作用。欢乐、欲望和激情(如我所说，还有看不见的劳动)在经典意义上被资本占有。伦敦问，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是否可以用来再生产抵抗的主体性，在那里“集体的人类生活再生产自己”，他说，“使个人从属于制度关系的激情有时也可以，重新配置自己以对抗这些相同的关系”(伦敦，2014,138-139)。

专注的压力和一次性被人类生产力的量化、机器般的形象所培养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所强化，并被永久的负债进一步强化，导致一种永久的不足感(Gill 1995)。跟踪和监测技术似乎提供了关于人类能力的客观数据，但这种说法忽略了它们的社会背景。它们只衡量用户，制造了一种错觉，即不稳定的工人——由这些技术所属的情感和社会领域构建——与人类——人类身体能力的定义点——是相同的，而我们应该从这个点开始——一个限制政治和社会可能性的“人性”的外部限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衡量情感、感觉和身体反应，但用新技术在颗粒级上划分和分配工作涉及到对*严格意义*上的情感的捕捉——这是人类行为的社会和心理结构基础

情感反应。这些技术只测量由不稳定情感定义的范围内的方差，提供了一种虚幻的、伪客观的观点，来看待这个范围之外可能发生的事情。

更糟糕的是，对所有生活和工作进行量化的意识形态延续了精神控制身体的形象，因此，从斯宾诺莎的角度来看，它将身体的力量包含在一个主要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主体性(管理自我、量化的生产绩效、神奇的唯意志主义(Magical voluntarism)。巴特勒(2004)的作品《*不稳定的生活*》(Precarious Life)将身体视为包含死亡、脆弱和能动性的(26)。虽然这篇文章本身并不是关于抵抗的，但她承认了共同的“生命的脆弱性”(Lorey 2010)，并呼吁左翼政治旨在围绕我们的肉体和脆弱性定位我们的“平等和普遍权利的规范性义务”(同上)。也许现在是时候让不稳定无产阶级(precariat)认识到自己(我们自己)，认识到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一个不以不安全感为牺牲品，而是建立团结的替代方案，一个不需要单一领导人的政治构成，一个激活的根茎状形成，不需要正统意义上的阶级同一性。

不稳定现在在学术和公共话语中被用来指代被抛弃的工人、弱势群体、那些生活与持续的风险和压力捆绑在一起的人。在国际层面，正在讨论如何在解决针对妇女和男子的暴力行为的基础上形成一项新的劳工公约。在“从不稳定工作到体面工作”-国际劳工组织2011年工人*打击不稳定就业政策法规*研讨会上，工会会员、国际工会联合会、全球工会联合会、工人团体和工会会员齐聚一堂，讨论了“一起占领”运动所指出的不稳定*状况*上升的症状。不断升级的失业和就业不足，以及西方国家的民主危机和经济崩溃。这些会议产生的文件概述了问题，并强调了可行的应对策略，包括如何组织和使工人之间的非正式团结和抵抗成为可能。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工部门，ACTRAV，在2012年组织了*不稳定工作研讨会*，以寻找方法来减轻“世界各地的人们似乎由于经济和金融危机以及政府对这些危机的软弱政策反应而遭受不稳定”这一事实(ACTRAV 2012)。1)这些行动没有预料到的是，零工工作的急剧增加，在许多城市已经无处不在。

21世纪初，我和一群不稳定的数字工作者谈论了他们在曼彻斯特Fab Lab中心的工作经历。新出现的画面是过度劳累和压力，这与创造性和数字劳动自由的主流形象相矛盾:

> 我已经在全职工作中处理了不合理的期望和不可能的管理文化……我希望压力更少，自由更多地从事我想做的事情，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创新”发生的地方。

> 我要处理经常性的过度工作和资金问题。
> 主要的问题是经济衰退，人们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
>
> 玩?目前都是工作。
>
> 临近截止日期的压力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无论人体工程学如何，每天坐12个小时以上对你的健康和姿势都有害。
>
> 我们需要现实的期望。你可以暂时一周工作80个小时，但你必须记住，从长远来看，这对你没有好处。

这些来自IT和创意产业零工的语录揭示了一系列持续反复出现的问题，包括不合理的业绩预期，以及压力(通过激励和能力和必要性的自我概念)。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工作需要灵活性、志愿服务和剩余价值的提取，这意味着一种新兴的自我感知形式使不稳定的零工工人处于“活跃的暂停状态”(Berlant 2011,256)。

## 5. 艰难时期的推回(Pushing Back in Hard Times

### *5.1. 零工工作中的日常抵抗形式*

马格斯·杜赫斯特是CitySprint英国有限公司的当日医疗推车快递员，也是英国独立工人协会主席。我问杜赫斯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五年中，她目睹了哪些变化。杜赫斯特回答说，无论是在快递行业还是外卖行业，手持电脑(XDA/PDA，如Palm Pilots)和应用程序等技术都在不断发展。这些技术将过去发生在纸上的事情数字化，主要用于收集签名，以授权提取和收集包裹。然而，相关设备也允许公司通过GPS实时跟踪所有快递员的活动，并监控每个阶段的收集和交付过程。杜赫斯特说:

> 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数字审计跟踪中被跟踪。这与快递员过去用纸工作，完全依靠使用无线电(Walkie Talkie)接收工作的日子大不相同。现在一切都是数字化的，自由少了很多，控制也多了很多，这意味着我们的“独立性”少了很多，尽管我们的合同上说我们是完全自由和独立的。

我问杜赫斯特，在她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对工人权利的最大威胁是什么。她指出，虚假的独立承包商(IC)/分包商合同在零工经济工作中普遍存在。她告诉我，数字化、自动化和算法管理的兴起已经兴起，并指出“结合起来使用，它们是有毒的，旨在剥夺数百万人的基本权利”。我问她，在她的工作环境中，哪些权利被剥夺了。杜赫斯特回答说:“全都是。唯一能保护我的立法就是《平等法案》了，但那只会保护某些特征，而且无论如何都很难赢。假期工资、国家最低工资、病假工资、养老金、育儿假、裁员、税收和(国民保险)缴款……都通过IC合同被取消了。”

> 马格斯和她的同事们为了应对零工工作所面临的压力，建立了英国独立工人联盟(IWGB)的分支机构。这是我们发现的创造变革最有效的机制——因为它有助于巩固一个支离破碎的社区，并通过集体斗争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力量。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伦敦的三大快递公司赢得了三次20-30%的加薪;CitySprint、Ecourier和Absolutely Couriers。我们还拿下了一家小型应用公司Gophr，但他们最近退出了协议。我们还在四家大型快递公司的法庭上挑战我们的IC地位。我们在8月份的Deliveroo罢工中也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虽然我们没能阻止新的薪酬结构的到来，但我们帮助工人们升级了罢工，创造了大量的积极宣传，帮助人们把零工经济的光明照了出来，暴露了它固有的矛盾——这些显然也存在于快递行业。

我问他们，在组织和改革工作方面还能做些什么，是什么阻止了人们这样做?杜赫斯特指出，组建零工经济工人工会的困难在于，很难接触到不断流动的工人，因为他们的工作分散在大面积地区。杜赫斯特指出，“如果我们不能通过立法迫使公司从一开始就允许工会加入，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工会需要更加努力。”她指出，一个问题是，工会通常持非常消极的态度，这只会阻止行动。杜赫斯特说，她经常听到大工会抱怨反工会立法和缺乏参与，并指责政府为什么他们没有获胜。在她看来，

> [T]这是错误的态度，是不作为的处方，是失败主义者。如果这是一种态度，当然什么也不会发生，当然你也无法说服任何人采取行动。Deliveroo罢工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是自动的:司机们自己动手，

> 我们只是在罢工开始后提供帮助。它暴露了政府、企业和工会的失败!!现在，大人物们慢慢地觉醒了，准备好了，但我怀疑会发生什么。一如既往，我们将依靠工人们自己有勇气采取行动，推动变革，这才是真正的力量所在。

一位名叫英格丽(Ingrid，化名)的仓库工作人员在英国的一个仓库工作了11年，她向我提供了一种新的穿戴式设备的信息，该设备于2016年2月在她的工作场所推出。出乎意料的是，所有仓库车间的工作人员都被要求使用这种手戴式扫描仪。目前的研究人员询问工人们被告知这些设备将用于什么。英格丽德回答说，管理层告诉工人，这些设备将为管理层提供任何错误的信息，以及谁在仓库里犯了错误，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帮助，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然而，英格丽德指出，在实践中，这项技术不仅被用于跟踪个人错误，还被用于跟踪个人的生产力和工作和休息时间。工人被告知，管理层将根据这些数据举行个别磋商，但这并没有发生。相反，在设备实施后的几个月里，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间隔里，工人们被告知，有人将在几天内被解雇，而且设备上的数据是决定解雇谁的决策过程的一部分。然而，英格丽德并不清楚这些数据是如何被解释的，从她的回答中可以看出:

> 最近他们解雇了两三个人，他们是根据谁做得最少来决定的。也许是在5月份，那时工作比较安静。他们解雇了3个人:其中一个很懒，所以我能理解为什么。但另外两个人都很好。裁员前一周，管理层说:“大家要小心，因为我们要从临时员工中解雇一个人。”于是每个人都加快了速度。

英格丽德表示担心数据积累实际上是被操纵的。在一个案例中，她和同事怀疑，在放大监控期间，特定的人被分配了更容易的任务。虽然仓库工作人员被允许加入工会，但英格丽表示，她不是工会的成员，也不知道她的工作场所有任何会员。无论如何，在技术整合之前，没有与相关工会或工人进行过协商。英格丽说:

> 我们意识到，跟踪可能会被用来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更快地工作，也可能被用来解雇员工。但我们很多人觉得，我们已经不在乎了。因为身体上我们已经不能再做了。

### *5.2. 量化工作场所实验与A(e)有效阻力*

从2015年到2016年，荷兰办公室的一组专业工作者进行了一项他们称之为“量化工作场所”项目(以下简称QWP)的实验。多达50名员工可以选择获得FitBit人力资源活动追踪器，最终约有35名员工接受了这项服务。一些员工订购了不同尺寸的手表，但没有到货，这一问题和其他问题最终导致大约25名参与者在项目运行的一年中，在不同的时间点被雇佣。该公司聘请了数据分析师约斯特·普拉特尔(Joost Plattel)，他为参与者设置了个性化的仪表板和RescueTime。参与该项目的志愿者会收到工作日生活日志邮件，要求他们对自己的主观生产力、幸福感和压力进行评分。

采访结果显示，人们对研究问题的回答各不相同。编码类别中增长率最高的是自主性、对指导和支持的渴望以及对隐私的关注。从项目的第3个月到第8个月，人们对QW项目是否对行为改变产生影响的看法下降了48%。虽然在项目开始时，参与者不确定是否需要为个人参与项目设定目标，但到项目结束时，表示设定目标是好事的回应数量增加了27%。到第八个月，员工对项目的不确定感下降了70%。然而，这一结果并没有反映在对项目的投入程度上(见表1)。

重要的是，该项目在变革管理期间运行，因为一家跨国公司吸收了一家较小的公司，该公司曾是一个由房地产和工作设计顾问组成的紧密团体。较小的公司

| Themes | Frequency Interview 1 | % Responses Interview 1 | Frequency Interview 2 | % Responses Interview 2 | % Change between 1 and 2 |
|---|---|---|---|---|---|
| Perceived behaviour change | 7 | 3.43% | 12 | 3.96% | 15% |
| No perceived behaviour change | 5 | 2.45% | 11% | 3.63% | 48% |
| Difficulties in using tech | 13 | 6.37% | 24 | 7.92% | 20% |
| Good to set goals | 9 | 4.41% | 17 | 5.61% | 27% |
| Not important to set goals | 5 | 2.45% | 3 | 0.99% | -60% |
| Goals met | 0 | 0 | 17 | 5.61% | - |
| Stopped using tech | 9 | 4.41% | 20 | 6.60% | 50% |
| Unsure about project | 41 | 20.10% | 18 | 5.94% | -70% |
| Continuous tech use | 8 | 3.92% | 14 | 4.62% | 18% |
| Not continuous tech use | 7 | 3.43% | 18 | 5.94% | 73% |
| Concerns abou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 5 | 2.45% | 2 | 0.66% | -73% |
| Impact on sense of autonomy | 2 | 0.98% | 9 | 2.97% | 203% |
| Positive engagement w project | 25 | 12.25% | 5 | 1.65% | -87% |
| Impact on motivation | 13 | 6.37% | 5 | 1.65% | -74% |
| Desire for competitive element | 2 | 0.98% | 6 | 1.98% | 102% |
| Desire for coaching | 2 | 0.98% | 15 | 4.95% | 405% |
| Impact on workplace relationships | 9 | 4.41% | 34 | 11.22% | 154% |
| Increased self-awareness | 25 | 12.25% | 36 | 11.88% | -3% |
| Effect on subjective productivity | 14 | 6.86% | 16 | 5.28% | -23% |
| Concern for privacy | 3 | 1.47% | 21 | 6.93% | 371% |

**表1:**访谈结果:“量化工作场所”项目。

建议并领导项目。我从负责项目的经理那里得知，这个项目是朝着更敏捷的工作场所迈进的一部分。项目经理表示，他的目的是帮助员工适应灵活的工作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变化是可以预料到的，繁文缛节也会减少，他还想看看员工的自我意识、压力、幸福感和“福利账单”(员工为公司创造的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善。在过渡期间受到了影响(2015年10月5日采访)。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期望员工通过使用高强度的调查设备，变得更健康、更快乐、更有效率，从而改变自己的情感和身体方面。该公司对比较主观和客观衡量的生产力很感兴趣，这与健康、活动跟踪和“可计费性”有关。我没有获得该公司收集的有关改善活动是否会提高生产率和可计费性的数据。然而，这个项目确实符合公司在任何地方工作的趋势，在一个类似零工的场景中，这在项目合并到位的时候是鼓励的，也导致了团队合作的增加;以及效率的提升。此外，合并对所有在小公司工作过的人来说都是一个重大变化，因为QWP的所有参与者都在小公司工作。因此，他们的变化经验和情感劳动是通过QWP实施的过程来衡量的。在公司进行合并和收购过程中，员工被期望管理任何情绪或情感影响。我对参与者的采访表明，由于对隐私的担忧、对数字设备有效性的担忧以及对此类项目所产生的企业监控的担忧，他们出现了退出项目的抵制行为。

第一批访谈中的回应显示出对FitBIt读数有效性的怀疑，以及对更多设备智能的渴望:

> 对我和其他一些人来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FitBit有多可靠。
> [⋯]这个东西[FitBit]可能比记录我的数据更智能。

在第二次采访中，一位受访者表示很沮丧:

> 我没有得到任何答案，我只是把我的东西填进去，但是我没有得到好不好的答案，我只是想知道我(做得)好不好，然后就开始工作。

第一批采访中的一条评论表明，员工最初认为会有更多的“关于隐私的抱怨”。然而，在最初的采访中，只有3条评论表示担心管理部门正在查看个人数据，尽管在最后的采访中这一数字增加到21条。大多数评论

与会者对企业的隐私做法持谨慎态度。在第一次调查中，66%的人同意“消费者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公司如何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的控制权”;62%的人不同意“大多数企业以适当和保密的方式处理他们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43%的人不同意“现有的法律和组织实践为当今的消费者隐私提供了合理的保护水平”。
对于“你对量化工作场所项目的看法发生了什么变化?”的回答是,

> 我对这个项目仍然(有)甚至更多的怀疑。而且我也不经常戴Fitbit。当我戴它的时候，是为了我自己，看看我有多活跃。几个月来，我一直在观察自己的职场行为，发现并没有太大变化。这证实了我一开始的想法。最好是根据自己的感受来改变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手段。
>
> 我并没有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九名受访者表示，在头两个月，他们要么放弃了一段时间，要么完全放弃了FitBit。一些人几乎整个项目都在使用FitBit，而另一些人使用不到一个月或偶尔使用。在整个项目中，FitBit的使用显著减少，这可以从所有员工记录的每月平均步数中反映出来。前三个月内记录的平均步数下降了30%，六个月内下降了50%，到最后下降了75%。这些结果表明了对QWP的明确抵制，并对这种在敏捷期管理情感和情绪劳动的项目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 6. 结论

数字化的工作将身体和思想结合在心灵的标志下，作为管理(精神)控制的技术，Rose(2001)称之为“生活本身的政治”。然而，困难在于，这种政治并不像福特主义或中世纪主义那样与“生活本身”对话。它所谈论的是一种特定的*定量的*、空间的生活*再现*。哈特和内格里(2000)强调赋权，说明了后福特主义气候中的情感和非物质劳动为抵抗和形成社区提供了可能性。管理策略中对情感的强调可以看作是与劳动控制和社会再生产联系在一起的(Hartmann 2002, 引自Carls 2007, 46)。作为一种抵抗的工具，情感在这个系统中作为一种结构发挥作用，它使我们的行动能力(通过身体)得以实现或失效。我们可以对比工具性关系和表现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是指身体被精神“利用”以追求理性目标，表现性关系是指身体或情感力量通过精神在世界上表达自己。数字化的工作

情境发生在工人、客户和往往是无形的管理形式之间一种高度工具化的关系中。

最后，我评估了数字化工作中情感抵抗的可能性。情感是“行动的力量，它是单一的，同时也是普遍的”(内格里1999,85)。这预示并启发了德勒兹对情感或力量的主动形式和被动形式的区分。情感劳动是在情绪表达之前发生的内部工作，既涉及可能导致抵抗的潜意识劳动力的可能性，也涉及潜意识情感自我压抑的可能性。它与工作的生物学方面有关，即:

> 劳动直接作用于情感;它生产主体性，它生产社会，它生产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情感劳动是本体论的——它揭示了构成一种生命形式的活劳动……(哈特1999,99)

对于斯宾诺莎来说，情感是一个强烈的具身的概念，它指的是身体相互影响并共同产生社会生活的积极方式(并不总是以有意识的方式)。情感的完全积极实现意味着“行动的力量”被制定，团结是非物质的，也变得有意识和有形。因此，情感超越了直接意识到的东西。出于这个原因，情感抵抗是对工作场所操作系统的严重威胁，例如零工工作环境中的接口管理。简而言之，情感团结将导致最难停止的抵抗形式，因为，类似于渗透到生活各个方面的技术控制的侵入性管理技术，影响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Simondon(1958/1980)通过描述技术对象在个性化时具有无限可能的用途，将跨个性作为与解放的联系进行了讨论，但他指出，它们的汇合是它们有用并成为一个系统的点。他以“量身定做”的汽车为例，指出只有非必要的部件是偶然的，并且“与技术存在的本质相抵触，就像从外部强加的死物”(18)。西蒙东为人类作为技术的组织者辩护，指出自动化从来都不是完美的，也不是完整的，总是包含着“一定的不确定性”(4)。他说，“远不是一群奴隶的监督者，人是技术对象的永久组织者，这些技术对象需要他，就像管弦乐队的音乐家需要指挥一样”(4)。以类似的方式，人们可以认识到他们的个体存在，而不会变得原子化或充满敌意，并认识到，正是我们的相互关系增强了我们的力量，防止我们放弃人性，把人性委托给机器人(2)。马克思在他的一生中观察到，早期工业化是如何把活劳动变成机器的一个活生生的附属品，作为机器行动的手段，也把劳动过程的物质性质作为资本实现过程的一个简单环节来加以吸收”(马克思1858/1993,693)。他补充说:“(机械)知识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和“外在的”，工人在这里是“多余的”(括号)

增加)(1858/1993,605)。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确定了劳动过程中的机器，并描述了机器量化、抽象和分工的能力;他评论说，“工人的活动，被简化为一种单纯的抽象活动，是由机器的运动而不是相反的，从各个方面决定和调节的”(1858/1993,693)。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将能动性甚至权威与机器等同起来，在机器中，“物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对抗，作为统治它的力量;一种权力，作为对活劳动的占有，是资本的形式”(1858/1993,693)。马克思写道，劳动资料被机器改造、控制和吸收。很有可能，工人们开始抵制传统的管理形式和机器本身(见Moore 2017)。

数字化工作，在敏捷性和不稳定性的当代背景下，最终证明了机器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生命本身的秩序”的象征(Merchant 1999,227)，它加速了劳动过程，使其走向可能忍受的悬崖边缘，并将工人拖到了一起。工人对零工工作的数字化方面的反应，以及他们对这里概述的量化工作场所公司主导的项目的明确脱离，表明了对围绕新控制机制的紧张关系的认识，当代劳动过程中持续的斗争，其中敏捷性是一个关键模因，以及对终身管理策略进行审查的迫切需要。这一章探讨了在哪里以及如何出现对这个勇敢的终身工作新世界的抵制，在这个新世界中，对看不见的劳动的监控和跟踪可能无处不在。未来的研究必须着眼于这给工人带来的风险，以及在量化的工作场所中出现的针对调节和控制方法的抵抗形式。

## 注释

[1]本章的一个版本已发表在Adam Fishwick和Heather Connolly(2018)的《*紧缩与工人阶级抵抗:艰难时期的生存、破坏和创造*》(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8)中。

[2]在测试克劳德·香农和爱德华·o·索普在麻省理工发明和设计的第一台可穿戴计算机时发表的评论，用于赌场轮盘赌(索普1998)。

[3]数据来源: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8/apr/23/numberof-zero-hours-contracts-in-uk-rose-by-100000-in-2017-ons

[4] Lukasz Piwek为本项目提供数据分析支持。

## 参考文献

ACTRAV. 2012. *From Precarious Work to Decent Work. Outcome Document to the Workers' Symposium on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o Combat Precarious*

*Employment.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 Bureau for Workers' Activi- ties*. Available at: http://www. ilo. org/wcmsp5/groups/public/@ed_dialogue/@actrav/documents/ meetingdocument/wcms_179787.pdf (accessed 14 May 14 2018)

Adorno, Theodor W. 1983. '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 In *Prisms*, 17–34. Cambridge, MA: MIT Press.

Adorno, Theodor W. 2005. *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on a Damaged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AFL-CIO. 2016. *Our Principles on the On-Demand Economy*. Available at: https://aflcio.org/ our-principles-demand-economy (accessed 14 May 2018)

Akhtar, Pav and Phoebe Moore. 2016. 'The Psycho-Social Impact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Workplaces and Trade Union Respon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bour Research* 8 (1–2): 102–31.

Beller, Jonathan. 1998. 'Capital/Cinema.' In *Deleuze and Guattari*: *New Map- pings in Politics, Philosophy and Culture*, eds. Eleanor Kaufman and Kevin Jon Heller. 76–95.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erardi, Franco 'Bifo'. 2009. *Precarious Rhapsody*. New York: Minor -Composition. Berlant, Lauren. 2011. *Cruel Optimism*. USA: Duke University.

Blackman, Lisa and Couze Venn. 2010. *Affect*, special issue*: Body & Society* 16 (1).

Bogard, William. 2010. 'Digital Resisto(e)rs.' *Code Drift: Essays in Critical -Digital Studies* cds012. Available at: http://ctheory.net/ctheory_wp/digital-resistoers/ (accessed 14 May 2018)

Brook, Paul. 2013. 'Emotional Labour and the Living Personality at Work: Labour Power, Materialist Subjectivity and the Dialogical Self.'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19(4).

Brook, Paul. 2009. 'The Alienated Heart: Hochschild's Emotional Labour Thesis and the Anti-Capitalist Politics of Alienation.' *Capital and Class* 33 (2): 7–31.

Brophy, Enda and Greig de Peuter. 2007. 'Immaterial Labor, Precarity and Recomposition.' In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ds. Catherine McKercher and Vincent Mosco. Lanham, MD: Lexington.

Butler, Judith. 2004.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London: Verso.

Cederström, Carl and André Spicer. 2015. *The Wellness Syndrome*. Cam-bridge: Polity.

Cherry, Miriam A. (2011) 'A Taxonomy of Virtual Work', 45 GA. L. REV. 951, 962–69.

Clough, Patricia. 2007. 'Introduction'. In *The Affective Turn: Theorising the Social*.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pp. 1–33.

Dalla Costa, Mariarosa and Selma James. 1972.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Community*. Brooklyn, NY: Petroleuse Press.

Davies, William. 2016. *The Happiness Industry: How the Government and Big Business Sold Us Well-Being*. London: Verso Books.

Dowling, Emma. 2016. 'Valorised but Not Valued: Affective Remuneration,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Politics Beyond the Crisis.' *British Poli- tics* 11 (4): 452–68.

Dowling, Emma. 2007. 'Producing the Dining Experience: Measure Subjectiv-ity and the Affective Worker.' *Ephemera* 7 (1): 117–32.

Ducey, Ariel. 2007. 'More Than a Job: Meaning, Affect, and Training Health Care Workers.' In *The Affective Turn: Theorizing the Social*, eds. Patricia Clough and Jean Halle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87–208.

Federici, Silvia. 2008. 'Precarious Labour: A Feminist Viewpoint.' *In the - Middle of A Whirlwind*. Available at: https://inthemiddleofthewhirlwind. wordpress.com/precarious-labor-a-feminist-viewpoint/ (accessed 14 May 2018).

Federici, Silvia. 2004. *Caliban and the Witch: Women, the Body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 New York: Autonomedia.

Firth, Rhiannon. 2016. 'Somatic Pedagogies: Critiquing and Resisting the Affective Discourse of the Neoliberal State from an Embodied Anarchist Perspective.' *Ephemera* 16(4): 121–142.

Fisher, Mark. 2014. *Ghosts of My Life: Writings on Depression, Hauntology and Lost Futures* London: Verso Books.

Fishwick, Adam. 2015. 'Paternalism, Taylorism, Socialism: The Battle for Pro-duction in the Chilean Textile Industry, 1930–1970.' In *Hand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duction*, ed. Kees van der Pijl, 211–28. London: Edward Elgar.

Fleming, Peter. 2015. *Resisting Work: The Corporatization of Life and is Discon- tents*.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Frassanito Network. 2005. 'Precarious, Precarization, Precariat?' Available at: http://www. metamute. org/editorial/articles/precarious-precarisation-precariat (accessed 14 May 2018)

Frey, C. and Osborne, M. 2013.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 (Oxford Martin School, University of Oxford). Available at: https://www.oxfordmartin.ox.ac.uk/downloads/-academic/The_Future_of_Employment.pdf

Gerbaudo, Paolo. 2012 *Tweets and the Streets: Social Media and Contemporary Activism.* London: Pluto Press.

Gill, Stephen. 1995. 'The Global Panopticon? The Neo-Liberal State, Economic Life and Democratic Surveillance.'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20 (1): 1–49.

Gregg, Melissa. 2010. 'On Friday Night Drinks: Workplace Affects in the Age of the Cubicle.' In *The Affect Theory Reader*, eds. Melissa Gregg and Gregory J. Seigworth, 250–268.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Haider, Asad and Salar Mohandesi. eds. 2015. Social Reproduction special issue. *Viewpoint Magazine* 5.

Hardt, Michael. 1999. 'Affective Labour.' *boundary 2* 26 (2): 89–100.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tmann, Heidi. 1979. 'Capitalism, Patriarchy and Job Segregation by Sex.' *Signs* 1 (3): 137–69.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2012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uws, Ursula. 2015. 'Online Labour Exchanges, or "Crowdsourcing": Implica-tions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European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gency.

Jarrett, Kylie. 2015a. 'Devaluing Binaries: Marxist Feminism and the Values of Consumer Labour.' In *Reconsidering Value and Labour in the Digital Age*, eds. Christian Fuchs and Eran Fisher, 207–23. New York: Springer.

Jarrett, Kylie. 2015b. *Feminism Labour and Digital Media: The Digital House- wife*. Abingdon: Routledge.

Karatzogianni, Athina. 2015. *Firebrand Waves of Digital Activism 1994–2014: The Rise and Spread of Hacktivism and Cyberconflic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Kofman, Eleonore and Parvati Raghuram. 2015. *Gendered Migrations and Global Social Reproduc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Lordon, Frédéric. 2014. *Willing Slaves of Capital: Spinoza and Marx on Desire*. London, New York: Verso.

Lorey, Isabell. 2010. 'Becoming Common: Precarization as Political Consti-tuting.' *e-flux*, 17 (June). Available at: http://www. e-flux. com/journal/17/67385/becoming-common-precarization-as-political-constituting/ (accessed 14 May 2018)

Lorusso, Silvio. 2017. 'A Hauntology of Precarity'.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Enteprecariat.* 21 Feb. Available at: http://networkcultures. org/entreprecariat/a-hauntology-of-precarity/ (accessed 14 May 2018)

Marx, Karl. 1858/1993. 'Fragment on Machines.' In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lated and with a foreword by Martin Nicolau. London: Penguin Books.

Merchant, Carolyn. 1990.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 tific Revolution.* London: HarperCollins.

Moore, Phoebe. 2017. *The Quantified Self at Work, in Precarity: Work, Technol- ogy and What Counts.* London: Routledge.

Moore, Phoebe. 2015. 'Tracking Bodies, the Quantified Self and the Corporeal Turn.'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duction*, ed. Kees van der Pijl, 394–408.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Moore, Phoebe and Andrew Robinson. 2016. 'The Quantified Self: What Counts in the Neoliberal Workplace.' *New Media & Society* 18 (11): 2774–92.

Massumi, Brian. 2002.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Mitropoulos, A. 2006. 'Precari-Us?' *Mute* 29: 88–92. Available at: http://www. metamute.org/editorial/articles/precari-us (accessed 14 May 2018)

Negri, Antonio. 1999. 'Value and Affect.' Translated by Michael Hardt. *boundary 2* 26 (2): 77–88.

Neilson, Brett and Ned Rossiter. 2005. 'From Precarity to Precariousness and Back Again: Labour, Life and Unstable Networks.' *The Fibreculture*

*Journal* FCJ-022(5): np. Available at: http://five.fibreculturejournal.org/fcj-022-from-precarity-to-precariousness-and-back-again-labour-life-and-unstable-networks/ (accessed 14 May 2018)

Psychology Tools. 2017. *Affect Regulation/Emotion Regulation* Available at: https://psychologytools.com/technique-affect-regulation.html (accessed 14 May 2018)

Rose, Nikolas. 2001. 'The Politics of Life Itself'.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8 (6): 1–30.

Ross, Andrew. 2008. 'The New Geography of Work. Power to the Precarious?' In *The Precarious Labour in the Field of Art* 5(16/13) 25 (7–8): 31–49. Oncu-rating.org. Available at: www.e-flux.com/wp-content/uploads/2013/05/ Ross_Precarity.pdf (accessed 14 May 2018)

Sanchez, Luis M. and Rakesh Nagi. 2010. 'A Review of Agile Manufacturing Syst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Research* 39 (16): 3561–600.

Sayer, Andrew. 2005. 'Class, Moral Worth and Recognition.' *Sociology* 29 (5): 957–63.

Shukaitis, Stevphen. 2006. 'Whose Precarity is it Anyway?' *Fifth Estate* 41 (3). Available at: https://www.fifthestate.org/archive/374-winter-2007/whose-precarity-is-it-anyway/ (accessed 14 May 2018)

Simondon, Gilbert. 1958/1980.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Translated by Ninian Mellamphy. Ontario: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Smith, Gavin J. D. 2016. 'Surveillance Data and Embodiment: On the Work of Being Watched.' *Body and Society* 22 (2): 108–39.

Standing, Guy. 2011.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Virno, Paolo. 2004. *The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New York: Semiotext(e). Avail-able at: http://www.generation-online.org/c/fcmultitude3.htm (accessed 14 May 2018)

Weeks, Kathi. 2011. *The Problem with Work: Feminism Marxism Antiwork - Politics and Postwork Imaginar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第十一章

# 超越压抑:对菲比摩尔章节的反思

Elisabetta Brighi

UK政府最近委托撰写了一份调查工作幸福感问题的报告，特别是精神疾病对UK经济的影响。这份名为《职场繁荣》的报告由HBOS保险公司前董事长和心理健康慈善机构Mind的首席执行官撰写，报告估计，UK企业每年因心理健康问题付出的成本为990亿英镑，并表示每年有30万人因心理健康问题而失业(*《卫报》*2017年)。尽管该报告内容丰富且广受欢迎，但令人遗憾的是，该报告因缺乏对现在公认的紧急问题的批判性参与而脱颖而出。首先，该报告依赖于对精神卫生的概念化，狭隘地关注其经济“成本”，而不是其对人类、社会和政治的影响。其次，该报告没有调查精神健康问题、工作环境和更广泛的社会(包括其主导的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该报告的建议可以归结为众所周知的短期权宜之计:为员工提供弹性方面的电子学习模块，并为雇主加强对员工心理健康和福祉的监控。并讨论了情感和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Brighi, E. 2019. Beyond Repression: Reflections on Phoebe Moore’s Chapter.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145–150.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I: https://doi.org/10.16997/book29.k. License: CC‐BY‐NC‐ND 4.0

超越苍白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以及适当地隐藏在“数据”烟幕后面的异化的影响，解决方案仍然是一样的——将责任直接转移到个人身上，并将常态病态化。

菲比·摩尔的这一章及时介入了关于情感和平台资本主义的日益重要的讨论。以安东尼奥·内格里的论断为出发点，即在全球化的、后现代的生产方式中，影响已经获得了“基本的生产资格”，因此“必须得到控制”(内格里1999,86,87)，摩尔研究了平台资本主义的情感维度，并描绘了技术是如何实现这种控制的。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观是，生产力的禁令完全占据了情感和情感领域，使健康成为另一个表现维度，就像生活成为工作的另一个维度一样。“零工”平台经济的数字化工作场所使工人的生活不稳定，他们的生活被移动性、灵活性和弹性的必要性所破坏，而劳动力的技术管理则无情地监控、跟踪、衡量和制裁工人。正如摩尔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不稳定性因此成为最纯粹的异化形式。

关于情感和平台资本主义的文献广泛研究了情感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被动员和货币化的方式(Hardt 1999, Blackman and Venn 2010, Massumi 2015, Ilouz 2017)。这里涉及到两个趋同的问题:第一，情感似乎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真正货币;第二，是资本似乎已经完全占领了情感、心理和个人领域，即情感领域。摩尔借鉴了广泛的文献，并通过关注“终身工作”的特殊形式，即“需求经济”中的零工，为其做出了贡献。在这里，情感既是工作的核心，又受到工作的强烈调节。在零工工作中，工人生活中最亲密的方面，包括性格、情感和心理特征，立即被询问、货币化和监管。新自由主义对恢复力的要求意味着，工人必须不断地从他们的心理和情感资源中汲取资源，才能在一种不仅不确定、竞争激烈，而且经常以情感为代价的环境中取得成功(Neocleous 2012, 2013)。另一方面，今天的技术为雇主提供了控制和调节工人情感领域的能力，激励对资本主义劳动关系再生产起作用的情绪(Atkinson 2015, Ahmed 2010)。摩尔的这一章从理论上和经验上充分说明了这两点。

也许还需要更详细地分析的是，资本主义对工人生活的影响，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群体或阶级。在这方面，有机会更多地参与那些文献，从社会和临床心理学到精神分析，这些文献关注社会结构和“情感结构”之间，社会和经济条件与个人之间的密切对应关系

心理和情感层面。然而，如果任何解放计划要取得成功，更清楚地理解异化的情感轮廓是至关重要的。

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治疗师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在心理上的邪恶本质体现在平台资本主义中(Davies 2017, Tweedy 2016, Wilkinson and Pickett 2010)。正如保罗·韦尔哈格(Paul Verhaeghe)最近所说，随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主导着新自由主义的工作场所，劳动力不断受到监控、跟踪和评估，工人被剥夺了任何自主性、控制、独立和最终意义(2014a)。这种极度依赖的抑郁状态与极度客观化的狂躁态度共存，从而产生了许多撕裂性的自我认知:一方面，信仰自己最终要独立地为自己的成功或失败负责;另一方面，信仰自己是可以抛弃的，无足轻重的，完全依赖的。前者强化了关于支配、控制和生产自我(包括其影响)的自恋和惩罚性幻想;后者则加剧了异化、遗弃和冷漠。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工作场所创造了一个无法容纳我们最糟糕的恐惧和本能的社会环境——事实上，它加剧了这些特征，使它们相互对立，同时系统性地阻碍了社会互动的修复、创造和实现潜力(韦尔哈格 2014b)。德勒兹和瓜塔里(1972/2004)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了精神分裂人格，而☒i☒ek(2009)后来将资本主义与变态等同起来。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会转化为一种双相情感障碍的流行——或者，实际上，精神错乱，以及与之相关的分裂、投射和偏执倾向(Bell 2006, 2016)。摩尔在写“零工经济”的工作场所中，情绪受到调节的程度时，顺便提到了这些精神分析动力学:

> 除了肉体上的，情感上的零工劳动者不会利用自己的情感能力从事创造性的生产。他们从事的是一种*情感压抑*，通过这种压抑，所要求的从属表演侵蚀了他们自己的身心和身体健康。[斜体]

然而，由于它们的复杂性，在新自由主义工作场所中旋转的情感、心理和情感动态超出了相对简单的压抑过程，无法在这一类别中耗尽。如果压抑是唯一真正起作用的心理机制，那么当前的状况就不会如此自我撕裂——超越它的可能性也就不那么难以想象了。

这就引出了摩尔这一章探讨的第二个重要主题，这个主题也需要进一步分析。这是情感抵抗的主题，也是构建一个能够超越平台资本主义的解放工程的主题。在这里，摩尔再次引用了迈克尔·哈特(1999)和

安东尼奥·内格里，以及斯宾诺莎，提出了“情感和非物质劳动”提供“抵抗、集体主体性和社区形成的可能性”的论点。事实上，摩尔认为，“情感团结”导致了“最难阻止的抵抗形式，因为情感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情感抵抗是对工作场所运作系统的严重威胁”——这当然解释了新自由主义控制它的决心。摩尔提出的材料当然是重要的——在这一章中有许多例子，工人行使他们的权力，通过退出项目来抵制新自由主义技术越来越多的侵入性影响，因为担心隐私和/或公司监控，或者将追踪技术所产生的不对称倒置，从而拥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控制权。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例子都不足以让人联想到“真正的替代方案”。正如摩尔所说，如果目标是“一种不以不安全感为牺牲品，而是建立团结的选择，一种不需要单一领导人的政治构成，一种激活的根茎状形成，不需要正统意义上的阶级同一性”，那么所提供的数据就到此为止了。这不是一个数量或临界质量的问题，而是一个质量问题，它指向了一个问题，即除了镇压问题之外，情感抵抗中真正利害攸关的可能是什么。

根据内格里(2017)的说法，在全球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斗争将永远是出走和遗弃的结合。”脱离指挥和超越指挥的逃亡”。但从情感的角度来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情感上抛弃新自由主义的工作场所，从心理上拒绝它的指挥，这意味着什么?在平台资本主义中，政治地感受和行动又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异化和压迫的词汇并没有深入到新自由主义的情感纠缠中，从而允许解放项目的建设。摩尔写道:“为了在数字化工人中充分团结起来，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意识是必要的。”然而，她也意识到，今天的离心力可能会瓦解任何“阶级”的概念。

资本主义对情感的攫取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它完成了社会原子化的过程:它使异化臻于完美。正因为如此，它不仅把阶级意识的可能性，而且把个人意识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事实上，它积极地以歪曲、操纵、控制和调节意识为目标。今天，抛弃和拒绝资本主义指挥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地在这个战场上，在这种极端个体化的层面上发挥出来，并归结为各种各样的辨别。反对野蛮的新自由主义将“关心自我”的概念转变为一种纯粹的商品化和自利的抑郁，享乐主义积累的版本，替代方案可能通过非奴性的技巧的表达展开(Virno 1996,200)，意识到我们与他人的纠葛的自我意识;拒绝通过利用不安全感将不必要的焦虑感投射到脆弱的他人身上;

这揭开了自主性和独立的错觉的神秘面纱，揭示了其虐待狂和暴力的含义;拒绝把自己和他人当作商品来对待;相信人类有创造、生活、关爱和治愈的能力。

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 1996)在《出埃及记》(Political Theory of* Exodus)一书中，称赞放纵是一种主要的美德，而不是大小便失禁。根据维尔诺的说法，失禁是一种粗俗的任性和对法律的无视，它闯入公共领域，目的是夺取其制度和权力——在多年的压抑之后，症状猛烈地爆发到意识中，这与这种破坏性是一样的。维尔诺认为，另一方面，放纵“不是对法律的无知”，也不仅仅是反对它——相反，它在道德和政治基础上“诋毁它”，并且“以智力和政治行动之间系统互连的名义”(维尔诺1996,199)。因此，其目的不是推翻国家，也不是夺取它的制度，而是要维护积极的特权、生活形式和“友谊”的“作品”，这些都是在途中取得和征服的，并非没有斗争。鉴于当代劳动关系的原子化，我认为，阶级意识的发展取决于个人意识的发展，而个人意识的发展反过来*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情感*。任务可能仍然是教育群众，但今天的起点可能是一种“情感教育”——即关于解放和自我破坏的教育——在新自由主义的工作场所中动员起来的影响。

## 参考文献

Ahmed, Sara. 2010. *The Promise of Happines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Atkinson, Paul. 2015. ‘Happiness and the Capture of Subjectivity.’ *Self and Soci- ety* 44(4): 394–401.

Bell, David. 2006. ‘Primitive Mind of State.’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10 (1): 45–57.

Bell, David. 2016. ‘Neo-Liberalism is Dangerous for your Mental Health.’ *Frontier Psychoanalyst.* Radio broadcast. Available at: https://www. mixcloud. com/Resonance/frontier-psychoanalyst-25th-january-2016/ (accessed 14 May, 2018)

Blackman, Lisa and Couze Venn. 2010. *Affect*, special issue: *Body & Society* 16 (1). Davies, James (ed. ). 2017. *The Sedated Societ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1972/2004.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Continuum.

Hardt, Michael. 1999. ‘Affective Labor.’ *boundary 2* 26 (2): 89–100.

Illouz, Eva. 2017. *Emotions as Commodities: Capitalism, Consumption and Authenticity*. Abingdon: Routledge.

Massumi, Brian. 2015.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Negri, Antonio. 1999. ‘Value and Affect.’ Translated by Michael Hardt. *bound-*

*ary 2*, 26(2): 77–88.

Negri, Antonio. 2017. 'Post-operaismo o operaismo?'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5 April. Available at: http://www.euronomade.info/?p=9189 (accessed 14 May 2018)

Neocleous, Mark. 2012. '"Don't Be Scared, Be Prepared": Trauma-Anxiety-Resilience.'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37(3): 188–98.

Neocleous, Mark. 2013. 'Resisting Resilience.' *Radical Philosophy* 178: 2–7.

Siddique, Haroon. 2017.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re Forcing Thousands in UK Out of Work –Report.' *The Guardian*, 26 October.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7/oct/26/thriving-work-report-uk-mental-health-problems-forcing-thousands-out (accessed 14 May 2018)

Tweedy, Rod, ed. 2016. *The Political Self: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Context for Mental Illness.* London: Karnac Books.

Verhaeghe, Paul. 2014a. *What About Me? The Struggle for Identity in a Market-Based Society*. London: Scribe Publications.

Verhaeghe, Paul. 2014b. 'Neoliberalism has Brought out the Worst in Us.' *The Guardian*, 29 September.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4/sep/29/neoliberalism-economic-system-ethics-personality-psychopathicsthic (accessed 14 May 2018)

Virno, Paulo. 1996. 'Virtuosity and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Exo-dus.' In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eds. Pau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Wilkinson, Iain. 2001. *Anxiety in a 'Risk'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Wilkinson, Richard and Kate Pickett. 2010. *The Spirit Level: Why Equality is Better for Everyone.* London: Penguin Books.

☒i☒ek, Slavoj. 2009. *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London: Verso.

第十二章

# 再见孤岛奴隶:通过数字对象制作替代主题

邱林川

## 1. 简介

自从“数字革命”到来以来，我们一直被反复提醒着技术对象的解放力量。苹果公司标志性的“1984”广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展示了他们的新麦金塔电脑可以将人类的主体性从“老大哥”的暴政中解放出来。然而，30多年后的2017年，当iPhone迎来十岁生日时，我们回首往事，看到的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画面:智能手机等数字产品不仅未能实现其解放的承诺(邱林川 2016a)，反而创造了新的奴役条件，以至于我认为废除数字奴隶制或奴隶制是一项势在必行的责任，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承担。

关键词“孤岛奴隶”最初是2010年香港和瑞士劳工活动家在一场跨国运动中发明的口号(见图4)，我在2016年的《*再见孤岛奴隶:数字废除宣言*》一书中*对*其进行了提炼和充实。因此，这本书的标题是对那些在数字劳工运动前线工作的人的致敬，对他们的勇敢和创造力的致敬。这本书的副标题包含了“宣言”这个词，这意味深长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Qiu, J. L. 2019. Goodbye iSlave: Making Alternative -Subjects Through Digital Objects.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151–164.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I: https://doi.org/10.16997/book29.l. License: CC‐BY‐NC‐ND 4.0

比我开始写这本书时的想法更大胆。然而，我认为它非常符合我的目标，因为我希望提出两个挑衅:第一，数字媒体对世界和人类造成的伤害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要意识到的要大得多;第二，我们能够而且必须使用同样的技术对象来抵制和废除新旧的奴役模式，重获人类的尊严，创造后资本主义时代的新主体性。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首先讨论如何定义21世纪的奴隶制，并将其应用于从装配线到数据矿井的数字资本主义条件。然后，我将简要介绍两种基本的奴役模式:一种是“制造奴役”或生产模式奴役，例如富士康的中国移民工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商，以其臭名昭著的血汗工厂条件而闻名，可以说，这与跨大西洋三角贸易相当。第二种模式是“制造”或消费模式的奴役，比如Facebook的免费劳动力和沉迷于数字设备的人。第2部分将重点关注通过集体抵抗、创意模因和纠察线上的社交媒体来进行反奴隶制斗争和数字废除的开放(Qiu 2016b)，这些可以在中国的工厂区和网上大量观察到。我的目标不仅是批评现状，也是照亮我们集体数字未来的希望。

但请允许我坦率地承认:我使用苹果产品已经超过30年了。我和碰巧读到这篇文章的每一位电子产品消费者一样，对自己即将批评的产品感到自满。坦率地说，到达奴隶制的主题标志着我在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旅程中的一个点。然而，我现在提出这个不太可能的想法，是因为我看到了将奴隶制与数字事物联系起来的巨大效用。对我来说，奴隶制不仅仅是一种过去的状况，也不仅仅是对当代现实的一种挑衅的隐喻。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比较方法，将我们对数字媒体和劳工、中国和世界的思考重新历史化。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我恰好掌握了自2010年以来在富士康(Foxconn)工作中获得的太多分散的实证观察结果，为此我需要一个更大、更连贯的分析框架，也因为对中国数字媒体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方法论民族主义或中国例外论的影响。但是，在一个比较奴隶制的框架下，我们可以将中国与世界历史重新联系起来，将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斗争重建为一个连续的、*漫长的斗争*过程。这种概念上的扩大可以成为理论上的突破。毕竟，奴隶制是关于将人类主体缩减为非人的客体，是一种物化和异化的终极形式，这个过程总是伴随着抵抗、反抗和主体性的再制造。

## 2. 概念化奴隶制(conceptualizing Slavery

借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法律研究的学术知识，我构建了一个概念框架，如图1所示，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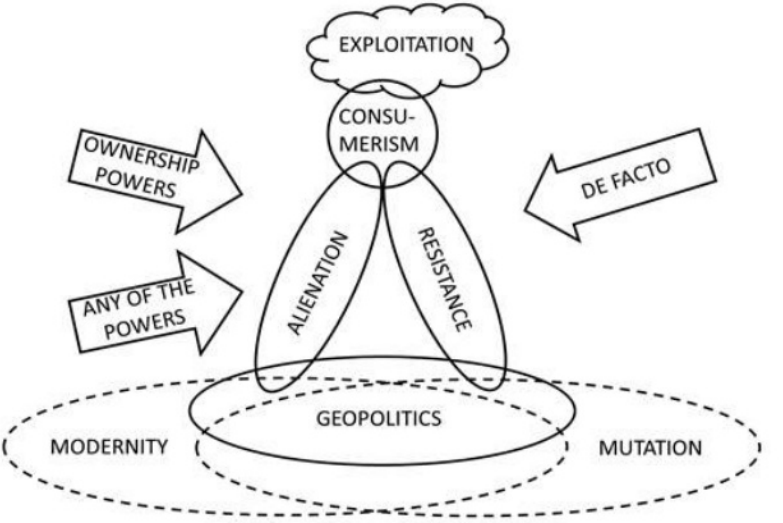



**图1:**阐述奴隶制定义方式的概念框架。

定义现代的奴隶制。图中显示，奴隶制的深层基础有两个，一个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另一个是奴隶政权随时间变异的能力。奴隶制具有惊人的韧性。随着资本主义呈现出新的形式，它也发生了变化(布莱克本，1997)。站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流沙上，奴隶制的直接和有形的基础是地缘政治，我指的是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综合体，它在海洋和大陆上扩张，现在进入了网络空间、智能设备和大数据的新世界。

奴隶制有两大支柱，其中之一是异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 1982, 7)所说的“先天异化”。另一个支柱是被奴役者的反抗，他们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我们重新想象一个更好的数字经济和一个更人道的世界。虽然传统智慧通常只关注压抑的奴隶政权和疏远的奴役经历，但重要的是要强调，在过去或现在的奴隶制条件下，奴隶抵抗一直是社会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Linebaugh和雷迪克 2013;雷迪克 2007)。

奴隶制的最终目的是在不正常的劳资关系条件下剥削被奴役者的身体或身体部位(Fuchs 2014)。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异化劳动的剩余价值必须从消费的过程中提取出来，消费主义的霸权文化占主导地位——这些文化现在被编码在企业算法中，这是通过操纵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奴役的最新工具。

最后，借鉴法律学术，特别是2012年《贝拉吉-哈佛关于奴隶制法律参数的指南》，我将奴役定义为*事实*

条件而*不是法律*地位。如果发现存在任何“附属于所有权的权力”——例如占有、转让或处置——那么这足以表明“类似于奴隶制的制度或做法”(Allen 2014, 213,220)。

我将提出，第一个全球性的现代奴隶制制度是17世纪的跨大西洋体系。虽然在16世纪就有非洲人被贩卖到加勒比地区，但直到17世纪，以糖为中心的种族结构、生产方式和跨大陆贸易才稳定下来。这种制度在18世纪急剧扩张，直到19世纪消亡，例如，1807年的《奴隶贸易法案》(Slave Trade Act)终结了大英帝国，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了美国。

但是，奴隶制在21世纪仍然存在。自2000年以来，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和澳大利亚高等法院都曾利用奴隶制指控成功起诉过前民兵和帮派成员。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两个法院都承认刑事犯罪构成了奴隶制，尽管这一术语通常在历史上适用，因为它们考虑了图1所总结的*事实*条件。问题是:我们能否将这种对现代奴隶制的理解框架进一步扩展到数字媒体和智能手机的世界中?

一些概念上的澄清是有序的。首先，我在这里批判的奴隶制类型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奴隶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理解为发生在封建主义之前的一种古老的生产方式。就其目前的形态而言，21世纪的奴隶制是一种技术-社会的新奇事物。换句话说，目前这种形式的奴隶制以前从未存在过。

此外，我们从历史研究中了解到，奴隶不仅仅是在种植园或工厂里辛苦劳作的贫穷劳动者，而且还有一种高级类别，即帕特森所说的“终极奴隶”(1982,299)，比如*凯撒家族*(原谅我的拉丁语)，即凯撒的所谓“家族”，他们充当了皇帝的代理人。他们可能极其富有和强大。但当皇帝不喜欢他们时，他们可以不经法律程序就被处决。这些“终极奴隶”有时也会造反，甚至会把自己变成国王和王后，例如，当土耳其奴隶在中世纪埃及建立马穆鲁克王国时。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代理人已经成为皇帝唯一的交流手段，而“对交流的控制就是权力”。这种关系的扬弃立即成为一种可能”(1982,333)。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奴隶-主人主体间性被颠覆了，首先是在思维和符号互动领域，然后是在社会及其制度的现实世界。

第三个澄清是，奴隶制的概念*不是*种族定义的: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从历史中学到了这一教训:“各色船员”的跨种族复活通常被认为是反奴隶制斗争的最强大形式(Linebaugh和Rediker 2013, 211)。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一个有效的数字废奴运动——一个有效的全球阶级

事实上，只有当斗争超越了同一性政治，当被奴役者在共同被剥削而不是肤色的基础上形成团结时，斗争才能成功。

这是我基于上述概念化的主要论点:数字资本主义复兴了奴隶制，但它也刺激了以解放为前提的新的反奴隶制运动。发展这一论点，我们拥有一个概念镜头，打开了新的前景，带来了新的思维。它使我们能够在17世纪和21世纪之间来回穿梭。

更具体地说，我的比较分析遵循了图2中概述的三种三角交换模型。左边是17世纪欧洲、西非和新世界之间的跨大西洋三角贸易。这一点无需赘述，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建立在非洲奴隶、糖和金钱流动基础上的格局。

底部是21世纪的奴隶制。在这里，苹果被挑出来是因为它与富士康关系密切。然而，这不仅适用于苹果，也适用于其他主要电子产品品牌，如三星、华为、索尼和亚马逊Kindle。从结构上讲，苹果与富士康的关系堪比四个世纪前欧洲与西非的交流。它们一起扩展到数字消费和社交媒体的新世界，在那里，用户生成内容(UGC)可以说是新的“糖”。

右边是一种反奴隶制交换的新模式，其中有组织的“网络劳动”作为网络社会的第三个支柱，与网络企业和网络国家形成辩证关系。网络劳动的文化资本和社会创新通过工人阶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实现(Qiu 2009)，这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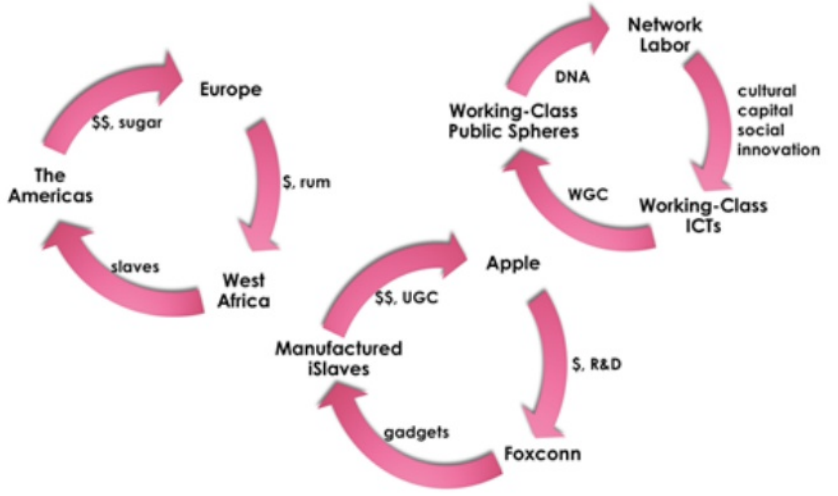



**图2:**奴隶制和反奴隶制的三种电路模型。

用于创建集体和行动导向的工人生成内容(WGC)。WGC汇聚于工人阶级的公共领域，导致数字网络化行动(DNA)，这为网络劳动产生了新的意义和新的实践，从而为区域和全球的反奴隶制的替代电路做出了贡献。

本文的其余部分在图2的左侧和底部比较了物化、商品化和资本主义积累的两个回路。然后，我们将放大到反奴隶制和新主体形成的循环，这只是走向真正的、可持续的、系统性变革的再主体化和再人性化的一种模式。

## 3. 奴隶制的两种模式:制造与被制造

奴隶制有两种模式:一方面是制造型或生产型奴隶制，另一方面是制造型奴隶制或消费型奴隶制。在制造业领域，故事始于地球的深处，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地方，包括童工在内的矿工在军阀的控制下，甚至在枪口下开采钶钽铁矿等“血矿”(Van Reybrouck 2014)。这些矿物质对于我们智能设备中的电子元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些部件是在大型工厂组装的，比如富士康的工厂。

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富士康在中国大陆雇佣了大约140万名工人(Mozur and Luk 2013)，这支军队的人数比美国所有武装部队的人数总和还要多。富士康的劳动条件如何?该公司首次受到媒体关注是在2006年，当时记者潜入了位于中国南方深圳的富士康“和平”宿舍，他们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多达300名工人睡在一个没有空调的巨大房间里的三层双层床上。据住在那里的一名工人说:“汗味和脏脚令人窒息”(张和李，2006年)。这让我们想起了中部航道奴隶船的下层甲板，非洲人的尸体被挤在一起，在拥挤的空间里窒息，通风极差。

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劳动尸体的转移，他们没有自由，无法逃脱。在档案和《为奴*十二年*》等近期的电影中，非洲人或非裔美国*奴隶的拍卖都有很好的记录*。在富士康，我们遇到了中国内地职业学校派到工厂的所谓“实习生”。他们通常是快30岁的年轻人。没有在富士康工作三个月，他们根本无法毕业。在学校，他们主修会计、英语或制药。在富士康，他们被分配到最繁琐的装配线工作，例如制造iPhone后盖(Chan Pun and Seldon 2015)。

2012年，我采访了他们的生产线负责人，了解到这些“实习生”每天都要站10个小时制作iPhone手机壳。第一周，所有女实习生都会泪流满面;第二周，所有男生都会因为腿部剧痛而哭泣。但他们又不能离开，否则就拿不到毕业证书了。学校和工厂都从这种被奴役的身体的转移中获得了丰厚的利益。

如果工人得了职业病，比如白血病，该怎么办呢?如果员工因工受伤，不能再工作怎么办?工厂是否会按照中国劳动法的要求对他们进行照顾?不会。在2016年的书中，我记录了几个令人悲伤的工人被丢弃的案例，比如张的案例，他在富士康因工伤失去了一半的大脑(Qiu 2016a)。这与大西洋贸易中非洲人的尸体成为负债后被丢弃并无本质区别。

最可怕的悲剧发生在2010年，当时15名富士康工人在6个月内从高层建筑跳楼身亡(Chan和Pun 2010)。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一系列的自杀事件。然而，如果我们回到跨大西洋贸易，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相似的劳动纪律和社会控制装置，以防止被奴役人口试图自杀:防跳网(见下图3)。

据18世纪中部航道幸存下来的奴隶男孩奥劳达·伊奎亚诺(Olaudah Equiano)说，他目睹了非洲同胞跳过那张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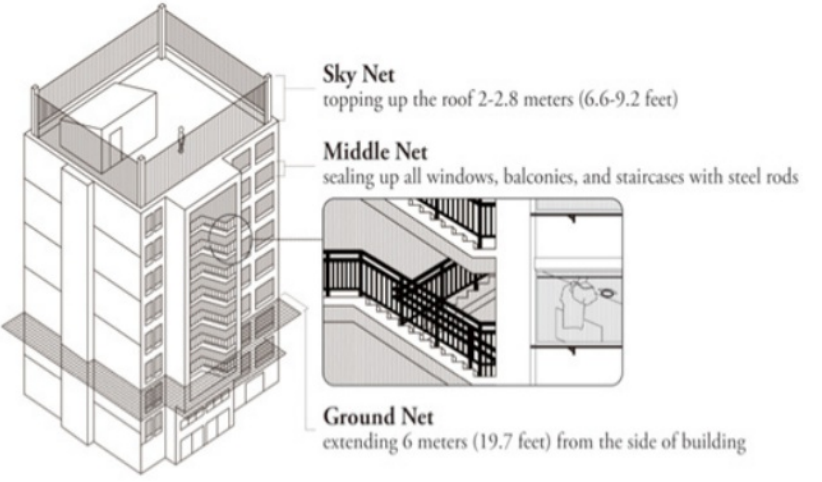



**图3:**一个典型的富士康大楼被防跳网封锁。

因为他们想死，想从奴役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埃奎阿诺1789/1995)。当时，防跳网是奴隶船的标配。当跨大西洋贸易在19世纪被废除时，这些渔网就过时了。但在2010年，它们再次出现在生产i-产品的富士康大楼的楼顶上。有三层网:顶部的“天网”，底部的“地网”，中间密封窗户和走廊的“中网”。富士康声称已经拆除了防跳网，尽管当我参观位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工厂时，仍然可以看到它们。

由于中国的媒体审查，我们没有关于富士康自2010年以来自杀事件的完整报道。但他们仍在继续，正如徐立之自杀所表明的那样，他现在是中国文坛著名的工人诗人，他于2014年从深圳富士康跳楼自杀(Tharoor 2014)。2016年8月，在郑州富士康(Foxconn)，也就是大多数最新款iphone的生产地，我们仍然有可靠的消息称，一名工人在组装iphone 7后跳楼身亡。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它为“制造业的奴隶”:因为沿着装配线及其周围，从全球和*长期*的视角来看，21世纪的电子血汗工厂和17世纪大西洋系统的奴隶制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罪魁祸首并不是某一家公司或某一个国家。它更像是一个行星系统，我称之为“应用程序”，即一个新的全球制度，它不仅生产小玩意，而且生产致命的异化、物化、奴役、处理“无用”劳动力和防跳网。

接下来我们转向“制造的”或消费模式的奴役。它始于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个来自工薪阶层家庭的中国少年，他在2011年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脏，买了一部iPhone和一部iPad。这是一个自愿奴役的极端案例，是一个人类主体被剥夺灵魂的极端悲剧。究竟为什么会有人如此狂热地拿自己的健康去换小玩意呢?他这么做是因为同辈的压力。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如此狂热地沉迷于自己的i-devices呢?

历史上的比较是几个世纪前大西洋体系中令人上瘾的实体，如烟草和酒精，尽管17世纪三角贸易的真正推动力是糖，包括糖生产的副产品朗姆酒。如今，我们的电子产品中也有类似的功能:Facebook、b微信、Candy Crush(甚至连名字听起来都很甜!)

上瘾的结果不仅仅是硬件或软件，而是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西德尼·明茨称之为“去社会化饮食”，当消费被规范化和个性化，以满足消费品生产和营销的节奏，而不是社区和家庭的社会文化需求时(1985,121)。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启示:从历史上看，新世界奴隶生产的增加必须与旧世界消费的增加相匹配。当系统生成时，消费主义的霸权文化是应用程序统治的关键

消费市场是新世界体系的一个支柱，它和它的生产机构一样不可或缺。一种强烈的上瘾实体来自游戏和社交媒体平台——就像那些对糖、酒和烟草上瘾的人一样。当我们上瘾时，我们就失去了自由(Schull 2012)。

评估成瘾的另一个角度是，看看应用程序机制能够从我们身上榨取多少时间。时间是马克思主义分析剥削的一个关键维度。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积累最终是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获取——要么通过延长工作时间，要么通过强化生产过程(马克思1867/1992)。根据罗宾·布莱克本(Robin Blackburn, 1997,581)的研究，1800年，大英帝国控制下的所有奴隶贡献了25亿小时的劳动时间，主要是在糖田和相关工厂工作。如果我们对富士康进行同样的计算，根据我的计算，这家现代数码设备工厂在2014年消耗了48亿小时的劳动时间。也就是1800年的两个大英帝国。Facebook从我们身上榨取了多少时间?我对2014年的保守估计是，仅使用日活跃用户总数就有6530亿小时，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大约相当于261个大英帝国或137个富士康。朱迪·瓦伊克曼(Judy Wajcman, 2015, 178)在《*紧迫的时间*》一书中写道:“‘i’这个词实际上是一种麻醉剂。”她继续说，恢复人性的一种方法是恢复我们的“暂时主权”——使用同样的数字工具作为工具——反奴隶制，恢复和重新发明人类的主体性。

## 4. anti - slavery: Resistance Through and Beyond WGC

随着天空越来越暗，我们看到了更亮的希望之星。奴隶制不是世界末日。相反，它是人类物种重新获得主体性和重建主体间性的不断斗争的一个新的开始，这也构成了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以争取自由——所有劳动人民及其家庭的自由，他们现在拥有了自己的数字设备。

在历史学家中，关于反奴隶制的思想有两股。一种强调由精英、受过教育的人、律师、宗教团体和中产阶级(包括白人救世主)自上而下地废除奴隶制(Clarkson 1839;Eltis和Walvin 1981;Drescher 2009)。另一派通过被压迫者——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土著人民、妇女、文盲、黑人雅各宾派——的眼睛来看待反奴隶制，他们抵制来自基层和自下而上的权力(James 1938/2001;Linebaugh and 雷迪克 2013;雷诺兹1981)。虽然我是废奴主义者，但我的作品更倾向于第二股，强调被奴役者的反抗。

最重要的是来自历史文献的三个见解，它们为我的分析提供了线索。首先，反奴隶制有很多形式:唱歌跳舞、偷窃、破坏、绝食、自杀——这个名单还在继续(雷迪克2007)。

第二，奴隶制与反奴隶制、通融与反抗在全球和地区背景下并存。第三，血腥对抗是例外;更常见的抵抗形式发生在文化中，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以及在主体制造、反制造和再制造的不断过程中(Genovese 1976)。

考虑到这些历史模式，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中国也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中国政府通过提供廉价劳动力、土地和基础设施，在塑造Appconn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Pun Lu Guo Shen 2011)。另一个地缘政治因素是，北京方面试图引入台湾资本，以实现统一“伟大中华民族”的目标。这使得地方政府机构——以市政府的形式相互竞争，拼命争取企业的青睐——在北京的传统权力中心之外脱颖而出，深入到国内。中国的国家，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仍然是社会斗争和权力争夺的关键舞台(Zhao, 2008)。这意味着，如果能向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等主管部门施压，迫使其履行基本职责，Appconn并非不可战胜。ACFTU是一个战略性的机构空间，中国工人往往比知识分子更了解它。

今天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互联网的广泛传播和信息“无富人”的崛起(Qiu2009)，这是所谓的数字鸿沟的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一个类别，为网络劳动力——数字时代的新工人阶级——的形成提供了关键的技术社会基础。这些是收入和资源较少的农民工等群体，但他们对政治经济现状的投入也较少。衡量穷人的一个粗略指标是受教育程度。当中国官方互联网统计部门在1998年发布第一次关于用户人口统计的调查结果时，没有学士学位的人(大致为无学历群体)占全国所有互联网用户的41.1%，这一数字在2008年攀升至78.8%，在2016年攀升至88.4% (CNNIC 1998;2008;2016)。近九成的中国网民属于工人阶级和下层阶级。他们会在网上和线下交流些什么?

西方媒体和中国商业媒体都习惯性地把中国工人描绘成温顺、听话的样子。当富士康“自杀快车”发生时，这起悲剧引起了轰动。但当工人们在“自杀快车”发生后立即进行反击时，媒体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仿佛没有什么新闻价值可言。然而，这场斗争每天都在继续，并且经常通过微博(中国类似twitter的数字平台)进行在线直播。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工厂工人使用网络视频来记录他们的集体反抗，例如对暴力警卫的反抗。然而，最常用的图像是剧照，例如2014年豫园鞋厂罢工时拍摄的剧照(Qiu 2016b)。

回顾过去，我们不仅看到了“在纠察线上使用社交媒体”的无数种方式(Qiu 2016b)，而且还看到了工人阶级主题的至少三个阶段

由数字媒体促成的形成。2004年之前，行动集中在即时通讯工具QQ上。2004年至2009年间，网络论坛Weblog以及播客和视频网站吸引了更多关注。自2009年以来，微博和b微信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技术平台在现有平台之上不断积累，工人的集体经验也是如此;最有趣的发展可能是毛主义和新毛主义的网络组织，这些值得在未来进行更多的研究。

在如此丰富的工人反抗背景下，将WGC(工人生成内容)视为UGC之外的另一种途径是有意义的，它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约束之外的主体性。在很多方面，中国工人阶级社交媒体上流传的WGC可以与非洲中部航路期间的歌舞相提并论。在不熟悉的观察者看来，它可能显得毫无意义和混乱。但对圈内人来说，它可能是无比的精神和诗意，令人满足和强大，挑衅和有趣。

然而，我认为，尽管中国的WGC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今天社交媒体在纠察线上的行为仍然不如大西洋革命历史上的行为引人注目。(Linebaugh and Rediker 2013)。图4左侧著名的韦奇伍德反奴隶制奖章是18世纪废奴运动的一个显著标志。它的浮雕设计是一个带有基督教信息的非洲形象——“我不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兄弟吗?”——被复制成各种各样的材料形式:精美的瓷器、手表、金针。这种废除奴隶制的“模因”跨越了社会各阶层，超越了地理和历史的限制。它激发了大量反奴隶制的努力，并与之联合起来，从《*汤姆叔叔的小屋*》等文学干预到从农产品中提取血液的“免费农产品商店”，




**图4:**韦奇伍德废奴奖章(1787年)和奴隶梗(2010年)。

尤其是棉花和糖(本质上是19世纪的公平贸易)。相比之下，21世纪中国乃至全球的数字废奴运动还没有发展出如此有影响力的模因。它在建立联盟和改造更广泛的社会方面也没有取得成功。因此，在整个历史跨度中，还有很多东西有待学习。

## 5. 结语

这篇文章的主要信息是关于历史的连续性，尽管非洲人或非裔美国人与中国或亚洲劳工有种族特殊性。是的，这两个被奴役的群体远隔重洋，彼此相隔几个世纪。是的，作为被奴役身体最典型的形态，存在着从男性到女性的性别转变。但他们既被物化了，又被剥削了，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新老殖民主子压垮了。正是这种征服、异化、物化和暴力镇压，构成了他们最牢固的纽带——跨越种族范畴、跨越国界、跨越历史。

在这一点上，应该清楚的是，数字媒体仍然处于奴隶制的阴影下，现在从中国和刚果投射到Appconn和大数据算法的新世界。因此，设想一种替代体系并帮助其实现是势在必行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一个更全面的数字劳动概念。必须看透数字资本主义，并理解装配线和数据矿井内部当代劳动条件的恶化，这绝不是巧合。中国的工人、知识分子和积极分子可以从非洲的大西洋抵抗运动和美国废奴运动中学到很多东西。其中之一是文化抵抗的中心地位，物化的劳动通过再主体化的过程加入到反奴隶制的斗争中，消费者倡导可以在恢复我们在生产和消费模式中的主体间性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在创造新的革命主体方面汇合。

另一个教训是一种极大的赋权启示。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奴隶制，尽管外表可怕，但如果我们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它已经并且将会被击败。本文首先对奴隶制度在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身条件下的恢复力做了注解。让我们以不同的注释结束:反奴隶制的力量和恢复我们集体人性的努力更具弹性——如果我们回顾废奴主义者在过去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取得成功，那么我们确实可以想象一个替代的后资本主义世界。

根据我的理解，18世纪80年代的全球奴隶制度，以及它对政治、文化和宗教力量的利用，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今天的大数据资本主义，或21世纪的奴隶制，远不如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秩序强大。然而，它只花了一代人的时间

18世纪80年代之后，跨大西洋贸易开始崩溃;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现代反奴隶制立法于1807年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宫通过。记住这一历史记录，我们真的没有理由感到绝望和绝望。我们确实应该带着信心和集体的乐观意志一起行动。

## 致谢

本章受惠于香港普通研究基金项目“工人阶级公共领域:富士康自杀快车以来的媒体与行动主义”(项目ID: 14612715)。

## 参考文献

Allain, Jean. 2012. *The Legal Understanding of Slavery: From the Historical to the Contempor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lackburn, Robin. 1997. *The 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 From the Baroque to the Modern, 1492–1800*. London: Verso.

Chan, Jenny, Pun Ngai and Mark Seldon. 2015. ‘Interns or Students: China’s Student Labour Regime.’ *Asian Studies* 1 (1): 1–31.

Chan, Jenny, and Ngai Pun. 2010. ‘Suicide as Protest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Foxconn, Global Capital, and the State.’ *Japan Focus* 8 (37). Available at: http://apjjf.org/-Jenny-Chan/3408/article.html(accessed 14 May 2018)

Clarkson, Thomas. 1839. *The History of the Rise, Progress, and Accomplishment of the Abolition of the African Slave-Trade by the British Parliament*. London: Parker.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 (CNNIC) 1998, 2008, 2016. Available at http://cnnic.com.cn/IDR/ReportDownloads.

Drescher, Seymour. 2009. *Abolition: A History of Slavery and Anti-Slave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ltis, David and James Walvin. 1981. *The Abolition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Origins and Effects in Europe, Africa, and the America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Equiano, Olaudah. 1789/1995. *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Olaudah Equiano; Or, Gustavus Vassa, the African, Written by Himself*. New York: Penguin.

Fuchs, Christian. 2014.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James, C. L. R. 1938/2001. *The Black Jacobins: Toussaint L’Ouverture and the San Domingo Revolution*. New York: Penguin.

Genovese, Eugene. 1976. *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 New York, Vintage.

Linebaugh, Peter and Marcus Rediker. 2013. *The Many-Headed Hydra: Sailors, Slaves, Commoners, 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ary Atlantic*. Boston: Beacon.

Marx, Karl. 1867/1992. *Capital, Volume 1*. London: Penguin.

Mintz, Sidney. 1985.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 tory*. New York: Penguin.

Mozur, Paul and Lorraine Luk. 2013. 'Gadget Maker Foxconn Freezes Overall China Hiring.'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0. Available at: http://ow.ly/MEiLa (accessed 14 May 2018).

Patterson, Orlando. 1982. *Slavery and Social Death: A Comparative Stud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diker, Marcus. 2007. *The Slave Ship: A Human History*.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Reynolds, Henry. 1981. *The Other Side of the Frontier*. Kensington: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Pun, Ngai, Huilin Lu, Yuhua Guo and Yuan Shen. 2011. *Suicide Express behind the Glory of Foxconn*. Hong Kong: Commercial Press.

Qiu, Jack L. 2009.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Cambridge: MIT Press.

Qiu, Jack L. 2016a. *Goodbye iSlave: A Mani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Qiu, Jack L. 2016b. Social Media on the Picket Lin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8 (4): 619–33.

Schull, Natasha D. 2012. *Addiction by Design: Machine Gambling in Las Vega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aroor, Ishaan. 2014. 'The Haunting Poetry of a Chinese Factory Worker Who Committed Suicide.' *Washington Post*, 12 November. Available at: http://ow.ly/MDaWh (accessed 16 May 2018)

Van Reybrouck, David. 2014. *Congo: The Epic History of a People.* London: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Wajcman, Judy. 2014. *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 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Zhang, Juan and Qiang Li. 2006. 'Foxconn Workers: Lowest Salary 340 Yuan per Month, 700-Plus People Sharing One Room.' *Neteast Commercial Channel*, 17 June. Available at: http://ow. ly/MG8m1 (accessed 14 May 2018)

Zhao, Yuezhi. 2008. *Communication in China: Political Economy, Power, and Conflict*. Lanham: Rowman and Littlefield.

第13章

# 雇佣工人，不是奴隶:对杰克·邱这一章的反思

彼得·古德温

杰克·邱的这一章，就像他的书《*再见，奴隶:废除数字的宣言*》(邱，2016)一样，有力地揭露了隐藏在“数字革命”浮华背后的一些骇人听闻的劳动条件，以及遭受这些条件的人对这些条件的抵抗。同样有力的是，他将富士康(Foxconn)和苹果(Apple)在21世纪初全球化资本主义中所处的地位，与17、18世纪国际资本主义中大西洋奴隶贸易所处的地位进行了比较。考虑到他如此有效地提出的问题具有巨大的社会、政治乃至道德重要性，吹毛求疵似乎几乎是不得体的。

但是，尽管它具有强大的力量和真理，我认为我们必须在这种背景下质疑奴隶制的概念。邱是否可能牺牲了一些重要的分析严谨性，以获得毋庸置疑的、受欢迎的辩论效果?

正如邱在本章所概述的那样，在他2016年出版的书的第二章中，奴隶制在不同时期采取了各种形式。它在历史上一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前现代性遗留下来的产物。而且它总是产生各种形式的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Goodwin, P. 2019. Wage-Workers, Not Slaves: Reflections on Jack Qiu’s Chapter.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165–167.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I: https://doi.org/10.16997/book29.m. License: CC‐BY‐NC‐ND 4.0

被奴役者之间的反抗。但是，如果奴隶制可以成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那么奴隶与雇佣工人或无产者有什么区别呢?当然是奴隶归资本家所有，可以买卖(连同她或他的全部劳动力)，而雇佣工人保留她或他的劳动力的所有权，并将其出售给一个资本家或另一个资本家。无论在社会、政治、经济还是历史上，这种区别都是很重要的。如果它不重要，那么林肯1863年在美国内战中发表的《解放奴隶宣言》和1865年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也就不重要了。

卡尔·马克思在他的手稿《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写于美国废除资本主义奴隶制时)中明确指出了经济差异:

> 奴隶是特定主人的属性;工人确实必须把自己出卖给资本，但不能出卖给某个特定的资本家，因此在一定限度内，他可以选择把自己出卖给他所希望的任何人;而且他也可以更换自己的主人。所有这些差别的结果，就是使自由工人的工作比奴隶的工作更密集、更连续、更灵活、更熟练，且不说这些差别使他适合扮演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角色。(马克思1976/1864,1032-1033)。

我怀疑邱是否会不同意这些。但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话语中，工人和奴隶的区别一直都是不明确的。一个灰色地带是，很多雇佣劳动都涉及到市场之外的强制因素，从黑帮老大到公司警察，到捆绑住房或公司宿舍，再到卡车系统，等等。邱所描述的正是这种真实而可怕的灰色地带。话语的灰色地带是，从现代工人阶级的到来开始，劳工组织者和社会主义者——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提到，通常是修辞性的，“工资奴隶制”或“工资奴隶”。而在美国最纯粹的资本主义奴隶制养活欧洲纺织厂的时期，社会主义者有时会指责拥有工厂的废奴主义者忽视“自己的”雇佣奴隶，而真正奴隶制的支持者有时也会指责他们虚伪，以支持他们自己的反动事业。正是在探索这些真实的和修辞上的灰色地带时，邱的论点的力量所在。但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邱所谈论的工人是雇佣工人，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奴隶，即使在邱所记录的消除怪诞虐待的战斗取得胜利后，他们仍将是受剥削的雇佣工人。

邱强调了反奴隶制历史的一面——奴隶反抗和奴隶叛乱的历史——而另一方面，更广为人知的是，有道德动机的白人废奴主义者的历史。因此，除了揭露虐待行为，他还关注富士康工人的反抗和反叛行为。

邱描述奴役的另一面，无论是在分析层面还是修辞层面，都不那么可信。邱区分了两种奴役模式:“一方面是制造型或生产型奴役，另一方面是制造型奴役或消费型奴役”。我们刚才谈论的(富士康工厂的工人)是邱的“制造或生产模式的奴隶”，尽管我批评了邱在技术上把工人和奴隶混为一谈，但在这个“生产模式奴役”上，我对他的论点的主旨绝对没有异议。但在我看来，邱的第二个“消费模式奴役”在分析上似乎既单薄，又具有完全相反的修辞力量。邱举了一个例子，“2011年，一个来自工薪阶层家庭的中国少年卖掉了自己的一个肾脏，买了一台iPhone和一台iPad”。他指出，这是他所谓的“自愿奴役”的“极端案例”，他的意思似乎是上瘾。虽然17世纪三角贸易的真正推动力是糖，包括糖的副产品朗姆酒，但历史上的比较是几个世纪前大西洋体系中令人上瘾的实体，比如烟草和酒精。如今，我们的数字设备中也有类似的功能:Facebook、b微信、《Candy Crush》。他总结道:“当我们上瘾时，我们就失去了自由。”

我怀疑“上瘾”一词是否有助于描述社交媒体或数字设备的普遍使用(记住，邱自己说过，他卖肾买iPhone的例子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即使人们接受它是有帮助的，那也不能使我们这些今天需要iphone或Facebook账户的人成为“奴隶”，就像它不能使18世纪需要定期摄入糖的所有阶级的欧洲白人成为“奴隶”一样。

## 参考文献

Marx, Karl. 1976/1864. *Capital Volume 1*. Translated by Ben Fowkes. Harmonds-worth and London: Penguin Books in Association with New Left Review.

Qiu, Jack. 2016. *Goodbye iSlave: A Mani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 Urbana, -Chicago and Springfield: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第三节

# 数字政治

第十四章

# 批判还是集体?交往资本主义与政治主体

乔迪·迪恩

## 1. 简介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数字对象、数字主体:大数据资本主义时代的行动主义、研究与批判”，讨论了数字时代数字行动主义和批判的可能性。作为行动主义的限定词和批判的条件，数字意味着什么?一方面，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谈论的是我们目前网络媒体、个性化大众传播和支持它的设备生产的状况;我们谈论的是大数据，是交流资本主义的总体背景。另一方面，在用“数字”来限定行动主义和批判时，有一些东西不太清楚，即主体的潜在理论。在对数字行动主义和批判的研究中，政治主体的概念是什么?这个主题是如何受到数字时代的影响的?这种影响(如果有的话)是否最好从数字化的角度来理解，或者“数字化”实际上是否标志或周期了对资本主义及其决定我们环境的方式的某种理解?(我应该在这里补充一点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Dean, J. 2019. Critique or Collectivity?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the Subject of Politics.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171-182.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 https://di.org/10.16997/book29.n. License: CC-BY-NC-ND 4.0

在批判媒体研究中，当然是克里斯蒂安·富克斯(Christian Fuchs)坚持认为，有必要从资本主义及其劳动、生产和价值的范畴来分析数字媒体，而不是从资产阶级的信息范畴来分析。)在我看来，“数字”将我们引向我们在传播资本主义中的环境。它告诉我们的与其说是政治主体，不如说是阻止这个主体出现的过程，尽管如此，这些过程有助于集中和聚集，而这些集中和聚集是主体出现的机会。

我认为政治主体的理论对于任何行动主义和批判(数字或其他)的方法都是重要的，这是无可争议的。例如，我们是否认为，政治主体必然是一个行动主义主体?还是我们假定它是被行动、被服从、被制约或被决定的?同样，我们是否想象政治主体参与或受到批判的影响?在线上的分享和评论、推特风暴和脸书更新，是政治主体的实践吗?黑客或写博客呢?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把这个话题当作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它是否存在于以它的名义进行的行动和事件中，如果存在，又是如何存在的?

在这篇文章中，我首先简要概述了一种政治主体的理论(以拉康为锚)，它将斯洛文尼亚的主体观作为结构中的缺口(☒i☒ek和dollar;参见我在Dean, 2016年的讨论)与早期巴迪欧(2009)强调主体化和主观过程作为对主体干预的反应。其次，我通过转向群体来阐述这一理论。人群不是政治主体，但他们的“平等主义释放”(我从卡内蒂1984年取的一个术语)可以发挥的影响，可以追溯地归因于作为他们主体的分裂的人民(作为我们其余人的人民[Dean, 2012]，一个被压迫者的革命联盟)。第三，对群体的强调使我们能够在交际资本主义对复杂网络及其链接的幂律分布的动员和依赖中找到“掘墓人”。然后，数字网络的政治就形成了一个“一”对“多”和维持主体差距的双重问题——一种集体而非批判的政治。最后，我将我的论文与哈特和内格里的网络化生命政治方法进行对比，以证明政党形式作为革命政治所必需的视角、工具和组织手段对我们今天的相关性。

我不想直接进入理论讨论，而是想从幸存者和制度的角度描述我想解决的一般问题。当代理论和行动主义的两个主要主题围绕着幸存者或系统。因此，一些活动家和理论家，更不用说许多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的学生和其他人，都深深投入到同一性政治和交叉性中。他们认为同一性是政治的一个重要场所，必须捍卫和主张免受多重侵犯和伤害。他们既缺乏团结的社会和政治协会，也缺乏经济上可靠的未来，因此提出了多重交叉的挑战，阻碍了他们的发展

通往成功和幸福的道路。他们把这些挑战想象得像他们一样，是具体的，而不是普遍的。由于机构的背叛，他们对有组织的集体缺乏信心。因此，他们自发地重复着依靠自己、单干的主导命令，尽管他们已经对阻碍他们“单干”的障碍感到愤怒。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倡导者认为宜居性、生存能力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成就。因此，在这一理论和行动主义的脉络中，《幸存者》成为当代政治主题的一个关键人物。

然而，即使社交媒体和左翼政治文化更广泛地对幸存者进行了估值，当代理论的另一股力量却使自己远离了人，远离了任何类似于主体的东西，甚至远离了人类。对这些理论家来说，理解现在需要一个后人类主义者关注系统——地质的、银河的、算法的、混沌的等等。我们在强调灭绝、衰竭、物体和事物上看到了这种普遍的动向。

这两种理论潮流对应于新自由主义对社会制度的拆解，以及传播资本主义通过网络媒体/信息化强化资本主义。大学、学校、家庭和工会不那么稳定，更多的是在不断变化。社会福利保障在人们为自己负责的名义下被拆除。社会团体和机构的崩溃使个人更容易受到剥削、暴力和胁迫;他们更有可能将他人视为竞争对手或威胁，并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人。现在，照顾好自己似乎是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行为，而不是社会福利体系解体和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到令人讨厌的症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照顾好自己，如果我们想要跟上时代。自发的反应是个人的:愤怒、要求有所作为、呼吁变革。沟通资本主义为这种自发的个人政治提供了基础设施:手机和社交媒体。这些媒体奖励即时的反应，如推特、状态更新、签署请愿书、给代表发电子邮件——个人活动都隶属于被认为真正重要的单一行为:投票。所谓的政治在意识形态上使个人屈从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及其个体化的政治实践。工作不那么可靠，人们觉得一切都更有竞争力，更不稳定。在一个越来越复杂和不确定的信息领域中，越来越多的选择被下载到个人身上，尽管这些个性化的选择对我们生活的真正决定几乎没有影响，在一个卫星、光纤电缆、服务器群、大数据和复杂算法为高速交易提供动力的环境中，使准时生产成为可能，强化劳动力市场，将财富集中在更少的人手中。

纳粹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将自由主义描述为用伦理和经济取代政治。我想说，当与传播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时，新自由主义的特点是对幸存者和制度的意识形态投资(分别是伦理和经济学的强化)。

新自由主义迫使(社交媒体鼓励并包围)个性化的自我修养、自我管理、自力更生和自我吸收，与此同时，传播资本主义安装并加速了非个人的决定过程、回路和系统。单一性的、被渲染为独特的、高度个性化的人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完全决定性的、超出他们控制的环境。幸存者挣扎着在不适宜居住的条件下坚持，而不是抓住和改变这些条件。系统被呈现为决定我们的过程和对象，是可以观察和描绘的东西，甚至可以预测或哀悼，但永远不会影响。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没有一个人能带来改变。个人可以有政治感受，而社交媒体鼓励这些感受的表达和传播，通过当天的愤怒产生情感强度。个人可以记录和报道——这是这一事件的照片，这是我对这条新闻的感受。个人甚至可以说话——社交媒体(就像无政府主义政治一样)告诉我们，没有人能代表我们说话，让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说话，即使声音的不和谐意味着感觉被倾听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我们都被要求倾听。但我们怎么能倾听每个人，甚至很多人的声音，而不试图让彼此变得更简短，即使是140个字符，也根本不可能听到很多人的声音，在这一点上，我们不是又变成了观众吗?做一个免费的内容提供者的代价，也就是成为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演出的永久观众的代价?不是大众媒体的观众，而是个性化媒体的观众，一种我们为自己策划的、由许多人组成的媒体?无论如何，我们目前对幸存者和系统的意识形态配置，让我们很难看到政治主体。我们可以看到脆弱的个体、强大的算法和地质力量，但我们完全忽略了能够采取政治行动的主体——分裂的人民，在历史上被描绘成工人阶级、农民、失业后备军、被殖民化的人、那些反抗奴隶制、反抗父权制、反抗压迫的人。交往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去主体化的系统运作，而那些把政治焦点放在算法、对象、地质和灭绝上的人，则提供了这种去主体化的意识形态表达。
但还有另一种方式，一种从作为政治主体的分裂的人民开始的方式。

## 2. Subject: The People as Subject

正如我们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我们不能创造自己的历史。政治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事情，不是我们在自己选择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创造的东西。这些环境是什么以及它们是如何被限制的，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无限可塑的。历史的重复并不是同一事物的重复;曾经的悲剧，后来变成了闹剧。用更⌧i⌧ekian的术语来表达，重复可以作为否定、消极或死亡驱动，不仅会造成僵局，还会造成破裂。

对于⌧i⌧ek(以及Mladen dollar)来说，这些断裂就是主体:主体就是结构上的缺口。我的主张是，政治主体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缺口，因为人民是政治的主体(这里的人民，我指的是分裂的人民;无产阶级化和被压迫的人，而不是作为民粹主义整体的人民)。

在他们的自我关系中，人们总是与自己对立。他们遇到了他们交往的实际的、物质的限制，遇到了他们的共性的精神的和情感的压力。他们对自己作为“人民”的反思性关系的过度是政治的扭曲。政治发生在人们与其自我组织之间的非同一性、差距或扭曲中。政治主体化迫使这种非同一性，使它被认为是主体的影响。“政治的主体”不仅仅是任何的空隙或缺失。政治主体是通过积极地占领人民的结构性缺失而出现的。

政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政治主体是集体的，是分裂的。这种分裂是实际的、物质的，是我们肉体存在的状态。人民永远不*可能是*政治性的(或者换句话说，“人民”不是一个本体论范畴)。他们只是作为部分、作为子集、作为主张而存在。人群占领公共广场、民选议会、军队参战和民意调查都是如此。这些都是必然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偏袒——部分与(想象的)整体之间的鸿沟——是政治主体化的激动人心的原因。即使作为部分，人民也只是暂时存在的。他们可能试图把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曾经记录在文件、实践和组织中，这些文件、实践和组织将取代他们的位置，并代替他们运作，这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片面的存在和运作。某种程度的异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创建新的机构并不能消除集体与人民之间的最小差异。因此，政治的条件，仅仅是人民和实际走到一起的集体之间的这种实际的物质分裂。

人民内部的分裂一直向下延伸。它不能局限于一些人被排除在人民之外的想法(因此，包括他们将解决差距的问题)。它也不能被渲染为表征的问题(并因此通过本体论来解决，仿佛只要我们能够摆脱表征，我们的异化状态就可以通过重生而得到本体论的圆满来补救)。当然，它也不能通过寻求以偏好聚合的形式取代工会和政党等政治形式的平台来解决。这样的技术修复再现了沟通资本主义关于幸存者与系统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有个人需求的个人面对着他们无法控制的大型基础设施。我在这里想到了Alex威廉姆斯的定位，即“围绕过时的结构统一原则构建的政党和工会”，这是为了支持“能够承载未知范围的偶然政治行动”的平台而需要克服的东西(威廉姆斯2015,227)。“结构统一”的表述不仅歪曲了面对敌人时行动统一的政治需要，而且党(特别是在列宁的版本中)命名为“在不可预见的情况下忠于事件的灵活组织”(bosteel 2011,

243)。威廉姆斯忽略了忠诚、一致性的因素，事实上，“纲领”的政治维度，即一个政党的纲领宣布其承诺、价值观、计划和意图。“一系列偶然的政治行动”根本没有指明一种政治;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对Facebook和Twitter的拥抱。

人们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没有完全呈现给自己。冲突和矛盾的欲望和动力使人民成为一个分裂的主体，永远在努力表达、遭遇和解决自己的非知识。作为政治的集体主体，人民只不过是这种差距，是许多人通过和反对以他们的名义提出的要求、陈述和制度的力量或推动力。

经济(过度)决定了主体化的设定。它配置了我们在其上组织主体化后果的地形。回到我的论点，政治不可能有任何出发点，因为它不是在一个开放的、无条件的歧管中发生的。相反，它是在一个被一种根本的对立所撕裂和建构的环境中向前推进的。因此，经济，作为社会特征的生产方式——数字或其他——并不能*决定*政治主体。正是这种断裂或鸿沟的主体化的设置，证明了主体的力量。进一步说，经济是*围绕*这一证明进行*斗争*的背景——如果有的话，断裂意味着什么，这一意义可用的术语和图像，以及支持或反对某一事件是政治主体的影响的给定证明的各种力量的集合。

人群——集体，暂时的异质统一——有助于说明作为政治主体的人民是如何在空隙中出现的。

## 3. 人群——集体的力量

在过去的十年中，人群和抗议活动向我们展示了人们感受到他们的集体力量，以及许多人在预期中留下差距的能力。这种“在预期中刻下的缺口”在占领运动中表现得很明显——最终，人们开始抗议，起来反抗。我们看到，在突尼斯、埃及、西班牙和希腊，人们群起反抗民主的分离;在各种各样的反紧缩抗议活动中;在波兰和爱尔兰要求生育自由的抗议活动中;2017年1月21日美国女性的大规模抗议，等等。

然而，让人群在预期中制造差距的力量，也带来了一系列政治挑战。人群具有破坏性、创造性、不可预测性、传染性和暂时性。他们不会持久。人们回家。人群在政治上是不确定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是出于各种相互矛盾的原因、感情和冲动(这就是为什么采访单身参与者没有抓住重点;你不能采访一群人——在这里，我想到了保罗·格巴多(2017)的*《面具与旗帜》,这本书在很多方面都很有趣,也很重要*。格巴多将人群分解成个体的回忆。

通过这样做，他能够将破坏性人群事件的国际链减少到公民参与，“公民主义”，从而消除了2010-2011年各种占领和示威活动对现状的挑战。伴随着人群信息的不确定性而来的力量，在人群分散时就成了弱点。人群没有政治;它是一个政治的机会——这是另一种说法，人群铭刻了一个缺口;它打破了预期，打破了日常，但它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或朝着什么方向。

群体如何获得政治取决于对群体事件的反应，以及这种反应是否忠实于群体的平等主义实体。在《*人群与权力*》*一书中*，伊莱亚斯·卡内蒂(1984)将人群出现的时刻描述为“放电”。这是“所有属于群体的人都摆脱了他们之间的差异，感到平等”的时刻。在那之前，可能会有很多人，但他们还没有那么集中的身体和影响，那是一个群体。随着人群密度的增加，力比多效应就会释放出来:“在这种密度中，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空间，身体相互压在一起，每个人都像靠近自己一样靠近对方，一种巨大的解脱感随之而来。”正是为了这个幸福的时刻，当没有人比另一个人更伟大或更好的时候，人们才成为一个群体。卡内蒂给我们的人群是一个奇特的*欢爽的吸引者*，一个集体享受的形象。人群的力比多能量使他们在一个欢乐的时刻聚集在一起，卡内蒂将这个时刻描述为一种“平等的感觉”，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共同的归属感。这种感觉不会持久;不平等会随着人群的消散而回归。但在性高潮的放电中，“绝对平等的状态”取代了个体化的差别。

我们从卡内蒂那里得到的，是作为绝对平等的群体形式的实体或本质。这种平等只是暂时的，但它对于人群的释放，即人群为之聚集的感觉是必不可少的。卡内蒂认为，人群的平等注入了对正义的所有要求。平等作为一种归属——而不是分离、权衡和衡量——是为对正义的渴望提供“能量”(卡内蒂的术语)的东西。群众集中了平等和对正义的渴望(并因此执行了马克思与工厂联系在一起的一种功能)。群众事件可以登记为人民的运动。另一些人会把人群看作曾经的人民，因为她领会了平等主义释放的*欢爽*。她回应了在人群中交织在一起的勇气和正义，也许伴随着它的*欢爽之后的一些焦虑*。她的回应表明，群体事件的断裂是一种主体化(我在这里的分析以巴迪欧[2009]在《*主体理论*》中的指导思想为指导)。他者把人群中的人，他们的集体力量，看作是被压迫者的普遍斗争。她把这种决裂看作是人民解放平等主义运动主观过程中的一个瞬间。人群不只是此刻在这里的这些特定的人。他们是为正义而战的人。忠于平等主义的释放是群体事件的结果;作为主体的人民因此被理解为它的原因。

资本和它的国家都不希望人民出现。所以他们试图修补裂痕，尽可能快地缩小差距。他们否认发生过的事情，依靠无情的媒体不断重复的新奇来转移和分散注意力。他们声称这不是人民的错;而是暴徒、暴民、外来者。他们让一切照常进行，公民像公民应该做的那样参与。左派的自发反应通过强调特定的群体、问题和身份，通过强调谁不在那里，通过优先考虑他们自己对事件的独特解读，来挑战作为人群事件集体主体的分裂人民的主张。社交媒体鼓励这样的回应，越多越多样越好。交际资本主义以多样性、混乱、不确定性，任何能分散群众力量的东西为食。

## 4. 数字网络的中心特征——幂律分布

然而，传播资本主义仍然产生了群体。我们可以很快指出几种不同的群体:社交媒体上的“朋友”、追随者和用户群体;工厂里的工人群体(参见Jack Qui的书《*Goodbye iSlave*》[2017])，以及Christian Fuchs对数字劳动力的详细案例研究);商品和一次性物品的人群;大数据群体(事实上，大数据可能是当今数字时代最强大的群体符号之一);以及那些因网络经济加剧的不平等而被剥夺工作、家庭、生活和未来的人群。这些人群需要用幂律分布的“长尾”来理解——多对一。

交流资本主义刺激了产生幂律分布的网络的产生。它依赖于以自由选择、增长和优先依附为特征的一般领域或公地的创造和圈定。从共性中出现了一个“一”，即处于顶端的那个，点击量或链接最多的那个，重磅炸弹或超级明星。在这里，剥削包括刺激一个领域的生产，以寻找这个领域，然后将其货币化。许多人贡献，许多人工作。一个人得到回报。领域越大，这个人就越强大，越有价值，或者越精英。

不平等是复杂网络的必要和不可避免的特征，即以自由选择、成长和优先依附为特征的网络。正如Albert-Laszlo Barabasi所证明的那样，复杂网络遵循链接的幂律分布。在给定的网络中，第一名或顶部的物品的链接数是第二名物品的两倍，第二名的链接数比第三名的多，以此类推，这样，底部的物品之间的差异很小，但顶部和底部之间的差异很大。很多小说都是写出来的。很少出版。售出的更少。只有极少数成为畅销书。Twitter是另一个例子:它拥有超过10亿的注册用户;一个流行歌手，凯蒂

佩里有超过9400万粉丝。大多数人只有200个。大众媒体用“80/20法则”、“赢者通吃”或“赢者通吃”的新经济特征、“长尾”等术语来表达复杂网络的幂律结构。

请注意，不管我们谈论的是哪种网络或领域——小说、Twitter、亚马逊、b谷歌、电影——内容都不重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依赖于对传播的剥夺和剥削。任何交往行为都等同于任何其他行为;它们的意义或使用价值不如它们的交换价值重要，即它们可以被共享的事实。一个反响是，资本主义已经将沟通纳入其中，以至于沟通不提供一个批判性的外部。数量、数量和群众压倒了批判。在复杂的网络中，这个体积，这个数字，是按幂律分布的等级组织起来的:一对多。

在交往资本主义中，政治的挑战是使多数人的力量发挥作用——群体如何在自身内并为自身而存在，也就是说，群体如何产生可归因于作为其主体的分裂的人的影响。社交媒体的功能是驱散为保持人群破裂所产生的鸿沟而做出的努力，因此，一度属于人民的东西，后来被遗忘、削弱、重新诠释。然而，它的过程产生了新的群体形式，集体试图通过这些形式来发挥自己的力量——话题标签、表情包、自拍和其他常见的图像。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标签是革命性的。相反，它们指出了随着批评失去效力而出现的政治机遇。

## 5. 哈特和内格里

我已经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复杂的网络会产生层级。相比之下，哈特和内格里强调了生命政治劳动的民主维度。他们声称，同样的网络化合作结构产生了共性，产生了新的民主能力，甚至“使民主组织在政治领域的发展成为可能”(哈特和内格里 2009, 354)。考虑到交流贡献的交换价值取代了它们的意义或使用价值，考虑到交流资本主义一方面推动了个体化和单一性的过程，另一方面又将资源和权力集中于一方，很难看出他们对新民主能力的要求与90年代的技术乌托邦主义有什么不同。这同样适用于新兴的民主组织，特别是考虑到哈特和内格里对“先锋组织”的拒绝。他们告诉我们，先锋队党对应于一种不同的、早期的劳动结构(无产阶级的一种不同的技术组成)。根据他们的周期划分，先锋队党对应于20世纪早期的专业工厂工人。二十世纪中期的技术工人则与那个时期的群众党相适应。但是

他们认为，今天适合生命政治工党的政治形式必须是民主的、合作的、自主的和横向网络化的。先锋党是不充分的，“不合时宜的”，因为它看起来不像当代生物政治生产的网络。

这一论点并不令人信服。复杂网络并不是哈特和内格里想象的那种水平的、合作的和自主的形式。正如Albert-Laszlo Barabasi关于复杂网络的研究(2003)所表明的那样，自由选择、成长和优先依恋产生了等级制度，并在最被选择和最受欢迎的人与许多不受欢迎的人之间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巨大差异(参见我在Dean 2016,12 - 13中的讨论)。网络交流表面上的创造性、合作性和民主性并没有消除层级。它利用我们自己的选择来反对我们，从而巩固了等级制度。而且，正如Barabasi对复杂网络的研究表明的那样，这种层次结构并不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它是自由选择、成长和优先依恋的内在效应。

反映生物政治生产的政治形式不会是横向的和民主的。它的民主将产生幂律分布、不平等的节点或结果、赢家和输家、少数和许多。我们在Twitter上看到了这种现象，人们通过热门话题标签进行斗争。话题标签提供了共同的名字，作为斗争的位点;当它们成为趋势时，它们就会从网络上数百万条未读、不受欢迎的推文的长尾中脱颖而出。民主因素——人们对使用和转发的选择——产生了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让一些话题标签在一段时间内显得很重要，甚至很重要。新兴的等级制度的事实表明，新兴的先锋队很可能是生命政治条件下斗争所必需的政治形式，也就是说，交流资本主义。

复杂的生命政治生产网络的结构表明，与哈特和内格里*相反*，一个先锋党根本不是不合时宜的。相反，它是一种与网络化传播的动态相对应的形式。这种结构表明了哈特和内格里拒绝先锋党的另一个问题。他们把列宁的党描述为一个组织过程，这个组织过程来自于“高于”群众的运动。从历史上看，这种影射显然是错误的。布尔什维克只是在动荡的俄国革命背景下行动的多个政党、倾向和派别中的一个群体。他们活跃在被压迫工人和农民的运动中。运动本身，通过胜利和失败，短期和长期的联盟，新的合作形式，以及政治组织的进步，产生了党，甚至党也推动了运动。

对于哈特和内格里来说，革命的目标是“产生新的社会生活形式”(哈特和内格里2009,354)。他们将革命斗争描述为一种建立共同社会的解放过程。他们认为，这样一个过程使新的集体习惯和实践制度化，从而巩固了起义。于是，机构就成了管理的场所

遭遇，社会破裂的延伸，以及构成它们的人的转变。

这些机构和先锋党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惊人的。这个党有一个共同的名称、语言和一套策略。它有建立在一起的方式的做法。它的目的是占领和扩大阶级斗争所代表的社会差距。正如格奥尔格Lukács所坚持的那样，列宁的党组织概念优先考虑了灵活性和一致性:党有而且必须有自我转化的能力。哈特和内格里所描述的起义在制度过程中的延伸是另一种理论化政党的方式。

哈特和内格里勾勒出一个诉求的平台，没有载体，没有为之奋斗的身体。他们的制度模型表明，一个或多个政党可以成为这样的载体，但哈特和内格里并没有将其平台呈现为政党平台，而是将其呈现为对现有政府和全球治理机构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但这些要求是谁提出的?)这些要求是关于提供基本的生活手段、全球公民身份和进入公地的要求。哈特和内格里承认，“不幸的是，今天的统治权力甚至无意满足这些基本要求”(哈特和内格里2009,382)。哈特和内格里的回应是笑声，“一种创造和欢乐的笑声，牢牢地扎根于现在”(哈特和内格里2009,383)。难怪他们不把自己的诉求作为一个政党的平台来呈现。这些要求是不值得争取的。它们标志着在对资本主义控制的共同限制的生命政治生产中已经存在的潜力。

哈特和内格里暗示，政党形式已经过时。我认为，当代网络不仅产生了“少”和“多”的幂律分布，而且新兴的等级制度——特别是当人们从已经从政治运动中出现的先锋队和实践的角度来理解时——指出了政党组织出现的方式。当前这种趋势的例子包括采用共同的策略、名称和符号，将以前分离的、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竞争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当地方政治和议题政治通过一个共同的名称联系在一起时，一个领域的成功会推动整个斗争。单独的行动成为自己加上所有其他的行动。他们灌输热情，激发模仿。我们许多人都相信，资本主义危机已经到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我们知道，这个体系是脆弱的，它产生了自己的掘墓人，它是由一个压制性的国际国家结构把持的。然而，我们却表现得好像不知道这一点。党提供了一种形式，可以让我们相信我们所知道的。正如我们从列宁那里学到的，革命政治意识是在党内组织起来的集体视角，以党的理论和深远的历史任务为导向。没有党，人民是很难看清的。他们的行为被拉拢和取代，被引导和包装，以支持他们反对的制度。在交流资本主义中，多重抵抗模糊成一份意见和选择的菜单，选项与真相脱节。遗产

人民的斗争和他们的群体事件是由大学、文化和短暂的组织传达的，它们受制于资本主义的要求，并作为活的资源而失效。系统的力量重新出现，成为重要力量的中心——沟通、流通、积累。如果我们想要打败这些系统，我们就不能重复或强化它们。我们必须抓住它们。这需要政治组织。

那么，回到生存者和制度的主题:当代理论中的这些倾向遮蔽了主体的空间，使我们无法承认交往资本主义中的矛盾——但长尾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可以被组织、集中、政治化。更进一步，一些新兴的等级——话题标签、共同的形象、职业甚至政党等共同的政治形式——成为争论、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超越批判的是集体性。

## 参考文献

Badiou, Alain. 2009. *Theory of the Subject.* New York: Continuum. Barabasi, Albert-Laszlo. 2003. *Linked.* New York: Penguin.

Bosteels, Bruno. 2011. *The Actuality of Communism*. London: Verso. Canetti, Elias. 1984. *Crowds and Powe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Dean, Jodi. 2012. *The Communist Horizon*. London: Verso.

Dean, Jodi. 2016. *Crowds and Party*. London: Verso.

Gerbaudo, Paolo. 2017. *The Mask and the Flag: Populism, Citizenism and Global Protest.* London: Hurst.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9. *Commonweal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Qui, Jack Linchaun. 2017. *Goodbye iSlave*: *A Mani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Williams, Alex. 2015. ‘Control Societies and Platform Logic.’ *New Formations* 84/85: 209–227.

第十五章

# 主题、语境和批判模式:对乔迪·迪恩章节的反思

宝琳娜·坦巴基

在《*哲学与现实政治*》一书中，雷蒙德·高斯对政治的理想理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理想理论从他们假定为历史不变的“几个一般原则”开始(2008,7)。他们解释和证明这些原则，然后得出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和行动的结论。这些理论缺少对高斯所说的“行动语境”的反思，即影响人类动机和塑造政治行动的历史情境(高斯 2008,9 - 11)。高斯坚持认为，任何负责任的(和现实主义的)理论都必须考虑到这些行动背景。因为它们构建并增强了我们对政治的理解，以及政治可能被重塑的方式。乔迪·迪恩(Jodi Dean)对交往资本主义条件的研究就是这种框架的例证。

迪恩解释说，交往资本主义去主体化了。它使得人们很难看到有能力进行政治行动的政治主体，因为在这种语境下，执行这种行动的集体被封锁了。集体被溶解为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愤怒的个人，集体被怀疑，被视为过时。与此同时，根据迪安的说法，自我管理、自力更生和自我关怀的新自由主义口号进一步发挥了作用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Tambakaki, P. 2019. Subjects, Contexts and Modes of Critique: Reflections on Jodi Dean’ s Chapter.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 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183–186.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I: https://doi. org/10.16997/book29.o. License: CC‐BY‐NC‐ND 4.0

单数。它们强化了个体生存的主题，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们削弱了旨在改变——而不仅仅是批评——个体化趋势的集体化的前景。对迪恩来说，集体主体有能力改变政治，这些主体在群体的平等主义释放中找到了原始表达。虽然这些释放是暂时的，但它们表明，有可能超越交往资本主义的个体化，最终是去政治化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人群(用户、关注者、话题标签等)以其幂律分布(传播资本主义矛盾地产生了幂律分布)，按照迪安的说法，为更有力(因为它是分裂和集体的)的政治化主体的出现提供了契机;更持久(因为它会在事件发生后持续存在);也更激进(因为它的目标是取代和夺取体制)。迪安认为，这一课题需要努力。政治组织，以先锋队的形式，推动着这项工作向前发展，取消了交流资本主义的正常化。或者用迪安的话来说:“超越批判的是集体”。这一论证无疑引发了关于批判的局限性的令人耳目一新的问题。

长期以来，政治理论一直痴迷于批判在变革政治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从波尔坦斯基和恰佩罗呼吁重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艺术批判，以抵制资本主义(2007)，到强调为争夺和扰乱政治而出现的过度行为的斗争理论，很难忽视变革与批判之间建立的密切联系。在争论、抵抗和异议暴露排斥的假设的背后，关于批判的好处已经形成了共识，就其为另类政治提供可能的开放而言。当迪恩告诉我们，为了改变社会政治结构，需要的是集体，而不是批判时，她动摇了这种共识。迪安认为，在交往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批判是不够的，她是对的。虽然关于当代政治的意义和实践存在着多种争议，但这些争议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像*Aganaktismenoi*或占领运动这样的群体事件，一旦事件结束，往往就会消失。个性化的机会也更多，而被理解为过程的集体化的机会很少。还有脆弱性、剥削、愤怒和从众——换句话说，去主体化，就像迪恩解释的那样。但集体化是这些发展的答案吗?或者用更夸张的说法来表达同样的问题，更多的政治是缺乏变革政治的答案吗?

毫无疑问，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集体声称要解决的问题的诊断——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化和单一性的趋势激发了许多当代行动主义和某些数字批评流派。但是，如果在诊断中没有分歧呢?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我发现迪恩对交际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政治挑战的描述令人信服。然而，这种共识正是促使我进行第二步思考的东西

迪恩的诊断是否最终会削弱这样一种观点，即一个集体*可以*在幂律分配的开放中产生，也可以在幂律分配的开放中产生。对动词“can”的强调在很多方面都与文献中一个熟悉的、即使不是老生常谈的论点有关。当谈到被剥削者的崛起，甚至是墨守成规者的崛起时，考虑到他们在统治他们的制度和话语中明显丧失了能力，人们对他们的崛起能力产生了质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很难看到如何克服交往资本主义的去主体化，超越个体化倾向，形成集体。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交往资本主义确实产生了群体，而这种群体向集体做出了姿态——尤其是当它们能够提供分裂、主体化和平等主义要求的微光时。但是，如果这些群体没有传递任何政治，因为他们没有设法引起对群体事件的反应，那会怎么样呢?这里的问题与其说是集体因为丧失能力而无法形成，不如说是先锋队没能让群体的表象持续下去。当我们想到关于政治组织的讨论中固有的分歧时，那么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合理的，即先锋队可能无法立即对抗复杂的沟通网络所建立的等级制度。而如果先锋不能立即获得，那么群众可能就是我们唯一能做政治*和*批判的东西了。例如，当我想到占领运动时，我不能否认他们基于“我们是99%”的口号对体制建立的批评的有效性。然而，我想质疑的是，这种批评是否给政治建制带来了任何破裂——如果确实如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破裂。换句话说，我想通过这个例子提出的主张是，人群形成的批评可能在事件发生后持久，而不会立即导致任何变革性的政治。这种不断扩大的变革与批判之间的分裂，不仅要求我们认真地重新思考批判的目的(甚至可能是局限)，也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民主与批判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习惯于认为民主是开放的场所，不可避免地也是变革与批判的场所。

迪恩对民主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哈特和内格里对民主实践作为变革工具的信念。她认为，民主实践利用了不平等的结果和一对多的分配。民主被理解为“人民”使用和前进的选择，它产生了“重要的”标签，这些标签助长了不平等，巩固了等级制度。由于这些原因，民主，以及哈特和内格里偏爱的横向和自治组织模式，作为变革的平台太过有限，不是因为变革难以实现，而是因为这些机构很容易被取代，成为支持他们试图抵制的剥削制度的工具。这一发人深省的论点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变革*是如何*在民主制度内部和通过民主制度发生的(如果有的话)。的确，如果民主的词汇，如迪恩所暗示的那样，支持交流资本主义，那么也许就在那里

期待变革可能通过民主制度来实现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投资民主制度也没有什么价值。

因此，迪恩建议，现在是时候从民主制度中撤掉投资，并期待在共产主义共同的世界周围出现另一个更政治化、更平等的世界。*按照哈特和内格里的说法*，她告诉我们的共同点是等级制度。它的等级制度要求一种激发忠诚和变革的对立政治。但是，如果这种共同(数字化与否)类似于雅克·朗西<s:1>(1999)通过警察的命令所理解的东西，从而作为一种不受集体(如果是短暂的)主体化以外的任何事物影响的东西呢?大多数设想另一种政治的尝试都面临着这种严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触及了由交往资本主义产生的现有焦虑。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增强我们的能量，重新审视政治、民主和批评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个方向上，迪安的《集体还是批判》(Collectivity or Critique)起到了鼓舞人心、发人深省的引领作用。

## 参考文献

Boltanski, Luc and Eve Chiapello. 2007.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Geuss, Raymond. 2008. *Philosophy and Real Politic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ancière, Jacques. 1999.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Julie Ros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第十六章

# 平台党:大数据时代的政治组织转型

Paolo Gerbaudo

## 1. 简介

每一代人的宪法，著名的孔多塞提出，认为制度体系必须适应历史的变化。对于每一代人的组织形式，人们可以反唇相讥，见证政党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的历史变化。当一个人说出“党”这个词，即政党，至少对大多数左派来说，思想飞向一个非常具体的政党形式，法国政治社会学家莫里斯·杜维格(Maurice Duverger, 1959)所说的“群众党”，这种政党出现在工业时代的高峰时期。但是，历史上也存在过许多其他形式的政党，比如19世纪盛行的名人政党。在大众政党衰落之后，出现了新的政党类型，如奥托·基奇海默(Otto Kircheimer, 1966)和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和彼得·梅尔(Peter Mair, 1994)分别描述的所谓的“包罗万象的政党”和“卡特尔党”。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新的政党类型正在兴起的时代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Gerbaudo, P. 2019. The Digital Par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Organisation in the Era of Big Data.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187–198.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I: https:// doi.org/10.16997/book29.p. License: CC‑BY‑NC‑ND 4.0

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在不同的政治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的政治形态。这就是我在本章中讨论的“平台党”或“数字党”，即与数字社会相对应的“政党类型”，就像群众党反映工业社会的本质一样。

平台党也可以被描述为“数字化”，因为它采用数字技术作为沟通和组织的关键手段。这种新兴的模板体现了在数字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新的组织形式、新的价值观和社会关系。平台政党的例子是多种多样的，在非常不同的国家背景下都可以找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意大利的“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北欧国家的“海盗党”(Pirate Party)、法国的“不受损害的法国”(La France Insoumise)，以及英国的“动量”(Momentum)等组织。这些组织被描述为“数字政党”、“互联网政党”或“网络政党”，因为他们将自己呈现为新组织形式和数字社会新价值观的捍卫者。

这种数字特征在其外部沟通和内部组织的不同深度上都是可见的。在外部，这些组织利用Facebook和Twitter等社交网络的力量，或专门的YouTube频道，建立了庞大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基础。在内部，他们开发了一些在线决策平台，邀请所有注册成员讨论和投票政策、候选人和领导。然而，这些特征似乎不足以将这些政党归类为属于同一组。它们的共性远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多，有一些东西使它们相互联系起来是合理的，即使其他也利用数字技术的各方被排除在这种联系之外。例如，为什么我们可以声称动量党是一个数字组织，而(英国)保守党不是?或者，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五星运动党比它的对手、中左翼的民主党更符合理想的纲领党类型?上面提到的跨越左/右鸿沟，经常声称完全超越它的阵型，有什么共同点?数字化政党的典型组织形式是什么?平台派对又如何反映数字文化的本质，以及社交媒体和大数据时代出现的主体性和权力的新形式?

平台党不是简单地在纯粹的工具意义上使用数字技术的政党，作为实现特定目的的一种方式，同时在其他方面保持过去的组织形式和动态;相反，这种变化要深刻得多，也要系统性得多。这些政党追求对其组织形式和理念进行深远的重组，其方式与数字社会的本质及其对直接性、非中介性、互动性、适应性和瞬时响应性的驱动相一致(Van Dijck 2013)。这些组织形式预示着一种修补和简化的尝试

政治，从而回应了公民与政治进程之间巨大差距的感知。它们追求定制化、适应性和互动性，在某种程度上使它们类似于facebook、Airbnb或优步(Uber)等社交媒体和应用程序平台。

这种组织重组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参与主义”，即信仰普通民众在讨论、决策和行动中不受限制的参与是一种向善的力量。然而，这种尝试并没有导致一种纯粹的水平状态，也没有导致代表制和等级制度的全面终结，就像一些最狂热的数字去中介化的布道者会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事实上，虽然消除了官僚群众性政党中存在的一些中介形式，特别是所谓的官僚、官僚和地方干部的中介层面，但平台党并没有走到消除高层领导的地步。相反，许多这样的政党都以强有力的领导为特征。他们既是“参与主义者”，也是“总统主义者”。在他们内部，去中介化的驱动力采取了组织两极分化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超级领袖——一个有魅力的、媒介化的、名人文化知情的领袖——在超级基础中反映自己，并与超级基础结盟——一个由所有党员或“用户”组成的高度活跃和反应迅速的数字集会，这发现了日常参与社交媒体对话的新机会，以及在所有这些组织建立的在线“参与平台”上进行的讨论和决策。

## 2. 从工业党到平台党

在每个历史时代，生产方式和我们可以称之为“组织模式”的东西之间往往存在类比，即当时普遍存在的一套组织机制、实践和结构。换句话说，政党具有历史特殊性:它们不是自上而下强加于社会的组织结构，而是为了有效而必然包含和反映任何特定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特有的社会倾向的现象。

正如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尔科·雷维里(Marco Revelli)所主张的那样，群众性政党——体现了工业社会的生产逻辑，体现了适合于那个时期的社会经验的组织结构和形式。这个党开始变得像福特主义的工厂，通过建立一个坚实而沉重的组织结构，其特征是外部的强烈封闭，以及内部的等级和垂直整合。因此，群众性政党是工业社会的完美镜像，它倾向于“将大量的人以稳定的方式结合起来，通过将他们安排在坚实和永久的结构中”。(Ravelli 2013)。党被设想为一个工厂，政治必须通过集体的“政治工作”来生产，就好像它是一种制造，受到泰勒主义效率和合理化标准的启发。在这样的结构中

武装分子相当于流水线上的工人，地方干部相当于生产技术人员，中央委员会相当于企业管理机构”(同上)。用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监狱笔记*》(the Prison Notebooks)中的表述，我们在这里遇到的党是一个“现代君主”:一个神经中枢，通过它来协调政治行动，征服国家，同时控制社会，遵循伟大的福特主义工厂(1971)的垂直整合逻辑。

由于从六十年代开始发展的一系列深刻的经济和文化转型，这种组织模式陷入危机，主要是由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的危机积累模式削弱了工人阶级和旧资产阶级。新的抗议运动的兴起，1968年的学生抗议、生态运动、女权主义和城市抗议，是一个越来越难以垂直整合的社会日益复杂的标志。新自由主义时代猖獗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取代了-工业时代的政治战斗性。

群众性政党危机为政治科学中通过一系列概念讨论的新政党形式开辟了道路:“职业选举党”(Panebianco, 1988)、“包罗万象的党”(Kirchheimer, 1990)和“卡特尔党”(Katz and maair, 1995)。我们分析的目的似乎是指出，这些术语最终指向同一个趋势:一个新的“轻”后福特主义政党的出现，作为大众政党的替代品。“电视党”是我在本分析中更愿意采用的术语，因为对于这种政党来说，电视，而不是新闻界或党报，成为与选民沟通的主要渠道，并取代了坚定的战斗性。这一转变涉及到政党组织结构的深刻转变。首先，纲领党是一个失去活跃的激进分子基础支持，注册党员数量严重下降的政党。其次，它是一个不再具有群众党那种沉重的官僚结构，而是采用一种看起来更像选举委员会的轻结构的政党，正如“专业选举”政党的概念所表达的那样。第三，它是一个与群众性政党不同的政党，不再有明确界定的社会基础，而是根据情况寻求机会主义地从不同的社会人口结构中获得支持，因此它也被描述为“包揽一切的政党”，甚至是“意见党”;一个不再以预定义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是追逐稍纵即逝的愿望和意见的政党。

电视党是意大利人熟知的一种政党类型，因为它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和他的“政党-公司”意大利力量党的政治冒险中得到了体现。对于这个政党来说，媒体进程发挥着核心作用，因为它可以进入电视，对民众具有影响力，在贝卢斯科尼的情况下，他拥有全国一半的电视频率，这保证了他的影响力。它也是一个引入了强烈的政治个性化的政党，其中面对的是

领导人以演员的角色进行政治表演，成为可识别性的核心来源，也是在公民和党之间建立情感联系(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话来说)的手段(1971)。也正是因为它几乎完全依赖电视露面作为联系领导人和人民的手段，电视党因此失去了积极的战斗性的支持。

根据雷维里的分析，电视晚会体现了生产方式向后福特主义社会的转变。这个党不再像福特式的工厂，而是服务公司，尤其是传播和广告领域的服务公司，它们是后工业服务经济的先锋。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在他的公共广告公司(Publitalia)的地域网络和他的电视频道的媒体火力基础上创立了意大利力量党(Forza Italia)。电视党内化了用来理解和操纵人民欲望的营销和广告技术。它是一个由一小群传播顾问、民意测验专家和公关专家组成的政党。它将政治视为消费领域的延伸，并将公民视为“选举市场”，可以像对待任何其他商品和服务市场一样对待，其中战略区域由中间派选民代表，更有可能在政党之间摇摆。它也是一个在选民中产生被动态度的政党，这让人想起电视观众的“沙发土豆”习惯。一个把政治变成综艺节目，迫使公民陷入冷漠和幻灭的政党。

在这种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站在政党形态演变的一个新阶段。社交媒体和应用程序的扩散，以及Facebook、Twitter、Uber、Airbnb等许多Web 2.0公司的崛起，标志着生产方式的深刻转变，正在催生一种新型派对的兴起。数字党在其理念中反映了“网络社会”中出现的新趋势(Castells 2011)，就像大众党反映了工业社会的性质和趋势，电视党反映了后工业时代的新趋势一样。第三，平台党不是一个阶级政党。相反，它是一个具有强烈包容性和跨阶级倾向的政党。虽然这些政党依靠贫穷的中产阶级中较低和较年轻的部分来获得选举支持，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吸引阶级，而是吸引作为这些阶级一部分的个人。第四，它不是一个意识形态政党，或者至少不是狭义的、二十世纪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政党。纲领党没有改变社会的长期救世主般的愿景，而是对那些被认为是具体而直接的问题有偏好。

总而言之，用创业公司和软件行话来说，平台党是一个“轻巧”、“敏捷”但又强大的政党结构。它的组织骨架很轻，但在成员参与的深度和强度上却很强大;上层敏捷，基层反应强烈。因此，它结合了在过去的政党中似乎不可调和的两个特征:精益指令

结构和一个积极的，虽然主要是在有限意义上的“被动的”，激进的支持基地。

## 3. 作为纲领的党

平台党是政党在社交媒体和应用时代采取的形式，此时，新的在线交流、工作和购买形式正在彻底改变各种社交模式。这种技术上的变革是如何导致政党性质的改变的?我们可以党、五星运动党和海盗党等组织大量使用的社交媒体和在线平台对数字党有何影响?按照我们前面关于生产方式与组织方式类比的讨论，可以说，平台党内化了数字时代社会经验的新形式，以及在其中盛行的生产、消费和人际关系形式。这些趋势的核心是数字平台所扮演的角色，这是平台党别名的起源:“数字党”。

在政治科学中，“平台”一词通常用来指政党的政治纲领，即他们所追求和向选民提出的一套政策。然而，在数字政党的背景下，我们想到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平台。这里暗示的平台是数字“平台”，这个术语用来描述一系列在线服务的内在逻辑，从Facebook和Twitter到优步和爱彼迎等消费者应用程序，这些服务已经定义了社交媒体和大数据时代。这些公司和其他公司使用的数字平台是微型操作系统，是各种程序和应用程序的执行环境，使用户能够完成各种各样的活动:与朋友和熟人社交(Facebook);发布个人想法或新闻(Twitter);寻找情感伴侣和性伴侣(Match.com、Tinder);叫出租车(优步、Grab等);或预订住宿(爱彼迎、Booking.com等)。

在过去的几年里，人们对这类平台的性质及其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议论纷纷。媒体理论家乔斯·汉兹(Joss Hands, 2013, 1)将平台定义为“基于“云”的软件模块，充当不同类型信息的门户，嵌套的应用程序聚合内容，通常由“用户”自己生成。在Nick Srnicek(2016, *43)的新书《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中，他将平台定义为“允许两个或多个群体进行交互的数字基础设施”。因此，它们被定位为“连接多个用户的中介:客户、广告商、服务提供商、制造商[…]，甚至是实物。”“在线平台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们去中介化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方式。然而，这种去中介化的过程带来了更复杂的现实。事实上，通过去中介化，平台创造了新的数字中介，这些中介与新的权力关系齐头并进。

数字平台引入的去中介化/再中介化围绕着一系列关键要素:它们对用户产生的数据和信息的依赖，用“用户生成内容”一词来表达;它们高度的个性化;他们的聚合逻辑允许，例如，有相似兴趣的人相互认识，或者在某个地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系，或者广告商瞄准一个利基市场;这类系统的部分封闭或“封闭”特征，作为利用“网络效应”的手段。在线平台试图通过构建能够即时拦截消费者需求的系统来应对当代社会和经济的极端可变性;通过开发关于个人行为和消费者选择的复杂智能形式;通过创造新的服务来快速响应新的需求(或创造新的需求);通过新的经纪形式“扰乱”已有的市场，就像优步(Uber)和爱彼迎(Airbnb)等公司所说的“数字颠覆”一样。

平台各方反映了支撑社交媒体和应用世界的新平台逻辑的不同元素。首先，平台方在其业务中整合了一系列在线平台，从Facebook和Twitter等用于外部通信的社交媒体，到WhatsApp和Telegram等用于内部通信的各种即时通讯服务。其次，平台党开发了自己专用的讨论和投票平台:即所谓的“参与式平台”，这已成为他们试图建立直接和参与式民主形式的象征。这些组织采用数字公司的数据挖掘、聚合和分析逻辑，将其用于创造共识和政治动员的目的。与Facebook、Twitter和Airbnb等公司的情况类似，平台各方团结在同一个“数据库”公民中，这些公民尽管有各自的特点，但由于共同的利益、需求和愿望而团结在一起。例如，法国Insoumise使用NationBuilder软件为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elenchon)的竞选活动招募了50万支持者，只需让他们按一下“je soutien”(我支持)按钮。或者看看其他政党是如何利用参与式平台和社交媒体账户聚集数千名支持者的，而且往往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因此，在线平台不仅成为这些政党的参与性架构，而且有效地成为一种组织“脚手架”，用于弥补它们缺乏可靠的官僚结构，这种结构在20世纪的政党和工会中发现。

## 4. 云/创业/论坛

平台党采用数字公司的平台逻辑，来体现一些与数字文化相关的典型功能和特征。平台派对的这种倾向在各种“面孔”上可见一斑

对应其运营不同方面的平台方:云方、创业方和论坛方。
首先，平台方是一个*云方*，一个像在线软件平台一样可以被任何设备、任何地方访问的敏捷方。在这种背景下，数字通信成为构成传统政党组织结构的办公室、圈子和部门等物理基础设施的替代品。平台党也是一种*创业党*。它分享了初创企业的快速增长速度，它们有能力迅速扩大规模，以应对消费者对其产品和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这种动态与这些政党与社会运动的相似性是平行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经常被描述为“运动政党”——但也与这些组织的“气态”和极其灵活的性质有关，这是由于它们缺乏可靠和稳定的组织基础设施。然而，初创企业的另一个特点是“儿童死亡率”很高。事实上，虽然有许多平台党成立，但很少有从初创企业成熟为成熟公司的。
这些组织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启动阶段和热情支持氛围的营造。平台方试图激发基地的热情，在他们的社交媒体渠道上使用高度情绪化的沟通，并举办象征性的活动来展示他们所享受的支持，在这些场合中，他们虚幻的在线支持者群体暂时表现为实体人群。
平台党最终是这样一个政党，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持者的参与程度，以及他们在其组织和交流平台上展开的讨论。因此，它可以被描述为一个*论坛党*，指的是维持其日常存在的在线讨论论坛，这些论坛构成了所有成员永久数字集会的场所，在那里讨论从当前新闻到政策，甚至到候选人和领导层的最多样化的话题。平台党这种参与性特征正是铭刻在其平台性质中，这使得该党类似于一种“容器”，其内容以过程为导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成员之间的持续互动。
平台党生活中的参与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其正规化程度或高或低。一方面，参与发生在社交媒体上，在facebook和Twitter等渠道上进行持续的讨论，最终告知这些编队的定位。另一方面，它是在决策平台上以更正式的方式进行的，这些决策平台构成了数字政党的真正核心，并且对这些政治组织的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困境决策是在这里进行的。
“我们可以党”、“五星党”和“海盗党”都建立了自己的参与式平台，这是这些平台政党最重要的组织创新。这些平台在标志着这些政党与传统政党的区别上获得了极大的重要性

被指责对选民意愿充耳不闻的政党。这些参与性平台似乎不仅迎合了参与的欲望，也迎合了后工业社会的极端分裂和分散。
数字论坛就像古代的论坛一样，是一个聚集的空间，是一个聚会的场所，否则会被原子化的个体可以参与集体讨论，并采用共同的身份。这种集群式的操作，与Uber、Airbnb等应用程序的逻辑，以及它们对用户进行剖析并将其聚集到微生态位的方式有相似之处。如果说在商业平台的情况下，目的是将消费者与给定服务的生产者联系起来，那么在平台方的情况下，则是将所有对某项政策和相关公共产品(如清洁空气或公共教育)感兴趣的人聚集在一起。平台党是一种聚合系统，它回应了这样一种社会状况，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众——工业时代大众党赖以存在的关键隐喻——不是起点，而是在互联网上进行的讨论和审议中持续的漫长政治过程的结果，并通过认同一位有魅力的领袖来实现，这位领袖作为从这种互动中出现的“普遍意志”的发言人。

## 5. Superbase和Hyperleader

所有平台政党的核心承诺是超越现有民主的深度危机的新民主。这些政党之所以充满活力，是因为他们诊断出，当代社会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不安全感和不公正，是选民与他们选出的人之间脱节的结果，是越来越脱离普通民众需求的政治阶层的背叛。为了应对这一状况，平台政党利用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手段，构建与数字时代的社会经验相适应的新型民主参与形式。平台党对激进民主的承诺，围绕着直接和参与式民主的崇高工程展开，在这个崇高工程中，公民完全绕过他们的代表。然而，这种技术乌托邦式的叙述与现实并不相符。采用或多或少激进的数字民主形式，并没有导致组织等级制度的彻底消除，也没有导致政党形式中固有的基础与顶点之间的不对称，而是导致了对这种关系的彻底重新定义。
为了理解这种重组，我们必须回到20世纪初罗伯特·米歇尔斯(1915)提出的关于政党形式的本质和存在于民主、组织和代表制之间的有问题的关系的经典辩论之一。米歇尔斯认为，政党的特点是寡头政治的铁律，可以总结如下:民主需要组织;组织具有寡头倾向的特征，不可避免地会被一个小的统治阶级所支配;

因此，民主是不可能的。这些民主与组织之间的矛盾，在数字政党的背景下重新浮出水面。

平台党被呈现为激进的民主政党，希望让公民对集体决策有直接的发言权，从而消除了被怀疑扭曲民主进程的调解形式。然而，这是一个悖论，它们的特点往往是存在高度集中和统一的魅力型领导。这两种趋势如何共存呢?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需要准确理解这些各方提供的是什么样的去中介化。因此，去中介化涉及到以牺牲中间结构、党的官僚机构和党的干部为代价，加强组织极端——基础和顶点。平台党将基础视为成员的同义词，但也指“超级基础”(superbase)的出现——用化学中的术语来描述一种极其基本和反应性的化合物——也就是说，成员由于持续参与在线讨论和投票而获得强大的议价能力。然而，在另一个极端，伴随而来的是“超级领袖”的出现，他享有巨大的权力和行动自由。超级领袖的权力来自于参与决策平台，如前所述，这些决策平台主持各种提案和政治问题的磋商。

这些民主进程为普通成员参与以前由代表控制的决策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此外，它们还促进了参与性政策发展新形式的有趣实验。然而，一些问题指出，这些形式的在线参与的民主质量有限。首先，人们对这些平台的工作人员在协商时机和问题制定方面所拥有的影响力水平提出了质疑。其次，此类磋商召开的频率过低，受到了批评。第三，在某些情况下，有人指控操纵这种磋商，这很可能是在没有外部验证的专有系统上进行投票的情况，就像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经常发生的那样。最后，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磋商都得到了高度预期的结果，绝大多数人支持党的领导层所青睐的选项。普通民众的反抗非常罕见。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2014年1月的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中，尽管格里洛(Grillo)和卡萨莱乔(Casaleggio)提出了相反的建议，但选民投票支持废除非法移民罪。然而，加强基地的权力并不意味着这些政党创造了一个横向的决策空间，这是主张直接民主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所希望的。超级基础反映在一个超级领袖身上，这是一种高度集中和个性化的领导，它在魅力领袖的身体上具体化。这一现象不仅影响政纲政党。在特朗普、桑德斯、姆萨伦钦、萨尔维尼和马琳·勒庞的时代，

这种倾向在最多样化的背景下表现出来，特别是在反建制和民粹主义的形成中，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

在“我们可以党”的内部辩论中，“超级领袖”一词被用来形容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的角色。在这种背景下，“超级领袖”被理解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他的任务是在媒体领域代表党及其成员。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在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的早期阶段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当时他把自己长期担任喜剧演员积累的象征资本借给了该运动。

超级领袖往往也是创始人，没有这个人，政党就不会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数字公司创始人的情况类似，比如Twitter的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或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这表明，在2014年5月的欧洲选举中，选民在选票上“我们可以党”(Podemos)字样旁边发现的标志不是该党的圆形标志，而是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Pablo Iglesias)坚定而愤怒的照片。从维基百科的创始人吉米·威尔士到Linux的创始人莱纳斯·托瓦兹，在许多数字文化现象中，这位超级领袖和“仁慈的独裁者”的形象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与这些人物的情况一样，超级领袖将自己呈现为党及其创始原则的最终保证人。

超级基层的干预大多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需要超级领导人不断地后退，两者之间的冲突联盟是为了粉碎中间层——传统政党的官方的、沉重的官僚结构——许多人怀疑这扭曲了民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平台党完全没有这样的中间结构。他们依赖于一个人数不多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政治”人员的存在，负责管理他们的资源、沟通渠道和平台。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结构让人想起社会运动，严重依赖于志愿者提供的免费劳动力。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它可能会呈现出“政治企业”的特征，一个政党公司，以恢复20世纪90年代用来描述意大利力量党的概念。

在五星运动党(Five Star Movement)的案例中，这种扭曲——不能称之为扭曲——是显而易见的。该党的标志被注册为商标，决策平台的管理被分配给一家私营公司——Casaleggio Associati。它的作用远远超出了单纯的传播咨询，而更接近于一家外包的政治管理公司。毫无疑问，与大多数传统政党相比，这是一种保证了高水平效率的组织模式，但这种效率是以民主和透明为代价获得的。

平台政党内部正在出现的新的权威形式和组织形式，将是一个争论多年的问题。然而，在这个阶段已经可以说的是，海盗党、五星运动和我们可以党等新兴组织已经成功地颠覆了一种疲惫的政治格局

，并展示了一种非凡的能力来试验新的组织形式，这些组织形式显示出巨大的潜力，并促进了成千上万以前远离政治进程的人的动员。然而，数字政党也显示出他们提出的直接参与和脱媒的主张与他们对有魅力和高度集中的领导的依赖之间的重大矛盾。这些矛盾是否能成功解决，或者平台党最终是否会以另一种铁律取代寡头政治的铁律，这种铁律以超级领袖的仁慈(有时也不太仁慈)独裁为中心，还有待观察。

## 参考文献

Castells, Manuel. 2011.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1).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Duverger, Maurice. 1959.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London: Methuen & Co.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 Gramsci.*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Hands, Joss. ‘Introduction: Politics, Power, and “Platformativity”’. *Culture Machine* 14.

Katz, Richard S. and Peter Mair. 1995.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 *Party Politics* 1 (1): 5–28.

Kirchheimer, O. (1966).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in J. LaPalombara and M. Weiner (eds.), *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irchheimer, Otto. 1990. ‘The Catch-All Party.’ In *The West European Party System*, ed. Peter Mair, 50–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ncini, Paolo. 2013. ‘The Italian Public Sphere: A Case of Dramatized Polarization.’ *Journal of Modern Italian Studies* 18(3): 335–47.

Michels, R. (1915). *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New York: Hearst’s International Library Company.

Panebianco, Angelo. 1988. *Political Parties: Organization and Powe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velli, Marco. 2013. *Finale di partito*. Turin: Giulio Einaudi.

Srnicek, Nick. 2016. *Platform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Van Dijck, José. 2013. *The Culture of Connectivity: A Critical History of Social Med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十七章

# 运动党-在数字时代赢得选举和改造民主:对保罗·格博多章节的反思

阿纳斯塔西娅·卡瓦达

政党在数字时代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保罗·格博多在他对这本编辑过的书的贡献中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即他们关注的是左翼和右翼的政党，比如意大利的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或西班牙的我们可以(Podemos)。作为对Gerbaudo观点的回应，我想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观点:第一，政党形式的演变可能更好地解释为通信技术的变化，而不是经济组织模式的影响;其次，Gerbaudo所描述的平台(或“数字”)政党也是*运动政党*，它们围绕着相互矛盾的目标——赢得选举游戏和改变代议制民主制度——组成，这一矛盾可以解释它们的组织结构。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Kavada, A. 2019. The Movement Party –Winning Elections and Transforming Democ-racy in a -Digital Era: Reflections on Paolo Gerbaudo’s Chapter.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199–204.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I: https://doi.org/10.16997/book29.q. License: CC‐BY‐NC‐ND 4.0

Gerbaudo令人信服地指出，他所说的“数字党”有三个关键特征:它基于位于云上的数字资产基础设施，它作为基层互动的论坛，它在敏捷性和“高死亡率”方面类似于初创公司。然而，根据Gerbaudo的说法，加强党的基层并不会导致党的等级结构的减少。它只是稀释了党的中层干部，创造了一个充当党的化身的“超级领袖”。

在追踪这些变化的过程中，Gerbaudo认为，“在每个历史时代，生产方式和我们所谓的‘组织模式’之间往往存在类比，即当时流行的一套组织机制、实践和结构。”

继Revelli之后，Gerbaudo认为，在工业时代，党被设想为福特式的工厂，采用等级和官僚结构来协调大量的参与者。20世纪60年代末之后，政党组织沿着强调灵活性的后福特主义模式发展，而权力则集中在少数技术官僚手中。这种新形式通常被称为“电视党”，旨在吸引更广泛的选民，而不仅仅是代表特定政治阶层的利益。在这一历史轨迹中，平台/数字党构成了与以Facebook和谷歌等初创企业和数字公司为代表的新型经济组织相对应的最新形式。

虽然Gerbaudo对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类比令人回味，但他的文章并没有详细解释为什么这些形式是相关的。Gerbaudo还暗示，在特定时代，流行的组织模式来自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因此，工业时代的政党遵循工厂的组织模式，而不是相反。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并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公司和政党的组织是围绕不同的目标组成的时候。前者的目的是为了盈利而生产和销售商品和服务，而后者则以赢得选举和夺取国家控制权为目标。

另一种或许更合适的解释可能是，经济组织模式和政治组织模式之间的相似之处，部分源于通信技术的发展，而不是经济形式对政治形式的直接影响。因此，新的生产和分配技术改变了经济组织，这些技术影响了工厂的协调，以符合资本主义对灵活性和降低成本的要求。与此同时，政党形式的演变是在一个日益“中介化”的政治体系(Blumler and Kavanagh 1999)和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中，共同努力吸引选民的结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政党的组织主要集中在协调当地的志愿者，他们会散发传单，敲门

登门宣传，招募新党员，动员潜在选民参加政治集会。正如诺里斯(2000)所说，在这个前现代的选举运动时代，政党机制是基于党派媒体和政党志愿者与选民之间的直接互动。随着20世纪30年代广播的出现，尤其是电视的出现，大众传媒的兴起，将竞选活动带入了一个“现代”阶段。正如Gerbaudo在他对“电视党”的分析中所暗示的那样，现代时期的政党形式集中在电视竞选活动的使用上。政党在广播媒体上的战略形象是由一小群党内技术官僚和“舆论专家”在“作战室”竞选模式下从幕后控制的。党因此变得越来越集中，而基层的影响力被削弱了。政党的组织在“政治事件的安排[…]，政治语言[…]以及其呈现的个性化(对最高领导人的更加关注)”方面被电视的新闻价值所注入(Blumler和Kavanagh 1999年，212)。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竞选活动进入了后现代竞选的“第三个时代”(同上)，以应对24小时滚动新闻的兴起、电视频道的激增和媒体受众的分散。政治营销和选民的微观目标，加上复杂的投票技术，成为竞选活动的关键方面(诺里斯2000)。

在这种背景下，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与两种相互抵消的动力有关。一方面，它通过对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以及数字媒体平台上政治广告的增长，提高了个人的微目标定位。另一方面，互联网促进了基层志愿者的协调，使挨家挨户的竞选活动重新成为主流。这在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的第一次总统竞选中表现得很明显，他利用数字媒体动员了地面上的政党志愿者，并推出了MyBarackObama.com，这是一个竞选团队拥有的社交网站(Chadwick 2013)。讨论论坛和电子邮件列表的爆炸式增长，以及在线公投和咨询的便利性，使政党基础在制定政党政策方面有了更大的投入。

这一简短的历史小品表明，政党形式的演变更能用政党对不断变化的媒体和政治环境的反应来解释，而不是用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影响来解释。经济学似乎发挥更大作用的地方，是在塑造推动组织变革的政治条件方面——即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的相互关联的危机。正如Gerbaudo所言，纲领党出现的时候，人们对政治机构的信任度很低，而公民对政治感到疏远和被剥夺了权力。过去十年的经济危机加剧了这一点，经济危机导致了福利国家的削减和一系列紧缩措施。各国政府似乎既无力也不愿解决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问题

贫富差距，确保经济活动惠及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反建制情绪的高涨，引发了一波反对政治腐败和经济利益对政治体系施加不当影响的抗议浪潮。它还导致了对更直接控制和参与政治的要求，这种要求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从主张国家主权，到对边境控制和不受限制的移民的担忧，再到对更直接和参与性民主的呼吁，要求建立一个更加分散的制度，挑战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局面。

平台政党的组织形式是针对这些政治条件而出现的，在某些情况下是抗议运动的直接结果。五星运动源于对政治腐败的抗议，而“我们可以”党与2011年的愤怒运动有关，后者试图预示一种基于直接参与、透明和拒绝中央领导的不同类型的民主。

因此，Gerbaudo分析的纲领党是*运动党*,*这表明这些政党*围绕的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社会运动围绕着一场挑战其产生的政治制度局限性的冲突而展开(Melucci 1996)。因此，当代政纲政党的运动成分意味着，它们的目标不仅是赢得选举，而且要从根本上改变它们所属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后一种目标意味着，政党不仅仅是一个竞选机器，也是一个试验政党(和国家)治理新形式的空间。这些实验使政党能够更真实地引导普通公民的需求，并在掌权后为其提供创新治理的想法。

然而，作为治理的实验，数字政党在设计基层参与的方式上确实存在差异，这可能反映了它们在政治领域的不同立场。如Gerbaudo所言，如果这些政党是平台，那么他们的平台设计可以揭示他们对民主、政治参与和政党基础权力的更广泛愿望。对这种参与架构的关注也可以帮助我们区分真正致力于激进民主愿景的政党，以及那些仅仅采用基层参与的话语(而不是实际实践)作为赢得更多选票的玩世不恭的策略的政党。例如，当政党基础在问题的制定中没有投入时，在线公投可能比民主更专制。政党数字平台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为其对新治理形式的实验提供线索。例如，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的数字平台Rousseau属于其创始人之一詹罗伯托·卡萨莱乔(Gianroberto Casaleggio)的私人公司，詹罗伯托去世后，这家公司现在由他的儿子戴维(Davide)经营。这使得公司的所有者既可以从政党平台中获利，又可以在内部不担任官方职务的情况下成为守门人

党(Politi and Roberts 2017)。相比之下，Podemos相信免费提供其平台的软件代码，并在其网站上主张开放源代码等于开放民主(Podemos n.d.)。

然而，运动政党组织围绕的两个目标并不总是可通约的。运动政党既要通过遵循现有制度的规则赢得选举，又要围绕一种尚不存在的民主模式塑造自己的组织。这或许可以解释当前政纲政党中超级领袖和超级基础的矛盾存在。超级领袖帮助政党在一个仍然以政治个性化为特征的传播环境中赢得选举。与此同时，正如Gerbaudo所言，超级选民基础的崛起构成了这些政党激进民主政治的一个关键方面。但是，现在就肯定地认定正在出现的新型政党，是不是还为时过早?我们是否仍处于转型阶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运动党在完成转型的过程中，可能仍然会褪去一些特征，尤其是那些从上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超级领袖的形象可以被认为是过去的残余，或者是一个过时的、不再令人向往的现在:一个基于媒体景观、个性化和空洞言辞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这些领导人中有许多是白人、男性、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这一事实增加了这种“d<s:1>乔斯乌”的感觉。人们希望，一旦超级基层找到赢得选举和自我治理的更好方法，超级领导层就会被抛弃。

我并不是说这是一种可能的发展，而是我们可能希望并努力实现的一种发展。在一个“旧的正在死去，新的不能诞生”(葛兰西1971, 276)的政权交替时代，米歇尔的铁律陷入混乱，霸权受到挑战。在这样的时代，识别可能从混乱中出现的新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分析的问题。这也是一个设想和实验的问题，是需要政治意愿、勇气和想象力的先兆实践和自我实现的预言的问题。

## 参考文献

Blumler, Jay G. and Dennis Kavanagh. 1999. ‘The Third Ag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fluences and Feature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6, 209–30.

Chadwick, Andrew. 2013. *The Hybrid Media System: Politics and Power*.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amsci, Antonio.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Smith.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Melucci, Alberto. 1996. *Challenging Codes: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rris, Pippa. 2000. *A Virtuous Circl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demos. *Releasing the Code of Podemos' Digital Heart*. Available at: https:// podemos. info/releasing-the-code-of-podemos-digital-heart/ (accessed 14 May, 2018)

Politi, James and Hannah Roberts. 2017. 'Five Star Movement: The Unan-swered Questions About Italy's Populist Party.' *Financial Times*, 17 Septem-ber. Available at: https://www. ft. com/content/ 546be098-989f-11e7-a652-cde3f882dd7b (accessed 14 May 2018)

第十八章

# 固定资本的挪用:一个隐喻?

安东尼奥·内格里
*Michele Ledda意大利语翻译,David Chandler、Christian Fuchs和Sara Raimondi编辑支持。*

## 1.《数字机器时代的劳工》

在关于数字对社会的影响的辩论中，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假设，即工人，生产者，被数字机器的使用所改变，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数字技术已经深刻地改变了生产方式，以及认识和沟通的方式。关于数字机器的心理-政治后果的讨论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即使本研究获得的结果存在很大问题，也值得记住。

他们通常提出工人对机器的被动服从，一种普遍的异化，抑郁症的流行病特征，算法泰勒主义的定义等等。在这些灾难性的新奇事物中，有一句古老的纳粹格言:“我们生活的地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死亡的矿区，它切割了人类的本质。”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Negri, A. 2019. The Appropriation of Fixed Capital: A Metaphor?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205–214.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I: https://doi.org/10.16997/book29.r. License: CC-BY-NC-ND 4.0

思考数字化的影响似乎要复杂得多，我们可以问问工人的思想和身体是否以及如何适应数字化机器。

让我们安静地记住，如果数字机器对生产者的新影响是在资本的指挥下发生的，那么生产者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对不变资本产生了价值，而且，就他在个人对生产努力的贡献和对数字机器的合作使用上都是一种认知劳动力而言，当这种联系通过认知劳动的非物质流动实现时，他就与机器相连接，并能与机器相融合。在认知劳动中，活劳动可以投入固定资本，它既是认知劳动的实体，同时又是认知劳动的活动动力，尽管它在发展自己的生产能力时也受制于固定资本。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人们开始谈论数字工人(或认知生产者)对固定资本的“占有”。当分析数字工人生产率的提高，甚至“数字原住民”的生产能力时，这些主题和问题就会自发地呈现出来。它们仅仅是隐喻吗?

## 2. 固定资本的挪用

尤其是，它们只是单纯的政治隐喻吗?通过说生产者的“固定资本的占有”(与企业相比，企业的行为是为了利润)，人们会联想到过去50年来在政治和哲学领域产生巨大共鸣的主题。人/机器混合的主题在德国人类学(Helmuth Plessner, Arnold Gehlen, Heinrich Popitz)以及法国唯物主义(Simondon)和唯物主义女权主义(Donna Haraway和Rosi Braidotti)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参见Braidotti 2013, Gehlen 1980, Haraway 1991, Plessner 1924, Popitz 1995, Simondon 2017)。 在此回顾一下瓜塔里贯穿其作品的机械组合理论就足够了，这一理论极大地影响了《*千高原*》的哲学设计(德拉兹和瓜塔里，1987)。也许在这些哲学理论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它们的结构——尽管它们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但都是同质的唯物主义的——显示出了新的特征，这些特征不能简化为过去的任何变体。当然，唯物主义早就抛弃了启蒙运动作家从霍尔巴赫(d’holbach)到赫尔夫萨迪斯(helv<s:1> tius)所阐述的史诗形式，而从20世纪的物理学中获得了明显的动态特征。然而，在上面提到的理论中，它现在显示出一种“人文主义”的印记，这种印记远没有更新“人”的理想主义道歉，而是以对身体的兴趣为特征，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对身体的独特性和密度感兴趣。

今天，唯物主义将自己呈现为一种生产理论，这种生产理论在认知方面和生产本身的合作杂交的影响方面广泛不平衡。是生产方式的变化，

从物质的主导到非物质的霸权，是什么对哲学思想产生了这些影响?由于我不是反思理论的追随者，所以我不这么认为。然而，我确信，唯物主义传统的这种显著变化是与数字生产方式的增长同时发生的。我们现在可以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固定资本的占有”是否是一个政治隐喻?它当然是，如果我们从这个假设中得出*权力*(如果需要的话，构成权力)在政治术语中的定义，而对固定资本的占有，则成为构建伦理和/或政治主体的类比基础，这种主体适用于唯物主义的现在时本体论和尚未到来的共产主义目的论。

## 3. 卡尔·马克思论固定资本

然而，“固定资本的挪用”这一主题的发展并不总是隐喻性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马克思1867/1976;1885/1978;1894/1981)，展示了工人在生产资料(对生产资料的支配)之前的位置如何改变了他的生产能力、他的人格、他的本性、他的本体论。在这方面，马克思关于从制造业向现代工业转变的叙述是经典的。在制造业中，劳动分工仍然有一个主观原则——这意味着在生产过程适应了工人之后，工人才占有了生产过程。这与现代工业形成了对比，在现代工业中，劳动分工只是“客观的”，因为主观的、手工的机器使用被消除了，机器是与人类对立的。在这里，机器成了工人的竞争者、对手，甚至把工人贬为劳动的动物。然而，马克思也有另一个方面:他认识到工人和劳动工具也获得了一种混合的结构，生产过程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工人的生活条件，他的“他的积极生活过程本身的条件，他的生活条件”(马克思1894/1981,180)。劳动生产率的概念本身意味着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之间紧密的动态联系，马克思补充说，理论发现是通过工人的经验在生产过程中传递的。我们稍后将看到马克思本人如何在*《资本论》*中预见到生产者占有固定资本。

现在，让我们记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分析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由*《政治批判大*纲》的论点所提供的，也就是说，通过将“一般智力”作为生产过程的实体和主体的理论化(马克思1857/1858/1973,706;831):这一发现表明了认知物质对于生产的核心作用，以及固定资本的概念本身是如何被它所改变的。当马克思断言固定资本——在《资本论》中通常被理解为机器网络——已经成为“人本身”时(马克思1857/1858/1973,712)，他预测了资本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虽然固定资本

资本是劳动的产物，是被资本占有的劳动;尽管科学活动的积累和马克思所说的“一般智力”的生产力被纳入了资本控制下的机器;最后，尽管资本免费占有了这一切，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个阶段，活劳动开始发挥力量来扭转这种关系。与资本和资本主义对社会生产的管理相比，活劳动开始显示出它的优先地位，尽管这一点不可能从这个过程中被剔除。换句话说，随着活劳动成为一种越来越大的社会力量，它作为一种越来越独立的活动，在资本所指挥的纪律结构之外运作——不仅作为劳动力，而且更普遍地，作为一种生命活动。一方面，过去的人类活动及其智慧被积累起来，结晶为固定资本;另一方面，反过来说，活着的人类有能力在自身和自己的社会生活中重新吸收资本。

固定资本在两种意义上都是“人本身”(马克思1857/1858/1973,712)。在这里，对固定资本的占有不再是一个隐喻，而是成为阶级斗争可以采取的一种工具，并将其作为政治纲领强加于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不再是一种客观上包括生产者的关系，不再是一种用武力强加其统治的关系。相反，资本主义关系现在包含了一个终极矛盾:一个生产者、一个生产者阶级的矛盾，这个生产者或部分或全部剥夺了资本，但无论如何都有效地剥夺了生产资料，从而将自己作为霸权主体强加于人。马克思在将资本关系历史化的过程中，将第三等级的出现与*古代*革命*制度*的结构进行了类比，并以一种爆炸性的、革命性的方式清晰地呈现出来。

## 4. 工党的社交网络和自主性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关注劳动力的新数字，特别是那些由工人自己在社交网络中创造的数字。这些工人的生产能力由于他们之间日益紧密的合作而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里发生了什么。有了合作，工作越来越从资本中抽象出来，这意味着它有更大的能力自主地组织生产，尤其是与机器有关的生产，尽管它仍然服从于资本方面的劳动榨取机制。这种自主性和我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的自主劳动形式中所认识到的那种自主性是一样的吗?在我们看来，当然不是。我们的假设是，现在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不仅涉及生产过程，而且还在本体论层面上施加自己——在这些情况下，工作即使完全受到资本主义控制也获得了本体论的质地。我们如何理解这样一种情况，即生产企业在空间和空间上都得到了扩展

在时间上是连续的，工人的集体的、合作的发明最终被资本固定为榨取的价值?这是很困难的，除非我们摆脱线性的和确定性的方法论，采用一种通过器具铰接的方法。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认识到，在目前的情况下，工人手中的生产过程和资本主义的价值增值和控制手段越来越分开。工作已经达到了如此高的尊严和权力水平，它可以潜在地拒绝强加给它的价值增值形式，因此，即使在命令下，它也可以发展自己的自主性。

劳动力量的增长不仅体现在合作的扩大和自主性的增加上，而且体现在生产结构中对劳动的社会和认知能力的更大重视上。第一个特征，扩大的合作，当然是由于信息社会中数字工人之间的身体接触增加，但更重要的是，正如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一直建议的那样，“大众智力”的形成是由语言和文化技能、情感能力和数字力量所激发的。还有第二个特征:这些能力和创造力提高了工作的生产率，这并不是巧合。因此，让我们反思一下，在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历史中，知识的角色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匠的知识作为一种独立的、孤立的力量，从属于等级组织结构，被运用和吸收到生产中。相比之下，在现代工业阶段，工人被认为没有能力掌握生产所必需的知识，因此这些知识被管理部门集中起来。在“普遍智力”的当代阶段，知识在生产过程中具有多种形式，尽管从所有者的角度来看，它可以被孤立，就像手艺人的知识在制造业中一样。事实上，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工作自我组织的方式仍然是一个谜，即使这成为了生产的基础。

为了向前推进，让我们举一个例子:今天，在算法的运作中，一个强大的联合劳动形象变得不可见。再加上对资本主义控制必要性的不断宣传，以及对这种权力体系不可能有替代方案的说教，我们经常听到对算法所起作用的赞扬。但什么是算法呢?首先，它是固定资本，是一种诞生于合作社会智能的机器，是“一般智能”的产物。虽然生产活动的价值在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社会过程中是固定的，但我们不应忘记，活劳动的力量是这一过程的根源。没有活劳动，就没有算法。

然而，其次，算法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让我们考虑b谷歌的页面排名，这可能是最著名的算法，也是最大的利润来源。现在，一个网页的排名是由它的链接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的，高质量意味着链接到一个页面

本身就有很高的排名。因此，页面排名是一种结合用户对互联网对象的判断和价值的机制。Matteo Pasquinelli(2009, 152)写道，“虽然网络上的每个链接都包含一点点人类智能，但所有链接组合在一起却包含了大量智能”。然而，b谷歌的页面排名等算法的显著区别在于，工业机器以相对固定和静态的形式结晶过去的智能，而这些算法不断地将社会智能添加到过去的结果中，以这种方式创建一个开放和扩展的过程。看起来，算法机器本身是智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它对人类智能的不断修改是开放的。当我们说“智能机器”时，我们必须明白机器能够不断地吸收人类的智慧。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由这些算法建立的提取价值的过程本身是以增量的方式开放的，并且以消除工作和生活之间边界的方式进行社会化。b谷歌用户对此非常了解。最后，马克思研究的生产过程与这种价值形成的另一个区别在于，今天的合作不再是由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强加的，而是由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产生的。今天我们可以真正地谈论工人对固定资本的重新占有，以及智能机器在自主社会控制下的整合，例如，这发生在算法的构建过程中，这些算法与社会合作和生命再生产的自我增值都有联系。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即使当控制论和数字工具被用于资本主义增值的服务时，即使当社会智能被用于生产顺从的主体性时，固定资本也被整合到工人的身体和大脑中，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自从工业文明诞生以来，工人对机器及其系统的了解，总是比资本家和他们的管理者更私密、更内行。今天，工人对知识的这些占有过程可以变得具有决定性。它们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实现，而且还通过流通和社会化的重要过程中的生产合作而得到加强和实施。工人可以在工作时占有固定资本，他们可以在与其他工人的社会、合作和生命政治关系中发展这种占有。这一切决定了一种新的生产性质，即一种新的生活形式，它是新的“生产方式”的基础。

## 5. 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变化关系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并消除乌托邦主义的表象，如果它不损害我们的论点，有时似乎会增加混乱，让我们考虑一些研究认知的人是如何

资本主义构建了固定资本占有的假设。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2012)通过分析被投入工作的主体在大都市的定居和跨越空间来研究这种挪用——可变资本的运动对主体的条件和实践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能够自主运动和自主性组织劳动。然而，这种分析仍然是肤浅的。更为精辟的是前一段时间由安德烈·格尔兹(andr <s:1> Gorz, 2010)提出的分析，他通过强调生产的智力力量是在社会主体中形成的，从而推翻了剥削和异化的复杂网络。从社会异化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在生产中主体性/理性行动的能力。按照这种方式一步一步地进行，人们并不会惊讶地发现，今天的“无形资本”(研发,*软件*，但最重要的是教育、培训和健康)已经超过了全球资本存量中有形资本的比例”(Lucarelli和维切隆 2011,87)。固定资本现在出现在身体内部，烙印在他们身上，同时从属于他们-当我们考虑诸如研究和软件开发等活动时，情况更是如此，在这些活动中，工作并没有结晶在与工人分离的物理产品中，而是与大脑结合在一起，与人不可分割。最后，Laurent Baronian(2013)通过回归《资本论》及*其对生产关系*的分析强调，肉体和心灵的力量在与固定资本的限定要素相关的图形中得到了概括。固定资本在这里指的是社会合作。在这里，*死劳动*和活*劳动*(即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界限一劳永逸地模糊了。

的确，正如马克思(1894年)在《*资本论*》中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那样，如果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流动资本的标题下是等同的，如果对资本家来说，唯一本质的区别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那么，从生产者的观点来看，不变资本和流动资本在固定资本的标题下成为同一的，而唯一的本质区别就是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因此，可变资本对再占有的兴趣需要集中在固定资本上。

因此，活劳动合作的解放条件越来越多地投资和占据固定资本的空间和功能。

在这一点上，让我们继续讨论卡洛·维切隆和克里斯蒂安·马拉齐。所谓的非物质或智力资本实际上基本上具身在人身上，因此它在根本上与劳动力的智力和创造性能力相对应。我们发现自己处在恒定资本的概念和我们从工业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资本的有机构成被推翻之前。在恒定和可变资本c/v的关系中，这在数学上表明了资本的有机社会构成，正是v，劳动力，表现为主要的固定资本，重复克里斯蒂安·马拉齐(2006)的表达，表现为“身体-机器”。马拉齐(2006)澄清说，这是因为，除此之外

包括劳动力在内，劳动力还扮演着固定资本典型功能的容器的角色，生产资料的容器，因为它们是编纂知识的沉积物，历史上获得的知识，生产语法和经验-简而言之，过去的劳动。

## 6. 机械主体性(mechanical subjectivity)

例如，人们可以将自发进入数字世界的年轻人描述为具有机械主体性。我们构想的机械，不仅与机械形成对比，而且是一种与人类社会分离甚至对立的技术现实。f瓜塔里解释说，传统上，与*技术*和技术的问题相比，机器的问题被视为次要问题，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机器的问题是首要的，技术的问题是次要的。他坚持认为，我们可以看到机器的社会本质:“由于‘机器’向其机械环境开放，并与社会成分和个人主体性保持各种关系，因此技术机器的概念应扩展为*机械协议*[机械组合]的概念”(瓜塔里1999,9)。

因此，“机器”从来不是指个体的、孤立的机器，而总是指一种组合。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机械系统开始思考，即与其他机器连接和集成的机器。然后让我们加入人的主观性，想象人类融入到机器关系中，机器融入到人体和人类社会中。最后，瓜塔里与德勒兹一起，将机械组装视为一种进步，融合了各种各样的人类元素以及人类和非人类的独特性。德勒兹(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1987)的机械概念，以及福柯(Foucault)的不同形式的生产概念，都强调了在唯心主义身份之外发展知识和行动的主体性的必要性，并展示了这些主体性是如何从物质联系的生产中产生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机械清晰地出现在固定资本被劳动力重新占有时所出现的主体性中，即:当物质和非物质的机器以及结晶过去社会生产的各种知识被重新整合到现在合作和生产的社会主体性中。因此，机械组合部分地嫁接到人为生产的概念上。一些更聪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罗伯特·博耶(2002)到克里斯蒂安·马拉齐(2005)，通过关注“人对人的生产”(人对人的*生产*，博耶2002,192)，描述了当代经济生产的新新*性*——以及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转变。与传统的“通过商品的手段进行商品的生产”(斯拉法，1960)的概念形成对比。主体性和生命的生产

形式在资本主义价值增值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种逻辑直接导致了认知生产和生命政治生产的概念。机器进一步扩展了这种人为模型，以便将各种非人类的奇点纳入其生产的组合中。更确切地说，当我们说固定资本被劳动主体重新占有时，我们并不是指它简单地成为他们的财产，而是指它被整合到构成主体性的机械组合中。

机器永远是一种组合，是人类和其他存在的动态组合，但这些新的主体性的效力只是一种虚拟的，直到它们在公地和社会合作中被实现和表达。事实上，如果固定资本的重新占有是在个人的基础上进行的，通过将私人属性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这只是拆东墙补西墙，没有真正的意义。另一方面，当固定资本的财富和生产力被社会占有，从而从私有属性转移到公地时，机械主体性及其合作网络的力量就可以充分实现。集合的机械动力、合作的生产形式和公地的本体论基础以最密切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当我们看到今天的年轻人全神贯注于公共领域，被他们机械地参与合作所决定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存在就是抵抗。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都在进行抵抗。资本被迫承认这个残酷的事实。资本可以从经济上巩固那些由资本从中提取价值的主体性所产生的公地的发展，但公地只有通过抵抗的形式和重新占有固定资本的过程才能被建构起来。这一矛盾变得越来越明显。资本对生产的主体性说:“剥削你自己”。他们回答说:“我们希望自我增值，管理我们所生产的公地。”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障碍，甚至是虚拟的障碍，可以阻止冲突的到来。如果资本只能从主体性的合作中剥夺价值，而这些主体性抵制剥削，那么资本就被迫提高指挥水平，并实施更加武断和暴力的操作，从公地中榨取价值。而固定资本的再占有这一主题，将把我们引向这一段。

## 参考文献

Baronian, Laurent. 2013. *Marx and Living Labour*. Abingdon: Routledge. Boyer, Robert. 2002. *La croissance, début de siècle*. Paris: Albin Michel. Braidotti, Rosi. 2013.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ttari. 1987.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Gehlen, Arnold. 1980. *Man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orz, André. 2010. *The Immaterial*.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uattari, Félix. 1995. 'On Machines.' *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 the Visual Arts* 6(8): 8–12.

Haraway, Donna. 1991.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149-181. Abingdon: Routledge.

Harvey, David. 2012. *Rebel Cities: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 lution.* London: Verso.

Lucarelli, Stefano and Carlo Vercellone. 2011. 'Welfare Systems and Social Ser-vices During the Systematic Crisi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European Jour- 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 27(1–2): 77–97.

Marazzi, Christian. 2006. L' amortissement du corps-machine. *Multitudes* 27: 27–36.

Marazzi, Christian. 2005. Capitalismo digitale e modello antropogenetico di produzione. In *Reinventare il lavoro*, ed. Jean-Louis Laville, Michele La Rosa, Christian Marazzi and Federico Chicci et al., 107–126. Rome: Sapere. Marx, Karl. 1857/1858/1973 *The Grundrisse*.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1867/1976. *Capital Volume I*.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1885/1978. *Capital Volume II*.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1894/1981. *Capital Volume III*. London: Penguin.

Pasquinelli, Matteo. 2009. 'Google' s Page Rank Algorithm: A Diagram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and the Rentier of the Common Intellect.' In *Deep Search: The Politics of Search Beyond Google*, ed. Konrad Becker and Felix Stalder, 152–62.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Plessner, Helmuth. 1924. Die Utopie in der Maschine.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0*, 31–40.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Popitz, Heinrich. 1995. *Der Aufbruch zur artifiziellen Gesellschaft. Zur Anthro- pologie der Technik*. Tübingen: Mohr Siebeck.

Simondon, Gilbert. 2017.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raffa, Piero. 1960.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Prelude to a Critique of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第十九章

# 数字机器的占有与固定资本的占有是对社会存在的真正占有——对托尼·内格里章的反思

克里斯蒂安·富克斯

## 1. 马克思

在他的文章《固定资本的占有》中，托尼·内格里提出了思考技术在社会斗争中的作用以及与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关系的论点。他反对技术决定论和技术悲观主义。他在*《政治批判》*和《资本论》中运用了马克思的技术概念，并将类似的观点应用于数字技术。

自治主义传统上更倾向于解读*《政治批判大纲》而不是*《资本论》，因为斯大林主义解读马克思时，对后者的关注很大。在这种背景下，内格里强调“*《资本论》*中范畴的客观化阻碍了革命主体性的行动”(内格里1991,8)。“我不是在发起一场反对*《资本论》*的抽象论战——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已经形成了。

**How to cite this book chapter:**

Fuchs, C. 2018. Appropriation of Digital Machines and Appropriation of Fixed Capital as the Real Appropriation of Social Being: Reflections on Toni Negri s Chapter. In: Chandler, D. and Fuchs, C. (ed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Pp. 215–221.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DOI: https://doi.org/10.16997/book29.s. License: CC‐BY‐NC‐ND 4.0

通过阅读《资本论》所产生的阶级仇恨，我们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都有了认识。但*《资本论》*也被用来将批判简化为经济理论，将主观性消除为客观性，并通过以统治科学的形式对知识进行压制性重组来征服颠覆性的无产阶级”(内格里19881,175)。内格里认为，《政治*批判大纲》*是“一种政治文本，它结合了对“迫在眉睫的危机”所创造的革命可能性的欣赏”(内格里1991,8)。内格里指出了技术在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重要性。在这种背景下，他强调了*《政治批判纲要》关于机器*的*片段*的作用(马克思1857/1858/1973,690-714;参见Fuchs 2016, 360-375)。

在*《片段》中*，马克思预见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信息经济将会出现。他预见到一个阶段，“一般社会知识”，或者他所说的“一般智力”，已经成为“*直接*的生产力”(马克思1857/1858/1973, 706)。马克思强调了知识在固定资本发展中的重要性。他关于一般智力的概念对内格里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是后者关于社会工作者、大众、非物质劳动和公地的概念的核心(见哈特和内格里1994,10,21;哈特和内格里(英文版)，2000,29-30,364-369;内格里1991, 139 - 150)。

一般智力的概念也可以在*《资本论》*中作为一般工作的概念找到(马克思1867/1976,667;马克思1894/1981,199)。因此，将对资本主义内外知识的分析扩展到包括*《资本论》在内的广泛的马克思著作中当然是可行的*。在最近的作品中，托尼·内格里越来越多地接受了*《资本论》*。例如，*内格里(2017)在他的新书《马克思与*福柯》中强调，*《资本论第一卷》*中对相对剩余价值和大工业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的政治*观点*”。内格里(2017,55)写道，在*《政治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些先进的论点，这些论点只有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才能达到充分和物质上的一致性”*。机器是劳动力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固定资本。它们也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手段。当内格里说大工业和相对剩余价值是政治性的，他的意思是资本主义中的阶级斗争是对人类活动和时间控制权的斗争。鉴于技术是组织劳动和劳动时间的手段，它就嵌入了社会斗争之中。

*《资本论第一卷》*的第15章(机器*和大工业)*大约有150页，是全书中最长的一章。这也是*资本*的技术章节(参见Fuchs 2016，第15章，详细讨论本章)。资本主义的技术正在“把工人变成机器的活附属物”(马克思1867/1976,614)，但与此同时，它也为“完全发展的个人”开发了潜力(同上，618)，并助长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同上，553)，这种斗争延伸到“劳动工具本身”。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ibid, 554)。现代技术是资本主义之间矛盾的核心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种对抗并不会像崩溃理论错误地假设的那样，导致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而是同时促进了危机的反复出现和共产主义潜力的出现。资本主义的辩证超越和*Aufhebung*不是由技术引起的，而是一种只有在社会斗争中并通过社会斗争才能实现的潜力。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第15章中了解到，资本主义中的技术始终具有对抗性;它既是一种统治手段，也是一种潜在的解放手段，在一个后资本主义世界里，它也是一种共同性和共产主义的手段。

在这本书的文章中，内格里强调了马克思在《*政治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对技术分析的连续性*。机器既是一种统治工具，也是一种潜在的解放工具。它打开了剥削的空间和潜在的自主性和自我增值的空间。内格里在他的章节中说:“一方面，过去的人类活动及其智慧是积累起来的，结晶为固定资本;另一方面，反过来说，活着的人类有能力在自身和自己的社会生活中重新吸收资本”。

## 2. 技术的挪用

托尼·内格里(Toni Negri)在谈到对技术的政治挪用的需要时，拒绝了技术决定论的乐观和悲观版本。技术乐观主义认为，技术本身就是人类占有的一种形式，并自动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在通信技术研究领域，我们可以参考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例子，即电子媒体创造了一个地球村:“新的电子相互依赖以地球村的形象重新创造了世界”(麦克卢汉1995,121)。“对我们传统政治体系的彻底改革只是电子媒体所造成的再循环过程的一种表现，它正在将地球变成一个地球村”(同上，238)。

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本身是一个自主的领域，本质上对社会有负面影响。一个例子是马丁·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分析。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1996,119)将报纸和公共交通工具描述为不真实和“真正的独裁”。对海德格尔来说，左翼博客和社会主义报纸就像右翼极端主义小报一样，是一种不真实的形式。在《*关于技术的问题*》一书中，海德格尔(1977)引入了现代技术的*Gestell*概念，他认为现代技术本质上是异化的。海德格尔将对技术的分析从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分离出来，因此在他的理论中留下了一个危险的空白(Fuchs 2015c, 2015d)。内格里(2017,7)在“海德格尔式法西斯主义”的背景下发言。

与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不同，内格里强调技术的占有是一场政治斗争。技术不是

自动具有解放或支配的特征，但其特征是由社会斗争的过程和结果塑造的。对技术的占有意味着试图将其从统治和剥削的手段转变为斗争和共同的手段。技术的占有是技术的*Aufhebung*，也就是说，既不是对技术的消除，也不是对技术的新创造，而是一种辩证的转化，这种转化保留了现有技术的最佳品质，消除了它们的破坏性、支配性和剥削性，并创造出支持人类、社会和自然共同发展的新品质。作为政治斗争的挪用，意味着社会从阶级社会向平民主义社会的转变。技术从资本的技术转化为共同性的技术，是这个占有过程的一部分。

对剥夺者的共同性剥夺需要将资本主义技术转化为共同的、共同拥有和共同控制的、促进共同利益的技术。剥削是“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马克思1867/1978,929)，而共同占有是共产主义的占有方式。在资本主义中，“*占有*表现为异化和*异化*”(马克思1844/*2010,83*)，而共产主义则是对“社会(即人)存在”(同上，102)和“对人的生命的占有”(同上，103)的“真正占有”。真正的占有需要社会发达的生产力作为其先决条件之一，以便将剩余劳动时间转化为自由的领域。在社会工作者和数字机器的时代，真实占有的前提和萌芽存在和发展，但同时又受到资本主义的制约。

## 3. 数字机器的挪用

在算法、社交媒体、大数据和数字机器的时代，固定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动态。传统上，工程师创造的机器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时间更长，直到它们在物理上或道德上贬值，不得不被替换。数字机器操作的是二进制数据。数字资本主义使我们的生活数据化。我们的在线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数字劳动，它创造的数据既是商品，也是固定资本的一部分(Fuchs 2014;2015a，第5章).数据存储是数字机器的固有元素。数字资本主义中的数据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成为固定不变资本(Fuchs 2015a, 183-185)。它作为数字机器的一部分存储在服务器上，从而实现数字资本的积累。但数据也是构建块，是流动的不变资本，在此基础上，数字劳动创造出新的内容和数据。在大数据领域，“流动不变资本和固定不变资本趋于收敛”(Fuchs 2015a, 184)。数据是数字化劳动的物化，是人的主体性在网络上的物化。因此，作为不变资本的数据是对一般的客观化

智力。数据化概括了人类的知识，并将其固定在存储在服务器上的数据库中。

托尼·内格里在他的章节中说，年轻人尤其有潜力应对数字剥削和数字资本:“我们希望自我增值，管理我们生产的公地”。当人类主体成为政治主体时，那么平民主义的数字占有就可以成为对数字资本主义的一种抵抗形式。内格里在他的章节中提醒我们，算法和数字机器并不智能。只有人类才拥有智能。而正是人类的政治智慧赋予了他们将数字资本转化为数字公地的能力，将资本主义的数字机器转化为共同性和社会合作的机器。

大数据公共主义是大数据资本主义的替代品吗?一方面，积累、泄露和发布资本主义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大数据已成为一种抵抗策略。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大数据产生和大数据存储服务于资本主义和国家利益。大数据是从资本主义控制(基于大数据的资本积累)和国家控制(国家对公民的监视，因为错误的监视意识形态认为，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监视和警察国家，是对抗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最佳手段)中产生的。此外，大数据资本主义需要大量以不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这加剧了气候变化。因此，大数据共通主义旨在将存储的数据量限制在必要的最低限度，并摆脱今天成为剩余价值和剩余权力的多余数据。我们需要小数据，而不是大数据。

但是我们如何恰当地运用一个算法呢?主要有两种策略，第一种是资本税。全球互联网巨头不断逃税，这种逃税行为是由全球互联网与民族国家层面监管的矛盾所促成的。对全球企业和网络广告征税，可以创造国家收入，并通过参与式预算分配给公民。参与式媒体费将对全球公司征税，并为每个人提供公民的传播收入，然后可以捐赠给非营利媒体项目(Fuchs 2015b)。另类媒体往往缺乏资源。通过参与式预算和资本税，可以加强替代媒体部门，以削弱互联网和一般媒体的企业特征。一般来说，为使用Facebook支付工资并不是一个可行的策略，因为它没有质疑数字垄断资本的主导特征。普遍劳动的普遍基本收入，包括无偿的数字劳动和其他无偿的生殖劳动，将是一个更好的政治策略。

第二种策略是平台合作社和点对点生产。这些是公民社会项目，将在线平台和数字机器组织为用户控制和数字工人控制的组织，这些组织的运作不是为了利润和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和共同利益。资源不稳定是替代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

项目往往面对。将这两种策略结合起来，将为平台合作社和点对点项目创造一个资源基础。如果它们能够扩张，那么它们就可以创造一个经济领域，为数字资本提供另一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反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数字阶级斗争形式。

传统上，左派一直害怕征服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斯大林主义的经验证明了这种怀疑是正确的。但是，无政府主义者拒绝为了改造和超越国家而挪用国家，往往使其他项目无能为力，被边缘化，并面临不稳定(自愿劳动和资源)的政治经济，这种不稳定助长了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版本的斯大林正统和等级制度。在传播领域，我们不应忘记，除了公民媒体之外，还有公共服务媒体(public service media, PSM)。特别是在欧洲，有一个强大的PSM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在资本逻辑之外运作。它经常面临的问题是政治上的庇护主义。但就像在经济中会有从资本那里争取更多自治领域的斗争一样，在公共领域也会有从国家那里争取更多自治领域的斗争。目前，法律框架阻碍了PSM成为公共数字服务和公共服务互联网平台提供商。垄断媒体资本将PSM视为竞争对手，并影响立法，最终帮助数字垄断资本(b谷歌、Facebook、亚马逊、微软、苹果等)的经济利益。我并不是支持国家控制的互联网，因为我们已经可以发现，秘密机构实施了一个监视工业互联网综合体(如爱德华·斯诺登所揭示的)，而是支持提供特定在线服务的独立、关键的公共服务媒体，如Club 2.0(见富克斯 2017)。第3.3节)或一个公共服务YouTube，它向公众提供所有存档的公共服务电视和广播内容，作为一种可以被挪用和重新混合的共同利益(使用某些知识共享许可)。

资本主义数字机器的挪用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而斗争，即数字和互联网的去商品化、去资本化和去商业化。今天，我们经常发现促进商品化的公私伙伴关系。当以公共-公共伙伴关系的形式组织起来时，数字挪用有望成为一种有效的数字斗争形式，这种伙伴关系否定了数字资本的逻辑，并帮助数字公共超越和废除数字资本主义。这种数字斗争的更广泛背景是左派作为运动和政党的辩证法的更新(Dean 2016)。

## 参考文献

Dean, Jodi. 2016. Crowds and Party. London: Verso.

Fuchs, Christian. 2017. Günther Anders' Undiscovered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in the Age of Big Data Capitalism'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15(2): 584-615.

Fuchs, Christian. 2016. Reading Marx in the Information Age. A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Perspective on 'Capital Volume I. New York: Routledge.

Fuchs, Christian. 2015a. Culture and Econom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New York: Routledge.

Fuchs, Christian. 2015b. 'Left-Wing Media Politics and the Advertising Tax. Reflections on Astra Taylor's Book "The Peoples Platform: Taking Back Power and Culture in the Digital Age"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e Critique 13(1): 1-4.

Fuchs, Christian. 2015c. "Martin-Heidegger's Anti-Semitism: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the Media in the Light of the "Black Notebooks". Implications for the Reception of Heidegger i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13(1): 55-78.

Fuchs, Christian. 2015d. "Anti-Semitism, Anti-Marxism, and Technophobia: The Fourth Volume of Martin Heidegger's Black Notebooks (1942-1948)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e Critique 13(1): 93-100. Fuchs, Christian. 2014.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2000.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1994. Labor of Dionysus: A Critique of the State Form.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eidegger, Martin. 1996. Being and Tim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Heidegger, Martin. 1977.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Harper.

Marx, Karl. 1894/1981. Capital Volume III.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1867/ 1976. Capital Volume I.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1857/1858/1973. The Grundrisse.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1844/2010.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an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3-168. Amherst, NY: Prometheus.

McLuhan, Marshall. 1995. Essential McLuhan, ed. Eric McLuhan and Frank Zingrone. London: Routledge.

Negri, Antonio. 2017. Marx and Foucault. Cambridge: Polity.

Negri, Antonio. 1991.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London: Pluto.

Negri, Antonio. 1988. Revolution Retrieved: Selected Writings on Marx, Keynes, Capitalist Crisis, New Social Subjects 1967-83. London: Red Notes.

# 编辑和贡献者

## 编辑

大卫·钱德勒，威斯敏斯特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韧性:国际政策、实践和论述》杂志编辑。他最近的专著有:人类世的地球政治学:测绘，传感和黑客入门(劳特利奇，2018);《建设和平:二十年危机，1997-2017》(Palgrave, 2017);《新自由主义主题:弹性、适应和脆弱性》(与朱利安·里德合著)(罗曼和利特菲尔德，2016)和《弹性:复杂性的治理》(劳特利奇，2014)。

克里斯蒂安·富克斯，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威斯敏斯特高级研究所(WIAS)和传播与媒体研究所(CAMRI)主任。他在批判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发表了大量著作;论数字媒体与社会;以及媒体、文化与社会。Christian是开放获取期刊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Critique(网址://www.triple-c.at)的联合编辑。他的著作包括《数字煽动者:特朗普和推特时代的威权资本主义》(2018);《传播批判理论:互联网时代Lukács、阿多诺、马尔库塞、霍内斯和哈贝马斯的新读本》(2016);《信息时代的马克思解读》(2016);《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2014);《社交媒体时代的文化与经济》(2015);《社交媒体:批判导论》(2014，第2版，2017);OccupyMedia!危机资本主义中的占领运动和社交媒体(2014)。http://fuchs.uti.at，@fuchschristian。

## 投稿人

Joanna Boehnert博士是英国拉夫堡大学设计专业的讲师。她的第一本书《设计/生态/政治:走向生态生态》链接

社会与生态理论对设计的理论与实践。她是EcoLabs的创始董事，曾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科技政策研究中心(CSTPR)担任环境和复杂视觉传达问题的传播设计研究员;威斯敏斯特大学艺术与媒体研究与教育中心(CREAM);萨里大学跨Nexus复杂性评估中心(CECAN)。她tweets@ecolabs(高流量)和@ecocene(学术)。

**伊丽莎白·布里吉**，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国际关系高级讲师。她目前的研究兴趣在于国际安全、暴力和政治理论的交叉点。研究领域包括恐怖主义、城市安全、影响和模仿。她最近编辑了《*神圣与政治*》(布卢姆斯伯里学术出版社，2016年)，并撰写了《怨恨的全球化》(《千年*国际研究杂志*》，2016年)。

**罗伯特·考利(Robert** Cowley)，伦敦国王学院可持续城市讲师。他目前正在协调一个由esrc资助的多中心研究项目，比较欧洲和中国的实验性“智能生态”城市倡议，该项目由埃克塞特大学牵头。此前，他曾担任利华休姆信托基金资助的国际研究联盟“明天的城市今天——生态城市框架的国际比较”的网络协调员。他在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完成博士学位，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计划的公共层面，特别关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和韩国世宗市的新城市。他曾在国际上发表演讲，并撰写了各种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智慧城市的出版物。

**乔迪·迪恩教授**是纽约日内瓦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的Donald R. Harter ' 39人文社会科学教授。她是十二本书的作者，包括*博客理论*(Polity 2010)，*共产主义地平线*(Verso 2012)*和人群与党*(Verso 2016)。
**Paolo Gerbaudo博士**是伦敦国王学院的高级讲师和数字文化中心主任。

**彼得·古德温博士**是威斯敏斯特大学CAMRI的研究员。他在传播政策、公共服务媒体和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方面发表过文章。

**凯莉·贾勒特博士**是爱尔兰梅努斯大学媒体研究系的高级讲师和系主任。她对商业网络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著有《*女权主义*》*《劳工》和*《互联网》

《*数字媒体:数字家庭主妇*》(劳特利奇)和《*谷歌和搜索文化*》(劳特利奇-与肯·希利斯和迈克尔·佩蒂合著)。她还有一本即将出版的书,《*工作不安全:社交媒体中的性、幽默和风险*》(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与Susanna Paasonen和Ben Light合著。

**Anastasia Kavada博士**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威斯敏斯特媒体与传播学院的一名讲师。她是媒体、运动和社会变革硕士课程的共同负责人,也是传播与媒体研究所(CAMRI)的联席主任。

**菲比摩尔博士**是莱斯特大学一位国际知名的技术、工作和全球治理方面的研究员和思想家。摩尔已经出版了三本关于这些问题的独立著作,包括她最近出版的《*不稳定中的量化自我:工作、技术和什么重要*》(2017年)。摩尔与工会和国际组织合作制定工人标准。

**托尼·内格里**是世界上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内格里现居法国,在意大利帕多瓦长大,父亲是一位活跃的共产主义者。1969年,他创立了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组织,是工人自治组织(*Autonomia Operaia)的主要成员*。作为自主主义最杰出的理论家之一,内格里出版了《*马克思超越马克思:政治批判的教训*》、《*像我们这样的共产主义者*》等影响深远的著作。在法国,他与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和吉尔·德勒兹一起在巴黎第八大学和国际哲学学院任教。在他的许多出版物中,内格里最著名的可能是他与迈克尔哈特合著的《*帝国*》、《*众*》和《*联邦*》三部曲。2017年,该系列丛书的第四卷以《*大会*》*为题出版*。同样在2017年,托尼·内格里的散文集《*马克思与福柯*》出版。他对公地和社会工作者的理论化是理解当代社会和数字媒体的现实和潜力的关键关键工具。

**丘**先生,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媒体与比较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他的著作包括《*再见我的奴隶*》(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6年)、《*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工人阶级网络社会*》(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9年)、《*移动通信与社会*》(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6年),其中部分著作已被翻译成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西班牙语。中文、韩文等。他是12种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会成员,其中6种被SSCI收录,并担任*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副主编。联合创始人,年度指导委员会成员

丘先生现任中国通信协会(CCA)副会长，中国互联网研究协会(AoIR)执行委员会成员。除了学术职位，他还与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基层劳工非政府组织合作，同时为国际组织提供咨询服务。

**Paul Rekret博士**在伦敦里士满美国国际大学教授政治理论。著有《*打倒童年*》(Repeater 2017)和《*德里达与福柯:哲学、政治、论战*》(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18)，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关于工作、歌曲和资本主义危机的书。

**Paulina Tambakaki博士**是威斯敏斯特大学民主研究中心政治理论高级讲师。她是劳特利奇系列丛书《民主理论进展》的联合编辑，研究领域包括斗争主义、激进民主、代表制和公民身份。她的著作包括专著《*人权，还是公民权?*》*-于2011年与伯克贝克法律出版社出版*，并在各种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宝琳娜目前正致力于她的第二专著，专注于政治变革的过程，特别侧重于民主，理想化和记忆之间的关系。

# 索引


**符号**

2008年金融危机188

**a**

堕胎112
抽象，数字12积累
56,105,122被剥夺13,14
金融化127
灵活的13,45
原始的85、126中华全国
总工会
160激进主义2、9、14、
109数字化131、171-182
劳工151
社交媒体160幸存者和/或系
统172,182行为者网络理论(ANT)
24,
31 - 34、39、43、
45现实主义24
、31、76适应性变化37、77成瘾、
数字化152、158-159、167阿多诺、
西奥多74、126广告5、57-58、61、
121、219针对性在线7、8、61影
响(s) 11,15、126 127、129、139、
146的概念和平台资本主义146 -
147情感劳动103、109、125-
126,
128-132、138、139、146
情感调节与
压抑129,146-148情感抵抗与
团结
129-132、139、147、148
非洲16、155
Agamben, Giorgio 25,37,49
*Aganaktismenoi* 184机构(见人类
机构)88,105,106,121,140
议程设置7
敏捷的工作环境137-138
敏捷性140

艾哈迈德，萨拉111
Airbnb 189、191、195 算法知识4 - 6,8、9算法4、15、90、173、174,
209-210、219治理与政治靠12、48思路6
管理通过134
交易通过48
异化12、15-16、110、127、146-147、152、175、205、218使之臻于完美148社会211
物种进化110,
科技217
所有的劳工历史107另类右翼，108、121亚马逊13,155、220亚马逊机械土耳其人127美国内战154、166类比,76、77分析4,8
作为研究方法
经济学8无政府主义220
安德斯，gnther 59安德森，克里斯8安德森，玛丽布117-120动物解放理论45人类世，9,12,23 - 42“副作用的时代”27人类中心主义82-84反奴隶制运动和
Thought 155, 162-163
强调废奴159强调抵抗152,
159-160、166 Appconn 112、158-160、162苹果151-152、155、165、220挪用129数字和技术218-220固定资本206-207、215-221
*劳动*140*再生产的奥术*，The (1995) 107人工智能14、48人工假体34-35手工生产85、207装配与装配理论12,24,31,33 - 37,92、129、206、212、213 观众商品61观众劳动60-62
*扬弃*(扬弃)46、217、218威权资本主义16,65,67
威权主义2,15,57,65-68、122自动文本提取7自动化14、127、134、139自治60、211、215自主性62、88、105、106、110、111、147、208-209、217妄想的149
和劳工的社交网络208-211
人类83人

## b

巴贝奇，查尔斯4巴迪欧，阿兰172,177巴拉巴西，阿尔伯特-拉兹洛178,180野蛮126巴罗尼亚，劳伦211鲍德里亚，让12,44 BBC 120
贝克、乌尔里希24、26-28、30、38《*存在与时间*》(1996)217
《贝拉吉-哈佛关于奴隶制法律参数的指南》(2012)153
贝勒，乔纳森129贝拉尔迪，佛朗哥“比佛”11贝卢斯科尼，西尔维奥190巴斯卡尔，罗伊24

大数据1 - 17,77,173,178,
192,218
  分析学2,77
  分59
  作为意识形态恋物癖
  14的含义3-9
“左”批判75、77大数据资
本主义2 - 3,9 - 16,
    43-51、48-49、53-71、
    73-79、103-116、219
*大数据与社会*7,13 - 15大数据
研究6二元理论4,28;
44-46、48、56、57、82-84、
88生物工程27生物信息学83生
物政治劳动179-180生物政治
生产180,
181,213生命政治172生物传
感器36生物技术83布莱克本,
罗宾159黑人的命也是命111
布莱克曼，莉萨126搅拌机
108身体机器211伯纳特，乔
安娜117-123布尔什维克,
180博尔坦斯基，吕克184波
拿巴主义57波斯蒂尔斯，布
鲁诺175布迪厄，皮埃尔10
博耶尔，罗伯特212布雷多
蒂，罗西206品牌战略8布劳
恩，布鲁斯37资本主义的崩
溃理论64,217
英国脱欧109
布里吉，伊丽莎白145-
150大英帝国154,159巴特
勒，朱迪思132

**C**
可计算性15,45
camming 106
卡内蒂，伊莱亚斯172,177资本
11,48,55 - 56,68,86,146,
  178、206、216-218、
  220文化155
  固定和可变11,207 - 208,
  210-213、216、218
  个想法的10个
  非物质211无形
  211
  劳动(和自然)14、65、67、
  85、209
  作为泛光力58重新
  定义9,14赋税219
《*资本论*》(1867)第3、207、211、
215-217卷:*机械与大规模
工业*55,216资本主义(*也*见交往
资本主义)9-15,43-51,
  171-182、205-214、218 意
  识控制148危机15、47全球
  化54
  和现代性45
  以及对生活抽象概念的变态制
  造者
  数字13-14的角色
  '符号操作员' 12
  As social formation 10
  As system(s) 15-16
  technology in 55
10-11资本积累类型(清单)10-
11、60、86、87、121、156、
159、218、219
加勒比，154 Casaleggio Associ
ati 197 Casaleggio, Gianroberto
1962,202

Castells, Manuel 10,191因果深
度24,32因果关系和因果关系9,
24 - 25,
30、33、36、37、44、45、
76因果本体论31、33因果、
涌现32、77钱德勒，大卫1-
21、23-51、73-79
Chiapello, Eve 184
中国16、152、156、
160媒体审查158公民
主义177
公民传感器7 CitySprint UK Ltd
133、134类45、48、49、56、65、
67、109、111，
113、132、148、191意识
130、148、149挣扎66、208、
216 clientelism 220
气候变化26 - 28,30,37云，59、
127、200胁迫106、129、166、
173认知资本主义11,210认知绩效、
操纵90
科尔、马修121集体劳动者60、
120集体主体176、178、184
集体172、173、175-179商品
化54、56、76、87、
106-108、126、127、156、
220的资料59
商品拜物教57、65商品形态54、
57商品关系108共性218-219共
性13、55、67、68、178、
181、
186,213, 216-217, 219学术
62-63联邦，67通信在资本
主义56-57技术发展
200
-201传播资本主义
171-182, 183-186复杂性理论39,
44,46压缩(时空)13,16计算机，作
为“通用机器”15计算机化，对
速率的影响
利润64孔多塞侯爵187冲突管理
25保守党188消费主义154,158,
190偶然的相互作用24生物多样
性公约
(1992) 87合作15、49、57、64、
208-213版权62-64共相关33、44 -
45相关3、6、23-42功率76相关
机23-42、44温度计为35考利，
罗伯特95-100考克斯，罗伯特38
犯罪48,57
危机13、27、46-49、55、
76、127、181
批判媒体研究59，批判现
实主义24
批判理论30、56、73-75批
判73-78、171、172、179、
182-185
人群 172,175 - 178,184 - 185,194
平等主义放电的172,
177 - 178,184*人群与党*(2016)
180*人群与权力*(1984)177众
包59,127文化产业13文化唯
物主义56文化研究108,113
文化，测量7控制论39,83
半机械人45,81 - 94,96 - 98
《*半机械人宣言*》，*A* (1991)
83

**D**

数据化2、8、76、219
数据缺口7 .
数据新闻7
迪恩，乔迪171-182,183-186决策，自动化6-7,
25,59,122 决策平台196 Deep Ecology 45去人性化2,73,75,91 DeLanda, Manuel 31 Deleuze, Gilles 12,37 - 39,44,129, 139, 147, 212
“控制社会”，1937年Deliveroo的概念;134年需求经济(见“零工”)
经济”)127、146民主75、180、185、195、199、203
分布2参与性193,202民主机构185-186刚果民主共和国156国际部
国际发展部(DFID)德里达，雅克44,82笛卡尔，雷诺85
“去社会化的饮食”158去主体化174,185决定论(另见技术决定论)43 - 46,48,
113,215,217 Dewhurst, Mags 133-135 d 'Holbach, Paul-Henri Thiry 206辩证现代性44,48 - 50
*启蒙辩证法*(1947)74
辩证法，技术与社会55差异，剥削109数字资本14、15、54、218-220数字资本2 - 3,10 - 13,152,
218、
219数字资本主义的危机64-65数字公地54、56、62、219、220
152个数字民主平台的193个数字论坛造成的数字沟通16损害195
数字治理23-42,43作为范式34
数字人文59数字劳动2、13、15、54、60、61,
103-167、209、219国际分工16、54、88、207
的负面影响
实践110非经济维度108
研究103-116数字网络行动(DNA) 156
数字机器(见“机器”;
) 215-221年数字网络178-179年数字党，188-203年数字奴隶制(见奴隶制)151“数字转向”2
数字战争4
数字妓女106、121开放存取目录
期刊63 disaster 5 - 7,27,38 discrimination 59 disintermediation 189, 192-197,
196,198 剥夺13、14、84、106、110,
113、127、178、208 DNAinfo 120-121 DNAinfo 117
美元，姆拉丹172,175国内劳动力104,107支配2 - 3,45 - 46, 48 - 49,57,
105、107、110、217-218多尔西、杰克119、122、197

无人驾驶飞机吸毒Du verger, Maurice 187

**e**

*经济与哲学手稿*110*经济学*家，1教育15、69、109、149效应鉴赏26数字治理24、31、36与再分配机构25紧急26 - 29,31,33,37竞选201解放宣言(1863) 166个胚胎，人类冷冻83,86个新兴等级180-182共情12帝国32、67、153实证方法5、6、15、24、30就业福利127圈地84、88恩格斯、弗里德里希154、166启蒙运动，45、74、76、78、126作为一个极权主义项目74-75奴役12,13,151 - 164,158机械39纠缠26,28,148认识论5,85,88和知识属性86到- 43 - 44,46“定位”30,77平等，“感觉”177 Equiano, Olaudah 157等效，74本质的规则，24伦理的搜索59,88欧盟15欧洲工作时间指令130个事件，意外和冲击26交换价值65、107、179“排气”128“扩脑”梗117-120利用10、15-16、49、54、56、106、121、155数字劳动的3,130

**f**

Fab Lab中心，曼彻斯特132 Facebook 4、7、60-62、66、111、121、152、159、167、176、188、189,191、194、197、200、219、220的利润5虚假意识110法西斯主义 65、67、75、109、217*《快餐之国》*(2006)17福克纳、乔安妮89费代里奇、西尔维亚85、88、109、126反馈效应和循环25-29、38女权主义60-61、119、125、激进主义112

马克思主义104-105美国第三世界111女权主义89、154金融泡沫16金融化13、65、127金融市场8、48 Firth, Rhiannon 129 Fisher, Mark 128 Fishwick, Adam 131 FitBit Charge HR Activity追踪者136-138五星运动188,194,196,197、199、202 柔韧性128、133

流感33
福特主义127,138,189 - 190,
190,200
外交和联邦事务部
(FCO) 25 Fortunati, Leopoldin
a 107-108论坛党194
意大利力量党190,197福柯，米
歇尔9,58,82,85,212富士康152,
155-157,165,167自杀在157-158,
160法国Insoumise, La 188, 193弗
雷泽，南希107富克斯，基督教
1-21,43-51,53-71,73-79,120,172,
178,215-222

g:弗雷泽，南希107;富克斯，Christian 211, 214, 216, 243

纳姆、尼古拉斯10
格伦、阿诺德206性
190
般智力208,216地缘政
治153
Gerbardo, Paolo 176, 187 - 203,
199 - 204
德意志意识形态》, The
(1845) 16格斯泰尔，The 217
雷蒙德·格斯183《我生命
中的幽灵》(2014)128《礼
物经济》74
礼品关系108
零工与零工经济103、126-130、
132-135、139-140、146、147
全球阶级斗争154全球
化26,54
全球变暖28《再见,我的奴隶:数字
化宣言》
废除(2016)151,165古德温，彼
得165 - 167谷歌8,13,33,60,61,
76,200,210,220
, 页面排名209-210 Gor
z, andr<s:1> 211 Gothamist,
The 117, 120, 121治理7,12,
28,43,75 - 77,202
大数据49,76
数字化(见数字化治理)49全球
28,30,181干预24
逻辑之9,39
效应24 - 31,37,39治理研
究9 Grab 192
安东尼奥·葛兰西，109,190-191,
191、203-204基层政治
200-203绿色荧光蛋白
(GFP) 36
绿色基础设施37 Grillo,
Beppe 196,197 Grossman
n, Henryk 64 *Grundrisse*
(1857) 56,207, 215-217
《机器上的片段》,55页,
216页
Guattari, flix 12, 38-39, 44, 147,
206, 212
罪恶感，59古鲁推定
127

h

哈贝马斯，j<s:1> rgen 45、
56、59、91哈金，伊恩91
哈吉吉，Fatima
111 Hammami, Rema
107 Hands, Joss 192
Handy 127
哈拉威，唐娜30、43、44、83、
86-87、91、92、206哈特、
迈克尔47、67、129、138、
139、172、179-182、
185-186哈曼，格雷厄姆
24,31,39哈维，大卫13 - 14,
211

话题182、184、185
热门180
“幽魂学”128 Heath-Kelly, Charlotte 39黑格尔，G. W. F. 55霸权112,126海德格尔，马丁44,82,217赫尔维提乌斯，克劳德·阿德里安206澳大利亚高等法院154
*疯狂史*(2013)85*经济人*13
霍克海默，马克斯10,48,74
赛马76人类机构96延伸34-35人文主义57,73马克思主义45,57,73 - 74人道主义，数字6卡特里娜飓风27,38杂交性82 - 84,86 - 91超级领袖189,195-198,
200,203

## 1

同一性政治109,155,172意识形态191
意识形态(*另见监视意识形态*)45、48、57、65-68,
109、111、132、175 新自由主义10、68-69、132
幸存者vs系统175伊格莱西亚斯、巴勃罗197帝国主义13、15、111负债131独立承包商/
分包商承包了134名伟大的独立工人
英国133-134不确定性47愤怒者运动202
个性化58、148个人主义173、190工业社会189不平等7、14、27
、59、82、110、113、173、177、178、180、
185,195 信息
作为资源54
“少有”160信息资本主义56信息经济55,216 Instagram 66
即时通讯服务193工具主义10,75,78,
126,139工具理性10,15,44 - 49,59
保险38
知识属性86-87、121知识分子57、69、160放纵149互联互通26、29国际刑事法院
海牙154国际数字劳动分工61
物联网5、7、34、35交叉政治111、172 iPhone 151、156、158、167爱尔兰天主教105爱尔兰废除运动112伊斯兰恐惧症109奴隶制和伊斯兰教徒151 - 164消费模式156、
158,167制造模式的156,167

## j

詹姆森，弗雷德里克45贾勒特，凯莉103-116,117-123,119,127
贾萨诺夫，希拉87约翰逊，伊丽莎白36欢爽177新闻学7,57准时生产173

## k

Kant, Immanuel 5 Kavada, Anastasia 1999 - 204 Kitchin, Rob 5, 77 知识 1,5 - 7,12,14,15, 30,45,47,55,76 - 77,81 - 94,95,
209-212、216-217 学术62
经济11
86的圈地
形式的6、9、38、53、85、212纯真的88-90机械的139
理性vs .经验6知识生产11第四范式77知识社会, 10

## 1、

66-67年劳动节
劳动103认知206
分工48、87、207情感125
剥削3、15、54、64、121
工厂14
自由14、60、61、106、152性别分工105非物质11、129、138、148、216网络155、160
政治在数字化
经济106盈余61-62、209、218普遍55、219
无薪119
看不见的125、127-129、131、140值60
工资61-62、85、166女性作为85的自然再生者
劳动力(身体-机器)
211-21
2拉图尔，布鲁诺12、24、26、28-34、39、43、44、83、86、91血浆的概念32笑声
Lawrence & Wishart 63
Lazzarato, Maurizio 12-13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4 leisure 2,103
列宁，V. I. 175,180,181自由主义45,65,173自由主义政治哲学89林克莱特，理查德17
Linux 197
约翰·洛克，88-90
Logo 197
长 尾 178-180,182
Lordon, fracimdsamri
c 131 Lorey, Isabell
107
洛普索，西尔维奥
181卢森堡，罗莎67利奥塔，让-弗朗索瓦44
达4卢曼，尼克拉斯56

## m

“机器”，140,212-213, 216-217
数字205-207抹大拉洗衣店，爱尔兰105人与自然75,85马拉齐，克里斯蒂安211-213马尔库塞，赫伯特48马雷斯，诺杰32-33婚姻105 - 10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63
马克思与福柯(2017)216
*马克思,资本论与经济理性的疯狂*(2017)13-14
马克思主义自治主义者
11、119、128
Lukács，格奥尔格59,65, 128洛夫莱斯，艾达

临界74-75
黑格尔式46
马克思主义互联网档案(MIA) 63
马克思主义理论56,154马克思，卡尔4,9,53-71,76,139-140,154,166,207-208,211,218
一般智力分析55对互联网的期待56对集体劳动者的观念60对比率的趋势规律
利润下降64*面具与旗帜,the* (2017) 176 梅森，保罗14,64
大众智性209 Match.com 192唯物主义44、56、206数学4、6、59、74莫斯、马塞尔74麦克卢汉、马歇尔217机械决定论48媒体研究59、110、172梅朗雄、让-吕克193、196心理健康145梅洛-庞蒂、莫里斯34梅特伊、摩根106、121米歇尔斯、罗伯特195、203微软58,220
《中间通道》，《156、157、161》军国主义65
Mind(慈善)145国防部(MOD) 25明茨、西德尼158现代主义思想25 - 26,29,37, 44、74-75、77、84被批判为过于人文主义78现代性26、44 - 47、49-50、153辩证45-47、49-50动量188 Monnier, Jean-Marie 11垄断媒体62、220 Moore, Phoebe V. 106、125-150 Moroz ov, Evgeny 9、48-49 Moulier-Boutang, Yann 11 众 67 众 (the) 67、111、130, 131,216

## n

纳米技术27
出生异化民族主义57,65,67,75国家安全局(NSA) 58 NationBuilder软件193性质
在洛克的思想中，人类干预的对象，亡灵政治
内格里，安东尼奥(托尼)11、47、56、58、60、67、129、138、139、146、148、172、179-182、185;
205 - 215,215 - 222新自由主义
资本主义13,15,146新自由主义(另见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147,148,173网络化
数字技术56网络效应193网络社会10,155,191诺伊曼，弗兰兹L. 69新唯物主义44
新奥尔良27常态化，病态化146规范性37
诺里斯，皮帕201
核心家庭105
“数字说明一切”

## 8 .

奥巴马，巴拉克总统201面向对象本体31-34对象，传记108
偶次主义39占领运动176、184、185一起占领132

ODesk 127
寡头政治195
在线关注7,48在线厌女109本体-认识论43,44,46“本体论手术”86-88本体和本体23,29,30,33,34,37,44,84,85,88 - 89,99,175,207
  Of being 24, 77
  大数据39
  因果24 - 25,33
  和“人类”84
56 .《社会存在本体论》(Lukács)
开放获取出版62-63 open Data for Resilience initiative (OpenDRI) 23个开源
108个，203个被压迫,
方法论的111个
原罪89
‘其他’110
外包59,127

## p

巴勒斯坦111全景58参与主义2,189,
194,198 Partito Democratic o 188 party-company 197 Pasquinelli, Matteo 210专利11,88模式识别12 Patterson, Orlando 153,154点对点生产219 le Pen, Marine 196“人民”175,177 - 179,181作为主体174-176 Perry, Katy 178 Peterson, Tim 120现象学34哲学5,24,31,59,81,82,85,89,90
《哲学与真实政治》(2008)183
海盗党188、194、197等
离子(也是“失踪的群众”)32-35
平台资本主义109、121、127、146-148
121平台资本主义的专有架构(2016)192平台党，187-198磋商在196 - 197“总统主义”字符189超级基地在189、196平台 60、90、104、106、108、117、120-122、127、153、161,
  193-194、219政纲[党]175-176、181,
192 - 193,202普勒斯纳,
赫尔穆特206 Podemos 188, 194, 197, 199, 202, 203
打击不稳定的政策和法规
就业132项政策干预9,25项政治经济(数字)3,9,54,
56,202,220政治恋物癖57,67政治隐喻206政党3作为运动政党199-204电视政党200政党(另见“平台党”)187-203
作为“政党运动”194-195概念的190 - 191工业党、189 - 191群众党189、190政治主体(s)、(the) 111、131、171、174-176、183、207、219

*《出埃及的政治理论》*
(1996)149
政治学113、119、
138数字2、171-228
183的理想理论
关于生育权利113条变革
184条，185条污染36条
海因里希·波皮茨20
6 PopTech 23
实证主义45、59大数据与数字化
2、59后认识论方法24、
29-31, 44后人文主义3,45 - 46,81-
94,91,95-100,173
’政治上的进步主义者
企业' 86,89,91后现代主义
30,44 - 46权力，概念58,
207权力精英58
幂律分布
178-181, 184 precariat和precariou
s Labour 54,
59,131,132,173*不稳定的*
*生活*(2004)132不稳定14,
107,109,111,
126-129, 132, 146, 147, 220 资
源219预防原则26,28预测性警
务48偏好聚合175呈现，慢动
作观看76
*时间紧迫*(2015)159*监狱笔记*,
The(1971) 190隐私136-138,148
私有属性82,90,213私有化57,87
特权，男性化和
白109问题，方法24 - 26,28生产
力55,126,131,135-137,
146、179、20
6-209进步25、56、74、75、
99属性权利14消费61精神分
析146 - 147心理学129、146公
共服务互联网69公共服务媒
体(PSM) 220 publicitalia 191
“放出去的系统”，14

## q

邱，杰克林川112,151-
167,178
QQ、即时通讯161量化59、
126、127、132量化自我3、
23、37
“量化职场”项目
(QWP) 136-138酷儿不适111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The
(1977) 217

## r

种族主义27
ranci<e:1> re、Jacques 186
理性主义传统5里根、罗纳
德总统45实时4,5,7,30 - 31,
37,76里德·爱思唯尔62监管
(见另见影响)
监管)9,76,219物化59,73
Rekret, Paul 81-100 关系
32 - 33,37,111 Repealers
112生殖劳动61,62,113,120
“生殖转向”107生殖工
作 104,109 RescueTime 软
件136弹性23,145,146弹性
研究37,44

抵抗138 148 152 159-163被奴役的153
数字化劳动的影响130响应性25, 26,30,37 '的直接过程的结果
[1864] 166 Reveley, James 110
Revelli, Marco 189 - 190,200革命斗争172,179,180 - 181
里基茨，乔117,120
风险9,25-26,38
《风险社会》30
机器人传感器，使用35
洛克菲勒基金会23罗斯，
安德鲁130,131朗西曼，
沃尔特10

## 5、

萨尔维尼、马泰奥196
桑德斯，伯尼196
桑多瓦尔，切拉111
施密特，阿尔弗雷德85,88施密特，卡尔173
约瑟夫·熊彼特64岁
《科学与技术研究》92
科学管理130
艾伦·西尔斯105
第二次现代性，26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4
自我实现104
自主创业127
员工的自我认知147
自我，生产147
自跟踪126,130台128
半资本主义12
Senseable City Lab (MIT
灵敏度38
性，观念90
性工作106
共享经济127
共享干扰130深圳，中国14、156、158狗屎16
*sign and Machines*(2014) 12
硅谷14,16 Simondon, Gilbert 139, 206情境撬动130奴工105
奴隶制与反奴隶制3,27, 155 - 164,165 - 167电路模式155奴隶制起诉154奴隶贸易154 - 155,158,165奴隶贸易法案(1807)154智慧城市5 - 7,14
斯迈斯，达拉斯61斯诺登，爱德华58,220社会契约，89社会达尔文主义131社会民主主义68社会工厂103 - 108,110,119
社会媒体61,62,65,183社会媒体平台7,153,159
社会运动3社会网络208社会再生产109、113、119、128、138
社会科学，计算59 Sohn-Rethel，阿尔弗雷德48,75,85,88
索卡尔的“骗局”，90, 92团结148,155解决主义25-26,48,49苏监视130种-被130推测14
自旋医生201斯宾诺莎，巴鲁克131,139,148斯宾诺莎132
施普林格62
尼克·斯尔尼切克109、112、121、192斯大林主义220
创业党194，国家200，(作为泛光力量)58

斯特尔，尼克
斯特拉森，玛丽莲86-87,
89,91施特雷克，沃尔夫冈47
“史崔珊效应”，64压力
131、132、137次等111劳动条
件106持久性107臣服13主体化
172、175、176去主体化系统
174主体性105、110-113、119、
121、128、152、159、161、
162、210、212
机械的212-213
竞争中128个主体(the),
82、85、110-112,171个集体，
176个政治，172个后结构主义
批判
82 - 83,90 次 贷 14
糖155,158超级基地
195-198供应链8
剩余价值54、61、64、
65、121、126、133、153、
159、
216、219监控8、48、105、
137、219算法74意识形态57、
59、219社会2、73
职场8、126、137监控
意识形态48监控-工业综合
体
57、58监控-工业互联网
综合体220
“幸存者”173-175
可持续发展7象征性资本
10不稳定研讨会
工作132系统17
3-174,182

**t**

*tabula rasa*， 记 作 89
Tambakaki, Paulina 183-
186 Taskrabbit 106
税收，资本219泰勒主义
61,189算法205技术决定
论10,43,215,217
技术6-9、10、27-29、44-45、49、
99、125、130-131、133、135、
146、215
作为进步的进步84对217-
218的挪用效果批判91
55-56的辩证法
在资本主义中217技术乐
观主义2,152,217和技术决
定论
10,14技术悲观主义2,44,
68,
215,217科技乌托邦主义
14,179“时间主权”159
恐怖主义48,57,59理论,
“死亡”8
*主体理论*(2009)177《美国第
十三修正案》
《宪法》(1865)166《*千*高原》,
*A*(1987) 206《工作蒸蒸日上》
报告145 Tinder 192
Torvalds, Linus 197 极
权主义59,75跟踪和监
控 技 术 131,135 - 138,
140
工会(见工会)130跨个性139
跨国公司16运输5,13,16,44,
217伦敦交通局5特隆蒂，马
里奥104

特朗普，唐纳德总统48,
65-67、108-109、196青、
安娜33
图灵机，4《*为奴十二年*》
(2013)156二十一世纪，30、67、
152、154
推特7、60、66、67、117-123、
176,
178、180、188、191、
194规则变更120
“like”特征120

**u**

优步106、127、189、191、
192、195无处不在的传感技术7
“终极奴隶”154不确定性9、
47-49、147*汤姆叔叔的小屋*
(1852)161失业85
UN全球脉动45 23工会
45 117 119 120 132
134-135、160、175、193联合
国(UN)、4可持续发展目标7全民
基本收入219无人驾驶飞行器(见
无人机)6
Upwork 127
城市设计109用户生成内容
(UGC) 155;
161、193个用户生成的假
新闻48个使用价值129、130、
179

**v**

估值89,209,210,213自
我- 62,210
价值链108-109价值(另见
交换;盈余;使用)11、14、54、
120-122,
127、172、206、209 - 210、
213在
资本主义107-110资本的
“外”126先锋党179-181
先锋党181、184、185瓦
里安、哈尔R. 8维尔科娃、
茱莉亚108维恩、库兹126
风险投资16维切隆、卡洛
11,211维哈格、保罗147
维尔诺、保罗130、148、
209病毒爆发29,76漏洞26,
27,132

**w**

韦克曼，朱迪159工资奴隶制
166韦克菲尔德，斯蒂芬妮37
威尔士，吉米197沃勒斯坦,
伊曼纽尔47-48*华尔街日报*
156沃尔玛5
网络日志161
Web of Science 6
微信161
韦奇伍德反奴隶制大奖章“梗”
161
83．*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1993
微博160-161
幸福126-128,136-137,
145-147威斯敏斯特，1大学
维基百科197
亚历克斯·威廉姆斯109、112、
175-176雷蒙德·威廉姆斯56-57
《*资本的自愿奴隶*》(2014)131
*Wired* 8
维特根斯坦、路德维希
82作品
变成“生活的全部”130
个班次，处理13个工人
生成的内容
(wgc) 156,159,161

工人监控技术126工人阶级，数字时代的65、67、131、166人60、160(大众)67、111、130、216工作场所跟踪技术
106、126、131、140
世界银行23
赖特·米尔斯，C. 58

**x**

仇外心理57徐
立志158

**y**

YouTube 188、220豫园鞋厂罢工
(2014) 160

**z**

零时合同127张廷珍157中国郑州⊠i⊠ek，斯拉沃伊147,172,174扎克伯格，马克197



**本卷**探讨了数字化主体和客体时代的行动主义、研究和批判，以及据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政治未来的数字化转型后的大数据资本主义。乐观主义者断言，“数字”承诺:新形式的社区和认识和感知方式，创新，参与式文化，网络行动主义和分布式民主。悲观主义者认为，数字技术通过新的控制形式、网络威权主义和剥削、去人性化和监控社会扩大了统治。领先的国际学者对这些主张提出了不同的跨学科评估——在理论上和通过对话——以及数字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数字行动主义的潜力、陷阱、限制和意识形态。他们反思计算社会科学、数字人文和无处不在的数据化是否会导致威胁批判性研究的数字实证主义，还是会导致理论和社会的新视野。


**编辑们**

**大卫·钱德勒**，威斯敏斯特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韧性:国际政策、实践和论述》杂志编辑。他最近的专著是《人类世的地球政治学:测绘、传感和黑客入门》(2018)。

**Christian Fuchs**，威斯敏斯特大学社交媒体研究教授，传播与媒体研究所(CAMRI)和威斯敏斯特高级研究所(WIAS)主任。他是《***tripleC***》杂志的联合编辑，著有《传播批判理论》(2016)，最近著有《数字煽动者:特朗普和推特时代的威权资本主义》(2018)。



ISBN 978-1-912656-20-2

政治|社会理论|数字媒体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uwestminsterpress.co.uk